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大江洪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长江出版社
CHANGJIA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江洪波 /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20.12
ISBN 978-7-5492-7460-4

I. ①大… II. ①中…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37927 号

大江洪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李海振

装帧设计: 刘斯佳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 430010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电 话: (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市委印刷厂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16 印张 230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92-7460-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

编辑部

主 编 郑水平 田子渝

副主编 宋 健 李福珍 文道贵 张秋实 张 军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玲 王文全 王萍丽 刘桂芳 孙 勳
杜学勋 李 云 杨志权 杨剑波 肖 俊
何利平 沈泉晓 张志宏 陈 磊 周 薇
钟贤超 袁 刚 袁 琳 夏伟平 高万娥
傅 俊 谢 晶 戴定凯

《大江洪波》

编写组

编 著 张 军 张肇俊

编写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晓东 刘桂芳 齐志坚

孙 勳 吴 翔 何利平

宋 健 陈 磊 范文明

目 录

001	他从延安来
008	从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到新四军主要创建者
017	铁军名将，抗日先锋
027	“身份合法了，声音也要合法”
031	上海大戏院群英荟萃
039	张爱萍赶赴台儿庄
046	七月七日，武汉涌动献金潮
052	正义的力量
068	“日本进步的良心”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在武汉
078	排下诗的战阵，挖出文的壕堑
087	战歌声中的爱情
094	做民族抗战的号手和共产党人的朋友
101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114	博爱和正义的使者
120	地火喷发
126	孤军南下，深入敌后
136	打得熊光“神兵”作鸟兽散
142	新四军中的美女记者



150	敲开武汉西大门
156	兵定姚家山
164	汉阳伪军反正
170	红色涨渡湖
179	鏖兵侏儒山
189	金水河畔抗日英雄逞英豪
194	深水潜流——沦陷时期的中共汉口市委
202	活跃在武汉周边的反战勇士们
207	奇袭青山日军机场
212	武汉城区武工队
218	革命“尼姑”曾赛珠
222	新洲有位“刘大爷”
228	红烛之光——黄陂籍省委书记杨学诚传奇
236	从书斋走出的钢铁战士
246	武汉受降

他从延安来

1937年9月下旬，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尘仆仆从延安经西安来到武汉。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董必武。他是在蒋介石实际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来武汉，着手恢复和开创湖北党的工作，并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联络和谈判的。到武汉后，董必武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得力于朋友、商人熊子民的帮助，武汉“八办”的房子很快有了着落，就设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二号，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八路军将领李涛（李湘龄）被任命为处长，武汉“八办”便正式对外挂牌了。

董必武住在“八办”，并在东方旅馆楼上租下一间客房，接待各方访客，扩大党的影响，开展统战工作。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国民革命时期又主持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还是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兼农工厅厅长，组织、领导过湖北省的工农运动，在湖北拥有很高的威望。得知他回到武汉后，许多老友，如石瑛、严重、张难先、李书城、李范一、周苍柏、孔庚、蔡寄鸥、曹振武、陈楚伯等纷纷来看望他。这些老友或是国民党的元老，或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与他交谊深厚。把手晤谈之际，董必武感慨不已，说：“读顾亭林的诗，记不记



董必武



得这两句：‘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深’？我在由西安到潼关的途中，忆及这两句诗，觉得非常的可感。”由此论及国民党发动十年内战，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惨状，进而谈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和重要，得到来访者的认同。

石瑛是董必武在辛亥革命时期结识的朋友，此时正担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他为人刚正，清廉自律，虽身居要职，却一尘不染。对这位老友，董必武十分敬重，石瑛对董必武当然也钦佩有加。11月的一天夜晚，石瑛来到董必武的住处，与他会面，既为着叙旧，更为了商量合作抗日的事。

一番寒暄、互道别后情形后，石瑛直截了当地说：“洁畬兄，现在既然是国共合作、共御外侮之时，我想与中共方面合作办一件实事。”原来，湖北省建设厅下设有一个农村合作委员会，由石瑛兼任主任，农村合作委员会的宗旨是以发放贷款的形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以委员会的名义分配到各地去工作的人就叫农村合作指导员。农村合作指导员须经农村合作指导员培训班培训，此前，那些培训班培训出来的人多以做官为目的，并不热心农贷工作，石瑛对此十分失望。现在国共合作了，共产党擅长发动农民，做农村工作，因此他决心与共产党合作，以建设厅的名义，用共产党的教育方法来办培训班，培养一批真正的能为农民服务的指导员。

董必武听罢，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国共合作形式，对石瑛的提议当即表示赞同。至于办班的具体事宜，他们商议决定，开班地点设在鄂中应城县的汤池，由爱国人士李范一先生出面主持，因为李范一既是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又正在汤池主持农村改进实验区。共产党方面则派人具体领导训练班的日常工作，训练班全名为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

无疑，这个训练班为我党借助湖北省建设厅的招牌，用建设厅的经费训练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从而为恢复和建立各县、区党的组织，宣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因此，董、石商议后不久，中共湖北省工委经过研究，决定派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去负责领导汤池训练班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

虽然后来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和破坏，汤池训练班只办了四期，但它培训的 300 多名学员，不久即成为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力量。

就在董必武忙于筹办汤池训练班之时，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也转移到了武汉，中央决定将南京“八办”合并于武汉“八办”，由钱之光任处长。南京“八办”与武汉“八办”合并后，人员增加，办公、住宿更为紧张，原安仁里二号“八办”的房子明显不够用，而此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许多重要机构已纷纷迁到武汉，社会各界人士也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寻找新的合适的办公地点十分困难，怎么办？

董必武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学生徐会之。徐会之别号容庵，黄冈宋塆（今团风县总路嘴镇宋塆村）人，黄埔一期生，曾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在国民革命军从事政治工作，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号为国民党政工“四大干将”。抗战爆发后，任保定行营政训处处长。由于有这层关系，董必武找到了他，请他出面想办法。

徐会之曾是共产党员，又见自己的老师董必武亲自来找，当然不会怠慢。于是，他指定市政府将日租界中街 89 号（今长春街 57 号）四层楼的“大石洋行”，连同 90 号、120 号及成忠街 53 号的房屋都拨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为办公用房，武汉“八办”的房子问题因此得以顺利解决。后来，徐会之于 1950 年 11 月受党组织委派，赴台湾从事情报工作，1951 年 11 月在台湾被以“共谍”罪名杀害，1985 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7 年 12 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调整此前为开展国统区工作而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的人员构成，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在武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汉，负责与国民党联系和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负责新四军和东南党



的工作，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

12月18日，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由延安飞抵武汉；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两者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董必武兼长江局民运部部长，主管文教、妇运、青运、党派等工作，并兼管湖北省委。



1945年，董必武（中）与朱德（左）、周恩来在延安机场

董必武对湖北省委虽是“兼管”，但实际上对全省党组织和党员发展处处关心。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书记杨学诚受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秦邦宪的指派，来到武汉，组织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杨学诚为书记。这是十年内战之后武汉地区最先成立的地方党组织。就在董必武到达武汉后不久，1937年9月22日，原红31军政委郭述申（化名李震寰）奉中共中央命令，回湖北工作。董必武接见了郭述申，指示他尽快熟悉情况，恢复湖北党组织。几天后，原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何伟经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营救出狱，由南京来到武汉，和董必武取得联系；陶铸、钱瑛经周恩来、叶剑英营救，也从国民党监狱获释，来到武汉。在董必武的指导、关怀下，他们接收并整顿清理了杨学诚的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组织，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12月25日，湖北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将省工委改组为中共湖北省

临时委员会，郭述申任省临委书记，陶铸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钱瑛任组织部长，机关设在汉口富源里内。次年1月，省临委改组为省委。

在此过程中，董必武指导中共湖北省委积极而稳妥地整顿、恢复党的各级组织，湖北省党员及各级党组织因此发展迅速。到武汉会战结束前，武汉的党员达850名左右，全省其他县市也发展党员3000多名，建立了鄂东、鄂中、鄂南三个特委，鄂北、鄂西两个中心县委，武昌、硚口、汉口、汉阳四个区委，以及黄陂特支。这为后期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董必武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当时经过多方争取，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董必武很珍惜这两块来之不易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一创刊，他即题词曰：“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此后，即便在百忙之中，他都坚持为这一刊一报写社论、审读稿件。

一个冬日的早上，《新华日报》的一位编辑遵嘱来到武汉“八办”董必武的住处取董必武写好的社论。当“八办”工作人员夏之栩、张越霞开门迎进那位编辑，并到董必武的房间叫醒他时，发现床前仅有一只棉鞋，另一只找了半天却未找着。夏、张两位女同志也很奇怪，帮着找，结果在被子里面找到了另一只鞋子。原来，前天晚上写完社论后，董必武太疲惫，仅脱了一只鞋，就穿着另一只鞋上床睡觉了。

蔡寄鸥是董必武的老乡，也是前清秀才，同盟会会员，进入民国后，一直以办报为业。武汉会战期间，他与董必武多有交往，他后来在《武汉新闻史》中记述眼中的董必武时说：“（他）地位较高，但是每月俸禄不过三四十元的光景。新华报上，每天有他的论文。他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每天奔走忙，写作忙，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他的做事精神，的确是够人佩服的。”

就在董必武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南方党组织、开拓舆论阵地的同时，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经前期国共双方反复谈判、磋商，叶挺、项英先后被任



命为新四军正、副军长，中共中央同时任命项英为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决定“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挂牌，各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随即全面展开。为便利工作，中央决定，新四军各部的改编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就近指导。不久，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但长江局对新四军各支队，尤其是第四支队高敬亭部的改编和东进抗日工作，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

需要说明的是，从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川陕后，高敬亭即留下来，重组红28军，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率部转战于鄂豫皖边，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保留了火种。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高部接受改编。1938年初，董必武和叶剑英先后来到黄安七里坪，检查了高部的改编情况。2月，高部三千余人开赴皖中舒城集训。当时新四军另外三个支队皆为一两千人，高部实力最为雄厚，高因此颇为自傲。由于他对中央作出处理张国焘的决议不理解，对中央派往他那里工作的干部也不满，加之长期独立游击战争养成自作主张的作风，因而他对中央要求其率部东进的指示执行不力，将战斗力较强的手枪团留在身边；对新四军军部的指令也多有不从。

1938年5月上旬，董必武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指派，带着长江局参谋处作战组组长边章五，从武汉出发，准备到舒城东蒋冲高敬亭驻地，做高的工作。这一路不仅行程远，要通过第五战区李宗仁的防地，还不时有土匪出没。但董必武不惧险难，风雨兼程地赶到了舒城。从舒城到东蒋冲有八十余里，全系山路，无车可通，五十二岁的董必武和年轻人一样，爬山涉水，不眠不休地赶到了。见到董必武后，高敬亭起初是一副拒人千里的模样，甚至不让董必武接触连以下干部。董必武不急不躁，坚持耐心做说服、解释工作，经过七天七夜艰苦细致的努力，高部广大指战员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有了更多了解，对张国焘错误的性质、根源和危害有了较清醒的认识，高敬亭本人也对前期的所作所为有了一些悔悟，表示愿意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新四军军部指挥，正确对待中央派往四支队的同志，并把手枪团改编为教导团，开赴抗日前线。董必武以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终于完成了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委托的任务，使高敬亭这位个性桀骜的将领在政治上逐渐回到了正确轨道。

返程的时候，董必武一行经过金寨——黄安一线。在金寨，他们时而爬山，时而蹚水，董必武的脚上起了大水泡，腿也肿胀了，他拄着木棍坚持前行。在黄安，过倒水河时，正碰上山洪暴发，河水陡涨。董必武是在警卫员姜成的帮助下，坐在一只大木桶里，以木板代桨，划过河去的。

在董必武返程时，高敬亭指挥四支队加速挥师东进，其中四支队第9团于5月12日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大获全胜，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第一枪。



从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到新四军主要创建者

七七事变发生时，项英远在南方游击区领导游击战争，十余天后，他才从山下交通员带来的报纸里看到这一重大消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一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占领平津乃至华北的既定步骤，是国际国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的开始！

面对新的形势变化，回想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那 1000 多个风餐露宿、钻山穿林的日子，项英这位硬汉禁不住泪眼蒙眬，百感交集。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和陈毅临危受命，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他们率领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以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伤病员 3 万余人，担负起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重任。

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后，对留守的红色武装展开了疯狂“清剿”。红军及地方武装被挤压在狭小地区，随时有遭围歼的危险。中央分局只得分九路突围，项英、陈毅率分局转移到粤赣边根据地的油山地区活动。

1935 年 3 月 9 日开始突围前，项英向党中央发电报，报告中央分局的行动方向，由于信号不好，电报从早晨发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发完。这时天已擦黑，项英和陈毅埋好电台，烧掉密码后，这才带上一个营，摸黑前行。从此，他们与中共中央失去一切联系，“完全成了一支瞎眼的部队”。他们转战江西信丰、大余和广东南雄三县交界的油山一带，凭借山高林密、

地势险要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争。分散转移、夜半行军、设伏打敌，便成了家常便饭。为保密需要，项英化名“老周”。

初上山时，他们还能住窝棚，后来敌人封山了，他们连窝棚也住不上，雨天就撑把雨伞，在大树底下休息，晴天就在坟上或石板上睡觉。山上缺粮，他们就靠山吃山，春挖竹笋，夏摘杨梅，秋找野菜，冬摘山果，以此来果腹充饥。项英回忆说，“几乎有两年时间，我夜里从不脱衣服，而且总是穿着鞋子睡觉。我们多数士兵都是这样。那时我老穿着一套棉布制服，后来这套衣服褪了色，破破烂烂的尽是补丁”，而且“我们总是吃不饱”。至于缺医少药、弹药匮乏，那更是一直困扰红军游击队的难事。

尽管如此，项英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在与国民党军兜圈子的过程中，许多物品都丢弃了，可项英的挎包里却一直珍藏着《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概论》等书籍。这些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书籍，他反复钻研，看了又看，翻了又翻，后来书面、书页翻烂了，他依旧爱不释手，不时取出阅读。

现在全民族抗战开始了，国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项英以他特有的政治敏锐性，迅速做出了这种判断。他立即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指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华的步伐会加大加快，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会进一步高涨；国民党在全国民众抗日热潮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不抵抗主义，蒋介石亦不得不被迫宣布抗战，国共联合抗日挽救中国的局面即将到来。

当时这种判断还只是他在隔绝状态下对外界所作的一种分析，还不能在油山地区党员中作大范围的宣传，怕在党内引起不良影响。七月底的一个偶然事件彻底印证了项英的判断。他从托人买的一本《新学识》中看到诸青来的一篇关于各党派的论文，引用了毛泽东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摘要。项英非常兴奋，如获至宝。据此，项英和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一起研究，并以个人名义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认为中国革命正发展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的阶段，游击队



要遵照党的路线和要求，与国民党谈判，争取合作抗日。随后他又主持赣粤边区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精神，统一大家的思想，并派人到其他游击区联络、传达。

八月中上旬，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先后向国民党地方政府和边区群众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战宣言》及《告赣南民众书》，呼吁团结御侮，共同抗敌。8月20日，赣粤边特委又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第四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员马葆珩和第46师师长戴嗣夏，“敦促协商合作抗日事宜”。

不久，陈毅受派到大余县、赣州与国民党的县、省政府官员进行谈判。9月下旬，项英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并借此与驻南京的中央代表秦邦宪、叶剑英取得了联系。29日，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了《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信中云：“余遵照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指挥之下效命杀敌。望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以便追随全国友军和第八路军之后，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斗争。”

得知项英等人信息后，党中央急于向南方红军游击队告知集中改编的方针，并想让项英来西安一趟，但中央又没法与项英直接联系。

9月29日下午，中央书记处致电张云逸等人，通过他们告知项英相关事项。次日，毛泽东又给秦邦宪发出一电，要求迅速找到项英，并强调“南方游击队不宜集中”。可见中央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是何等记挂，何等焦急！而找到项英正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时，秦邦宪想起刚从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解救出来的顾建业，他老实本分，办事可靠，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期间，与项英有过多次接触。秦邦宪认为他是去江西找项英的合适人选。于是，顾建业改名顾玉良，受命去完成这项特殊任务。临行前，秦邦宪给项英、陈毅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当前形势，说明了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原则。

顾建业辗转来到赣南后，将中央文件及秦邦宪的亲笔信转交给了项英。

项英阅罢，满怀感激地对顾建业说：“中央的指示来得太及时了，倘使再迟个几天，只怕我们的工作受损失了。”稍停，他对围坐在身边的陈毅、陈丕显、贺敏学等人说：“现在我们清楚了中央精神，就像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跛子走路有了拐杖，走夜路的人有了灯笼一样，我们的工作从此有方向了。”

10月12日，项英带上两名警卫员，与顾建业一起，4人乘坐一辆从华山钨矿借来的吉普车，自赣南池江出发，转赣州，过兴国，经南昌，抵南京，与秦邦宪、叶剑英会面，随即奔赴延安。

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就像久离父母的孩子，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父母的身边一样，离别中央3年的项英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宝塔山，延河水，湛蓝的天，黄澄澄的土，这一切对他来说，是那样的陌生，又是那样的亲切。握着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手，他一遍遍地说：“我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党中央对他的回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对他领导的南方游击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项英出席会议并提交了南方游击区域《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详细报告，专题报告“南方各游击区工作问题”，还讲述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历程，同志们深受感动，不少人热泪纵横。当同志们纷纷赞扬他是死而后生的英雄时，项英谦逊地说：“我们革命者是惯于从死里复生的，看看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吧！他们已经被‘杀死’十来次了，作为个人，我们算不了什么，但是作为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是不可征服的！不论中国革命‘死’了多少次，它总是会复苏的。中国是不会亡的，中国革命是不会亡的。”



这次会议通过了项英起草的《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高度评价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2月14日，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南方游击区的工作，就新四军组建、东南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主席（后改为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主席（副书记）。

项英抵达延安时，已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也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早项英几天来到了延安。这两位新四军主要负责人见面，并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等问题进行了商讨。中央为项英举行了欢迎大会，叶挺亦应邀参加，并在主席台上就座。

12月18日，由于南京已经沦陷，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等由延安抵达武汉。到达武汉的当天，王明、周恩来、秦邦宪给毛泽东、张闻天致电：“蒋（介石）已到汉，明后日或可见面”，“请告项英同志早日来汉，以便赶快解决新四军问题”。

得此催行电报，项英在完成向党中央的汇报任务、接受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命令后，即于当日带领赖传珠等一批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从延安出发，南下武汉。

12月23日，项英等人抵达汉口。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将项英拟任新四军副军长的建议，报送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批。干部配备和新四军编制问题是项英来汉后开展的两项主要工作。

对于一支由长期战斗在深山密林里的游击队组成起来的军队，游击队自身干部无论是政策理论水平，还是其思想认识高度都难以适应国共合作

新形势下的要求。而新四军成立后，还有个发展问题，这也需要大量有水平、有能力的干部。因此，争取外派干部、多派干部是新四军组建中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项英在开完政治局会议、离开延安到汉口前，曾专程到中央组织部挑选、商谈调派到新四军工作的领导骨干。项英要求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调派一批曾参加过北伐或在两广工作过的领导骨干到新四军担任领导职务，以便于和叶挺合作。

项英到达武汉的当天，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即与项英一起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请求中央“凡交给新四军及东南党部的干部，从曾三（山）同志起，均请加速度地送出，即经西安转来武汉”。4天后，项英又就干部配备问题发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说：“根据目前形势，我们急需到南方布置一切。曾山及派往南方的军、政、党干部立即动身到汉，迟行对于工作有损失”，“张际春，请毛急调回来”，“浙江干部请多派来，以便建立工作，配合四军行动”。6天后，项英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曾山等人应即来汉，否则对于工作有损失，并（请）立即促他们动身”，“张际春请急调回派来，否则建立政治工作成问题”。

这急如星火的连续电报催请，其心情之急迫，处事之急切，体现了项英对新四军的殷殷关切及高度负责的态度。

在叶挺、项英的一再电催下，中央派出了多批干部奔赴武汉参加新四军组建。第一批从延安调派到汉口的干部是原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率领的20人，第二批随项英到汉的有原红一军团师政委赖传珠等人，第三批从



项英（左）、周恩来和叶挺



延安调派到汉口的干部是曾山、原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一氓等人。

这些从延安调派到新四军的领导骨干陆续到汉后，同叶挺在武汉“招兵买马”集聚的人才一起，共同组成了新四军军部的组织机构，军部下设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兵站处。根据党领导军队的原则，新四军突破国民革命军机构设置的框架，在军部下设置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部，下辖同军部各处平行的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运动部、敌军工作部、战地服务团。当时已到汉拟任新四军领导职务的有：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参谋处长赖传珠、军需处长叶辅仁、军医处长沈其震、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等人，还有些组织机构领导人暂缺；也有些新到汉口的领导人没有来得及明确领导职务。一时间，新四军筹备处群英荟萃，将星云集。

在组建新四军过程中，围绕编制问题，国共双方在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过程中也展开了艰苦谈判和反复磋商。叶挺到延安向党中央请示工作时，中央“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此议为蒋介石拒绝后，中央又提出编两个纵队，下辖六个支队，不料这一要求还是被何应钦否决。最终，经叶挺、项英和中共代表团据理力争，国民党同意新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支队等于旅。

在武汉期间，项英忙里偷闲，利用与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谈判的空隙，回自己老家去看了一眼。40年前，他出生在武昌粮道街273号那栋坐西朝东的老宅，在这个带天井的院子里，他依稀记得父亲晚上在油灯下伏案抄账的身影。老人是武昌县钱掌柜的账房先生，管着全县的钱粮账务，有这样的职位，他家里的生活在当时还是过得去的。但好景不长，十岁时，父亲病逝，全家随即陷入困顿境地。母亲虽然能干，缝补浆洗、织衣刺绣，样样来得，可他和妹妹项德芳还是不得不靠捡破烂贴补家用。这使他很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不公平，也使他很早就成为工人中的一员，并在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京汉铁路大罢工中，从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到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诞生；从罢工决策的制定，到罢工的失败及善后处理，他一直勇敢、坚定地战斗在最前线，领导着这场大罢工斗争。正因如此，

党的三大、四大、五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六大上，他进入中央政治局，斯大林还亲自赠他一把小手枪。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其间他虽然曾回武汉，在武昌搞工人运动，但白色恐怖之下，他哪能奢望回家看看？现在他虽然能踏进家门，但军务系身，他又怎能与独守老宅的妹妹促膝话旧？他明白自己已不仅仅属于这所老宅子了，新四军的筹建工作还需要他去奔波。

12月25日，项英与叶挺主持了新四军筹备处的全体干部会议，部分游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项英在武汉工作期间，中央作出了大量指示，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所请调的干部均尽量予以满足，与国民党谈判后商定的新四军编制问题也从实际出发予以批准。

1937年12月27日，也就是项英离开武汉到南昌的前夕，项英就新四军的编制及干部配备问题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次日毛泽东即复电项英说：“甲、同意编四（个）支队，云逸、子昆任支队长。乙、曾山、李一氓等已动身来汉，周子昆等17人有车即走。丙、罗炳辉，中央决定仍随周子昆来兄处，酌量分配工作，罗在学习中有进步。丁、张际春河防政治工作无人接替，或令莫文骅来南方。”1938年1月3日晚上8时，周子昆率领的30名干部火速赶到汉口，这为项英放手工作，加快新四军的组建步伐创造了条件。

1938年1月1日，汉口大和街26号院内热闹异常，大家以加餐的形式庆祝新年的到来，庆祝新四军军部的成立。餐后，工作人员捆扎包裹，准备军部迁址南昌的工作，项英、叶挺等人则前往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拜会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领导。事毕，项英、叶挺、张云逸、周子昆、曾山五人在大石洋行门口合影，这是新四军领导人留给我们的第一张合影。

1月4日，项英带领新四军军部的主要人员前往南昌。从此，他和陈毅等人一起，凭借他们在南方红军游击队中的威望和影响，奔赴粤赣边、



湘赣边、闽赣边、闽东、闽西等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部队改编的指示，动员部队迅速集中。他们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完成了新四军四个支队、一万余人的队伍集中改编。这支崇山峻岭里锻铸出的新“铁军”，随即挥师东进，挺进敌后，驰骋大江南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不朽功勋。

铁军名将，抗日先锋

—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日军飞机、大炮、军舰对大上海繁华市区和无辜平民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的暴行，让刚结束流亡生涯归国的名将叶挺义愤填膺，作为一名军人，他怎能容忍侵略者肆意践踏祖国的国土，屠杀自己的同胞！他迫切希望能重返沙场，抗日御侮。但他此刻手中并无一兵一卒，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也委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组成代表团，与国民党商谈国共合作各项事宜。陕北红军改编与中共合法地位等大问题均已谈妥，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却迟迟不得解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尚有赣粤边、湘赣边、湘鄂赣、浙南、鄂豫皖边、豫南桐柏山区等十四支红军游击队。现在国共合作了，共产党地位合法了，这些分散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又何去何从呢？

早在1937年7月中共代表与蒋介石举行庐山谈判时，周恩来等人即提出要国民党停止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在改编陕北红军的同时，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可蒋介石一方面拒不承认南方有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存在，一方面依然大肆“进剿”红军游击队。随着淞沪地区战事日紧，中共再次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区红军游击



叶挺



队为国民革命军，尽快开赴敌后，实行抗战。对此，国民党不能不予以考虑，一则日寇气焰嚣张，进逼甚速，国家急需抗日力量；二则国民党需要解决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对付日寇的进攻。于是，改编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又一次摆在国共谈判桌前。不过，这一次国民党采取“挖心”策略，既不肯给这些部队以正式番号和必要的装备，又要派人到其中担任要职，以达到削弱、改编、控制红军游击队的目的，对此中共方面当然不能答应。中共中央坚持要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成立一个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于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

面对共产党人的坚决态度和淞沪战场日益紧迫的军情，国民党当局感到拖延不起，遂与中共达成协议，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促其早日开赴抗日前线。但在这支部队的军长人选问题上，双方谈判又陷入僵局。中共中央只得指示其代表团：“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周恩来等人于是转到上海、南京活动。

二

周恩来到上海后，得知叶挺也在那里，遂与其会面。老友重逢，分外欣喜。周恩来提出希望叶挺能出面编组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带领这支部队下山抗日。周恩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他深深了解叶挺的品格和为人。

叶挺是忠诚的革命者。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大元帅府，时任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的叶挺在危急时刻舍命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叶挺是北伐名将。国民革命时期，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北伐战争中，独立团作为第四军的前锋，越五岭，下醴陵，克平江，一路冲锋在前，所向披靡；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武昌攻城等战役中，独立团不畏牺牲，英勇作战，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立下了赫赫战功，叶挺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叶挺还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又是受过错误打击和脱

党的党外人士。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广东省委于1928年1月在香港召开会议，检查广州起义问题。会议把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归结为起义领导人的军事投机与冒险主义错误，叶挺因此受到了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他对这个处分决定不服，想找上级党组织申诉，于是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将广州起义的详情如实地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不料遭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严厉批评，而米夫的亲信王明对叶挺的批评比米夫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明未参加广州起义，但他引用叶挺报告中的材料，以其“生花之笔”，竟然写出了一份洋洋数万言的广州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指责和攻击叶挺。叶挺深感委屈失望，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共产党，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异乡漂泊生活。只是他从未中断与国内的联系，也从未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品德。

正是基于这一切的考虑，所以当周恩来了解到叶挺已从境外回到上海，正向有关方面要求参加抗战的消息后，立即会见了叶挺，对他这十年来的遭遇给予慰勉，表扬他身悬海外、心系祖国的爱国精神，并以个人名义建议叶挺先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工作。

叶挺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随即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工作，将这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继承和发扬北伐时期第四军“铁军”的光荣传统。叶挺这一想法不禁让蒋介石为之心动：一则三年多来，共产党领导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始终无法剿灭，现在中日战端全面展开，再行剿共，国际国内形势已不允许，改编实为上策，既可以调虎离山，稳定后方，又可以增强抗日力量；二则叶挺是北伐名将，在国内军内深孚众望；三则叶挺脱离共产党已有十年之久，也许不再与共产党一条心，这样极有可能利用叶挺达到控制这支中共军队的目的。

因此，蒋介石没有征求共产党方面意见，即于9月28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的名义，正式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同时，拨发5万元开办费，交叶挺支配。10月6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浙闽边和闽西等地红军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三

国民党这么爽快地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颇有些出乎叶挺的意料。他一时思想准备不足，遂立即赶赴南京，向中共代表团的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作了汇报，说明是“周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出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但对于是否接受这一任命，他尚未确定，主要还是要听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人事任命。对蒋介石的意图，中央非常清楚；对叶挺提出的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出发点和蒋介石的意图之间的区别，中央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毕竟叶挺离党多年，他的真实思想状况如何？他如何整编组建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又如何接受党的领导？对此，中央还不明了，还需要深入考察研究。

因此，对是否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这一问题，中央没有立即表态。毛泽东等人想让叶挺到延安去一趟，以便了解情况。1937年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和完全受党的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表示如上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我们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经过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各游击队。”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再次表示：“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秦邦宪、叶剑英及时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给了叶挺，叶挺当即表示愿前往延安，将具体情况向党中央当面汇报。

10月21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说：“一、叶挺愿前来面陈，已得何应钦同意，约一两日后即启程。二、叶已领官防及开办费五万元，（但）尚未呈报就职，待去延结果再呈报。三、各部伙食钱，暂由叶商地方政府维持。四、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就在叶挺即将到达延安的前夕，毛泽东还在打电报给周恩来，向周恩来询问与叶挺在上海的交往情况。

10月下旬，叶挺动身去延安，11月3日到达。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

领导人对叶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了热情接待。毛泽东向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他出任新四军军长表示完全信任和支持,但前提是部队必须绝对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准国民党插手干涉。叶挺表示完全服从党的指挥,至于毛泽东提出的是否恢复党籍的建议,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党中央权衡考虑后认为,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叶挺暂留党外,有便利其工作之处,遂同意了他的意见。此后几天,叶挺除到延安有关部门参观访问之外,还就新四军的编制及干部配备问题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商谈,双方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主任,周子昆任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11月7日,项英接中央指示,也来到延安与叶挺会面,叶挺、项英及中央有关领导再次就新四军组建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其间,中共中央专门在抗日军政大学为叶挺举行了一场欢迎大会。大会由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主持,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欢迎词。他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欢迎叶挺军长!为什么欢迎他呢?因为他是北伐时期的一代名将,曾经站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时代前列;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领导我们南方游击队的同志上前线打日寇;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愿意为扩大巩固这条统一战线而努力。这样的朋友我们能不欢迎吗?”毛泽东的一席话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说得叶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叶挺在答谢辞中真诚地说道:“同志们,这时候的天气虽有阵阵寒意,但我在这里却感受到了十二万分的温暖,同志们欢迎我,我实在愧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往上走,我呢,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就折回去了,现在又算是重新爬吧,希望能够很快跟上来。毛主席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今以后,我一定谨遵党所指示的道路,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抗战到底。”

叶挺的这番延安之行使党中央真切了解了他的思想状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表现出的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也使他深受鼓舞,终身感激。皖南事



变后，他被囚桂林。一次在与一位记者谈及自己当年的延安之行时，他深情地感慨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懂得爱护干部使用人才，毛泽东主席特地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他主持会议，给我以过高的评价，真令我感愧哦！我不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了吗？这个家我想念多久啊！我二话没说便接受新四军军长的任命。”

四

叶挺离开延安后，在武汉稍作停留，便急忙赶赴南京。11月13日，叶挺首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报界发表谈话。他说，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无论到怎样地步，都要去拼，舍得拼死，就没有不成功的。

叶挺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后，向中共驻南京代表兼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报告了延安之行的情况。叶剑英是他的老战友，大革命时期和广州起义期间，他们是一同走过枪林弹雨的人。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又走到了一起。叶挺把他到延安后与中央领导人商议的新四军改编、干部调配意见及自己对党的认识、今后新四军的领导、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统统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高度赞扬了叶挺对党的忠诚。时值隆冬深夜，他们就着火盆，啜着淡茶，在丝丝幽香和融融暖意中倾心交流，两个曾经的同志的心又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11月21日，叶剑英陪同叶挺去见蒋介石。寒暄之后，切入正题，叶挺将延安商谈时拟定的干部名单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蒋介石一听就变了脸色，板着脸对叶挺说：“南方游击队不同于八路军，干部名单不能完全由他们提出来。你看你的周围全是共产党，就你一个不是，这样做，你将来有性命危险的。南方游击队不能由着共产党报多少就是多少，必须要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长、旅长，然后去扩充力量，那样行不得！”

叶挺与叶剑英对视了一眼，他压住性子，耐心地对蒋介石说：“现在将他们开到前方打日本才是主要问题，至于人事问题，容易解决。”

蒋介石连连摆手：“不是的，不是的，事情恐怕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叶挺见状，转换一个话题，以商量的口气问道：“委员长，新四军的经费还没有着落，有些部队吃饭都成问题。”

蒋介石的口气一点都不松动：“你说的这个问题——游击队还没有整编完成，经费按什么发？吃饭的问题，让他们找地方政府解决。”

叶挺正色回答道：“军费还是早落实为好，这样部队可以早日改编，早地上前线，不然对地方也不好。”

蒋介石见叶挺语气强硬，立马提高声调道：“游击队需要整编上前线的，否则待在原地扰乱地方，那就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绝不能在江南。”接着，他又厉声问道：“谁让你去延安的？”

叶挺一脸愕然，没好气地说：“这是与何部长请示过的。”

蒋介石碰到个软钉子，连声以“噉”“噉”打掩护。叶挺这时候已忍不住了，进一步说道：“委员长，我自觉难以担负这份重任，回去之后我立马向军委会打请辞报告。”这回轮到蒋介石一愣，他知道这位犟脾气的将军说的不完全是气话。倘若走到这一步，叶挺甩手不干，他蒋某人也不好向国内外交代。于是，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语气和缓地说道：“希夷，你把问题想严重了，对新四军的人、财问题，我只提原则意见，具体问题你与辞修商谈就行了。”

叶挺、叶剑英虽然带着满腹的愤懑离开，但叶挺还要为新四军组编的事周旋于国民党的各个部门之间，与国民党的大小官僚打交道，他要用自己最大的能量克服一切困难，为这支党领导的军队争取最大的发展空间。

五

11月下旬叶挺来到武汉后，着手开展新四军的筹建工作。他带着先期招募的人员，在日租界大和街26号选中一排三栋房子，作为新四军的办公用房。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封存的日本侨民房产，叶挺亲手撕掉封条，敲开门锁，破门而入，在门前挂起了“新四军筹备处”的招牌，开



始“招兵买马”筹建新四军。

1937年12月11日，叶挺就新四军组编事致电毛泽东：“毛主席：新四军改编事，已请董必武、叶剑英电告。刻军何（应钦）催办甚急。如何决定，请即复他，便处理。”毛泽东接电后，复电指示：“甲、新四军原则上可照军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乙、各支队以上最好能争到成为两个纵队，纵队长一陈毅，一张鼎丞。丙、长江以南各支队（共六个，不是五个），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丁、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应钦）派人。万一两队不能成立，则陈毅可改为政治部主任。戊、如暂时说不通，可稍延缓，但不要破裂。”

叶挺根据这些指示，与国民党据理力争，力争不到时，他又依照中央的意见，出面与何应钦交涉。几经波折，直到1938年1月8日何应钦才宣布：“核定新四军请求各项，该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个游击支队。”“所请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游击支队司令一节，准与照委。”“该军归陈诚总司令指挥集中，地点由陈司令决定之。”

在事关新四军的生存和发展的经费问题上，为争得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同等经费待遇，叶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不畏国民党当局百般刁难，反复地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虽然最后结果并不如意，但还是得到了部分解决。当时国民党军队一个师每月军费达20万元以上，新四军上报预算为每月16万元左右，最终国民党当局只批了6.5万元。周恩来等人找顾祝同协商又增加了2万元。由此，叶挺与新四军其他领导人认识到，新四军的发展不能寄希望于国民党当局，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才是新四军的发展根本。

干部和人才问题也是新四军队伍建设的重要问题，叶挺给予了高度重视。访问延安期间，他即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要求多派党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据此，中央向新四军输送了多批干部，充实了新四军的各级领导力量。叶挺自己也多方联系，动员和吸收了一批思想进步、有爱国心的知

识分子参加新四军。留日归国的医学专家沈其震，有感于叶挺的爱国热忱，放弃了大医院的工作，投身于新四军，被叶挺任命为军医处处长。林植夫是一位知名民主人士、大学教授，他钦佩叶挺的高尚人格，早就与叶挺结为知己，得知叶挺被委任为新四军军长后，他从后方弃家别子，加入新四军队伍，叶挺委派他为代理敌军工作部部长。皖南事变后，叶挺和林植夫同时被国民党扣押、隔离于江西上饶南郊的李村。叶挺恐遭敌人加害，遂抄写了三份遗嘱，分送林植夫等人保存。后来这几份遗嘱均因各种变故而损毁，林植夫为此悔憾终身。叶辅平是叶挺的胞弟，他是位勤勉负责、行胜于言的人，叶挺动员他参加新四军，任命他为军需处处长。他为保障新四军的后勤供应，劳碌奔波，呕心沥血，作出了极大贡献。1940年8月，他赴香港接受慰劳物品和军需物品返回途中，不幸在广西邕宁发生车祸，壮烈殉国。著名作曲家、《渔光曲》的作者任光，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等，也都是在叶挺的感召下而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中共中央长江局对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12月23日晚，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举行第一次联席会，第一项议程即是讨论新四军工作。会议决定：各地游击队应迅速集中，由叶剑英拟定新四军的作战方案。长江局参谋处下设军务组，专司新四军工作和游击队改编、扩大武装之责。随后，长江局在整编游击队，保证游击队的独立性，为新四军筹枪、筹款、筹粮、筹物、配备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12月25日，大和街26号，新四军筹备处的后院被布置一新，临时搭成了一个小型会场。筹备处的全体人员都换上了深灰色制服，齐刷刷地坐在那里，听候叶挺等首长讲话。

“同志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新四军军部的同志齐集一起，庆祝我们军部成立的日子！”叶挺扫视了一下全场，用他浓重的广东腔国语深情而兴奋地说道。众人掌声响起。

掌声过后，他继续说道：“同志们期盼这一刻想必已经很久了！想想过去的三年，我们中的大多数同志风餐露宿，忍饥挨冻，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革命保存了火种，为民族战争积蓄了力量。我们今



天能重新揭橥铁军的旗帜，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同志们百折不挠精神的胜利！”

端起面前的茶缸喝下一大口水后，叶挺接着说：“同志们，我们这支军队是党所领导的军队，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听党的指挥将是我们的根本宗旨。同时，我们这支军队也是人民的军队，抗敌保国救民于水火，将是我们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他挥着大手有力地说：“同志们，前路漫漫，征程迢迢，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等待我们去克服，还有许多的邪恶等待我们去战胜，还有许多的牺牲等待我们去承受，但这一切对于一个革命者爱国者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有党的正确领导，有人民的衷心拥护，我想我们一定能在抗日战争中敢于牺牲，敢于胜利，把铁军的盾牌打造得更加光亮！”

副军长项英也发表了讲话。

新四军军部就在这简朴而庄严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了。

次日，为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叶挺从国民政府所发的开办费中，拿出一些钱，给每人发了银圆8元的慰问金。几天后的新年元旦时，军部又请大家聚餐相庆。

1938年1月4日，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新四军军部开始迁往南昌，驻南昌高升巷新兴公馆（原张勋公馆，今南昌友竹巷友竹花园七至八号）。叶挺仍留在武汉，继续办理新四军编制、防区、干部委任、军费、装备等事项，在同国民政府筹委会协商基本各项遗留问题后，1月28日和29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发启事云：“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廿六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处长代办，所有一切公文信电，请径投南昌三眼井本军部为荷。”2月9日，叶挺离汉赴南昌，11日抵达军部，同项英一起部署新四军的集中行动和补充整训工作。不久，新四军各部集中改编完毕，并纷纷开赴抗日前线。从此，这支浴火重生的铁军，迎着日寇进攻武汉的方向，向敌人的后方进发，在大江南北的湖沼河港、崇山峻岭中，续写着铁军的辉煌。

“身份合法了，声音也要合法”

1938年1月11日，一份全新的报纸——《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轰动新闻。为什么一份报纸的出版会如此引人瞩目呢？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新闻媒介，而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机关报。

自从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得到国民党当局承认之后，如何“建立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其发行网”，让党的声音也合法地传到国统区，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身份合法了，声音也要合法”，成了中共中央的一大重要决策。早在南京谈判时，中共代表团即就办刊办报问题与国民党进行过多次谈判，来到武汉后，继续交涉，最终迫使国民党同意办一刊一报的要求，这一刊即是《群众》周刊，一报即是《新华日报》。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出版，一个月后，即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出版，社址设在汉口成忠街53号。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唯一的报纸。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及所属党报委员会领导下，由王明、秦邦宪、吴玉章、邓颖超、何克全（凯丰）等组成《新华日报》董事会。报社社长为潘梓年，总编辑先为华西原（华岗），不久后为吴克坚，总经理熊瑾玎，营业部主任先为寿松涛，后为易吉光，印刷部主任袁冰。编辑人员有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楼适夷、何云等；记者有刘述周、范元甄、杨慧琳、陆诒、张企程等。

《新华日报》是展现共产党人形象的窗口，传达共产党人声音的喉舌。其发刊词揭橥办报宗旨云：“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所以它谈及的宣传内容是：“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



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之原则下，本报将尽其绵薄，提倡与赞助一切有利于抗战之办法、设施、方针，力求其迅速确实的实现；而对于一切阻碍抗日事业之缺陷及弱点，本报亦将勇敢地尽其报急的警钟的功用。本报愿与全国一切志切救国的抗日的战士与同道，互相勉励，手携手地共同为驱除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

随后几天，《新华日报》便以其崭新的面貌，刊登各界人士的贺词、中共中央和长江局领导的讲话和文章，以及前方将士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但也招来了国民党内顽固反共分子的忌恨和压制。

1938年1月17日傍晚6时左右，十几个身着黑棉衣的凶徒，手持棍棒，二话不说，突然冲进报社营业部，一顿猛砸，毁坏门窗及印刷用纸、油墨。几分钟后，这伙人又像幽灵一样，一声呼啸，倏地消失在夜幕之中。这事引起了报社同仁的极大愤慨，当晚，报社拟定启事，对暴徒行径予以严厉声讨，对幕后指使者予以严正谴责！启事原定次日刊发，但送审时遭到国

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刁难，审查未过，故当日开了“天窗”。几经交涉，1月19日才登出启事。

此时正值日寇步步西侵、国共密切合作时期，《新华日报》的这一则严正启事，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此后直到武汉会战结束时，再无类似事情发生。因而，在武汉期间，《新华日报》能较为自由地发表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指挥员的文章和讲话，刊登党的声明，通过社论、社评等，向全



新华日报社旧址

国人民阐明中国共产党对重大事件的立场和态度，还以大量篇幅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回击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的谣言。除此之外，《新华日报》对台儿庄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的忠勇精神也给予了热情报道。徐州会战



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中心武汉创办并公开出版的报刊

展开时，报社还派出战地记者陆诒、石西民等去前线采访，忠实报道国民党将士浴血奋战的场景。它还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经常刊登沈钧儒、史良、梁漱溟等进步人士的政见，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倾听底层群众的呼声，反映他们的诉求，《新华日报》通过创办《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团结》《文艺之页》《友声》等副刊来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它在全国很多城市设立了分馆和分销处，其影响不断扩大，发行量从初期的每天2万多份，扩展到后期的5万多份。

对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新华日报》总是及时发表见解，纠正错误思想，引导抗战的走向。4月8日，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武汉各报纷纷发表社论祝贺，国民党中部分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中国抗战已度过危险阶段。《新华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强调指出，绝不能因部分胜利而产生丝毫骄傲的情绪。我们还应当清楚地了解，在军事上，我们的胜利还不过是局部的开端，敌人的损失和挫折也不过是部分的开始。它明确告诉人们要准备长期抗战，打持久战。4月26日，《大公报》发表题为《这一战》的社论，公开主张在徐州一带进行准决战，说这一仗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徐州会战既不是战略上的决战，也还不是第二期抗战中决定胜负的战斗，我们自卫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长期抗战。

徐州失守后，日军兵锋直指武汉。国民党内部一些人认为武汉防守意义不大，而且也守不住，主张放弃武汉。对此，中共代表团陆续组织了数



十篇有关保卫武汉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宣传持久战理论及保卫大武汉的目的和意义。

6月初，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脱稿，由于王明的反对，其全文未能在《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上发表。

但长江局的其他负责人是拥护、赞同毛泽东的持久战略思想的。因而，从7月17日开始，直到武汉沦陷之前，《新华日报》陆续刊登这部著作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广告共计37次之多。它还将单行本随报附送，单行本先后被4次印刷。它在介绍这部著作时鲜明地指出：本文可说是第三期抗战后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实为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凡属军政人员与救亡工作者，均宜精研细读，以求理论和实践之合一。

后来周恩来、叶剑英等长江局领导又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专门介绍该书。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他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集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两句话，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遂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武汉沦陷前，《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分三批向重庆撤退：第一批1938年9月份出发。当时租了两只大木船，由华西原、戈茅（徐元霄）带队，戈茅是队长，华西原是临时党支部书记，其中的一只船中途漏水，险些酿成重大事故。最后，这批同志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到达重庆。第二批是乘坐“新升隆”号轮船出发的，后来这条船在湖北嘉鱼遇到敌机轰炸，有20多位同志壮烈牺牲。第三批是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夕随周恩来撤离的。当时，周恩来是从武昌坐轮渡来到汉口，徒步走到新华日报社，口授最后一期报纸的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会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然后，他在绵绵细雨之中离开报社。林肖碛、朱进纶等7人则坚守到在武汉的最后一期报纸的出版。

上海大戏院群英荟萃

从国防参议会到国民参政会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界爱国人士就多次呼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局面，建立包括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具有决策权力的统一战线机关，团结对外，一致抗日，但国民党对此迟迟未作实质性的回应。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全民族抗战爆发，抗战已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动员团结全民族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成为举国共识，成立全国民意机关的呼声又骤然高涨。对此，国民党再也不能坐视不理，遂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的名义，聘请其他党派及社会名流，在国防最高会议下设立国防参议会，以发挥通报战况、听取意见、商量国事的作用。

国防参议会最初定为 15 人，后增至 24 人，成员包括国民党的马君武、徐谦、蒋百里，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作代表），青年党的李璜，职教社的黄炎培，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教育界的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等。这是一个设置极其简单的议事机构，一般一周开会两次，主席蒋介石多因故不能到会，主持会议基本上由副主席汪精卫代劳，成员与会与否也并无特别约束。据梁漱溟回忆：与会人最多不过 20 人，“蒋百里、胡适在会议开始不久即奉命出国；毛泽东留延安，始终未来，周恩来也很少到会；沈钧儒、黄炎培常往来上海；晏阳初和我也是往来不定；张耀曾、颜惠庆两位更是从未到南京出席会议。”

从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这个参议会也确实只是一个“参”和“议”的咨询机构，多是临时性交换意见，坐而论道，甚至为个别议题发生争执。



1937年8月17日，国防参议会第一次开会就闹了个不愉快。在这次会议上，梁漱溟提出要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当前的中日大战。梁把话匣子打开后，又连带地说到了行政改革、教育改造问题，话题越扯越远。另一位参议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大兼职教授傅斯年是位耿直、性急的山东大汉，他见梁漱溟离题太远，便站起来打断梁漱溟说：“现在上海炮火连天，我们是来商量如何应对时局的，你怎么说这个呢？”

梁漱溟一听，不高兴了，反问道：“我这说的就不是时局？！”

傅斯年当即回应说：“时局是战争，你谈的是改革，两码事。”

众人见两人有些动气了，赶紧转换了话题，劝和了事。

至于会上所提供的意见，有一些如推荐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建议蒋百里去德国、孙科去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等为政府所采纳，但大多数则杳如黄鹤，毫无回音。由于这个机构人员构成有限，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虽然“含有团结各党派来参加抗战大计，共同为国努力的意思”，但它最多只能算是国民参政会的萌芽。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国民党建议建立健全的民意机关。“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才。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事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同时，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甚至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建立真正的国民参政机关。而从团结抗战的大前提出发，蒋介石也不能不在政治民主化上做相应调整。

因此，1938年3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非常时期设立国民参政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考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这样，成立国民参政会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基本上是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上遴选国民参政员

1938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对国民参政员的选拔原则作了如下规定：凡年满30岁，非现任官吏，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可选为参政员：一是“曾在各省市（指行政院直辖市而言）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二是“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三是“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四是“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

参政员的人数总额初定为150名，后增至200名，依照上述四条所做的分配，分别为88名、6名、6名、100名。按地域分，各省市应出代表数分别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北、山东、河南、广东各出4人；山西、陕西、福建、广西、云南、贵州各出3人；甘肃、察哈尔、绥远、辽宁、吉林、新疆、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各出2人；青海、西康、宁夏、黑龙江、热河、天津市、青岛市、西京市各出1人。按党派分，国民党89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7人，国社党6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2人，救国会4人，职教社1人，乡建派2人，此外82人为教育界、新闻出版界、金融实业界、宗教界、无党派知名人士。

从这个名单分配来看，国民党及亲近国民党的参政员占了多数，但其中也容纳了其他各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体现了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具有一定的民族性，表明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

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国民参政会的主要职权为：“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决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但从实际的运作情况来看，决议也好，建议也好，询问也好，它只是备于政府案头的咨询、建议机构，对政府的操作、实施情况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权力。



因而，就代表的产生办法和机构的职权赋予上来看，国民参政会还不是一个在民主原则下产生的全权代表民意的机关，只是在全民族抗战的特殊情形下，具有过渡性的民意机关。但它仍给全中国人民带来民主、团结、胜利的希望，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陶希圣说：“这个会是战时民主制度及战后民主政治发达的基础，个人因之抱有极大的希望。”曾琦认为：“参政会虽然不是纯粹的民意机关，但至少是准民意机关，这是由一党专政进到各党并存合作的表现，是很重要的。”沈钧儒则“希望各方面的参政员尽量贡献意见，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救国方案”，“希望政府当局对参政会的决议尽量采纳，切实执行”。黄炎培希望大家“抛弃相互猜忌的观念”，“不要谋某一集团的功名”，而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产业工人和学生救国联合会也表达了对国民参政会的期望，就连湖南常德监狱的在监人犯也通过报界向国民参政会呼吁，希望国民参政会“促使政府大赦，或用其他办法使全国在监人犯尽量置身抗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被聘为参政员，他们认为，“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它的召开，“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表示着我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因而并未失掉“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

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他们表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国民



国民参政会

参政员同志们亲密地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陆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方案”。

由此可见，各党派各阶层对国民参政会的寄托之重和期望之殷。

两仪路上，群贤毕至

1938年7月6日，汉口两仪路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上海大戏院门前横幅高挂，彩旗飘飘，一派喜庆气氛。络绎而来的人们同门口迎候的人或握手，或相拥，或作揖，问候之声不绝于耳。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即将在这里召开。

上午9时，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幕了，136位参政员（在随后几天的会议中，这一数字皆有变化）及国民党党政军要人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居正、于右任、张群、何应钦、何键、王宠惠、翁文灏、张家璈、陈立夫等，英、美、法、意、比、瑞典等国大使、代办，中外记者1000余人出席了会议。

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外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给大会发来电文，表示“因齿病及琐务羁身”，不能与会，但有三点贡献于大会，“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指出：“诚能循是猛进，勿绥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议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副议长张伯苓也发表了致辞。

年近八旬的张一麟则代表所有的参政员致答词。他控诉了日本军阀“意在全部覆灭我中华”的狼子野心，颂扬了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及各地民众出钱出力以助抗战的爱国热情，认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必将“构成全国上下一心一德，以完成一方抗战、一方建国的重大使命”。

本次参政会共举行了10次正式会议，收到提案116件，内容包括如何动员军力、人力、物力以保卫武汉，如何设立省县参议会加速完成地方自治，如何改革弊端百出的征兵制度，如何促进后方生产充实抗战力量，如何开展节约运动，如何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政党之合法权利等。中共参政员陈绍禹、吴玉章等联合其他中间党派分别



提交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改善县区政治机构与保甲办法》等提案。

会议听取了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何键、外交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陈立夫、交通部长张家璈、经济部长翁文灏、政治部长陈诚、监察院长于右任等所做的施政报告，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及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并设立省市县地方民意机构、改善保甲制度、救济难民、战时教育等 125 个决议。

会议于 7 月 15 日下午闭幕，休会期间由参政会推选出 25 位驻会委员处理相关事宜，董必武、秦邦宪、陈绍禹等 3 位中共参政员当选为驻会委员。大会在最后发布的宣言中庄严宣告：“中华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代表合影

话题严肃，气氛轻松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当时中国民主政治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使各党派、各阶层有了一个参与国事、协商国事的合法讲坛，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敌的决心，对调动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有十分直接的作用。这些都可从参政员在十天会议中的表现反映出来。

首先，在此国难当头、抗战任重之际，召开这次重要会议，话题自然是十分严肃甚至是沉重的，所以大家在会场上的态度无不是极认真、极负责的。按照大会程序的规定，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做完施政报告后，参政员可就其中的问题当场提出质询。

7月7日下午，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做完财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对其中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合理负担”的提法不满，当场离席直趋主席台，高声质问孔祥熙道：“现在各地官吏催逼小民甚急，而豪门巨富、污吏赃官，不仅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反而借机中饱私囊，营私自肥。请问孔院长，这又作何解释？”

虽然会上程序已载明允许参政员当场质询，但孔祥熙以为还像以前一样，只不过做做样子，没想到竟有人来真的。所以，当许德珩质询他时，他一时语塞，又气又急，窘得愣在台上，还得堆出笑脸来保持形象。回过神来后，他笑着反问许德珩道：“许参政员，我们说话讲事实，以理服人，你能不能明示哪些官吏、豪门有如此行为？”

许德珩毫不松口：“就拿你们孔家来说，你们出了多少钱、多少力？”众人心头一紧，这话直插孔祥熙的心窝，不知他该如何接招。

孔祥熙到底是一条见过世面的老狐狸，他一直堆着笑脸说：“我们老孔家也算不得什么巨富，但比起一般的人家来说，自然好过一些，应该在抗战中多出钱，多出力，如果说以前出得还不够的话，这次献金运动，大家拭目以待，我们绝不甘为人后。”此话一出，引得众人一片掌声。一场尴尬就此解了围。

7月12日上午，监察院长于右任作了监察工作报告，也有参政员质询道：为什么监察院只弹劾芝麻绿豆官员，而对高官显位者视而不理？于右任当时也支支吾吾了一阵子，但最终也以其真诚和今后努力的承诺赢得了大多数参政员的谅解。

其次，会场上显示了团结的力量。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来自不同的党派、阶层、职业、地域、民族，但大家在会上的团结却是空前的。

最后，会场上的气氛是轻松活泼的。因为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吴依



软语与关西粗音相互交杂，众人之间的交流不免引发了不少笑话。褚辅成参议员是浙江嘉兴人，他的一口家乡话如同天外之音，让人不知所云。江苏籍参议员顾子扬将“熟练”说成“苏联”，知道众人理解错了后，已回到座位上的他又赶紧走上主席台作更正，引得众人大笑。

选举驻会委员时，有人站起来向议长建议：“既然是无记名投票，我能否投我自己的票？”又是引得众人会心地哄笑。为便于选举驻会委员，有人站起来请正副议长介绍 50 人作为参考，这自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善于言辞的汪精卫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倒是老成持重的张伯苓接过话筒说：“参议员里有党派之分，地域之别，还有男女之界，所以很难介绍。”一向严肃的张伯苓竟然说出这种幽默话来，众人想不笑都难。这一次国民参政会就是在这种严肃、团结、轻松的气氛中结束的。

张爱萍赶赴台儿庄

珞珈练兵：张爱萍为桂军培训游击干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预见到江浙一带也有成为战地，进而组织武装力量发动游击战争的可能，遂选派了一批干部前往东南地区。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的张爱萍就这样被毛泽东点将派到上海，担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

上海沦陷后，已迁到武汉的中共代表团指示张爱萍率江浙省委军委委员一班人向武汉撤退。

张爱萍等人到达武汉已是 1937 年底，这时候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两个组织已合二为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张爱萍就在长江局参谋处工作。参谋处由长江局委员、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参谋长，其主要工作是搜集各方情报，分析敌情，做军事统战工作，张爱萍为少将高级参谋。

其时，抗战形势已相当危急，卢沟桥事变后的半年时间内，国民党丧师失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军队节节败退，对敌抗战的信心也大受影响。原因何在呢？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认为，除了国力贫弱和武器低劣等客观因素外，战略上的消极防御和军事指挥的错误和笨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共代表团指出，国民党军应改变只知死守阵地、各部队之间缺乏战略战术配合的做法，而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和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则利用合法途径，向国统区人民广泛宣传游击战争理论。1937 年底，《群众》发表《毛泽东会见记》一文，就当前形势提出批评和告诫道：没有发



动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来配合主力军作战，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周恩来也撰文指出，我们应抓住敌人后方薄弱的环节，“派遣某些得力的干部到敌人占领的地区的侧面后方，做游击战争的骨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主力作战”。《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还刊登了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彭雪枫等人大量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这对于习惯于阵地作战的国民党军将领来说，无疑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在战略战术的运用过程之中，除了正规战，还有游击战。

桂系军队将领白崇禧足智多谋，长于战略擘画，人称“小诸葛”，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负责军队的训练工作。面对国民党一溃千里的局面，他也在反思个中缘由，并开始重视共产党的游击战争理论。他除了以军委会名义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及长江局参谋处的李涛、边章五、薛子正、张经武等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之外，还专门为广西部队开办了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桂系中下级军官。

这个培训班设在武昌蛇山抱冰堂，一共办过2期，张爱萍、边章五和聂鹤亭等均受命去为他们讲授过游击战争的理论。40年后，张爱萍仍清晰地记得，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从汉口过江，到蛇山上讲课，传授游击战知识。由此，张爱萍与桂系军人结下一段缘分。

武汉运筹：周恩来建议白崇禧在鲁南歼敌

1937年12月中旬，南京失守，华北华中地区的日军沿津浦路南下北上，夹攻徐州，欲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徐州自古为军事要地，此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的防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另一首领李宗仁对此当然不敢大意。他一方面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8万余众防守黄河，保卫济南，另一方面调韩德勤、李品仙等部，拒敌于淮扬沿线，而以汤恩伯所部为战区总预备兵团。不料韩复榘竟置军令于不顾，一退济南，再弃泰安，三丢济宁，致使蒋介石大为光火，李宗仁心急如焚。李命令韩复榘不要脱离其防区，韩则回电称：“现在全

国抗战，何分彼此？”李命令韩扼守泰安，韩又称：“南京不守，何守泰安？”韩干脆将大部人马撤至鲁西南、豫东一带。

韩复榘的溃逃促使蒋介石、李宗仁坚定了除掉他的决心。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借在河南开封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之机，下令逮捕韩复榘，随即将之正法。李宗仁急调邓锡侯（孙震代）的第22集团军、张自忠的第59军移防藤县，反攻济宁，津浦路北段战事暂时稳定了下来。

但这时南线日军正分三路北犯，定远、蚌埠告急。白崇禧在武汉与周恩来谈论此



张爱萍

事时，周恩来沉思后建议道：敌来势凶猛，且携攻取南京之余威，我不宜与其死拼，而应在正面诱敌深入，在铁路两侧布置重兵，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配合的方式困扰敌人。待其渡淮北上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白崇禧一听此话有理，遂电告李宗仁，供其参考。李也赞赏这一战略，于是依计而行，将李品仙的第31军撤至运河以西，让出正面；将于学忠的第51军布置于淮河北岸，凭险固守。结果，当日军进至淮河一线时，第51军冒死坚守，第31军自敌左侧向东追击，一举将敌截成数段。日军深恐被分割围歼，迅速回撤，津浦路南线形势一时成相持局面。

这种相持局面对于狂傲成性、一直在中国横冲直撞几乎没遭到什么重挫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他们急不可待地想尽快打破这种胶着状态。3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直辖的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率领所部，沿胶济路西进，经淮县向南直扑临沂，同时下令第10师团由师团长矶谷廉介率领，顺津浦线南下，与前者会师台儿庄，再策应津浦路南段日军合攻徐州，完成打通津浦路的战略目标。

此时，李宗仁第五战区拥有兵力60余万，面对6万多骄横的日军，他该如何作战略部署呢？蒋介石唯恐李宗仁考虑不周，战前即派李宗仁的老



搭档白崇禧到徐州协同指挥作战。周恩来与白崇禧同在军委会工作，两人关系十分熟稔。白崇禧动身前，周恩来便偕同叶剑英到武昌熊廷弼路白崇禧公馆，商议作战方略。

“健生兄到徐州后，准备采取何种对敌策略？”双方落座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道。

和周恩来一样，白崇禧以稳重见长，稍作停顿后，他略显迟疑地说：“兹事体大。先前对此并未作详细考察，昨日忽接委座命令，事发突然，实未形成通盘规划，不知恩来兄有何良策？”

周恩来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叶剑英，转头对白崇禧说：“实不瞒健生兄，我和剑英这次叨扰贵府，一来为你送行，祝你旗开得胜，另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的想法说给你听，并请你转达德邻兄，供你们参考。”

白崇禧以军人特有的笔挺坐姿坐着，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周恩来继续说道：“我们认为，德邻兄拥有60万大军，和敌军相比，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且抗战以来，我军一退再退，全军上下急盼打个胜仗来扭转局势，振奋人心。所以我们建议，德邻兄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与日军打他一战，杀一杀敌人的骄横之气。至于战略上，我们认为可留少量主力坚守阵地，吸引敌人，拖住敌人，而大部主力则应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应是打好这一仗的基础。”

周恩来刚一说完，白崇禧立马站起来道：“恩来兄，你这一番高论，开我茅塞，开我茅塞呀！我到徐州后，定向德邻转告一切。”

周恩来摆手谦逊地说：“仅供参考，仅供参考而已。”

宾主相谈甚欢，之后白崇禧陪送，待周恩来和叶剑英坐上小车后才作揖而别。

徐州献策：张爱萍向李宗仁转达周恩来的建议

3月中旬，已深入山东腹地的日军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自以为徐州地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遂分散兵力，多头进击：板垣师团分出一部，陷诸城、

莒县，向临沂挺进；矶谷师团的前锋濑谷支队则以一部守韩庄、峄县、临城，一部组成忻州支队从临城向忻州进击，一部组成台儿庄派遣队朝台儿庄前进。这正给了中国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分散之敌的千载良机。

对此良机，李宗仁能不能把握得住呢？周恩来有些放心不下，他把张爱萍找来，要张爱萍代表他和叶剑英去徐州面见李宗仁，当面转达中共的意见。28岁的张爱萍正是英气勃发的年纪，一听说周副主席找他，就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一进门发现叶剑英参谋长也在座，他顿时意识到是有重要的事情。

叶剑英首先问道：“张爱萍同志，这次周副主席找你来，是想要你到徐州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有什么困难吗？”

自1929年参加红军以来，张爱萍就以勇敢机智、对党忠诚受到组织的信任，爬雪山，过草地，他都没叫过一声困难，现在有什么比长征还苦还难的事情？所以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回答道：“没什么困难，请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尽管吩咐就是了。”说罢，他习惯性地掏出笔记本，准备做记录。

周恩来以深邃的目光看着张爱萍说：“事情是这样的，根据目前徐州周围日军的进攻态势，我们认为从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来看，李宗仁都可以和日军打一仗，而且这一仗极有取胜的把握。所以，我和剑英同志商量，决定派你到徐州去一趟，向李将军当面转达我们的意见。因为你为广西部队讲过课，对广西部队有一些了解。”接着，他一五一十地向张爱萍介绍了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的有利条件。张爱萍一一做了记录。叶剑英跟着又交代道：“你现在立马去办好一切通行手续，下午即可乘车出发。至于刚才做的记录，我看不必带上，记在心里就行。”张爱萍向两位领导敬了个军礼，随即转身做准备去了。

张爱萍一到徐州，即直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找到了李宗仁。李宗仁这时候正在作战室焦虑地来回踱着步子，听说八路军的代表来了，他略显惊讶，客气地接待了张爱萍。

张爱萍做完自我介绍，便向李宗仁转达周副部长、叶参谋长对徐州方面战事的关心。他说：“周副部长、叶参谋长分析日军的动态后认为，李



司令长官可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之间同日军打一仗，而且这一仗胜算极大。”

李宗仁开始时是低着头作倾听沉思的样子，听到张爱萍的后一句后，他立即抬起头来，看着张爱萍，想急切知道下文。张爱萍继续说道：“条件在哪里呢？周副部长和叶参谋长认为，第一，南线日军已被我阻滞于淮河以南，北线日军可以说是孤军冒进，我在数量上优于敌人十倍以上，这是我在目前情况下克敌制胜的关键。第二，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虽号称精锐，从山西一直打到如今的山东，几乎长驱直入，未受重挫，但也增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板垣曾扬言，只要给他一个步炮混成师团，他即可从中国的北方打到南方。自古骄兵必败，现在他们分散兵力，企图以小股力量合围徐州，即是失败的前兆，这种时机决不可失。”

李宗仁此时已露笑意，轻轻地点着头。张爱萍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第三，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多为山区，台儿庄、张庄一带全是山地，于我防守更为有利，而敌人虽是攻势，机械化装备在这里却难以发挥作用，就是火炮，也运转不便。第四，抗战以来，中央政府指挥不当，致使华北失守，南京沦陷，民心大失，军心不稳，而你们广西军队素以能打硬仗、苦仗著称，加以北边还有八路军做战略上的配合，因此有此几项有利条件，周副部长和叶参谋长相信李司令长官能打好这一战。虽然伤亡的代价可能大一些，但战绩也应该相当可观。这样不仅会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也会给国民增添抗战的信心，还可以提升广西军队在全国民众尤其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至于战略问题，周副部长已同白总长谈过了，想必您同白总长会有慎重考虑。”

一直在仔细倾听的李宗仁连连点头，用浓重的广西官话说道：“是的是的，周副部长和叶参谋长的意见极是，我会认真对待的。这无疑会增强我们打好这一仗的决心，兄弟阾于墙，而外御其侮。谢谢！谢谢八路军同志的关心！请转告周副部长和叶参谋长，我代表五战区的同志们，谢谢八路军同志们的关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的意见确实对李宗仁、白崇禧

打好台儿庄一战起了重要作用。而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尽管是局部的、暂时的，但它对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发挥了很大作用。

所有这一切，李宗仁、白崇禧等当然忘不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帮助。1939年4月6日是台儿庄战役胜利一周年的日子，已撤退到桂林的白崇禧在夏衍主办的桂林《救亡日报》上题词：“台儿庄的胜利，是在战术上运用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结果。”表明他没有忘记周恩来给他提出的建议。



七月七日，武汉涌动献金潮

1938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日子，武汉人民在国共两党的倡导下，走上街头，献金捐物，慰问抗日烈属，救济流亡难民，掀起了一场声势空前的爱国运动，史称“七七献金运动”。

周恩来、郭沫若起草了活动计划

1938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日子，用什么方式来纪念，以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坚定我们的抗日决心呢？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商议，决定以第三厅为主，成立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支援全国抗战，发动民众献金即是活动中的一项主要内容。这一倡议得到了政治部部长陈诚的赞同，并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批准，拨发了1.5万元活动经费。7月6日，献金运动前一天，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在报纸上发布了《民众献金办法》：“（一）献金运动自7月7日至9日举行，



政治部第三厅旧址

时间自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二）献金台地点：1.武昌司门口；2.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3.汉口江汉关右首；4.世界大戏院门首；5.中山路水塔旁。（三）民众献金时，由管理员在登记簿上将献金人姓名、献金种类及数目登记验明

后，即由献金人亲自投入箱内。（四）金银饰物用品，由献金者写姓名及物品质料数目于张纸上，包好后，交保管员专箱保存。”

献金台前人山人海

7月7日清晨，太阳才挂上树梢，武昌司门口已是热闹非凡，衣着各色的大人小孩纷纷朝这里走来，准备参加献金运动。

9时整，当主持人宣布献金运动开始后，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拿着一把中央银行的一元法币，上台投进了木箱，成了武昌献金的第一人。

一个瘦弱的卖蚕豆的小女孩，还没等中年人下来就匆忙上去，有些羞涩地把攥在手心的一枚铜币放进了箱中，那是她今天早晨的生意所得，也是她今天早餐的全部，她一声不吭地献了出来，并且很快消失在万头攒动的人海之中。

献金台下，顿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紧接着，武昌乞丐所的代表上台，宣布他们全部乞丐自愿绝食一天，献金40元。长春观的道士李元铨代表全观道友献出大金盾一个，长春丹100包，现金33元。报贩、菜贩、澡堂搓背的、茶楼跑堂的、街头缝衣补鞋的……络绎不绝，投进了他们一天、数天，甚至数月的血汗钱。中午时分，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代表政治部武汉卫戍司令部和湖北省政府捐献了3万元，并发表演讲。

与此同时，其他各个献金台前也是人山人海，捐赠踊跃。

在汉口中山路水塔献金台，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代表政治部同人献上了1万元支票。从北平流亡来的60岁老汉傅部周，靠贩卖长生堂的无极丹度日，他



儿童擦皮鞋献金



一天来了3次，捐出了一角九分钱，这是他当天的全部收入，他希望能再卖几包，再来捐助。铁匠铺打刀具的大汉黄泽盛，满头大汗，“哼哧哼哧”地拖着38把闪着青光的大刀来到了献金台，交给管理员清点登记后，对周围的群众说：“我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钱，送上几把刀，给兄弟们杀敌去吧。”台下有人喊“好样的”，更多人则唱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高亢的歌声如波涛般鼓舞着人们的激情。有3个六七岁的小朋友，双手捧着瓷猪形的储钱罐，也来到献金台上。他们揭开封口，倒出平素积攒下的毛票子、零角儿，总计有9元8角5分之多。一位东北来的妇女泪眼汪汪地走上台，掏出一个用红线包缠的布团，解开里面，现出一枚金灿灿的戒指来。这位妇女哭着对管理员说：“这是我从沈阳逃难时带出的唯一值钱的东西，我现在把它献出来，也算是为打鬼子出力吧！”管理员要她说出自己的名字，她一声不吭地抹着泪走了。有一位颤巍巍的老婆婆，抱着牙牙学语的孙女，交给了管理员一包手镯、银戒和小孩帽子上钉的银片。

在世界大戏院前的献金台，除了献纸币、铜板、银币、银片之外，影星黎莉莉的到来引起的轰动最大。

这几天各影院正轮番上映《火中的上海》《热血忠魂》《抗战特辑》等影片，人们对《热血忠魂》的女主角黎莉莉非常熟悉。

杏眼柳眉、薄施粉黛的黎莉莉，一袭长发依肩而披，高挑的身材，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如春风桃李，清丽动人。她刚结婚不久，夫君是才



武汉献金运动

子罗静予。她静静地走上献金台后，用力地在左手手指上撸着什么，台下的人都不解地睁大了眼睛，嘈杂的场面一时安静了下来，连小孩子也停止嬉闹，好奇地看着台上，就像看这位影星表演的电影。

她把手上的戒指撸了

下来，端详了一会儿，又拿在脸庞上摩擦了一会儿，然后依依不舍地放进了捐赠箱中。

她把结婚戒指捐了出来！

“哗！”人们给了黎莉莉最热烈的掌声，像一阵骤雨从天而降。

在江汉关献金台，海关同人送来了 1542 元，花楼街特业公会的人也捐出了数百元。在总理铜像献金台，曹谷冰代表《大公报》第一个走上台来，拿出千元一张的支票投进箱里。身着长袍短衫的商人、卖香烟的小男孩等也随之而来。一位每天在人行道旁哀求施舍的乞丐，小腿全断了，用胳膊在地上磨蹭着挪过来，他腋下夹着一床残破的芦席，右手托着 5 分钱，在他人帮助下慢慢挪上台，将 5 分钱投进了捐赠箱。管理员要记下他的名字，他怎么也不肯讲，只是低着头说：“我是个残废乞丐，这一生是不能为国家到火线上打仗了，但我宁死也不愿当亡国奴。”

7 月 8 日，天降大雨，但并没有浇灭人们的献金热情。在司门口献金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献出了重达 17 两的金鼎 1 座、金戒指 4 枚；蒋介石派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代表他和宋美龄献金 1.8 万元。在世界大戏院献金台，黄炎培、史良、邹韬奋、张澜、陶行知等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参加了献金运动，水塔献金台前则因献金群众太多而将栏杆挤断了。

中共与八路军代表踊跃献金

7 月 9 日的献金运动仍是人潮汹涌。午后 2 时半，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之中，一辆大卡车缓缓开到江汉关献金台前，车上载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的人员，车辆横板上贴着“中共献金团”几个红底黑字。

一行共 20 多人，首先由王明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公函及法币 1000 元交给献金台管理员清点登记，主持人代念了那封公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驻汉代表团将党员 6 月份所交党费项内拨出 1000 元以帮助抗战军人家属及受伤将士之用。”紧接着，周恩来将他在军委会政治部所得的 1 个月薪资 240 元，交给管理员清点后亲自投箱。跟着，6 位中共国民参政员——王明、秦邦宪、林祖涵、



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将他们7月份的参政员薪资由秦邦宪交给管理员点明数目投箱。同时，秦邦宪还宣读了6位参政员致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敝人等本月份所得参政员薪资（每人350元，共六人，计2100元），除已在参政会有委托秘书处替每人代发现金百元外，现将剩下全部薪资1500元献做捐助救助抗战军人家属及受伤将士和被难同胞之用。”

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上台后，先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递交八路军公函及现金1000元，函件内容道：“顷奉朱总司令自山西来电，嘱将八路军在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素食所节省的全军菜费共1000元，代献做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及救济被难同胞之用，因八路军已在敌人后方作战，故电由此地代献此金也。此致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筹备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启。”其后，李克农又代叶剑英、钱之光、李涛、边章五等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干部，将每人每月薪金5元献出；孟庆树、廖似光、童小鹏、赖祖烈、龙飞虎等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工作人员也献出了他们当月的薪资。

中共献金行动吸引了各路记者的关注。献金毕，有记者趋前想采访中共代表，但周恩来和各位参政员均有事要马上离开，台下群众遂要求其他的同志讲一讲话。于是，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发言：“各位同胞，时值抗敌救国、保卫大武汉的非常时期，我们用献金的方式来纪念七七周年的日子，意义特别，作用巨大。这是我们前线和后方一致，各阶层和各民众团结的象征！昨日我们接到朱德总司令的前方来电，谓八路军全体将士7月7日已节食一天，得洋一千元，遂委托武汉办事处兑付出来，献做救助抗日军人家属及被难同胞之用，这也算是八路军对后方人民所表达的一份心意！”

“大家都知道，八路军远在敌人后方艰苦作战，无时不在流血牺牲，但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民主和自由，八路军是绝无惧怕牺牲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后方的同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这样一来战胜日本法西斯军阀，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便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台下掌声雷动，接着孟庆树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代表也发表了演讲。这时候台下的掌声已山呼海啸般热烈，“保卫大武汉！”“中国共产党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声声口号响彻云霄。

三镇的几十家戏院影院于6日、8日两天举行献金公演，近3000名演员分文不取，将全部收入捐了出来。

如此热烈的场面，直到9日晚上，也就是原定活动截止的时间，仍是高潮迭起。由于前来献金的人太多，三天的时间根本无法满足群众的要求，因此，筹备会决定献金延期2天。这样，献金运动延长至5天。

5天下来，参加献金的各界民众达百万人次，献金总额达百万元以上。据当时的资料统计，共献有法币40余万元，金银器1156件，物品774件，各类外币、外钞、银圆、铜钱及支票共计50余万元。须知当时武汉市区的总人口也不过100万！

正如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郭沫若所说：“这是一次出于自发性的积极盛大的民意表现。我敢于这样说，那几座献金台作为民意机关的价值，实在是远远超乎那个200名参政员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之上。”

这场百万大献金运动，显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是民心民气的大检阅、大汇集、大提升！它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军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正义的力量

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和西班牙正在进行的马德里保卫战，成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西方战线的两个焦点，引起举世瞩目。“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遭受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帮助。来自各大洲的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汇聚武汉，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从多方面给中国抗战以实际援助。

武汉传出日本人民的反战呼声

1938年7月2日，汉口广播电台里传出了一个柔美元润的女中音，用流畅而又地道的日语播出对日宣传节目：

“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过，这是罪孽，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

这代表着人类正义和良知的声音，随着电波从武汉飞越万水千山，传遍全球各地，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呼吁日本人民和士兵觉醒，反对侵略战争和法西斯暴政。播音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震撼，而担任节目播音员的，是一位名叫绿川英子的日本女子。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是日本著名的世界语学者、进步作家，也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1936年她与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1937年初来到上海。抗战开始后，出于对世界和平的热爱、对中日友好的

维护和对法西斯的痛恨，她先后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积极从事反对日军侵华的反战运动。在世界语旬刊《中国怒吼了》第3卷第4期上，绿川英子发表了《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的曙光》一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指出“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甚至全人类的明天的一把钥匙”。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爱与憎》一文中，绿川英子鲜明地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恨和对中日两国人民的爱，她称赞中国抗战是“为着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战”，是为了“保证东方前途的光明”，呼吁日本士兵：



绿川英子与丈夫刘仁在重庆合影

“不要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1938年6月，在郭沫若的协助下，绿川英子来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担任日语播音员。她呼吁日本人民觉醒，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呼吁日本士兵不要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卖命。她深情地表白：“我爱日本，同时我也爱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法西斯”。

绿川英子的播音引起了日本法西斯的极度恐慌。他们咒骂绿川英子是“娇声卖国贼”，甚至恐吓要求她的父亲“引咎自杀”。周恩来高度评价绿川英子的反战义举，称赞她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在武汉抗战期间，还有一些像绿川英子这样的日本友人全身心投入反战运动，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鹿地亘，著名的日本反战进步作家，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1927年因反对日本当局而遭到逮捕，被关进监狱。1935年底出狱后，流亡到上海，经鲁迅先生提议，由鹿地亘按月给日文《改造》杂志翻译一篇中国进步青年作家的作品。鲁迅逝世后，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6卷，



他一人几乎翻译了半数。抗战爆发前夜，鹿地亘夫妇决定秘密回国进行反战运动，但一出法租界就被日本特务盯上了，他们当即转回法租界，为中国朋友所掩护。抗战爆发后，他们向中国朋友表示，只要有益于抗日，只要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他们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可以打机关枪，可以上战场去扫射屠杀中国人的日本侵略军。1938年3月，经郭沫若推荐，在夏衍的陪同下，鹿地亘夫妇几经辗转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设计委员，在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从事反战宣传工作。

4月1日，武汉各界举行欢迎茶会，郭沫若、沈钧儒、邓颖超、田汉、郁达夫、范长江、史沫特莱等中外人士200余人参加了大会。郭沫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鹿地亘夫妇，称赞他俩是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鹿地亘在会上介绍了风起云涌的日本反战运动，他充满信心地说：“任凭法西斯去力行战争吧！他们已坐在巨大的冰山上，被打得粉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鹿地亘夫妇到职后，忘我地工作着，除了参加这些公开活动外，他们坚持在第七处从事对敌宣传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与绿川英子轮流用日语向日本国民演说广播，鹿地亘把麦克风当作武器，把心中炽热的爱憎化作滔滔洪流，倾泻在每一次播音之中。他历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种种罪行，向日本士兵大声疾呼：为了两国人民，别洒错了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大海彼岸，放下屠刀，停止战争！同时还向日本人民申述中国抗战的真意并非对日本国民的仇视，两国人民应共同站在兄弟友好的立场上，消灭日本军阀，建立东亚永久的真正和平。此外，他还用热情的声音鼓舞江城人民起来斗争，把日本法西斯从中国赶出去。

4月6日，鹿地亘在汉口广播电台向日本军民发表广播讲话，号召日本军民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兄弟般的支持和援助，停止侵略，结束战争。真理的呼唤，引起了日军内部的极大恐慌，同时也复苏了一些被麻木的灵魂。在这一时期的对敌宣传教育工作中，鹿地亘的每日讲演及谈话，积累了大量素材，后来他据此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和平日记》。

3月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日军施放毒菌屠杀我

西北军民事件，呼吁全国、全世界抗议敌人的暴行，并以防毒、防疫物资支援前线。通电发表后，应者云集。鹿地亘夫妇率先响应：

对八路军英雄的战斗，深表敬意！

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者惨无人性的散布毒菌的阴谋，将会看到他们的报应。我们深深感觉到在日本民众的革命斗争中有加以阻止的责任。谨奉上法币 10 元，乞转致八路军将士，作购买防毒品的费用。

鹿地亘 池田幸子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集体名义向鹿地亘夫妇致敬，并于 4 月 13 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的日本友人——鹿地亘再度慨捐》，文章说：“中国的友人鹿地亘，前因响应朱总司令通电，曾捐致八路军将士法币拾元，作购买防毒品之用。兹又悉鹿地先生，又将本报稿费拾叁元肆角全数移捐由西北来的残疾军人，以表同情。此足见日本一般前进国民对于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战争及法西斯残暴行为无不一致反对，而对我国浴血奋战之英勇将士表示同情。”

鹿地亘夫妇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节衣缩食，将省吃俭用的一点零钱贡献给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抗日军民，其意义远远大于金钱和物质本身。4 月 27 日，鹿地亘出席 14 家团体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色斯的大会，他在会上大声呼吁世界舆论及爱好和平的人民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无私的援助。7 月中旬，又应第三厅第六处邀请，在汉口的一个戏剧训练班作题为《日本人民反战运动意义》的报告，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数据分析了日本的现状，预言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只会最后埋葬他们自己。报告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鹿地亘以日本公民身份出席各种会议这件事本身就给予武汉人民以极大鼓舞，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

9 月份，鹿地亘冒着战火随武汉前线慰问团赴长江南岸前线慰问。还受三厅委托到湖南常德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做反战教育工作，他怀着极大的耐心，不怕一次又一次遭受凌辱，和他的同胞们促膝谈话，一些日



本土兵受到感化开始转变立场。这一工作收到良好效果，为其后由他领导组织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尽管繁忙的社会政治工作几乎占去了白天所有的时间，可是作为作家、文艺理论家的鹿地亘从未中断过自己的写作，他夜以继日，辛勤笔耕，记下日寇惨绝人寰的罪行，痛斥日本御用文人的无耻谰言，歌颂中国人民的英勇精神，笔端下流淌着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在武汉他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歌、散文和政治论文，这些作品成为抗战文艺中具有宝贵价值的资料，是中日文化友谊的结晶。

1938年2月16日武汉出版的《七月》第二卷第三期的首篇发表了鹿地亘的两首诗歌《送北征》和《颂香港》。他在《颂香港》中称，“八一三”的炮火，将他们夫妇赶进了逃难流亡的人群，当他在“血与叫唤之中”辗转广州，抵达香港时，他在精神和体力上都感到疲劳；前线正进行着艰苦的血肉拼搏，内地的达官贵人却大批涌入香港，依旧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作者对中华民族的前途甚为忧虑和焦灼。《送北征》激情洋溢，格调奔放，是一首唱给出征战士的颂歌，细致地抒写了战友之间互相勉励的动人情谊和对于胜利的信心，成为抗战初期鹿地亘诗歌的代表作。

除了诗歌创作之外，鹿地亘把更大的精力用于文艺理论的写作。他紧扣战争的脉搏，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歌颂正义、抨击邪恶的文字。1938年3月9日《新华日报》连载了他写的《所谓“国民公意”》一文，报社特地加编了“记者的话”，对他为人类的和平、自由、真理而奋斗的崇高热情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4月12日，他在武汉写了《致日本同胞》一文，分析了侵华战争发生的原因，指出了它所造成的恶果，驳斥了污蔑中国人民的种种流言。最后，他发出这样的呼喊：“离开军队吧！同胞们，把日本从堕落和死亡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吧！鼓起勇气和中国协力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以两国民众的手，站在友爱和自由的新的关系上来确立东洋的再建！现在是真正爱国的日本人民断行他的决意的时机了！”真理的声音像春风吹送到日本士兵的心上，一个被俘的航空兵对鹿地亘悔恨地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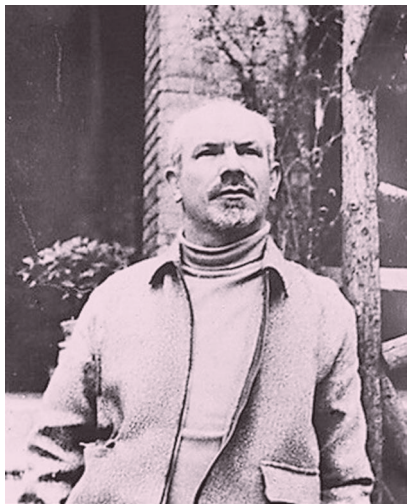
很明白中国人民的心情，我非常羞愧，我也痛感人类的真爱。请你向中国当局转达：我目前已决心与诸君共患难了。”

池田幸子也是一位日本反战作家，她与丈夫志同道合，“七七”献金时她亲自到献金台献出 20 元，还把自己的稿费寄给朱德总司令。抗战中，鹿地亘夫妇留在中国 8 年，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受到人民的信赖、尊重和热爱，被誉为“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

1938 年夏天，鹿地亘夫妇在武汉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慰问。《新华日报》高度赞扬鹿地亘的作品是“日本文艺作家第一次对于中国大众发出的声音”，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把他称作“日本进步的良心”“日本人民的代言人”，对于在抗战中始终与中国人民甘苦共尝、患难相依的鹿地亘夫妇来说，这是中肯而恰当的历史评说。

白求恩医疗队来汉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驰名欧美的胸外科专家。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白求恩得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古都北平，并对上海发起进攻时，他毅然决定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8 年 1 月初，年已 48 岁的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携带了美国和加拿大和平与民治大同盟英属哥伦比亚州分会募捐的 1100 美元和英属亚尔白达州分会用 200 美元购置的各种医药器械，同一名美国外科医生、一名加拿大女护士组成加—美援华医疗队，从温哥华乘坐邮轮横渡太平洋，于同月下旬抵达香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们乘飞机到达武汉。刚在美国圣公会主教鲁兹家里住下，白求恩不顾旅途疲劳，急切前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系，要求安排去延安抗日前线。他声明说：



1938 年，白求恩来华首站落脚武汉



“我的战斗岗位在前线。”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见了白求恩和他的队员，答应代他们与延安联系，进行安排。白求恩听后十分高兴。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日本法西斯侵华的野蛮暴行、中国人民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路线、政策和八路军深入敌后的情况。周恩来诚挚亲切地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给你们们的，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白求恩一行受到了武汉文艺界、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委会、汉口女青年会的热忱欢迎。白求恩曾应邀去国民党的一个陆军医院参观。走进医院，阴湿的霉气和着伤口的臭味扑鼻而来，满院都是带着脓血的纱布、打碎了的玻璃器皿，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停止了呼吸。面对这种现象，白求恩更加坚定了赴抗日前线为伤员服务的决心。不久，八路军总部军医处处长姜齐贤因公来汉，按周恩来的指示去看望白求恩，向他介绍了八路军英勇奋战的许多事迹，介绍了前方药品不足、器材短缺的艰难情况。听到这些，白求恩激动地握着姜齐贤的手说：“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尽快安排我们北上吧！到延安去，到前线去！我们不能面对着敌人的残暴静坐旁观，更不能看着自己的阶级兄弟在流血牺牲而不走上前线！”他还把这些情况电告加拿大和美国的有关方面，英属哥伦比亚州分会很快给他寄来3万件绷带和其他外科用品，并寄来600件救济难民的衣服。白求恩和援华医疗队的女护士琼·尤恩一起奔波于武汉三镇，加紧采购外科器材和医疗用品，以备前线之用。

1938年2月22日，春节刚过不久，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白求恩和尤恩迎着刺骨的寒风，在武汉八办的警卫员护送下，从武汉北上了。

印度援华医疗队来汉

当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通电以及史沫特莱为八路军请求医药品的呼吁传到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时，引起了印度国民大会及印度人民热烈的响应。1938年9月1日，带着印度人民的重托，由爱德任

队长、卓克任副队长以及柯棣、巴苏、木克等5位医生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启程漂洋过海，向中国进发。9月17日，爱德一行到达广州。

医疗队受到宋庆龄迎接，他们向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同八路军取得联系。当他们从宋庆龄那里得知可以到武汉去找周恩来时，便迫不及待地向武汉进发了。他们长途跋涉，经长沙，辗转来到武汉。第二天，他们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见了何光全、叶剑英，几天后又见到周恩来。后来，叶剑英曾回忆：“当时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国内某些人散布的悲观论调也很流行，但在我们和印度医疗队聚会时，却听到他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触，也使医疗队的队员们受到了鼓舞，更加坚定了要到八路军那里去工作的决心。”正在武汉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向爱德和他的队员说：“你们想到八路军那里去工作吗？那除非你们每天能坚持徒步行军50公里才成。”这时第一个响亮回答说“能”的，就是已经年过五旬的爱德博士。他不仅这样回答，而且立刻率领队员们练习起徒步行军来了。

9月30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武汉，带来了印度人民送来的药品50箱、防弹钢质救护车及卡车各一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国际宣传处、中共代表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八办屋顶举行了欢迎会。10月3日新华日报社也集会欢迎他们，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吴克坚以及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斯特朗都参加了欢迎会。爱德和柯棣充满激情和信心地表示，“你们不要看我们仅是5个人，我们是被印度国民大会推派来华的，我们后面有着千百万的印度人民。”“你们中国正与日寇作自卫之战，中国的作战，不是孤独的，各国都在积极支援。”在汉期间，他们还受到了武汉宗教、文化、卫生界的热情接待。10月7日，在周恩来会见他们时，他们要求到八路军的抗日前线去工作，周恩来看到武汉各陆军医院有几千伤兵正等待着治疗，劝他们暂时就地救死扶伤，以后再去八路军根据地。他们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安排，先后在武汉和重庆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1939年1月才奔赴延安。



伊文思和他摄制的《四万万人民》

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得到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不少国际电影人士万里迢迢赶来中国，拍摄反映中国人民这一斗争的新闻纪录片。首先来华的是著名的荷兰纪录片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

伊文思是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而且是好莱坞的著名导演及摄影师。他于1933年到比利时拍摄了反映矿工生活和斗争的《布里纳奇矿区》，1936年又到西班牙拍摄了反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著名影片《西班牙大地》，影片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他与几个美国友人组成一个摄制小组，带着全套摄影器材来到武汉。这群30岁左右的青年艺术家来中国的目的不是好奇，也不是发财，是“为了真理，为了真相，为了能尽自己对于保卫文化、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应尽的力量，使世界人类公敌的狰狞残暴面目和为民族独立解放的中国英勇抗战的事实，能尽情地显露在世界人类面前”。

这时正值台儿庄会战前夕，他们在武汉停留了几星期后就急赴台儿庄前线。伊文思和助手万农、贾白在那里工作了十天，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拍摄下敌机轰炸、难民逃难，民众抢救伤员及协助作战、中国将士奋力作战，缴获敌人几十辆坦克和众多的枪炮等宝贵镜头。《新华日报》文章评论说：“在中国电影界没有一个人和一具开麦拉（指电影摄影机）到津浦北段去的时候，这三位欧洲的青年，早已到了那里工作着，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使我们，尤其是使中国电影界惭愧的事。”

他们于4月中旬返回武汉，中华全国电影界、戏剧界、文艺界等抗敌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国文艺社、东北救亡总会等14个团体200多人举行盛大茶话会，热烈地欢迎他们。

接着，伊文思首次在汉口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努力争取他能去延安拍电影，并尽可能为他提供便利，为他的摄制组准备了交通工具。5月，他们在武汉八办的协助下到达西安，以便找机会到延安拍摄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抗日、八路军英勇作战的场面。后因国民党政府的限制，未能成行，只到兰州拍摄了一些镜头。6月底回到武汉后，他们又拍了保卫大武汉的献金运动、抗战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郭沫若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等珍贵的镜头。



伊文思

为了弥补遗憾，伊文思向周恩来提出，把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的形象拍摄下来，并且希望拍摄到中共领导人在重要会议上讨论和分析中国抗战形势的场面，周恩来同意了伊文思这一要求。

一天，伊文思巧妙地避开国民党当局的监视，来到武汉八办附近一所学校秘密拍摄。这里正在召开会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人王明、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和林伯渠、吴玉章等出席，伊文思顺利地拍摄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

伊文思一行在武汉告急时才离开武汉，临行时，他得知在延安的八路军将成立电影团，特意将自己拍片用的一台手提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留下作为礼物赠送，以独特方式表示“对这个有意义的行动的支持”。

很快，伊文思根据在中国拍摄的大量素材编辑完成了纪录片。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他没有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和八路军在前线作战的更有典型意义的镜头，但通过台儿庄大战、保卫大武汉、日机轰炸广州，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一些活动，仍然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面貌。虽然有关八路军的镜头不多，但也利用地图说明了在敌人后方活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武装。他还特意选用《义勇军进行曲》旋律作为配乐，片名几经斟酌，最后定名为《四万万人民》。

1939年，影片《四万万人民》在美国纽约正式公映，后又在法国、荷兰、



比利时等国放映，受到观众极大欢迎。伊文思用这部影片的收入购买了药品赠送给中国人民。

“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我有点迷恋汉口的魅力。在我这十年生涯中，它是美好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反复思考：我是回到西方世界去，还是留在这里？恐怕我是必须留在中国了。”史沫特莱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到汉口，抗战期间她在汉口住了将近一年，那是她在中国峥嵘岁月中最难忘的日子。

史沫特莱，美国进步女作家、著名记者。自1928年来中国后，长期在各地深入生活，进行采访和报道。1938年1月，她离开前线来到武汉后，主要从事两项工作。第一项是参加红十字会，为中国军队筹集医药。南京失陷后，不论前方和后方都缺医少药。史沫特莱从前线到后方，见到士兵受伤后得不到及时救护和治疗，革命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促使她参加红十字会医疗队。为扩大红十字会医疗队，史沫特莱四处活动，在她的努力下，红十字会医疗队建立了17个医疗小分队，并在长沙创办了战时急救训练学校，为抗战培训医护人员。这些小分队分配在武汉外围前线的几所野战医院，不久，因医疗器械和药品短缺无法开展工作，史沫特莱便弄来一辆卡车，到汉口各教会医院征募药品和医疗器械。她还向海外的好友去信，向印尼、爪哇的华侨去信，募集了大批捐款，以后还建立了国际联络网，突破日军封锁，把医药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医疗队。

史沫特莱的行动得到了在汉口的一些美国人的支持，如美国大使馆陆军武官史迪威上校就常帮她排忧解难。史沫特莱和史迪威多次来往于武汉和长沙之间，视察战场医院和长沙战时急救训练学校，这所学校为抗战培养了几百名红十字会医疗队员，分成小组，奔赴前线。由于史沫特莱和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共同努力，战地救护工作也迅速得到改善。到1938年夏天，已有58个红十字会医疗小分队活跃在各个战区。

史沫特莱在汉口的第二项工作是积极开展舆论宣传，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抗战争取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她以大量时间向美国、加拿大、英

国等地发函，谋求这些国家财政、人力援助和海外物资援助。这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即白求恩大夫受美国、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到中国，柯棣华等人组成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

史沫特莱作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每周给报社发两篇航空稿，她发出的第一批稿件主要报道中国伤兵的悲惨命运。她写道：“医疗站或大夫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景况只能说是糟糕透顶的。在被废弃的仓库、学校和庙宇里，伤员们躺在地上用草织成的破草席上或者平架在高脚凳的木板上，这些房屋常常是阴暗、潮湿，而且肮脏，地板破烂不堪……”这些报道在全世界传开后，博得了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许多人捐献药品和财物，援助抗日受伤的将士们。

此外，史沫特莱以记者的身份参加集会、发表演说、写文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号召人们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在她的号召下，汉口基督教圣公会鲁兹主教及其女儿弗兰西丝小姐募捐了1.3万元寄给朱德。1938年2月，史沫特莱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等人组建了一个由教授、医生、记者、传教士等参加的国际代表慰问团，带着两卡车物资，辗转到达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受到朱德总司令、康克清、丁玲等人的欢迎。

1938年10月中旬，当日军已到达武汉郊区，隆隆炮声不绝于耳时，史沫特莱才和其中国秘书罗凡驾驶着一辆救护车，冒着日机轰炸，潜回敌后去寻找新四军。一路上，他们不断遇上刚从与日军作战中撤退下来的伤兵，多次停下车来加以救助，直到所载药品所剩无几为止。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新四军。



斯诺在汉口促进“工合”成立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的作家、新闻记者。1928年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6年访问陕北红军，与毛泽东作了很长时间的谈话后，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然后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后改名《西行漫记》）。这是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如实系统地介绍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11月已发行了五版。

抗战初期，斯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洪流中，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斯诺住在上海租界，从事各种支援中国革命的活动。他冒着枪林弹雨，出入战区，进行火线采访，翻译出版了《西行漫记》中文本。中文本出版后，在国内和国外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8年6月，斯诺在香港大力协助宋庆龄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后改为“中国福利会”），并担任一部分会务工作，主要是把中日战争的真实消息向国外报道，向国外募集财物和医药用品，然后克服极大的困难，把这些物资运送到各抗日根据地，给医药奇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雪中送炭。



斯诺与毛泽东

不久，在武汉会战最紧急阶段，斯诺从香港来到武汉，停留了7周时间。在这里，他与周恩来、邓颖超、叶挺、郭沫若、郁达夫等许多中国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采访了军界的领导人。7月，他还在武昌珞珈山

访问了蒋介石,对于蒋介石当时所抱的抗日热情和决心,他作了如实的报道。这些都为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搜集了大量的素材。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是抗战开始后,由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等人倡议发起的,专门生产物资以供抗日之用的合作社生产运动,是战时经济中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937年11月,刚到上海的斯诺夫妇提出:“应该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支援游击战争。”这个建议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艾黎的想法不谋而合。艾黎起草了建立“工合”的初步计划,斯诺转交给《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印成小册子散发。经过多方联络和宣传,计划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支持,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艾黎为召集人,并于1938年5月写出中英文本的详细计划草案。宋庆龄得到这个计划报告后很高兴,马上表示“赞成和支持”。6月,发展“工合”的计划由爱国银行家徐新六、艾黎送到汉口,斯诺随之来到武汉。计划也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并任命艾黎为技术顾问,负责筹备工作。经过一番周折,8月“工合”在汉口正式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国民政府拨款500万元,作为“工合”的基金。办公地点暂设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办公处。

“工合”成立后,斯诺夫妇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他们向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工合”的情况,周恩来给予了热烈的支持,并指出,“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社会团体的面貌,使“工合”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

为了“工合”的存在和发展,斯诺甚至拜见了因《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得罪了的宋美龄,称赞她在战时所做的工作。“工合”成立后,首先在汉口举办了一期“合作讲习班”,以培训骨干。随后“工合”大力发展中国内地工业以支持长期抗战,帮助后方难民就业,在全国创办了3000多个工厂,其中“延安工合事务所”为陕甘宁边区军用和民用工业作出贡献。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慈善家纷纷参加“工合”董事会,斯诺夫妇为此捐出全部积蓄。



斯特朗声援武汉抗战

斯特朗与武汉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早在大革命高潮的 1927 年，她就来到武汉，与宋庆龄作了亲切的长谈，并深入湖南农村考察，热情赞扬高涨的农民运动。1937 年底，当斯特朗由意大利经香港进入中国，再次来到武汉时，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已在这里蓬勃兴起。她在武汉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以实际行动寻求国际援助，为支持中国抗战奔走呼号。

1938 年 1 月 25 日，她应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在广播电台以“马德里是怎样保卫的”为题，发表了慷慨激昂而富有战斗性的演说，鼓动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1 月 28 日，斯特朗参加了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召开的国际妇女茶话会，她以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批评国民党中央政府片面抗战，而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大加赞扬。在此之前，斯特朗向周恩来提出要到华北敌后八路军驻地采访。不久，她从武汉到了山西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和彭德怀、刘伯承等八路军将领，并深入到战士和农民中间去体

验战地生活。她在那里看到了希望。斯特朗从华北前线返回武汉之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生动流畅的文字，接连不断地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华北军民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8 年 4 月，斯特朗在离开中国之前，给朱德写了一封充满战斗情谊的信。由于战乱难寄，信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亲爱的朱德先生：现在已经是深夜二时，我这几天都是夜晚两点钟
中国人民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睡觉，早上七点起床。明天早上我又要赴香港，我太疲倦了，……但是，在离开中国武汉之前，我不能不给你说几句话，以表示对八路军同志们为我们共同的目的而献身的事业的敬佩，……中国的同志却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真诚，有一种对同志的炽热的情谊……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无法得到的，我很幸福，因为我们在一个世界上，在一个世界的运动之中，那中间，有中国的同志们，也有你……”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她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大大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国际友人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敏锐的观察力、质朴的同情心和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他们在武汉及至中国、全世界从事的进步事业影响大，意义深。他们是属于自己国家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武汉的。



“日本进步的良心”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在武汉

日本反战作家逃到上海，成了鲁迅的朋友

1936年1月下旬，浩瀚的黄海海面上，朔风吹着海水，卷起一层层海浪，击打在一艘从日本横滨驶向中国青岛的客轮上，溅起一堆堆雪卷式的浪花。客轮二层的甲板上，一个披着一头长发的年轻男子斜靠在船舷旁，双眉紧蹙，双眼茫然地望着远方水天一色的混沌世界。他的身旁站着一位穿着翻毛大衣的年轻女子，女子侧脸看着他，露出一丝的不安和疑惑。

女子说道：“鹿地君，我们这次化装逃往中国，中国人会接受我们吗？”

年轻男子收住远眺的眼神，看着身旁的女子说道：“就我和我的帝大中国同学的接触来看，中国人善良、宽容，应该会接受我们的。”

“我听说最近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很严重呢！”女子仍然担心地说。

“嗯，幸子，我相信他们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日本的大军阀，对我们这些友好的人，他们应该是会欢迎的。”男子语气坚定地说。

海风在呼呼地扑面而来，女子像雕塑似的看着男子，安静地听着他说话。听完，她挽着男人的手臂，靠在男人的臂膀上，男人则顺势把女子拥到怀中，任凭她的发梢在海风中凌乱飞舞。

原来，这个叫“鹿地君”的年轻男子，即是日本著名反战作家、文艺理论家鹿地亘。拥在他怀里的女子，是他的妻子池田幸子，她也是一名作家。鹿地亘本名濑口贡，1903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通过冯乃超的关系，他又与当时流亡日本的

郭沫若相识。学生时代，鹿地亘就投身于日本无产阶级运动，曾加入过日本共产党，参加过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并担任书记。他同情劳动人民，讴歌劳苦大众，反对极力向外扩张的日本当局。因而，1927年，他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其间被关、被放10余次。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反战言论，再一次被日本当局抓入牢中，判刑2年，一直到1935年底才获释，但仍受到密切监视。

这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甚嚣尘上，对华侵略已箭在弦上，全国上下到处弥漫着战争气氛，随时即可爆发。正是在这种焦虑、压抑、悲愤的心情中，“他那时却望见了中国，记起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日本劳苦大众的密切关系，于是他想到中国来。”这样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鹿地亘夫妇乔装改名，乘船到青岛一事——他们是混杂在一个中国赴日演出的戏班中，才逃出日本的。

船到青岛后，鹿地亘夫妇很快又转车来到了上海。经过内山书店老板、鲁迅先生的挚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介绍，鹿地亘与鲁迅先生相识。不久，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拜访鲁迅，与鲁迅先生达成两项协议：一项是由鲁迅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以《中国杰出小说》为总题目，在《改造》上刊出；另一项是编选鲁迅的杂文，以《忽然想到》作书名，分上、下两册，由《改造》杂志社出版。这两件事情的日文翻译交给谁呢？鹿地亘夫妇此时初到上海，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连住处也还是暂借在内山书店里，鲁迅先生想帮他们，就把这两件事情都交给他们来办，既解决翻译问题，又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考虑到他们此时尚不懂中文，鲁迅先生还专门让他的朋友胡风来协助他们。胡风留学日本，曾加入过日本共产党，是鲁迅先生的追随者。让胡风来协



鹿地亘



助鹿地亘夫妇并做翻译，再合适不过。

胡风放下手头的工作，全力帮助鹿地亘夫妇，使这两项工作进展顺利。2个多月后，合作就有了成果：作家萧军的《羊》、彭柏山的《悬镜》、艾芜的《山峡中》、沙汀的《老人》，从1936年6月起，先后在《改造》杂志发表。鲁迅先生的杂文集《野草》《热风》《坟》等的译作初稿也已完成。这一年的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这给鹿地亘和胡风以很大的精神打击。当然，为了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和怀念，他们也更加忘我地、拼命地工作，以期日文版的鲁迅先生杂文集能尽快面世。这时候，《改造》杂志社为缅怀鲁迅先生，也改变了原来的仅出《忽然想到》杂文集的计划，决定出版日文版《大鲁迅全集》。这是一项耗量巨大的工程，中方还成立了由许广平、茅盾、内山完造、胡风等人为编辑顾问的团队，鹿地亘则在胡风等人的帮助下，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终于使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8月开始在《改造》杂志社陆续出版。

沦落香港，仍不忘表达对中国抗战的关切和支持

《大鲁迅全集》出版之际，正值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之时。为保卫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集全国军队三分之一的兵力进行抗敌，上海地区随即湮没在战火之中。而在此之前，胡风已乘船来到武汉，编辑出版《七月》，宣传抗战；鹿地亘则“受到日本特务警犬的追捕，又遭到中国当局的驱逐，只好化装成华侨，辗转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过着艰难的流亡生活”。

此时，郭沫若回国后，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由上海到达香港。郭是社会名流，香港的爱国团体经常请他出来座谈、演讲，报纸上也不时登有他的消息，鹿地亘夫妇在香港生活无着，便想到了他，写了一张字条，托人带给他，希望他能帮助找到一份工作。说实话，郭沫若这时虽然在报纸上常常露面，但要让他找份工作，实在有些难为他，实际上，他自己也是难民啊！十年后，他写《洪波曲》时提起此事，仍然说：“我那时抱歉得很，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而且连信也没有回。”即便在香港生活得如此困顿，

作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鹿地亘也并未放下手中的笔，停止思考和创作。1938年2月16日，武汉出版的《七月》第2卷第3期上，首篇发表了鹿地亘的2首诗歌：《送北征》和《颂香港》。《送北征》是写给几位朋友的颂歌，他们参军入伍，即将出征作战，全诗情感充沛，格调高昂，作者的激情呼之欲出。诗中写道：

你们的胸膛鼓动，
年青的欢喜
是怎样的搔动着，
我们跃动的血啊！

诗人的“欢喜”，除了抗日战场上多了几位战士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加入的是正义之师——八路军，所以他们的出征满载着作者的喜悦与期待。

哦哦，朔风哟，
我在待望着，
待望着你吹送来的消息。
哦哦，每天每天
像那从原野，从山岳
腾舞上去的砂尘一样
向四面八方冲扩的朔风哟，
泛滥地吹罢！
卷起战斗的激情罢！
再恰当不过地，人们
把你叫做八路军。

诗人虽未见过这支军队，但在他的笔下，这支军队承载着他的全部期望和对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朔风在召唤你们，
把你们的燃烧的激情，



用冰雪的心武装起来吧，
去吧，和朔风一起
用坚决的心
去把凶烟吹散！

北方是中国的希望，南方的香港呢，前线硝烟弥漫，炮火连天，不少达官贵人却拖家带口，拎着金银细软，逃离战火，涌到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安逸生活！在《颂香港》中，诗人写道：这里有的是“宁静的街道”“温暖的内海”“风也没有，冰雪也没有”，看不到一星半点的抗战的影子，这让诗人深感失望和烦躁：

温暖的海，
使怠惰的疲劳更厉害了，
我焦躁着，
忘记了季节的太阳，
使无为的焦躁更难耐。
这是一种什么世界呢？！

这与作者当时的困境、心境是相合的，与作者始终系念着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坚定态度是一致的。一个心心念念于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反战斗士，怎能忍受这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享乐环境呢？！何况他还居无安定之所、食无隔夜之粮呢！他向往北方，向往投身抗战，投身火热的斗争！

政治部设计委员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 1938 年 3 月中旬。一次，在陈诚公馆吃午饭时，郭沫若对陈诚讲：“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一些日本朋友来帮忙。”陈诚反问郭沫若道：“目前去哪儿找日本朋友呢？”

郭沫若便推荐了鹿地亘。他介绍了鹿地亘的历史和现状，陈诚很快就同意了。于是，陈诚和郭沫若联名发了两通电报到广州，一通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通给当时广州的保安处长，请他们设法找到鹿地亘，把鹿地亘夫妇护送到武汉来。一个星期之后，在夏衍的陪同下，鹿地亘夫妇安然到达了武汉。

陈诚接见了鹿地亘夫妇，然后就和郭沫若商量他们的待遇问题。郭沫若提议，由政治部聘请鹿地亘为设计委员。那时候政治部有一个设计委员会，安插了很多知名人士，每月给车马费 200 元，照鹿地亘的资历，他当然可以做设计委员。

陈诚说：“他们两个是外国人，一个月 200 元，怕不够用，索性请他们夫妇俩都做设计委员吧。”这样，鹿地亘夫妇的待遇问题决定了下来。设计委员有留部和留厅两种，鹿地亘夫妇被指定属于后一种，他们事实上就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用言和行控诉战争，反战止战

鹿地亘夫妇来到武汉后，受到了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当时武汉各种集会很多，凡有鹿地亘参加的活动，举办方都会请他讲话。讲话中，他或是以亲身经历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或是以喷涌的热情歌颂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或是以真挚的情感去唤醒日本士兵的良知。

1938年3月27日，来到武汉第5天的鹿地亘出席了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并受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我能参加中国文艺作家这样一个大场合，我感想实在很多。”接着，他激动地谈到了到中国、到武汉后的种种感想，又以十分愤慨的语调谈及正在激战中的中日战争，指出：“打倒日本军事的法西斯，单靠军事是不够的，要靠日本的文化界以及反侵略同志共同起来努力……，中国今日正向着世界上最进步的民主大道前进，今天的战争，民众的力量是最基本的决定力量，最后要向诸位致意，中国应当与日本人民以及反侵略的文化人携手起来。”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作家



“继续甚久的鼓掌声”。

4月1日，他应邀出席“全国文协”“影协”“剧协”等11家团体召开的欢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先生及池田幸子女士茶会，郭沫若、吴国桢、沈钧儒、邓颖超、史沫特莱、田汉、郁达夫、范长江等200余中外人士与会。他们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鹿地亘夫妇，称赞他俩是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鹿地亘在答谢词中介绍了风起云涌的日本反战运动，他充满信心地说：“任凭法西斯去力行战争吧，他们已坐在巨大的冰山上，被打得粉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4月9日，鹿地亘在汉口广播电台向日本军民发布日语广播讲话，阐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自卫性质，号召日本军民和中国兄弟站在一起，共同反抗日本法西斯。

4月27日，他出席14家团体共同举行的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法国记者色斯的大会。他说：“我同情于中国，日本的同胞知道了，他们已经给我判了死罪，然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汉口很自由，与中国政府合作，我起草对日的传单，用无线电向日本的兄弟姐妹们广播消息……我希望日本最后觉悟，他的真正敌人，不是中国，是他自己。”这些讲话，尤其是对日广播电台的讲话，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反响。

除参加会议等公开社会活动外，鹿地亘还坚持对敌宣传处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一次轮流与青山、绿川英子做日语对敌广播。1938



鹿地亘在前线做反战工作

年9月，受政治部第三厅的委托，他曾到湖南常德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做反战教育工作。他以极大的耐心，忍受军国主义毒害的日本士兵的凌辱，以百般的真诚，和他的同胞谈心交心，一些日本士兵受到感化，开始转变立场。

这为他后来组织领导“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会”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一阶段的对敌教育工作中，鹿地亘“每日讲演、谈话及阅览俘虏作文，考察俘虏生活感情及思想”，让他对日本士兵，尤其是俘虏士兵的思想状况有了真切了解。后来，他据此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和平日记》。

用纸和笔抨击恶魔，弘扬正义

尽管社会政治活动繁忙，几乎占了他白天所有的时间，但以笔为武器的鹿地亘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写作。他用笔记录日寇制造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撰文痛斥日本御用文人的无耻谰言，写诗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敌斗志和日本人民的反战精神，笔端流淌着的，是他那不假调和、憎爱分明的严正立场。

1938年3月底，《七月》第2集第12期上发表了她的《听见了呀》的长诗，这是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日本出征士兵和家属爆发反战示威，遭到血腥镇压的新闻后，写的一首诗歌。在诗中，他描绘了日本工人反对战争、奋起抗争的悲壮场景：

冲天的巨响响了——
 六乡的勇士呵把敌人忘记了么？
 下船来！挽起手臂！
 调转你们的枪口，
 打倒法西斯们！
 群众的怒吼变成了暴风雨。

这“暴风雨”最终汇成了罢工怒潮，反战遭到了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诗人的笔端喷涌出的是愤张的血脉，燃烧的怒火！

哦哦，染在码头上的血流——
 那是流在世界上
 一些民众的心里的



战斗的血，是燃烧的火！
看吧，看吧！法西斯们呀，
火焰在你们的脚下跳着！
在哄哄地把你们包着！

4月12日，他在武汉写成《致日本同胞》一文，分析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指出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及给日本百姓带来的痛苦，他最后对自己的同胞呼喊：“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离开军队吧！同胞们，把日本从堕落和死亡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吧！鼓起勇气和中国协力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以两国民众的手，站在友爱和自由的新的关系上来确立东洋的再建，现在是真正爱国的日本人民，断行他的决意的时机了！”

鹿地亘的诗和文章像一道道闪电，撕裂黑暗的天幕，照在那些沉浸于军国主义迷梦的好战者心上。一位被俘的航空兵看罢鹿地亘的文章，对着鹿地亘悔恨地说：“我很明白中国人民的心情，我非常羞愧，我也痛感人类的真爱，请你向中国当局转达，我目前已决心与诸君共患难了。”

4月下旬，一个叫法拉尔的法国反动作家颠倒是非，信口雌黄，竟造谣污蔑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鹿地亘义愤填膺，连夜赶写出长达7000余字的《写给法国的弟兄们》，分3次连载于汉口版的《大公报》上，力驳法拉尔的无耻谎言，指出法拉尔毫无节操，只会把自己吊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和丈夫志同道合，患难与共，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同样不忘拿起笔来，加入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战斗行列。在武汉期间，她发表过通讯《复曹白》，叙述了他对中国友人的思念和对战斗生活的渴望。她的日记《武汉行》，记叙了她在武汉的见闻和感想，抒发了对武汉人民的热爱之情。

鹿地亘夫妇在武汉抗战中的正义之举，得到了中国人民的信赖、尊重和热爱。1938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亲切接

见鹿地亘夫妇，胡风担任他们的翻译。周恩来高度赞扬他们的反战立场，对他们支持中国人民抗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新华日报》称赞鹿地亘的作品是“日本文艺作家第一次对于中国大众发出的声音”，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把他称作是“日本进步的良心”和“日本人民的代言人”。

确实，在艰难困苦的武汉抗战中，浴血苦撑的中国人民能得到敌国朋友的并肩支援，这在道义上、精神上获取的，是多么宝贵而巨大的力量！鹿地亘夫妇是当之无愧的“日本进步的良心”！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夫妇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被美军以间谍嫌疑犯监禁1年。其后，鹿地亘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致力于日中民间友好事业，1982年去世。



排下诗的战阵，挖出文的壕堑

—

1937年9月的上海，正处在中日交战的最前线。70余万中国军队同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做殊死搏杀，浦江潮黑，闸北枪响，吴淞炮吼，大上海发出了民族抗战的最强音！身处战地的知名文化人胡风再也不能安坐于书斋之中了，面对一批批熙熙攘攘、惊慌失措的逃难人群，眼见一队队沉着坚毅、奔赴战场的铁血官兵，耳闻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日机轰鸣声和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胡风泪眼婆娑，血脉偾张，他喑哑了多年的咽喉，突然迸发出慷慨激昂的《为祖国而歌》：

在黑暗里在重压下在侮辱中，
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
是我底祖国，
是我底受难的祖国！

.....

胡风是文人，纸和笔是他的枪弹；他是编辑，刊物是他的阵地和堡垒。当战火在祖国燃烧之时，他想方设法办了一份杂志，为宣传抗战呐喊，为国家民族奉献他的赤诚和热血。1937年9月11日，一份16开印本的小小周刊，摆上了上海街头，刊名叫《七月》，选取的是鲁迅的手迹，表达的是对鲁迅和七七事变的双重纪念。

鲁迅是胡风一生中少有的几个崇拜对象之一。1926年，鲁迅在北大兼职，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胡风，亲聆先生的教诲。1933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从日本回国的胡风不畏风险，毅然投身鲁迅直接领导下的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左联”的宣传部长、行政书记，后来的秘书长，他与鲁迅来往频繁，感情真笃。据《鲁迅日记》记载，自1934年1月至1936年10月鲁迅病逝，鲁迅与胡风的通信往来、彼此走动、书刊赠阅、饮茶聚餐等就达120多次。其中，胡风给鲁迅的书信达51封，鲁迅复胡风书信23封，胡风拜访鲁迅39次，鲁迅回访2次。

鲁迅给予胡风的帮助和鼓励，是鲁迅的友朋中不多见的。胡风回国不久后，鲁迅竟在周扬的陪同下，亲自来到胡风的住处，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想必胡风发表在上海左翼刊物上的几篇文学论文，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次会面时，鲁迅一改以往与人初见时话少而冷的形象，同胡风侃侃而谈，让胡风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是清晰如昨。后来胡风因“内奸”谣言而辞去“左联”职务时，鲁迅的一句“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情，多用用笔”，让胡风真正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从而奠定了胡风在文坛上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鲁、胡两家的关系也是与鲁迅有过交往的近2000人中所少见的。鲁迅晚年定居上海时，和鲁迅有过交往的夫妇，最密切的莫过于瞿秋白、杨之华，冯雪峰、何爱玉，萧军、萧红，胡风、梅志了，先生晚年身体欠佳，工作繁忙，很少挈妇将雏到朋友家做客的，但却两次带许广平、海婴访胡风家，其中1935年9月24日的那一次，还被梅志写入了《在“皇宫”里招待鲁迅先生》这篇回忆散文中。这一天的日子是鲁迅自己选定的，恰好是他55岁生日的前夕，那时的胡风和梅志结婚还不到两年，梅志还只是一个22岁的少妇，还不太会烹饪。为了招待好他们最尊敬的客人，她特地让自己精于厨事的妹妹来掌勺，结果一碗江西草菇豆腐汤、一碗霉干菜扣肉，很得鲁迅和许广平欢迎，梅志紧张的心才放了下来。



胡风



正因如此，鲁迅逝世时，胡风被确定为由蔡元培、宋庆龄等 13 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鲁迅出殡时，他又是 16 名扶灵人之一。由于过度悲伤，劳累逾常，他放在兜里的 400 元治丧费被窃了，竟毫无知觉，还多亏老同学巴金援手相助，预支了他的几部书稿的版税，才算替他解了围，而事后他始终没有跟许广平提起过丢钱的事。

也正因如此，鲁迅逝世后，整理翻译鲁迅的遗著，宣传捍卫鲁迅为民族而战斗的精神，成了胡风生活的力量源泉。复刊《七月》，“用精神的微光去和死者的灵魂相拥”，便是他向先生、向抗战致敬的动力。

二

1937 年 9 月 25 日，胡风离开战火纷飞的上海，5 天后抵达汉口，住在老友熊子民的寓所——汉润里 42 号。

胡风是风风火火闲不住的人，稍事安顿后，他即筹备出刊事宜。出刊是需要一笔周转金的，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对于囊空如洗的胡风来说，哪里去筹集这笔资金呢？他整天急得团团转，光秃秃的大脑袋被他抓得红一条白一条的，十分惹眼。好在熊子民有办法，他当时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接受董必武的领导，而早在大革命时期，胡风就与董必武相识。这样，经过熊子民联系，胡风得到了董必武的支持，《七月》得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资助。

10 月 19 日是鲁迅逝世周年的纪念日，胡风认为在此民族抗战的高潮中纪念鲁迅，意义非同寻常。因此，他废寝忘食组稿、编稿，终于在 10 月 16 日，也就是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前 3 天，《七月》复刊了。这一期的《七月》刊载有彭柏山从上海寄来的《活着的依旧在斗争》，胡风的《即使被烧成了灰烬》等 6 篇纪念文章，首印 2000 份售完后，又加印了 3000 份，也很快售空，这给了胡风以极大的信心。

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当天，《七月》联合《哨岗》等刊物举行了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的著名演员王莹为大家朗诵了诗人高兰写的《我们的祭礼》。

面对疮痍破碎的河山，追忆民族导师的逝去，感受朗诵者深情的呼唤，在场者或低泣，或痛哭，胡风更是失声失语。他把几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七月》摆放在鲁迅的遗像前，算是向先生的一种汇报和倾诉。

新的《七月》，由周刊改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胡风任主编，熊子民为发行人，社址设在熊子民的家里。

三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抗战风暴掀起了诗的浪潮。诗是投向敌人的大刀和炮弹，诗是激发民众的鼓点和号角，因而这时候的武汉大街小巷，会场内外，四下激荡着的，便是诗的冲击和震颤。艾青深有感触地说：“这真是一个诗的时代，战争发动以来，全国的作家几乎全部都激动着诗的情感，用素朴的形式写过诗。”

那也是一个血火迸发的时代，伟大的民族战争催生了数不胜数的感人事迹，而这又给了作家用之不尽的精神养料。因此，报告文学就像矫健敏捷的战士，浸润着热血，饱含着愤怒，游走于读者的眼里，涤荡着读者的心灵。茅盾论及此时的创作说：“在作品方面，这一时期——从七七到武汉失守，最流行而最精彩的是报告文学。”

作为一份文艺刊物，《七月》上登载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且由于胡风的推荐和栽培，刊物的周围簇拥着艾青、田间、邹荻帆、庄涌、孙钿、冀沅、侯唯动、苏金伞等一大批新老诗人，活跃着丘东平、曹白、阿垅等一群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执笔为戈，挥毫作弹，以《七月》为营垒，布下了诗的战阵和文的壕堑，向着敌人，向着黑暗和腐朽，射击！

据统计，在武汉办刊期间，《七月》发表过36位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主题接近，风格近似，人称“七月诗派”，艾青和田间便是其中“领唱的歌手”。

艾青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以新诗《大堰河，我的保姆》闻名诗坛。1937年冬，他随着流亡大军来到了武汉，来到了涛急浪涌的扬子江边。此时冰封雪裹的大地，乌云压城的天空，如同在敌寇蹂躏下痛苦呻吟的中国，



悲怆而凄绝！满浸着悲愤的诗人于是写成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
是如此的泥泞呀！

……

同样的，在《北方》一诗中，他依旧“眼里常含泪水”，诉说着北方原野上人民的苦难。

但诗人也渐渐认识到，眼泪并不能驱除敌人的兽心，眼泪也不能减轻民众的痛苦和屈辱。武汉街头的抗战热情，燃起了他胜利的希望，他宣布要“拂去往日的忧郁”，和“悲哀的诗人”告别，他要迎着东升的太阳，走向街头，走上广场，走进带枪的战士的行列，走到人民中间，为复活的土地做“高亢的歌唱”。

1938年初春，艾青在《七月》上发表了《他站起来了》一诗：

他站起来了，
从几十年的屈辱里，
从敌人给他掘好的深坑旁边。
他的额上淋着雪，
他的胸上也淋着血，
但他却在笑，
他，
从来不曾如此的笑过！

全诗深沉，苍劲，满溢着自信的力量。胡风评价道：“这是全民族跃动了”的形象。

此外，《七月》还刊登他的《向太阳》《反侵略——给日本的士兵大众》《人皮》等诗歌，或歌颂人民抗战，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这些诗歌，确立了艾青在抗战文坛上作为吹号者的地位，也奠定了他在七月诗坛中的引路人的角色。

田间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1936年出版反映东北人民抗日的短诗集《中国牧歌》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描写农民反抗斗争的长诗《农村的故事》，为诗坛关注。田间也是1937年冬天抵达武汉，通过《七月》，他与艾青相识相交，相似的人生境遇和相同的人生追求又让俩人亲如兄弟。田间住进艾青租住的小屋，一道布帘隔着他们读书、思考、创作的空间，一篇篇诗作就在这小屋里传递、咏诵、修改，再交到胡风手里编进《七月》。

田间到武汉后写作的第一首诗是《给战斗者》。这是田间于1937年12月24日初到武汉后，在武昌的一家小旅馆里写就的。诗人以沉郁之笔、急促跳跃的诗句，描写生灵涂炭之痛楚，歌颂不屈反抗之伟大：

我们必须拔出敌人的刀刃，
从自己的，
血管！
我们，
人民的呼吸，
不能停止！
血肉的行列不能拆散，
复仇的枪，
不能扭断！
因为我们不能屈辱的活着，
也不能屈辱的死去啊！
……
举起我们被火烤的，
被暴风雨淋的，

被鞭子抽打的劳动者的双手，
斗争吧！
在斗争里胜利，
或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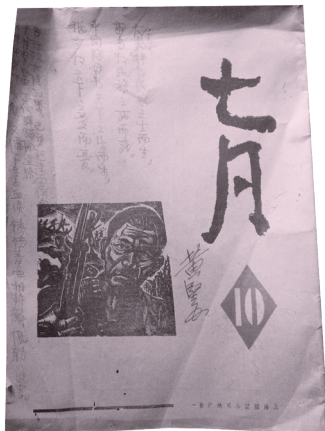
这首诗是田间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高峰，几十年后他回忆说：“这里没有什么细腻的问候，并没有什么花草，也并没有什么弦外之音……这是心灵的申诉，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呼唤，是我们这个古老而且胆大的民族未亡的一个纪念。”

继《给战斗者》之后，田间在《七月》上还发表了《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向国民宣战》《战斗的抒情小诗》《晚会》《儿童节》等一批作品，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1938年初，田间和艾青同赴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忻口会战失利后，晋南陷入日寇铁蹄下，两人不得不匆匆分手，艾青回到武汉，继续在《七月》上放唱，田间则奔赴延安，开启了新的生活。

四

《七月》是需要诗歌的，因为它适应了武汉街头热烈的抗日气氛；《七月》也是需要报告文学的，因为地处战时首都的人们时刻关注着前线和后方的



《七月》

情况；《七月》也是需要小说的，不是花前月下的一种，而是在痛苦中抗争，在沉郁中振奋的那种，因为亢奋中的武汉不能没有精神的养料和壮骨的汤汁。而在《七月》的作家群里，丘东平的报告文学及小说创作无疑是成就最大的。

丘东平是广东海丰人，少年时就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暴动”，担任儿童团长，后又任彭湃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香港，

当过渔夫，做过小贩，并开始学写文章，赚稿费糊口。丘东平经兄长丘国珍引荐参加第十九路军，曾任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的秘书。一·二八抗战时，丘东平随其参战。后东渡日本，加入东京左联，为负责人之一。回国后，辗转广西、上海等地，以写作为生。新四军成立时，他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春，随军挺进大江南北，后随陈毅转战于江南敌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敌工科长兼陈毅的秘书。丰富的阅历，为他写作报告文学提供了厚实的写作素材。

1938年上半年，《七月》接连刊登了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这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和《一个连长的遭遇》等。

《第七连》讲述了第七连连长丘俊（丘东平的一母同胞弟弟）带领队伍在上海附近展开的一场战斗。作品赞扬了抗日士兵不畏艰苦的民族牺牲精神，同时也揭露了这支队伍的混乱和腐败。

《一个连长的遭遇》是丘东平创作最为成功的一部小说，也是武汉抗战文艺中刻画得最深刻最真实的小说之一。通过林青史和他的第四连的突出战绩和悲壮结局，体现了中国军人的抗敌斗志和坚韧毅力，也体现了中国军人身上洋溢着的正义品格和巨大的爱国能量。作品细节感人，情节起伏，全篇充满着火药味和血腥气，也鼓荡着阳刚气概和悲壮氛围。胡风称这部作品为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首最壮丽的史诗，在叙述与抒情的辉煌的结合里，民族战争的苦难和欢乐，通过宏大的旋律，震荡着读者的心灵。

1941年7月24日，才华横溢的丘东平在盐城反“扫荡”中英勇殉国，正避居香港的胡风把满腔的悲痛化作一首《七律·祭东平》：

傲骨原来本赤心，两丰血迹尚殷殷。
惯将直道招乖运，赋得真声碰冷门。
痛悼国殇成绝唱，坚留敌后守高旌。
大江南北刀兵急，为哭新军失此人。

次年，胡风编了《东平短篇小说集》，以纪念这位永远的战士。



五

胡风向来爱憎分明，他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却对国共两党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左联”时，他就与共产党人冯雪峰等结下了深厚友谊，方志敏被捕后写给鲁迅的密信，还是他用碘药水给破译的。到武汉后，他更是得到了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的帮助，包括资助出版《七月》等。

所以，尽管是一份文艺刊物，《七月》的政治倾向也是十分鲜明的，除了大量发表来自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作品之外，它更刊载了来自党的领袖的声音。

1938年3月，《七月》上一篇署名大漠的《毛泽东论鲁迅》的文章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这篇声明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整理的文稿，论述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这是在国统区刊物上第一次发表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随后，《七月》还发表了白危的《毛泽东片段》，向国统区人民介绍了窑洞里的共产党领导人。

此外，每期《七月》出版后，胡风都设法寄一些给延安，其中一部分赠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阅看，另一部分则请延安的朋友代销。毛泽东看来是很关注《七月》上的文章的。1938年5月28日他在读完胡风托刘雪苇转赠给他的《七月》第三集第一期后，复信给刘雪苇说：“我已看了《座谈会记录》，很欢喜，如有新的，请续寄给我。”可见毛泽东对《七月》的喜爱之切。

《七月》以鲁迅的战斗精神为旗帜，团聚了一批激情燃烧的年轻作家，推出了一批记录残暴和反抗残暴的作品。它以灼热的歌喉，唱出了血火交织的大地壮歌，唱出了民族决斗中的不屈英魂。如果说，艾青、田间、丘东平是其中的领唱者，胡风则是《七月》大合唱中出色的组织者和指挥家。

战歌声中的爱情

相识歌咏晚会

1937年10月3日，著名音乐家冼星海随洪深、金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达武汉。

自1935年留法归国后，曾经醉心于模仿欧洲音乐风格、陶然于纯音乐创作的冼星海，在国难深重的现实面前，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左翼文艺界的影响下，先后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最后一滴血》和话剧《复活》等谱写插曲，受到了进步文化界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当得悉他来到武汉后，汉口教师抗日联谊会等武汉抗日团体都竞相聘请他为歌咏顾问，指导开展歌咏活动。

汉口教师抗日联谊会是由汉口地区中小学教师自发组织起来的爱国团体，钱韵玲即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她这时是汉口“六小”的音乐教师，年方19岁，正是活力四溢之时。10月10日，汉口教师抗日联谊会在光明大戏院举行歌咏晚会，钱韵玲负责接待工作。

那天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的秋雨一直下个不停。傍晚时分，晚会即将开幕之前，一位穿着黑色披风、打着红色油纸伞的人走了进来，钱韵玲迎了上去。

“唉，不好意思，今天武昌民教馆（民众教育馆）那里有两场歌咏会，我一直忙到现在才赶来，抱歉！抱歉！”那人一边收拾雨具，一边忙不迭地道歉。

“您是？”钱韵玲好奇地问道。

“哦，忘了作自我介绍，我叫冼星海，是你们联谊会的音乐顾问。本来打算早一点过来，给你们做一些指导的。”那人说。



钱韵玲睁大眼睛，将眼前这个浓发后梳、颧骨略高、眼眶稍凹的男人仔细打量了一遍。“您就是冼老师？久仰，久仰！我很喜欢您写的歌，只是没想到您这么年轻。”

冼星海一下子被眼前这个长着大眼睛、长发披肩的女孩儿逗乐了。他也端详了她一番，打趣地回应了一句：“你以为写歌的都是老童生啊？”说得钱韵玲红着脸，掩口窃笑。

当天晚上的歌咏晚会，气氛十分热烈，演员独唱、合唱了《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保卫国土》《做棉衣》《义勇军进行曲》等20多首歌曲，朗诵了诗人高兰（郭德浩）的《我的家在黑龙江》等十几首诗歌，极大地感染了会场上的每一位观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国土，还我河山！”的口号响彻整个会场。

由于冼星海来时晚会即将开始，所以晚会开幕前，他来不及给演员做指导。晚会过程中，他一直坐在台下认真欣赏、揣摩每一个节目，直到晚会结束，他才来到演员中间辅导大家。

他首先肯定了大家的热情和努力，接着指出了演唱中需要精雕细刻的地方：如何发声，如何换气，声部之间如何切换、配合，等等。他讲得很专业，很细致，钱韵玲等人也听得非常专心，学得非常投入。冼星海似乎忘了一整天的奔波、疲劳，与大家切磋到时针转点，才在钱韵玲等人的陪同下，回到汉口吉庆街和瑞祥里转弯处的住处。

相知歌咏训练班

为了培养歌咏人才，用歌曲去动员民众，宣传抗日，冼星海决定开办“星海歌咏训练班”，教学员唱歌、作曲、指挥的一些知识和技巧，成员包括工人、店员、流亡学生、教职员等，汉口教师抗日联谊会有7位老师入选，钱韵玲如愿成为其中的一员。

训练班每周上课两次，在上课过程中冼星海一个字、一个音节地教大家咬字吐音，手把手地教大家指挥，还注意从节律上、感情上引导大家理解音乐。他说：“就现时代的歌曲来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富于号

召性的、雄壮的进行曲，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这一类作品在演唱时节奏鲜明，旋律宽广，富于棱角性，要表现一种坚决、果敢的气势和激昂慷慨的情绪。”

说完，他以《路是我们开》为例，边唱边以手势打着节拍，一字一句地教大家吟唱。“路是我们开，哎哟，树是我们栽，哎哟，摩天大楼，我们亲手造起来，哎哟，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用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哎哟，创造新世界，哎哟！”

“另一类是兼有抒情性和战斗性的歌曲，如《做棉衣》《茫茫的西伯利亚》等，这类歌曲感情深沉、委婉、细密，歌声的力量更多来自于内心思绪的绵远。”经冼星海这样一讲解，训练班的许多学员进步神速，王云阶等人结业后不久，即组建了“云阶歌咏队”，活跃在武汉三镇街头。

1938年4月，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冼星海参加了第三厅音乐科工作，搬住到了武昌。即便如此，他仍每周风雨无阻，坚持乘船来汉口，给学员上课，有时忙到轮船要开时才登船。他来不及吃饭，就饿着肚子教歌，教完后吃一碗阳春面，再奔回武昌工作。

“星海歌咏训练班”最初设在钱韵玲工作所在的“六小”，这让钱韵玲每周都有两次很完整的时间接触冼星海，后来训练班迁至汉口“一小”，再迁址到汉口基督教青年会，不管到哪里，钱韵玲总是上课最勤、学习最积极、回答问题最活跃的学生。不知怎的，每次见到冼星海她都显得特别兴奋，而冼星海上完课要走时，她又有一种特别的失落，是冼星海的翩翩风度和优雅谈吐拨动了她的爱情心弦，还是冼星海的杰出才华和炽烈的爱国情感开启了她心灵之门？她的心底默认了他，可她羞于与人说起，更不可能向冼星海表白，她不知道冼老师如何看待她，她只把爱的心鹿揣在怀里，任它搅得自己吃饭不香睡眠不安，虽然她的心里甜滋滋的。

其实，冼星海也注意到了那一双常常愣愣地看着自己的眼睛。出身澳门贫苦渔家的他，少时即边打工边学习音乐，从北平艺专到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从南国社到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他一直把音乐作为“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的武器，无暇顾及自己的个人感情，也



难得找到志同道合的知己。现在面前这个长发飘逸的漂亮女孩儿，执着于音乐，热心于抗日，这不正是自己理想中的人生伴侣吗？尽管如此，冼星海也只是在心底掠过一阵涟漪。作为老师，他不便唐突向学生表达爱意，况且，各地歌咏活动频繁，他忙碌不已，也没有时间去细想这些问题。但向来不旷课的钱韵玲有一次却没有来，就引起了冼星海的极大注意。什么原因呢？一问其他学员才知，是钱韵玲的父亲去世了，她回家料理丧事去了。冼星海心头一紧，他想钱韵玲从此失去父亲了，回来后一定要好好安慰她。

1938年2月27日，武汉各界包括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普通民众1000多人在汉口总商会举行钱亦石追悼会。钱亦石又名介盘、嘯秋、史卢，湖北咸宁人，曾留学日本，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中华》《世界知识》等杂志编辑。八一三事变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队长，在上海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后因劳累过度，病逝于上海。1935年，冼星海从巴黎回到上海时，这位湖北籍文化名流、社会活动家就对冼星海的音乐才华极为赏识，老先生去世后，因上海情势危急，追悼会改在武汉举行。武汉各界举行公祭会的消息传开后，冼星海有感于这位文化前辈、抗日志士“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遂为施谊作词的“钱亦石先生挽歌”谱曲，准备献给追悼会。

当他步入追悼会会场时，猛然发现钱韵玲身穿孝衣，臂缠黑纱，双眼红肿地站立在黑漆棺木旁，正不断答谢前来悼念的人们。冼星海豁然明白，原来她是钱亦石先生的女儿！他上前紧紧握住钱韵玲冰冷的手，四目相对，双方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哗哗地流在衣服上、地面上。

再次上课后，冼星海把钱韵玲留了下来。他双眸凝视着钱韵玲道：“韵玲，你失去了父亲，今后让我来保护你，爱护你，好吗？”

钱韵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一把抱紧冼星海，连声说：“我愿意，我愿意。”

整个教室顿时寂静无声，就连窗外枝头上跳叫的麻雀也停止了吵闹，似乎一切都只是为了两颗相爱的心能听清对方的跳动。

相恋诗山歌海

担任第三厅六处第二科音乐科科长后，冼星海和共产党员、作曲家张曙等人一道，配合三厅组织的抗日活动，不断穿梭奔波于各抗日团体、歌咏队、街头剧社，教唱新歌，指挥合唱，指导诗歌朗诵。钱韵玲全力以赴地协助冼星海，成为他身边最活跃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4月初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9日是歌咏宣传日。冼星海精心筹备，钱韵玲等积极投入歌咏队，先在中山公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随后开始游行歌咏。大家在行进中歌唱，在歌声中前行，队伍沿中山路穿行到民族路，又从民权路抵达总商会门口，沿途吸引了十几万人注目。此外，他们又在黄鹤楼集会，举行美术歌咏、火炬游行活动，一时观者如堵，场面壮观。

三厅开展红五月宣传活动。5月4日，冼星海组织了水上歌咏大游行。50年后，钱韵玲还历历在目地回忆说：“星海指挥大家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开路先锋》《太行山上》《青年进行曲》《游击队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又指挥浩浩荡荡的队伍进入市区。我随着游行队伍，从黄鹤楼到阅马场，一边唱歌，一边呼口号。我们每到一地，就把那里活跃起来，把洪亮的歌声充满街道，然后我们又转回黄鹤楼登船，通宵高唱抗战歌曲，愤怒的歌声响彻大江南北，从四面八方汇成震天的怒吼！”

7月，星海歌咏队等团体在光明大戏院召开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作曲家刘雪庵致辞，冼星海、田汉、阳翰笙、李公朴等先后上台讲话。大家回顾了聂耳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热情，歌咏队演唱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台下的观众也齐声合唱，整个光明大戏院顿时人如潮，歌如海，抗日歌声久久回荡。8月9日，武汉三镇同时举行“保



冼星海与钱韵玲订婚照



卫大武汉”火炬游行活动，各剧团纷纷上街演出，诗人上台朗诵诗歌，冼星海则在阅马场指挥了万人歌咏，歌咏现场上万人同声同调，真是排山倒海，响遏行云，武汉人民的抗敌热情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一次又一次演出活动中，钱韵玲与冼星海珠联璧合，配合默契，他们的爱情之花也在如潮似浪的抗日歌声中绽放得更加璀璨夺目。

牵手金秋时节

在武汉抗战期间，冼星海除了忙于各种社会事务、组织大型歌咏活动之外，还以饱满的热情勤奋创作，谱写了大量充满感染力与战斗力的抗日歌曲。在沸腾的大武汉，抗日热潮和他心中的爱国热情激荡迸发，给了他无穷力量和横溢才情，他恨不能不眠不休地用歌声做武器去肃清残暴敌人，唤醒千百万人民，拯救苦难中的祖国。据统计，目前音乐界已收集到冼星海一生创作的歌曲 200 多首，其中在武汉的一年中，他就写作了 58 首，占了四分之一，可见他的创作力的旺盛。

冼星海注重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寻找素材，丰富创作内容。一次，他到大冶煤矿去宣传抗日，教工人唱歌，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了一个星期。其间他看到工人早晨下井，晚上出井，一身煤黑，苦累不堪，心里十分难过。他含着泪水谱写了一首歌曲，歌词十分简练，其中部分是口语和号子，表现了挖煤工人虽然在艰辛沉重的劳动之中，仍不忘抗日救国的感情。



冼星海、钱韵玲与他们的女儿妮娜在延安

钱韵玲见冼星海没日没夜地奔波创作，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想方设法照顾冼星海的生活。冼星海忙得顾不上吃饭，她就抽空跑到

街头炒一个小菜,送到冼星海的面前。歌咏会上,看着冼星海指挥得满头大汗,她会为他端来一瓷缸冷开水。冼星海深夜创作时,她会煮一碗鸡汤鸡蛋面让他消夜。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贤良和细致来照料他的恋人,张曙等朋友见冼星海确实离不开钱韵玲的照顾,就撺掇他们结合起来方便工作。

在秋日融融的9月,这一对乐坛知音终于结婚了。婚礼当天,武汉的大小报刊都竞相报道。新婚生活是甜蜜的,但他们并没有沉醉其中,而忘却民族的灾难和民众的痛苦。他们深知,只有把自己的全部投身到民族抗战之中,他们的爱情才会长久而幸福。所以他们在婚后更频繁地到乡村、工矿、学校、兵营、街道去教歌、唱歌,他们想为保卫大武汉而竭尽自己的所有心力。

然而,随着日军逼近武汉,形势日渐危急。10月上旬,田家镇、半壁山陷落,武汉东大门完全洞开;10月12日,信阳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几乎与此同时,大别山地区的防线也被日军突破,武汉已处在三面受敌的险境之中。撤离武汉,已成定局。究竟往何处撤退,就成了这对新婚夫妇的一个重大人生抉择。

在武汉工作期间的经历,让冼星海对国民党内部的腐朽有了直观认识,他从国民党人身上看不到中国的前途。10月初,《新华日报》登载的一篇报道《抗战中的延安》却让他很是兴奋。从这篇文章中,他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廉洁、朴素、团结和为抗战所做的种种准备。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现在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因此,他毅然对钱韵玲说:“我们走吧,到延安去,那里有着无限的希望和光明。”

恰在这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给冼星海发来聘书,聘请他担任音乐系主任,随聘书还附有一封文学院院长沙可和音乐系全体师生30多人签名的信件。冼星海被深深地打动了。接着,一向心细的周恩来找到冼星海,询问他到鲁艺任教的想法。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周恩来随即帮助冼星海和钱韵玲离开武汉,前往延安。这对从抗战歌声中走来的革命伴侣,又相伴着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做民族抗战的号手和共产党人的朋友

武汉抗战期间，邹韬奋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撰文呼吁全民族抗战；以出版家的身份，发行出版抗战书籍；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争取抗日民主权利；以党外朋友的身份，与共产党人并肩奋战。大武汉的抗日救国浪潮，在邹韬奋的短暂一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利用报刊阵地，宣传民族抗战

1937年7月31日，邹韬奋等“救国七君子”从苏州监狱里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结果，是全国各界不断疾呼、积极营救的结果，也是国民党人迫于战争形势不得不选择的结果。当天，清瘦的邹韬奋向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表示：爱国无罪，爱国万岁！抗战精神，始终不渝！

他是个职业新闻人，他的生命离不开对社会、对民生的关注和倾诉，离不开抒发“爱国”与“抗战”呼声的阵地，他需要办报刊。因此，“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六天，他和胡愈之、胡绳等同仁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后又随着逃难大军，把这份刊物迁到了汉口。他就住在文化街（现交通路）金城文具公司的楼上，主持着《抗战》及生活书店的工作。

《抗战》是以笔作枪、以墨作弹的，它登载了大量来自前线的战地通讯，也发表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对时局的宣言、主张，还报道了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的抗战情况，反映了各界群众的抗战心声。他自己更是不忘奋笔疾书，后来把这一时期刊发于《抗战》和其他报刊上的文章结集编成了《再厉集》，以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

这时候，“七君子”中的李公朴联合柳湜在汉口创办了《全民》周刊，号召全民族儿女支援抗战，参加抗战。这两份“救国会”负责人主办的刊物在民族抗战问题上发出了同一种声音。为集中人力物力，以更洪亮、更

强大的声音吹响抗战的号角，1938年7月，两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地点设在汉口联保里32号，邹韬奋为总发行人，并与柳湜同为主编，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为编委。

《全民抗战》三日刊在“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总口号下，解说时事，报道三日内国内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文化以及国际事件，并加以评述；刊发专稿，请专家撰写军事、政治、国际时事特稿、专稿；发表社评、专论；介绍有关抗战知识，讨论、交流抗战工作。由于时事性强，出刊周期短，信息量大，能及时反映各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政论时评和战地通讯适应了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需求，《全民抗战》虽只出刊30多期，但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发行地区遍及广州、重庆、昆明、长沙、桂林、香港等大中城市，最高发行量曾达30万份。

邹韬奋既是《全民抗战》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他多次表示：“愿做民族抗战的号手。”因而在他的文章中，既有对共产党人、民主党派人士和一般群众抗日活动的报道，也有对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浴血抗战的颂扬；既有对国民党坚持抗战、推进某些民主举措的欢迎，也有对其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压制民众爱国行动的尖锐批评。

1938年9月12日，陆军二十九师第八十六旅旅长陈德馨因伤重在汉口万国医院逝世。次日，邹韬奋去医院采访了陈旅长的战友，了解了他在广济前线作战受伤的经过和临死犹呼喊杀敌的悲壮情形，回来即写就了《记临死呼战的陈旅长》一文，刊登在当天的《全民抗战》上，这篇通讯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陈旅长出殡之日，武汉三镇万人空巷前来为英雄送行，“抗敌保国”的口号再一次在各界民众中掀起了爱国高潮。

邹韬奋还和沈钧儒等救国会同仁到湖北阳新、江西德安等地去慰劳前方将士，采访战地消息。在前线，他为将士们的英勇而感动，也



邹韬奋



为伤员得不到很好照料，甚至被弃路旁任其生死而感到不安和愤怒。因此，他在文章中强烈呼吁政府当局改弦易辙，放弃片面抗战路线，积极组织民众团体，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

除主编刊物外，邹韬奋还经营着生活书店，任该店的总经理。生活书店于1933年7月创办于上海，1937年12月搬迁至武汉后，在汉口成立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根据抗战需要来制定编辑、出版计划。

书店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抗战方面的图书。这些图书多为名家之作，质量高，而且都以丛书形式出现，从而成为书店编辑出版的一大特色。如《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就包括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冯玉祥的《抗日游击战术问答》、李公朴的《民众动员论》、邹韬奋的《大众集》、潘汉年的《全民抗战论》，《救亡》文丛包括钱俊瑞的《给救亡同志的公开信》、胡绳的《后方民众的总动员》、马常治的《大众防空知识》、徐得功的《大众化学战知识》等。这些丛书系统性强，知识性强，对人们认识抗战前途、掌握抗战知识、增强抗战信心，对鼓舞前方将士和动员后方民众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图书十分注重平民化。为适应普通民众的阅读水平和阅读需求，他们的图书语言上力求浅显易懂，体裁上尽量耳熟能详，内容上紧紧把握抗战主题，像冯玉祥的《开步走》、杨晋豪的《八路军出马打胜仗》、赵景深的《八百好汉守闸北》等，或以诗歌，或以故事，或以说唱文学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图文结合地宣传抗战事迹，介绍抗日救亡知识，极大地增强了图书的受众面和影响力。

生活书店还非常注重图书的时效性，以期将抗战的信息及时传达给读者。1938年5月，日军全力围攻徐州周围的60万大军，一批随军记者不得不跟随部队长途转移，他们纷纷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记录下来。3个月后，一部记载着众记者生死大逃亡的通讯报告集《徐州突围》摆在了书店的货架上。1938年6月，诗人臧克家到河南前线采访，8月，生活书店即出版了他的诗集《军行》。

生活书店出版或经销的书刊种类多、数量多，发行范围广，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就刊物来说，有《抗战》三日刊、《世界知识》半月刊、《妇

女生活》半月刊、《七月》半月刊、《群众》周刊、《全民抗战》三日刊等 20 多种，这在当时出版社和书店的经营中都是不多见的。就书籍来说，既出版中间人士撰写的书稿，也发行共产党人编写的书籍；既有一般抗战理论书籍，也有众多的抗战通俗读物，还有相当数量抗战有关的艺术书籍。书店除在汉口设立总店外，分店由原来上海、广州的两家发展到了 55 家，遍布中国 14 个省，仅抗战通俗读物就发行了 500 余万册。邹韬奋和他主编的《全民抗战》以及他主持的生活书店成为武汉抗战文化战线上一个影响广泛的宣传阵地。

利用议政舞台，争取民主权利

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的遴选条件，1938 年 6 月，邹韬奋以“重要文化团体”“著有望望”的人员，被推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早在国防参议会时期，邹韬奋就被聘为参议员，所以他说：“国防参议会

是国民参政会的胚胎。”

以他多年对国民党的观察、了解和与其打交道的经历，他对参政会的定位和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是非常的时候，国民参政会是在这非常时期所产生的非常的民意机关。”而这个非常民意机关“和欧美各国的所谓议会，显然有两个最大的差异：第一个差异是各国议会里的议员是由民选而来，而我们这次参政员是由政府选聘而来的”。“第二个差异是在各国议院里，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各党有各党的目标，往往互相非难。而我们这次的参政会却是由各党各派、各区域、各民族及无党无派的国民，在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尽管如此，他对国民参政会仍寄予深切的期望。他认为各参政员虽不是由民选而来，不是直接受人民的付托，却应该以民意代表自任，应该把国民参政会视为民意机关，应该努力使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成为民意机关。同时，他希望政府能切实重视，落实执行这个民意机关的意见，认为“倘若决而不行，行而不彻，那么这个会就是多余的”。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邹韬奋以满腔热忱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并



在会上利用合法身份反映民众心声，表达民众要求，为民众争取抗战民主权利。他相继提出了3个提案：1.《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这是针对国民党为实行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而限制、随意解散民众团体提出的提案。2.《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这是针对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及《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侵犯人民民主权利、压制抗战言论自由的各项规定而提出的提案。3.《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植干部案》。该提案提出改善青年的训练办法，引导青年抗日情绪，培养青年骨干，是保护、发挥青年抗日积极性的重要途径，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

这三个提案涉及抗战中民众运动、舆论自由、青年培养等重要问题，关乎民主权利和抗战前途。邹韬奋提出后，引起了其他参政员的关注，结果每一个提案联名附署的参政员少则10多人，多则30多人，最终都获得了大会的通过。

邹韬奋还通过会场外的民主力量，配合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他在主编的《全民抗战》上组织刊发了温光三的《民众为什么动员不起来——献给国民参政会诸先生》等一批重要文章，揭露国民党基层政权贪鄙腐朽、保甲制度僵化生硬、各级官吏专横跋扈、普通百姓生计艰难，更谈不上民主人权的事实，要求国民党当局切实革新政治，开放民主，以动员民众，坚持抗战。这些呼声对促使国民参政会通过相关议案，迫使国民党当局在内政上做出有限调整，都有一定的作用。

利用舆论力量，反对文化专制和政治压迫

就在武汉抗战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推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国民党当局，面对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渐渐“失控”的局面，颇感不安。应该说，他们也赞成甚至直接推动着抗日文化宣传活动，但是他们更想领导、掌控甚至包办这些宣传活动，因而对舆论宣传力量采取了诸多限制、钳制的办法。1938年1月，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依照其制定的《新闻检查标准》，突击检查了包括《新华日报》《抗战》等许多刊物，新华日报社还遭到了

10余名歹徒的打砸。随后，国民党当局颁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以及《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并成立由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武汉新闻检查所以及国民党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军等各有关方面联合组成的检查出版委员会，“严格审查”书报刊物。

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行为，邹韬奋非常气愤，他在《全民抗战》上发表了《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和《再论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等文章，对国民党的乱没收、乱扣留、乱查禁行径，给予了尖锐批评。他借古人的话来提醒国民党当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宜于疏导，而勿令溃决。”生活书店还和商务、中华、世界、开明等10多家书店联合具文，强烈吁请当局顺应时势，撤销书报审查决定。

10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第二次会议，邹韬奋又争取70余名参政员联署，以编著人和全国出版家代言人的身份，向大会提交了《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的提案，获得了大会通过。尽管国民党从未想到过认真落实各项提案，这些吁请和提案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但它从政治上仍给国民党一些压力，从思想上也教育了人民。

利用党外身份，与共产党人协同奋战

1935年华北事变后，邹韬奋和救国会的言行与中国共产党人号召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十分吻合，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也基本一致，共产党人很快就视救国会诸人为可以挽手并肩的朋友。因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西安事变”谈判时，所提出的六项主张之一，即是“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这里的“上海爱国领袖”特指“救国会七君子”，由此可见对因“爱国罪”而入狱的邹韬奋的关切。随后，在上海、南京、庐山等地的国共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人仍把释放政治犯包括“救国会七君子”作为条件提出来，为邹韬奋等人早日走出苏州监狱，不断作出努力。



邹韬奋从自己的社会活动和与国共两党的交往中也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共产党人才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到达武汉后，蒋介石先派人、后亲自找邹韬奋谈话，希望他加入国民党，甚至许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一职。邹韬奋看穿了蒋介石欲分化瓦解民主党派，借民主人士以装门面的做法，遂一口回绝了蒋介石的“美意”。

而对共产党人，邹韬奋却以真诚相待。《抗战》迁汉后出刊的事稍有着落，他即在张仲实的陪同下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受到周恩来热情欢迎接待，两人相见恨晚。周恩来说：“我们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是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临别时邹韬奋邀请周恩来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1938年5月19日，周恩来出席生活书店店员茶话会，鼓励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的人员多为抗战出力。周恩来的推崇和关怀，使邹韬奋深为感动，邹韬奋决心在中共的领导下，为救国救民而奋斗，于5、6月间向救国会中共党团书记钱俊瑞申请加入中共组织，并向周恩来申述了加入中共的迫切要求。尽管党组织考虑到邹韬奋留在党外比加入党组织更有利，更能发挥其作用，没有同意请求，邹韬奋始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但他理解党组织的决定。此后，他更自觉地与共产党人站在了一起。

前文介绍过，《抗战》三日刊上经常登载共产党的宣言、主张及共产党人关于抗战的文章。《抗战》与《全民》合刊为《全民抗战》后，在“书报查禁”问题上和“解散三团体”事件中，邹韬奋与共产党人更是桴鼓相应，并肩奋战。在生活书店出版和销售的书籍中，共产党人撰写、编定的著作占有相当的比例。新华日报社和《群众》周刊社编辑的新群丛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及《新华日报》社论集、《群众》周刊合订本等，都委托生活书店经销；生活书店还销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邹韬奋把这一切都看作是自己对共产党人奋斗目标的认定和支持，看作是自己追寻共产党人远大理想的一种表现。这种追寻是虔诚无伪的，终生不渝的，直到1944年7月24日，走完他那不平凡的半个世纪的人生。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7月，和大多数文艺界同仁一样，老舍在武汉这座涌动着民族救亡大潮的城市生活了8个月之久。他主持“文协”工作，为“文协”内外事务操心尽力，主办《抗战文艺》，为杂志组稿、阅稿、编稿、校稿、印刷，不辞辛劳，任劳任怨，还创作了不少通俗文艺作品，带头实践“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创作原则，为引导文艺界投身抗战洪流，自觉担当了一名尽职尽责的小卒。

凛冽寒风中拎着一只皮箱来到了武汉

凭着名作家的头衔和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的身份，抗战爆发前，老舍一家的生活是富裕、安康、幸福的。这从他在一张照片上的题诗就可以得到印证，其诗云：“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济南山水充名士，篮里猫球盆里鱼。”山东大学当时在青岛，在那儿凭海临风，看朝霞夕照，观浪卷云舒，这给了老舍汨汨而涌的创作源泉。因而他一边给学生教“小说作法”“文艺评论”“高级作文”等课程，一边伏案写作，他惬意于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

但卢沟桥的枪炮声震动了华北大地，也震碎了老舍一家平静的生活。平津已陷战火，齐鲁祸已不远，老舍既担心深陷北平的母亲，又焦虑于身边的妻儿。他想往南走，避居上海，无奈妻子胡挈青生产在即，加上沪上形势不明，所以他只得继续蜗居山大，静观其变。

8月中旬，济南齐鲁大学聘老舍为国文系教授，因齐鲁大学方面居所无着，老舍不得不只身前往。不几日，淞沪会战爆发，青岛随即失陷，这让老舍忧急万端，寝食难安。多亏友人相助，送妻小到济南，方使他心绪



稍宁。不久日军向济南步步进逼，全城一日三惊。到11月中旬，齐大师生已多半离校，老舍后来回忆说：“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解除。院里寂静得可怕，卖青菜、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饭吃。”

老舍也想到了走，倘使不走，济南一旦沦陷，他要么做日寇治下的奴隶，要么俯身做汉奸，而这都是他所做不到的。“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他后来说。但走又谈何容易呢？一则妻儿弱小。妻子胡挈青生产仅3个月，身子还很单薄虚弱。3个孩子，长女舒济4岁，儿子舒乙2岁，幼女刚满3个月，举家逃难，险阻重重。二则经济困窘。齐大已名存实亡，工资无从着落，书稿版税稿费又因战事无法收到，致使“存款无多，仅足略购柴米，用之行旅，则成难民”。因此，老舍在走和不走之间踟蹰不决，左右为难，他舍不下为夫之责、为父之情，又担当着爱国之义、民族之节，他几次提起了皮箱，又几次放下了皮箱。

犹豫之中，日军的铁蹄声已隐约可闻，国军毁坏黄河铁桥的爆炸声已声声入耳，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济南城危在旦夕，再不走将是逃无可逃了。11月15日，老舍决计独自离开济南。冬日的黄昏，天空满是愁云。他拿了50元钱，拎着装有两三身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久久地搂着一双儿女，瘦弱的胡挈青则抱着小女儿，噙着泪水，深情地看着他。老舍的心里如被人锤击一样疼痛：我这一走，妻子一肩挑着养育3个孩子的重担，何以为生？又何以保证安全？我此去前途未卜，生死难料，生离岂不等同于死别？想到这里，他的心头涌上一阵酸痛，有些含混地对胡挈青说：“我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几十年后，他回忆此时的心境说：“在我的心里，我期盼有车，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同时，我也愿车已不通，好折回来跟家人共患难。这两个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战，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张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凭火车替我决定。”

岂料这一走，他真的搭上了南行西往的列车。他与妻儿竟一别6年之久，

直到1943年11月17日，胡挈青历经千难万险，辗转来到重庆。岂料这一走，竟像掏空了他的心肺一样，让他长时间生活在伤感牵挂和自责之中。惯于写白话文的他，到武汉后写旧体诗《流亡》，以明心迹：“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



老舍

来？话因伤别潜衣泪，血若停留定是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为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他写他的妻子：“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地去做事，好对得起她。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样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国难时期……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岂料这一走，升腾起了他原本郁积的爱国烈焰，让他像一头不知停转的陀螺一样，忘我地投身于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以笔作刀去战斗，战斗！

经过三天三夜的辗转奔波，11月18日，老舍终于到达了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是深冬时序，寒风飕飕，滴水成冰，抗战形势的压抑与气候的冷酷，使这里的一切像是被冻结了一样，冷硬沉闷，让人在骨子里生出透彻的寒意。尽管如此，老舍的到来，在文人中间还是引起了一阵惊呼，就连以写“丘八诗”而闻名的冯玉祥将军，也为老舍弃家别子，一只提箱到武汉的事迹所感动，遂提笔为老舍作“丘八诗”道：“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捧中华。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艰难危局中毅然挑起“文协”的重担

与老舍一样，流亡到武汉的还有上千名文艺界人士。一时间，武汉成了文化名人的聚集之地，这里集中了当时中国文学界、艺术界的主要精英



力量，可谓群星璀璨。以往大家都只是互闻大名，现在聚集一处，除了高兴、兴奋之外，更感到联合起来的必要。而国共两党面对这支能够引领抗战方向，鼓舞抗战斗志的精神力量，也自然都希望把文艺家们组织起来，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于1938年初，即着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筹备工作，老舍被邀参与筹建活动。

在筹备过程中，国共两党又都不愿轻易放弃对这个社会团体的影响。国民党方面以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为首，企图控制这个社会团体，但他们难以推出深孚众望的人选来做它的领导，同时又绝不接受共产党方面可能推荐的左翼作家人选。共产党方面也十分重视这支文化大军的力量，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指派萧伯青（左翼作家）和冯乃超负责文艺界的统战工作。经过权衡考虑，他们认为，既然左翼作家会遭国民党拒绝，那就推荐无党无派又享有盛名的老舍主持“文协”，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都赞同这一提议。国民党方面也觉得这一人选可以接受，于是老舍便被推到了“文协”的中心位置。

当时考虑到“文协”组织的特殊性，也考虑到国共双方政治力量的平衡，这一团体没有像其他社会团体一样设理事长、会长之类的最高职务，而分设总务部、组织部、研究部、出版部来落实各项具体工作。其中总务部主任对内协调协会事务，对外代表协会活动，是协会的实际总负责人。老舍即是被推举担任这个职位。

作为一个自由派作家，老舍是惯于与世无争，埋头写作的，现在突然要他领导文化人做宣传，搞创作，成为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他起初是极力推辞的。因而在确定“文协”组织人选会上，他再三辞谢大家的好意。他说：“我算老几？怎能担此重任？”几次三番之后，会场一度陷于僵局。众人似乎不好再说什么。郁达夫这时被大家推选为研究部主任，他见老舍如此推托，便略带情绪地将了老舍一“军”，说：“这样吧，既然老舍先生不干，我这个研究部主任也不干，大家各自回家躲起来写小说算了。今天焕章先生（冯玉祥）请吃饭，这顿饭是要叨扰的，吃完饭我们就散伙吧！”这一“激”还

真起了作用，老舍只好笑着认领了。

在“文协”的筹建过程中，冯玉祥提供了不少帮助。冯玉祥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主张团结抗战，追求光明进步，因信奉基督教，人称“基督将军”。

冯玉祥少时家贫，只读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11岁入伍。当兵后，他通过看小说和用竹棍绑麻丝蘸黄泥练字作画，居然粗通文墨，写诗作画很有一些社会影响。1934年，《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在张家口采访他，他兴味之余，作画相赠，画的是一弓腰流汗的车夫在埋头拉车，其状堪怜。整幅画寓意明确，线条简洁，他还在上面题诗一首：“终日拉车，牛马生活。委员薪水，一月八百。”这诗后两句是有所指的。有一次冯玉祥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会议时，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提出，中央委员月薪800元太低了，要增加。耿直的冯玉祥深知民间疾苦，立马站起来指着谭延闿的鼻子骂道：“猪受主人豢养，还能用皮用肉来回报主人。我们这些中央委员受人民供养，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回报人民什么没有？比起猪来，我们难道心中无愧？”此事一时在坊间、报章上哄传。

冯玉祥喜欢以打油诗的形式抒发对民生的关注和对黑暗政治的不满。他自命他的诗为“丘八（兵）诗”，意为浅显直露，不伪饰。抗战开始时，冯玉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淞沪战区的司令长官，但随着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加深，他的一切实职都被剥夺，只留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等闲职。尽管如此，戎马一生的将军眼见山河沦丧，自然是赋闲不得，不能提枪上前线效力疆场，他便握笔在后方为前方将士呐喊助威，这样他与流寓武汉的文化人有了亲密接触，老舍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领导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隐居泰山，闭门读书。其时老舍正以《骆驼祥子》驰名文坛，自知文化不多的冯玉祥便想拜老舍为师学习写作，但那时老舍潜心创作，婉拒了将军。现在两人相会于武汉，冯玉祥的直率、坦诚、爽朗和对文化人的尊重，深深地感染了老舍，加之老舍也是基督教卫斯理宗循道会的教友，因而两人很快成了文友、教友。冯玉祥支持老舍等人筹建“文协”，为方便交流，他将自己居住的福



音堂东楼让给老舍、吴组缃、楼适夷、老向（王向辰）等文化名流居住。闲暇时候，他还请老舍等人聚餐聊天。虽然餐桌上端上来的只是馒头、咸菜、牛肉汤、盐煮花生米，或加卤面，但众人以茶代酒，把盏高谈，或战事，或文事，莫不兴尽而归。

作为中共代表团驻汉代表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十分注意对冯玉祥开展统战工作。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到福音堂拜会冯玉祥，向冯玉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得到了冯玉祥的赞同和拥护；周恩来还请冯玉祥在“文协”开幕地点上予以协调解决，冯玉祥也表示同意。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老向担任司仪，邵力子致开幕词，王平陵报告筹备经过。

周恩来莅临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文协”的成立，“表明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的深重危难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了，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

冯玉祥出席大会并演讲，表演节目。在表演节目时，人高马大、身形魁梧的冯玉祥穿着长仅及膝的藏青色外罩，戴一顶鸭舌帽，拂着一块手绢，高唱了一首泰山民歌《柴夫的儿子》，博得了会上600多名文友的喝彩。会后，冯玉祥还在普海春大酒店宴请了所有与会文艺界人士。

大会最后通过了会章及各项议案，发表了大会宣言、致世界作家书及告日本文艺作家书，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阳翰笙、邵力子、冯玉祥、田汉、巴金等45人被推举为理事，蔡元培、宋庆龄、叶楚伦、于右任、宋美龄、孙科、白崇禧、陈立夫、陈诚、周恩来、张闻天、何香凝等被聘为名誉理事。大会决定出版会报《抗战文艺》，大力提倡“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老舍宣读了大会宣言，他真诚地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这是老舍给自己的定位，也是他给别人作出的承诺。

“文协”成立了，老舍这个总务部主任也正式走马上任了，这对于老舍来说，就是一份责任，一项义务。他是一个不干则已，一干就全身心投入的人，为了处理“文协”的日常杂务，他花了大量时间编杂志，写通讯，起草宣传提纲，这对于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职业作家来说，该是一件多么烦琐又多么需要奉献的事情。

按照“文协”章程规定，“文协”里除一名专职驻会干事能每月领取少量的薪金之外，其余人包括各部正副主任均属义务劳动，也就是说老舍在“文协”的所有付出是没有酬劳的，且日常通讯所用的信封、邮票还需要自掏腰包。老舍为此无怨无悔，一干就是七年，直到抗战胜利，“文协”解散。

真正让老舍苦恼的是“文协”活动经费的拮据。“文协”成立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补助 500 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每月补助 200 元，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每月补助 500 元，以供协会日常开支。但随着战事紧张，各部经费萎缩，这些补助很多时候都不能及时到位，有时一拖数月之久。老舍后来苦涩地回忆说：“‘文协’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文协’成立，得到手里的只是筹备会的欠债 300 元。债必偿，事必办，‘弄钱去’乃成为口号。”因此，为维持“文协”的运作，他一方面节约开支，压缩酬劳，就连“文协”理事聚会议事时所需的茶水费用，也由理事们自掏腰包。“文协”理事有几次会议是在冯玉祥的住处福音堂召开的，这时候如果冯玉祥与会，他会提供茶水，并招待大家吃烧饼、油条、小米稀饭，理事开会的状况才稍有改善；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拉下文人的面子，在各个部门之间游说、“乞讨”。老舍的朋友以群回忆说：为了文艺界的团结，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知费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乃至叩头、作揖，只要是为了“文协”，他不推辞，碰到困难也从不退避。

“文协”的作用是团结各路文艺大军去发动群众，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开展对敌斗争。于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在“文协”成立的当天作为一条醒目的横幅悬挂于会场前面，会后即作为战时文艺工作的行动



纲领，鼓励文艺工作者们深入乡村，奔赴前线，为民族抗战鼓与呼。正如老舍所说的：“这时候这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做枪炮和炸弹。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跳的文心在抗战中去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励。”

正是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之下，成百上千的文艺工作者走出狭隘的“亭子间”，迈出宁静的“象牙塔”，冲破艺术沙龙的藩篱，自发地投身抗战的洪流，参加郭沫若主持的“三厅”活动，以工作队、宣传队、歌咏队、漫画队、孩子剧团、慰劳队、服务队的形式，分赴各地、各战区，唤起民族的激情，播撒抗日的火种。不少作家如臧克家、丘东平、姚雪垠、黑丁、曾克、李辉英、碧野等还在前线直接参与了对敌斗争。艺术家们以歌舞、街头剧、漫画等形式，作家们以报告文学、战地通讯、文艺速写及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鼓词、弹词、快板、评书等形式创作出了一大批质量上乘、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一扫以往作品的儿女之态、脂粉之气，展现出阳刚风骨和民族气概，不少作品成为辉耀抗战文艺史册的不朽篇章。

作为“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老舍除了极力宣传这一口号，指导“文协”活动的开展之外，更在繁杂的事务之余，以实际行动带头实践这一口号，挤出时间创作小说和各种通俗文艺作品，且数量不菲，成为武汉抗战期间创作成就最为显著的作家之一。

一部最终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蜕》

老舍以写作小说扬名文坛，来到武汉后，尽管“文协”的工作占用了他的大量时间，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但对一个热衷写作，视写作为生命的人来说，停止他的笔，就如同停止他的呼吸一样难受，况且在这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之中，深爱祖国的老舍岂能无动于衷。他来到武汉，就是想为抗战出力，为民族而歌，所以在到达武汉之初，老舍即开始构思反映抗日题材的小说。

“文协”成立后，在忙完各种事务之余，在编辑《抗战文艺》的稿件之中，在每日送走最后一批来访者之后，他就在夜阑人静时疾书，边写边发表。《人

同此心》《浴奴》《敌与友》等作品相继出炉，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蜕》，这也是武汉抗战期间文艺界所创作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蜕》从1938年2月起连载于《抗到底》半月刊上。《抗到底》是由冯玉祥发起并资助，于1938年元旦创办的通俗文艺刊物。刊物编辑老向在发刊词中表示：“抗到底”这个名称，充分代表着本刊的特征。我们要根绝妥协，永不屈服，抗战到底。我们不说大话，但绝对不说软话，不说于抗战无益的话，更不为谁造消遣趣话，我们愿以血为墨、使文字为武器赠予全国的同胞。《蜕》刊于《抗到底》上，也可见作品主题与刊物宗旨的吻合了。至于为何将作品命名为《蜕》，老舍在小说开头的“题解”中写了一段譬喻：“是在昆明湖的苔石上，也许是在北海上斜着身自顾绿影的古柳旁，有小小一只蝉正在蜕变。无疑的，时候是已经晚了一点了，因为柳影已略略含着悲意，晚风开始透出一一点警告的秋凉，蜕变似嫌太迟了些个。可是生的意志顽抗着一切的困难，生或死全凭今日的挣扎，没工夫去顾虑什么。生命的第一句口号是勇往直前，不管不顾的向前冲杀是它的最原始而最聪明的战略。这只小蝉是把钢一般黑润的身儿，由皮壳里冲出来，由阴暗而光明，由隐忍而活跃，绝对相信它自己的力量。它必须自证能飞上枝头，唱出生命最美的歌。它必须鼓动那潜在的大力，把自己提拔到朝阳与晚晴中，由酣睡而飞鸣。它那点小小的力量，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它是所向无敌，用生的意志击破所有的困难的。一直到它飞上柳枝，它还是喊着‘冲杀’、‘向前’！”

在这里，老舍以象征手法，将正在苦难中挣扎的祖国比喻为一只蜕壳的夏蝉，虽是艰难，虽是痛苦，却充满了生的活力与新的希望，聚集着坚毅与不屈的刚强，鼓动着胜利与新生的力量，而这也正是老舍对祖国的期冀和嘱托！

在《蜕》里，老舍刻画了三位性格迥异的流亡大学生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变化。金山自傲，平牧乾摩登，厉树人忧郁，但在亡国灭种的战争面前，他们开始认识到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的关系，开始重新寻找生活的目标和意义：金山“把爱国的情，代替了空洞的自负”；平牧乾“平日



她与国家毫无关系，照镜描眉是人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而如今在外敌入侵、生灵涂炭、自己四下流浪的残酷现实境况下，深知“国家与她有皮与肉那样的关系”，国难已“把最摩登的女郎变成最摩登的女战士”；潜心哲学思想、抑郁的厉树人也逐渐认识到，“国难当前，而缺乏在行动上的壮烈与弘毅，是莫大的耻辱。”正因如此，所以他们才有了当掉铺盖，换来香烟、水果，打着白旗去前线慰劳伤员的壮举；才有了将对阴城（济南）的恨恶转为恨不得跪在街心，去吻那肮脏的灰土的“圣地”的变化，虽然这里依然充斥着官场的卑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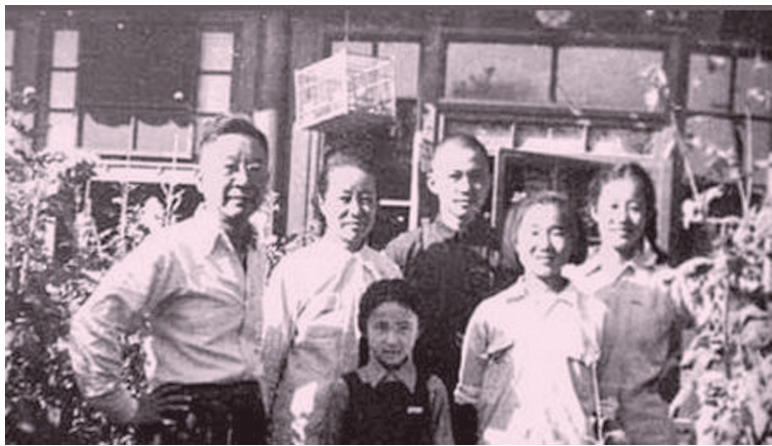
老舍虽是旗人出身，但自父亲死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舒家孤儿寡母沦落为城市的贫民，使他自小就熟悉下层百姓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因而在《蜕》之前的许多作品中，无论是《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还是《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他写他们的悲喜哀乐、陈规陋俗，也写他们身上的许多好品质。然而，“非知识分子的禀性以及老北京的生活哲学和氛围，终使老舍“厌恶暴力”，“生性平和”，也使他笔下的人物多了调侃、幽默而少了斗争与反抗。可这一切却在《蜕》中完全改变：北京西郊的骆驼祥子自发去拉伤兵，村中的老太太把家中最后一块饼子送给路过村庄赶赴前线的士兵吃，卖菜的年轻人捡起了伤兵的枪向敌人射出了复仇的子弹。下层民众的抗敌热情，已被那个时代所唤醒，所鼓荡，而作者也由此“认清了中国人——即使是大字不识——有一种伟大的哲学作他们举止行动的基础。不识字的只缺欠着些知识，而并非没有深厚的教化”。

喜欢平和的老舍向来是反对武力以及挑起武力争斗的武人的，因而“当兵的”在他以前的作品中是没有什么好形象的。但在《蜕》中，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河北河南的彪形大汉，湖南广西短小结实的战士，都是那么坚强，勇敢可爱，他们咬牙忍痛，挤在脏乱的临时救护所里，把哼哼一声都视为可耻，是因为“英雄的血肉要冲破阴沉的死寂，激荡起民族生存或灭亡的无声之潮”。他们“每个人身上的血痕像让他们感悟到都是黄帝的子孙”，“他们会预言的心眼儿中看到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

《蜕》中也不乏对官僚军阀腐朽黑暗统治的痛斥、批判，而且老舍直指阴城的警察局长、教育局长，军方的文司令等一千人，谴责他们不仅不动员民众、守土保乡，反而借机发国难财，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罪行，斥骂他们“还不如土匪硬抢那么敢做敢当”。

《抗到底》连载后，反响热烈，因老舍工作太忙，创作时断时续，致使到1939年3月《抗到底》停刊时，小说总计只刊了9万字，16章，并未完结，但故事的线索清楚，结构基本完整。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部小说中，老舍的创作风格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变：日本人的战火让他这个只埋头教书创作的知识分子变得开始关心国事，开始投身民族救亡的狂潮，并以振翅灭火的态度去为抗战尽力。他自己也说：“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不能不变动了。”这也正是《蜕》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最深厚的原因。



老舍全家福

在通俗文艺的创作中大显身手

抗战需要动员广大将士和下层群众。就艺术家而言，量身定制创作丰富的为一般兵士和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便是在为激励将士杀敌斗志，鼓舞群众支持抗战而做出的最大奉献。



“文协”提出的“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即基于此，老舍大量创作通俗文艺作品也是基于此。老舍是语言大师，长于用民间语言尤其是北京地区的方言俗语讲述故事。而在写作小说的同时，他也注意学习其他艺术形式。早在济南时，他就委托亲属搜集流传在北京的民间曲艺段子，并向民间艺人请教鼓书的作法。来到武汉后，他又结识了大鼓艺人富少舫（艺名山药蛋）和董莲芝，老舍一边向他们学习京韵大鼓和梨花大鼓的唱腔，一边为他们编写抗日题材的新词，写完之后即交他们到街头、到舞台翻唱，老舍的一部分鼓词就是这样相继问世的。

有一段时间，喜欢听河南坠子的冯玉祥将3位河南艺人邀请到福音堂来表演。同住于此的老舍因此有了学习河南坠子的机会，并尝试写了1篇长达3000多句的河南坠子，内容当然是抗日杀敌。老舍后来回忆说：“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版，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

台儿庄战役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后，冯玉祥约请画家赵望云等画了一系列大型抗战宣传画摆在六渡桥、江汉路等闹市区供市民观看，以生动直观的形象鼓舞民众，教育民众。赵望云画好后，冯玉祥又请老舍在画旁写了《二期抗战得胜图》《西洋景词画》等小曲和《女儿经》《忠孝全》等快板及诗配画《武汉小景》等。

老舍熟悉京剧、评剧等传统戏剧创作手法，以这些形式宣传抗战内容是老舍得心应手的活儿。在编写的京剧《新刺虎》中，他连剧中人物的称谓关系，如“员外”“夫人”“丫鬟”；人物的姓名，如“春香”“金郎”“玉娥”，甚至日本军官“花虎二郎”，以及人物上场、下场、过场的起唱、念诗、说白等都沿袭了传统程式，这就让观众看得清，看得懂，极大地拉近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而剧中借此宣传的抗日道理，也就极易为观众所接受了。

对这些传统文艺形式的作用，老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

手笔，只要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尝试。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

正是抱着这份炽热的爱国情感投身创作，老舍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有些概念化倾向，人物和情节较为粗糙，但主题上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却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而且他的作品数量也是同时代作家中罕有其匹的。据统计，在逗留武汉的八个月里，他共写出了10篇鼓词、6曲旧戏、1部长篇小说和几支小曲！他的高产量和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几乎是同等的。从小说家到“文协”总管，从普通国民到通俗文艺作家，他切切实实地尽到了“一个文艺界小卒”应尽的责任。



博爱和正义的使者

在近代武汉基督教的传教历史上，有一位极具影响的主教，几乎介入了武汉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1931年的汉口水灾、抗日战争等，他以基督教所宣扬的慈悲情怀、救世精神，帮助苦难深重的中国民众，并热心支持献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他就是基督教汉口美国圣公会主教吴德施。

参加反侵略活动，投入抗日救亡大潮

吴德施是一个中国名字，他的本名叫 Bishop Roots，美国人，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又到英国剑桥神学院深造，获神学博士学位，这使他成为一个兼具浪漫与谨严、感性与理性的神学学者。

1896年11月，吴德施受美国圣公会派遣来到中国，先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翰堂和汉口圣保罗堂担任教职。1904年任湘鄂皖赣教区主教。和当时大多数来华传教士一样，为尽可能地融入华人社会，方便布道传教，争取更多教民，他也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吴德施。“吴德施主教”也就由此传开。

吴德施主教多次对近代中国革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对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广大民众和进步团体给予了道义上的援助。1907年1月13日，武昌日知会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抄，革命党人刘静庵等九人先后遭捕，始称“丙午之狱”。事发后，吴德施主教以刘静庵系圣公会教徒的名义，出面与张之洞交涉，要求“释放教民刘静庵等人”。此事虽然最终未果，但张之洞也答应了免除刘静庵等人死刑的要求。辛亥革命爆发时，吴德施主教责成教会组建临时伤兵医院，救治起义军民，并设粥场救济战区难民。北伐军

攻占武昌后,为避免战后发生疫情,汉口中华圣公会在吴德施主教的倡导下,发动组织教徒开展城区卫生清扫工作,安抚避难灾民,为恢复城区秩序做了不少工作。

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作为在海内外有着社会影响的基督教传教人士,吴德施对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充满同情。1910年1月,他即在世界基督教总会主办的《教务》杂志上发表《为中国辩护》一文,指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赞扬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此后几十年,他的这一观点始终未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他既愤怒于日军的烧杀淫掠,更痛心于平民百姓所遭受的战火劫难,遂在动员教区教徒支持、参与抗日战争的同时,还利用基督教的国际性特点,向国际社会宣传日本侵略者的暴戾、中国人民的英勇,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

1938年2月,在当时佛教界领袖、全国佛教会会长、上海元明堂的圆瑛法师的倡议下,全国宗教界决议组织反侵略运动宣传周活动。2月6日,武汉基督教教徒在汉口圣保罗教堂(今鄱阳街32号)举行为国难牺牲者祈祷会,有3000多徒众参加了这场盛会。

吴德施以鄂湘教区主教的身份致辞,指出中华民族遭到了日本恶魔的肆意侵略,人类的慈爱和自由受到了法西斯的野蛮践踏,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鼓励信徒同中国人民一道与邪恶的法西斯势力展开殊死搏斗,走上前线与邪魔直接较量,或在后方救护伤员、维护秩序、安抚难民、组织生产,并表示愿与中华民族同受艰苦,愿与法西斯邪魔抗争到底。

吴德施代表全体外侨信徒为抗战死难军民做了祈祷。接着,中共党员钟向德牧师代表全体与会徒众宣读了致蒋介石及全世界基督徒的通电,呼吁全中国基督徒众为打倒邪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维护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号召全世界基督徒众一致高举基督精神,反对邪恶势力,尽力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会后,成立了全国基督徒救国联合会。

圣公会的祈祷活动和吴德施主教的致辞,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天《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基督阵线成立了,



在民族的统一阵线里，又加进了一个有力的因素。”文章强调指出：凡在华的宗教家，“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做抗日、保卫民族的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唤起和联合各国民众，一致起来扩大反侵略运动，同时通过各国教会以争取各种财力、物力的援助，而这一次基督教举行的为国难牺牲者祈祷会，正是这一行动的有力体现。”

委托长女将募捐所得送交八路军

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们或从道义上谴责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或从物资上直接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只是这些援华物资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政府。不仅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就连苏联也将其援助直接提供给了国民党政府。抗战初期仍住在延安的原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对此有过耐人寻味的回忆：“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的主要是少量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交游广泛且与国共双方都有着密切联系的吴德施对这些事实自然看得十分清楚，就其与国共双方要员接触的情况来看，国民党的腐败堕落与共产党的励精图治，他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从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他决定尽其所能从物质上帮助中国共产党人。

他利用自己在西方来汉人士中的威望和社会影响，号召他们积极捐助钱物，支援八路军，得到了西方来汉人士的广泛响应。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37 年底来到武汉后，住在吴德施的家里。她对吴德施的举动深表赞同，也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来征募资金、物资，支持吴德施主教。美国驻汉总领事戴维斯的女儿是斯特朗的同学，在斯特朗的感召下，她代表美国红十字会一次捐出 6000 元。1938 年 1 月 25 日，斯特朗应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向武汉人民做了题为“马德里是怎样保卫的”广播演说，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首都的精神，来激励中国军民坚持抗战。演说完后，

孔祥熙设便宴招待斯特朗，另一位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也陪同前往，她俩借机要孔祥熙捐献了一笔款子。

1938年1月底，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代表吴德施主教和其他在汉西方人士向他面交了募捐所得的捐款10300元，及吴德施写给八路军的一封信。吴德施在信中写道：“我是住在中国的一位外国老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写这封信向你们表示敬爱。”

2月下旬，经吴德施主教和史沫特莱倡议，由八位外国教授、医生、记者、传教士组成的国际代表慰问团，带着两卡车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及4万元捐款奔赴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慰问正在前线浴血抗日的八路军将士，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热烈欢迎，而这个慰问团带队的即是吴德施主教的长女弗朗西斯·鲁兹小姐。吴德施主教早已把他的博爱和正义传给了他的下一代。

面对纷纷来汉的西方人士，吴德施主教不仅为他们提供食宿方便，更为他们提供了与中国共产党人联系的场所。吴德施正直、和善、慈祥，兼之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使得他在中国各政治派别和西方来华人士中都有着极好的人缘关系，他的家也因此成为他人的“临时旅馆”和聚会场所。

那是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横平竖直，造型简洁，花岗石墙基，灰色墙砖，屋顶及楼层中间各砌着一道深红色的砖线，与白色的拱券大门共同构成这栋色调灰暗建筑的亮色。楼房底层为客厅、饭厅、书房和客房，二楼为吴德施全家的起居室和活动室。楼房的前面是大名鼎鼎的圣保罗教堂。它们坐落于当年的英租界，共同构成一个深幽雅致的花木扶疏的园区，难怪国内外许多重要人



吴德施及史沫特莱旧居



士常常把这里作为落脚的地方。前面介绍的斯特朗是如此，史沫特莱 1938 年 1 月从山西抗日前线来到武汉后，最初也是居住于此，而且这一住就是四个月之久。

在此期间，中共领导人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等先后在吴德施主教的住宅与斯特朗、史沫特莱会面，商议筹募物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史沫特莱还通过接受《新华日报》的采访，向中外记者和有关人士介绍、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事迹，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争取国内外的舆论支持，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发挥作用。1938 年 1 月 8 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率“加美援华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来中国。在离汉北上之前，他也在吴德施主教家里住了十天。其间，周恩来与之进行了密切接触，并在 2 月 22 日安排他北上延安工作。据此，有史书称，吴宅“常常高朋满座”。此话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中国共产党人借此联络了一批西方人士，并向西方人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战情况，却是事实。

周恩来题词设宴，为吴德施送行

1938 年 4 月，吴德施被批准退休回国。此时他已是 68 岁的老人，来到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也已 42 年了。得知这一消息，知礼重情的周恩来于 4 月 11 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屋顶花园为吴德施一家举行了欢送宴会。

宴会后，周恩来、秦邦宪还邀吴德施一家合影留念。周恩来并当场手书两幅题词，赠给吴德施：“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嚶嚶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吴主教存念。周恩来。1938 年 4 月 11 日”。

三天后，吴德施在住宅举办告别音乐会，以答谢武汉人民、社会各界名流，包括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以及周恩来的校友、汉口市长吴国桢等出席了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欢快的，因为弗朗西斯弹奏的钢琴是那样优美、舒缓，就像窗外海棠花下的月光，那么轻柔、静美，似乎捧一掬放在鼻前，就能闻出香味儿。这场音乐会也是感伤的，因为那潺潺的钢琴声略带着凄

婉和不舍，就像月儿不肯西移，虫儿不肯停唱一样，久久地，久久地在夜空中飘荡。

4月19日，吴德施告老回国的前夕，他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临别赠言——告中国友人书，肯定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已引起外国人士之钦佩，同时坦诚指出中国的弱点，在于国内“英贤不能和衷共济，反而互相攻击”，致令敌人利用以谋中国，强调“中国目前最大之问题，在巩固统一战线，中国之建国运动，不但中国人士应苦心奋斗以求其成功，世界各国人士亦无不乐观厥成，因中国之复兴亦为人类之幸福也”，表达了一个基督教徒对国共两党的共同祈愿。



地火喷发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军陆续退守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及江南幕阜山系，国民政府各级地方官员携眷属家财，望风而逃，各级政权随即崩溃。一些地主豪绅、地痞流氓、土匪头子和国民党军溃散军官趁机打出乡村自卫旗帜，收捡军队溃逃时遗弃的枪支，自立山头，拉起队伍。一时间，武汉外围各种旗号的游击队四处招摇，“司令”多如牛毛。这些打着“抗日”幌子的游杂武装到处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横行无忌，大部分待日军一到就摇身一变，卖身投靠敌人成为伪军，还有一些则被国民党军收编，委以番号。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以及分散在敌后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收集武器，组织起一支支抗日武装。早在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之际，中共湖北省委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派出了一批重要干部赴武汉周边，加强党对抗日力量的领导，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在中共各级组织、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领导下，武汉周边各抗日游击武装似地火喷发，汇聚起抗日救亡的巨大力量。

肖利三、肖文安父子毁家纾难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汉阳县七肖大湾的肖利三、肖毓福等，奉董必武的指示，建立起湖北省乡村工作促进委员会汉阳县分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7月，经天（门）汉（汉川、汉阳）中心县委批准，成立汉阳区委，属（汉）川汉（阳）县委领导，肖抱真任区委书记，肖毓福任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肖利三任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9月，肖文安、肖琳从中共湖北省委党员训练班学习归来，向肖毓福等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要立即着手建立抗日武装，便于在武汉沦陷之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区委研究认为七肖大湾可以作为立足点，因为这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土地革命时期又是发生秋收起义的地区之一，群众有相当的革命觉悟和政治基础。同时从地理位置来说，这里地处三湖（茶湖、许家赛、白湖）一河（长河）之滨，港汊纵横，芦苇丛生。向西北越过三汉港可进入汉川管辖的黄腊潭，有广阔的水上回旋空间；西南背靠乌梅山，可掌控当地制高点，居高临下。另外，七肖大湾是个大村，人口较多，居民基本上是肖氏一姓，虽然有少数外姓，也都是非亲即故，知根知底，方便保密，有利于掩护抗日活动。

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当地富商巨贾纷纷远走沙市、宜昌，或西上四川；中小商人和富裕市民则纷纷逃往附近农村避难。汉阳南乡人口骤增，鲜鱼、小菜、柴草、谷米及其他日用品价格猛涨，形势越来越紧张，各乡镇政府制发统一的“难民证”，通知外来避难人员“整装待命”。日军占领蔡甸、新沟、汉川、马口、城隍港等地后，局势进一步恶化，群情彷徨。此刻，中共汉阳区委及时亮剑，打出抗日游击队的旗帜，组建汉阳县民众抗日游击大队，坚持抗日。消息如一股春风，驱散人们心头上的阴霾，起到了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

11月，天汉工委在汉阳侏儒山战地文化服务站召开创建抗日武装专题会议。会后，张天晖、肖抱真、肖利三、肖毓福等组成筹军办事处，开始筹措经费，收集枪支和发展党员。老共产党员率先带头，有的动员亲戚带枪入伍，有的向富户募捐，有的下湖打捞枪支子弹。肖利三、肖文安父子决心抗日，一心跟党走，于是毁家纾难，决定把仅有的田产、地产卖掉，捐出银圆300余元，作为创建抗日武装的经费。在他们的带领下，仅1个月时间队伍就发展到150余人。

队伍组建后，人员要大多离开家乡活动，需要有专门的军饷保障。在供给即将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又是肖家出面，请关系甚笃的尹重臣出手援助。在尹的斡旋下，肖利三等与国民党汉阳县县长陈绳武商谈，答应将新



组建的队伍编为汉阳县自卫第五中队，由肖文安为第五中队中队长，发给军饷。汉阳县自卫第五中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统战关系以合法的形式存在，后发展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

梅店自卫队成为新四军

1938年7月，中共湖北省委派林翔到黄陂，指导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林翔到黄陂后，在刘家畈村的刘天明家召开中共黄陂特别支部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林翔、刘天明、祝季伟等。根据省委决定，中共黄陂特别支部由祝季伟任书记，何奇伟、刘天明、魏天一等为支部委员。

10月，林翔回鄂南，省委派任士舜回黄陂领导特别支部。回到家乡后，任士舜迅速联络梅店四里八乡的爱国青年，成立新梅店社，组织他们学习政治理论，分析时局，探讨救亡图存之道，会员很快就发展到40多人。任士舜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动他们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时还将积极分子分别派往各乡、村及各行业，宣传抗日救亡。每逢“热集”，任士舜就在集镇的河边广场上用简易的木板搭台演讲，宣传抗日救亡，讲解防空知识，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黄陂的抗日火种，就从梅店小镇迅速燃遍整个北乡。



任士舜

黄陂县城沦陷后，任士舜通过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黄陂县政府进行商谈，答应以合法身份收检和购买枪支弹药，组建黄陂抗日武装——梅店自卫队。在黄陂县政府和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转移到蔡店、梅店一带后，中共黄陂特支率梅店自卫队在听泉寺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学员有100余人，自卫队迅速扩大起来。

12月17日晚，伪军李汉鹏部袭击了驻梅店黄门冲的国民党黄陂县政府，县长潘正道被劫持，县政府随之瓦解。中共黄陂特支因事前

有提防，并及时将抗日青年训练班和梅店自卫队撤离驻地，没有受到损失。事件发生后，任士舜等当机立断，决定率梅店自卫队和抗日青年训练班的部分学员迅速转移。经过一夜长途跋涉，他们冲破敌人道道封锁，北上经扶（今河南新县）与罗厚福会合，所率队伍并入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成为坚持抗战的湖北早期抗日武装之一。

武昌响惊雷

1937年10月，隐蔽在武昌近郊活动的共产党员许保民，在汉口富源里与刚刚成立的中共湖北省工委取得联系，经省工委书记郭述申批准，成立中共武昌近郊区委，由许保民任书记，周竹轩负责组织工作，舒江皋负责民运工作。11月，省工委又派戴荣、潘斌到武昌保福祠，审查并恢复了涂文清、葛达等人的组织关系，建立保福祠党小组。随后，武昌豹子澥、青山、纸坊等地的党组织得到恢复，成立武昌县委，省工委派林翔任书记，许保民负责民运工作，王健民负责组织工作，党员有许大鹏、刘茂公等10余人。

1938年1月，董必武联络孔庚、黄松龄、马哲民等，在武汉成立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在湖北广大农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乡促会”的工作受到省委的指导，具体由省委（临）农委负责人何功伟领导。“乡促会”在武昌、崇阳、蒲圻等县最为活跃。

武昌县乡村工作促进会的主要负责人为许保民。在他领导下，武昌油坊岭、保福祠、五里山、十字岭、青山等地都成立了“乡促会”的支会。其中油坊岭支会影响很大，许保民亲任支会会长，工作非常出色，会员发展到400余人。“乡促会”的主要活动有：开办图书馆、阅览室，张贴抗日标语口号，组织街头演唱等。共产党员利用这个合法的群众组织，积极向农村各界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组织群众，动员爱国的青壮年起来抗日，支援前线。他们还向殷实的商户募捐，慰劳前方将士，同时在活动中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培养和发展党员。油坊岭、保福祠等支会还办有专门的抗日宣传站，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



国十大纲领》，揭露日军侵华暴行。武昌乡促会的工作似一声惊雷，唤起了武昌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

“梁湖大队”“樊湖大队”昙花一现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书记王健民在保福祠召开会议，号召加紧组织武装游击队，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会上，王健民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和武昌县的时局，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教育群众，迅速以各乡村工作促进会的可靠成员、积极分子为基础，组织成立游击武装，并尽可能地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进步人士和赞成抗日的国民党县、乡级负责人物。会议还决定将全县各乡武装集中到县南梁子湖畔的保福祠，统一整编，统一行动。

不久，武昌区委考虑到保福祠距敌人据点太近，队伍集中起来没有回旋余地，于是决定各抗日武装汇集鄂城涂家塆。王健民抵达涂家塆后，首先走访了白云寺住持，并结识了爱国青年鲁伯英和曾经当过红军连长的王儒林。王儒林见到王健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天，我重新入伍打日本鬼子的愿望要实现了。”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甦，意思是要在痛苦中“复甦”重生。通过王甦，又找到了当过红军的刘守信等，并说服当地最有威望的爱国开明士绅鲁斗南（鲁伯英的父亲），支持和资助组建抗



任士舜（后左）1938年初在武汉待命时与顾明（后右）、任启琇（前右）、任士祥（前左）的合影

日武装。随后，王健民、潘斌、况公仆等把收藏的50多条枪都集中到白云寺。

11月中旬，武昌区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武装的名称、建制、负责人、兵源、军饷等问题，在征得群众代表和爱国士绅同意后，在白云寺举行

大会，宣布梁湖抗日游击大队成立，王水任大队长，王甦任第一副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潘斌任第二副队长兼第二中队中队长，况公仆任第三副队长兼第三中队中队长，鲁斗南任军需参议，共近 200 人，步枪 150 余支，机枪 4 挺。1939 年 5 月，部队受编为湖北省第一区保安司令部直属国民自卫队第一大队，仍称“梁湖大队”。

7 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军第一九七师和第九战区湘鄂赣游击总指挥部第二纵队方步舟部包围了梁湖大队。为保存力量，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指示中共武昌县委，将第一、第二中队枪支埋藏，人员分散，只留况公仆的第三中队在白云寺周围活动。8 月初，第三中队被方步舟部廖义华支队打散，梁湖大队的大队长被逮捕，梁湖大队遂不复存在。

1938 年 10 月，共产党员许大鹏、舒江皋在武昌县油坊岭一带组建抗日队伍，11 月就组建了一支 200 余人的游击大队，许大鹏任大队长。与此同时，黄人杰也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乡促会”的名义，广泛收集散兵游勇和枪支，并开条子到各村收“救国捐”，拉起了三四百人的队伍。

1939 年春节刚过，许大鹏与黄人杰两支队伍合并，共组鄂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黄人杰任总队长，许大鹏任第一中队中队长。不久受编为湖北省第一区保安司令部直辖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将番号改为鄂南抗日游击樊湖大队，简称“樊湖大队”。5 月下旬，樊湖大队在覃公庙遭国民党军第一九七师丁炳权部袭击，损失 3 个中队。后又在流芳岭、五里界、豹子澥一带遭日伪军“清剿”，元气大伤，难以立足。黄人杰找到伪“中国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采取“借庙躲雨”的策略，将部队编为伪“中国人民自卫军鄂南独立旅”，后编为汪步青伪八十二师第一六二旅。“梁湖大队”“樊湖大队”终是昙花一现。



孤军南下，深入敌后

鄂豫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战略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外围点燃抗日烽火，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艰苦创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它一直在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等直属领导和指导下，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高潮，积极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在新四军7个师中发展人枪最多、开辟根据地面积最大的骄人业绩，创造了鄂豫边区经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鄂豫边区所开创的抗战伟业，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路线指导的结果，作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李先念高擎抗战的旗帜，大胆深入敌后，在日伪军精心密织的蛛网中纵横驰骋、拼搏奋战，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统一领导，集中创建党领导的主力部队，奠定了中原抗战的大局。

做活武汉这盘棋

鄂豫边区广大人民的抗日要求，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和关怀。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军委在统筹抗战全局的同时，对武汉外围的抗战部署极为重视。8月22日召开的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对长江流域党的工作进行布置。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二者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武汉外围地区共产党的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了恢复与重建。1937年10月，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12月，在省工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成立了临时省委，不久在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正式成立湖北省委。省委决定成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鄂北中心县委，每一地区都加派干部，推动党的工作进一步向农村发展。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鄂豫边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使这一地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随着鄂豫边区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以及抗日活动的开展，中共中央对于武汉外围地区极为关注，开始着手进行建立战略区的准备。1938年2、3月间，日军由河北、山西南下，攻占风陵渡，威胁潼关，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陷。西北形势堪忧，中原岌岌可危。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应该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3月6日，他复电彭雪枫：“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徐州失守后，鄂豫皖地区成为日军进攻的直接目标，中共中央书记处于5月22日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提出：“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口）信（阳）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将现在湖北省委的主要干部大部派去，加强省委与各主要地区的工作。该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立即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



李先念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边、豫皖边、豫西（鄂豫边）等区“中心任务是组织武装民众，建立抗日游击队，准备发动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游区”，湖北省委进行了积极布置，在鸡公山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在湖北应城由陶铸亲自负责创办了“汤池训练班”，在鄂东七里坪由郑位三、方毅举办了“青年训练班”和“干部训练班”，并把汤池、七里坪建设成为发动鄂豫边区抗战的战略支点，广泛培训抗日骨干，为湖北地区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作了干部准备。

武汉会战时期，为阻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继续北上、南下、西征和打破日本“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图谋，争夺华中、中原敌后，周恩来等于1938年8月1日在武汉致电毛泽东，提出：“九江、太湖失陷，战局日紧，各方向我们要求军事干部纷沓而至。豫皖鄂游击运动有发展为我们领导下之大规模游击战争之前途，但至今没有一个军事干部派来，坐失时机，令人焦急。请无论如何抽调二百军事干部即来。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发展将远过山东……在创造过程，必须有干部。”这一建议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毛泽东积极物色合适的派到武汉外围的干部的合适人选，李先念就是其中之一。

“这太不公平”

1937年5月1日，经历西路军浴血奋战、突围幸存的李先念，见到了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先念等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边休整边学习至12月中旬，后奉党中央的指示离开新疆奔赴延安。12月26日，李先念在周小舟等陪同下，乘汽车离开兰州，经西安到达延安，住中央军委招待所休息待命。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从新疆回来的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同志。

这天下午5时左右，李先念等在来人的引导下，从军委招待所步行到凤凰山毛泽东的住处——一所院子里的窑洞门前。毛泽东穿着朴素洁净的灰布军装，面带微笑，站在那里迎接他们，边同他们一一握手边亲切地说：

“你们辛苦了！”随后，便请大家共进晚餐。

晚饭后，毛泽东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他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其他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的谈话，给李先念他们以有力的鼓舞，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上。当时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已告一段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一致表示要坚决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完成新任务而奋斗。毛泽东关于“西路军”的谈话，其实就是给他们减压松绑。

接着，毛泽东还了解了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并单独会见了李先念，向他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李先念说：“第一，关于撤出鄂豫皖的问题。我回延安后，就听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当时在红十一师当政治委员，也算是个高级干部，多多少少是了解些情况的。依我看不撤出也不行，是被敌人逼着撤出的。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央分局的同志集体决定的。鄂豫皖离蒋介石的大本营南京那么近，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坐镇，调集重兵，专门对付鄂豫皖。我们打了几仗，顶不住，在根据地里转了一大圈，最后地盘大部分丧失，没有周转余地。而且，那时政策也有问题，不讲休养生息，把男女老少都动员去参军支前，田地没有人种，地里的树都长得有指头般粗，想找个南瓜吃都很困难。所以非退出不可，不退出部队没法生存。原本还想打回去，可敌人重兵追堵，只好往西走，走一步，看一步，才到了川北。

“第二，张国焘闹分裂的问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同志和我们都强调团结，维护中央。但张国焘有野心，有领袖欲，想依靠人多势众，对抗中央，夺权当头。跟着他跑的，只是极少数人。另一方面，凯丰等同志在刚会合后，就批评红四方面军军阀主义、政治落后等，的确也引起许



多同志的不满。有人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党的决定，上级的决定，没有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就是这个观念。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说我们反中央，大家想不通。”

在李先念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静静地听，有时插话、询问、讨论，有时点头微笑。这次谈话，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李先念，知道他不仅是员能征善战的虎将，而且是个有独立见解、敢讲真话的同志，具有工农干部的鲜明阶级本色，这也正是毛泽东最欣赏的。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学习，培养深造。入学不到2个月，抗大第3期结业，李先念主动要求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李先念在马列学院，得益最大的就是聆听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关于抗战形势和哲学、党的建设的讲演、报告，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1938年5月，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约请毛泽东来学院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毛泽东讲道：“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由于中日双方在这场决死的战争中各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又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还将这场持久战分为“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

战略退却”三个阶段。他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兵民是胜利之本”。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是李先念第



1939年1月，李先念（左一）率领新四军独立大队南下，挺进至武汉外围

一次聆听毛泽东的系统演讲，他由衷敬佩毛泽东的伟大战略眼光和精辟见解。通过反复学习研讨，李先念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全局、进程和前途有了飞跃性的认识，更加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重申了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议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

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从军政治委员降到营长，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此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李先念说是的。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接着又问：“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毛泽东说：“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毛泽东又说：“不过，听说高敬亭这个人爱杀人，难共事，你怕不怕？”李先念回答说：“不怕。在鄂豫皖苏区时期，我跟他在柴山堡一起打游击，后来他担任苏区苏维埃主席，我担任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工作中有许多接触，无话不说，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这样，就决定了李先念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新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把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等将去中原敌后的干部召集起来讲了一次话。他强调指出：你们到了敌后，第一是要大力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抓武装，第二也是要抓武装，第三还是要抓武装。在这过程中，可以用八路军的旗帜，可以用新四军的旗帜，也可以用别的什么名义，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用国民党军队的旗帜。但有一条要记住，那就是保持党的领导权，领导权是寸步不让的。

在毛泽东亲自安排下，李先念就这样离开了马列学院，踏上了奔赴武



汉外围抗日前线的征途。

我来了，李先念

1938年11月23日，东方微露晨曦，披着朝霞的宝塔山映照在延水河中，给古城延安增添了几分绚丽的光彩。李先念、朱理治、郭述申、谭希林和几十名身着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灰色军服的红军干部战士，在刘少奇的带领下分乘4辆卡车，告别延安，迎着塞外的寒风在黄土高原上奔驰，向西安前进。

经过一天的驱驰，黄昏前，刘少奇、李先念一行顺利抵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住了几天之后，兵分两路进发。刘少奇与秘书栗在山、副官李拓带电台机要人员由西安转至渑池八路军兵站，向豫西特委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另一路则由朱理治、李先念等带领，直奔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

12月26日，朱理治、李先念抵达竹沟，受到了早就在镇外等候的陈少敏、王国华等人的热烈欢迎。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朱理治着手筹备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研究撤销中共河南省委、组建中共豫鄂边区事宜。通过一路上与李先念的相处和了解，朱理治认为他明达机敏、顾全大局、智勇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决定将李先念留在豫鄂边，并立即报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在得到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后，李先念就留在了豫鄂边区党委工作，任军事部长。

1939年1月14日，李先念在竹沟北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边区各地的军事负责同志。会上，李先念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分析豫鄂边区对敌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发展敌后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工作总方针。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豫鄂边区下一步军事工作分三步走：一是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全面领导豫鄂边区的武装斗争；二是号召豫鄂边区各抗日武装迅速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扩大抗日力量，积极创建根据地，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三是立即组建新四

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仍称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率领向武汉外围挺进。

1月17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集合整装待发，许多同志和老乡不约而同地聚拢过来，和指战员们握手话别。李先念率部离开竹沟，顶着凛冽的寒风，大踏步地向武汉外围挺进。这支队伍共160余人，仅有1挺重机枪、90多支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为有利于做统战工作，部队番号对外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化名李威，对外联络以少将或上校的身份出现。

1月20日，李先念率领独立游击大队到达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受到了豫南特委和信阳挺进队负责同志危拱之、刘子厚、王海山、朱大鹏等的热烈欢迎。朱大鹏后来回忆说：“一月中旬，我们接到一封令人兴奋的电报，称‘李先念不日将来四望山’。24日，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先念给我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报告的精神，使我们认清了形势，知道了抗战将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也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意义。”

2月初，日军发起襄东战役。为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2月7日，中原局作出决定，派李先念迅速南下应山、安陆以至应城附近去开展游击战争。2月18日是农历除夕，呼啸的北风裹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寒气袭人。李先念一行直奔应山浆溪店，傍晚到达了净明铺小镇，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四处可闻。随行人员征得李先念的同意，决定就在此镇宿营。有人提议到老乡家里去住，李先念摇摇头说：“我们不要去打扰老乡啦，自日寇入侵以来，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政府搜刮民脂民膏，土匪也趁火打劫，他们已经够苦的了，难得过一个安定的团圆年，我们就到那个破庙去宿营吧。”于是，大家来到破庙，生起了火，围坐火旁吃干粮，李先念给大家深情讲述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同志们听得十分专注，渐渐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夜。

到达浆溪店后，李先念命令周志坚率部去联络应山地方党和抗日游击队，并进行统战和筹款工作。2月27日，日军百余人及伪军数十人从应山



城出发，经龙泉镇分路“扫荡”来到余家店。驻在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军一个营及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不战而逃。周志坚率部赶到余家店南面的罗家庙观察敌情，只见日伪军正向西“扫荡”，遂果断命令部队迅速展开，奋力抗击。日伪军遭新四军突然打击，忙窜进余家店镇内顽抗。新四军在余家店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迫撤出镇外，在死伤20余人之后，趁暮色仓皇逃窜。余家店战斗是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入侵日军的首次进攻作战，战果虽小，影响却大。新四军指战员以英勇果敢的实际行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赢得了人民的信赖。

2月底，李先念离开四望山，率部东进，向信（阳）罗（山）边进发。3月，在九里关与贺建华、罗厚福、熊作芳率领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会合。随后，李先念在灵山寺主持军事会议，向到会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有关指示。会后，李先念率部出发南下，挺进鄂中，先是到大悟蒋家楼子做国民党鄂东第十九纵队司令蒋少璠的统战工作，继而到刘家河小悟山庄去做国民党第十九游击纵队第四挺进支队刘梅溪的统战工作。见到刘梅溪后，李先念晓以大义，劝说其以国家、民族为重，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刘梅溪阳奉阴违，心怀叵测地说：“李司令忧国忧民，刘某深表敬佩，我军就是遵循总裁的训谕，在此防御日寇进犯。李司令日后有用得着刘某处，自当尽力配合。对于部下，我一定严加管束，做到秋毫无犯，如有违反军纪，祸害百姓的，我定当重处。”说到这里，刘梅溪突然把话锋一转，说：“不过，此地倒真有一支祸国殃民的部队哩！”李先念心头一震，问道：“你说的是哪支部队？”刘梅溪回答说：“中和南乡新街的许金彪部。此人绰号‘许大人’，听说还是个红军伤员。他拉人搞枪，胡作非为，专打国军，四面为敌，贵军如能为民除此一害，我刘某定助一臂之力！”李先念一听是“红军伤员”，就觉得不对劲。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刘梅溪这个反共顽固分子，为什么如此热心要消灭这支队伍呢？其中必有蹊跷。

从刘梅溪处离开，李先念就命令部队向这支队伍靠拢，弄个究竟。这时，许金彪也正在派人联络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许金彪的联络员先找到了李

先念，李先念在不清楚“许大人”的情况下，找出一张纸条，在纸条上写下“我来了，李先念”六个字，交给来人带回去。大约3个小时后，李先念的驻地外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响，李先念、周志坚走出门外，只见一个便装青年翻身下马——来人正是许金彪。

许金彪，原名许世猛，曾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干部，与周志坚在长征时就熟识。许金彪久闻李先念的大名，今日得见，激动不已。他握着李先念的双手说：“首长，这里是反共老手刘梅溪、刘亚卿和伪军李汉鹏、杨希超的活动区，不可久停，快到我们的根据地去。”“你们有根据地？”李先念惊异地问。许说：“有，就在紧靠铁路的孝感中和乡。”部队在许金彪的带领下连夜出发，于次日晨到达中和乡南新街。吃过早饭后，许金彪双手捧着他珍藏的党证，郑重地交给李先念，激动地说：“政委，我离开党一年多了，今天才找到了你们。现在我把这支武装和这块根据地交给党，请党严格地全面审查我的工作。”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淌。接着，许金彪向李先念详细汇报了他率领的湖北抗日游击大队这支武装的诞生和成长过程。李先念听完汇报，非常高兴，他站起身来，紧紧握住许金彪的手说：“好！你干得好！你是一个好同志！”许金彪这位刚强的汉子听到李先念肯定的话语，像一个流浪在外多时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再次流下了眼泪。

下午，许金彪召集湖北抗日游击大队干部开会，李先念向他们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了发展路西根据地和整编部队的任务。李先念讲话后，许金彪代表湖北抗日游击大队的全体同志发言。此后，这支英雄的抗日武装在豫鄂边党委和李先念的领导下进行顽强抗战，为新四军在整个安（陆）应（山）孝（感）边站稳脚跟，挺进武汉外围铺下了基石。



打得熊光“神兵”作鸟兽散

1939年9月，由汉川县自卫第三中队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三团队第二大队合编组成的第四团队跨过襄河，在汉阳县蔡甸附近击败熊光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第九十二师，不仅打出新四军的声威，震慑武汉三镇的日军，还为开辟天（门）汉（汉川、汉阳）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坚实基础。

接受任务 进军蔡甸

1939年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将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7月，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筹备组建第四团队，李先念、陈少敏把刚从延安来到应城不久的李人林找来。

李先念开门见山：“组织上决定组建第四团队，任命你为团长，你有什么意见？”“服从组织决定！”李人林回答干脆。李先念接着说：“政委由天汉特委书记雍文涛兼任。你们的任务是开辟天汉湖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敌后根据地。”李先念还强调了开辟天汉湖区的重要意义，他说：“天汉湖区北靠襄河（汉水）、南临长江、东接武汉，境内湖泊星罗棋布，河渠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理想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了天汉湖区，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对敌斗争将更加主动。同时，还能与襄西、鄂南相策应，从西南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另外，也可以为解决部队给养找到重要的物资供应来源。”

为进一步鼓舞士气，鄂中区党委书记兼支队政委陈少敏对李人林说：“现在第四团队只有三个中队，也就是300多人，要开展游击战争，困难

很多，但也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天汉湖区是大革命时期贺龙同志领导的洪湖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各地都已建立了党的组织，有的还建立了抗日武装。你们到了那里，内有湖区党组织的配合，外有襄南等地党组织的支持，再加上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湖区港汊如网，芦苇丛生，地形复杂，日军大型舰艇进不去，小型舰艇又不敢进，你们可以来去自由。第三，汉阳县党领导的第五中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党的武装，他们将配合你们行动，还有蔡松荣的第三团队和‘应抗’部队作为后盾。你们在那里将是大有作为的。”

说到这里，李先念补充道：“大革命时期，贺龙同志带领你们在江汉闹过革命，你对这里环境比较熟悉，这也是有利的条件嘛！”李人林听后，向李先念、陈少敏表明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即奔赴京山八字门组建第四团队。



陈少敏（中）

8月，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团队300余人从八字门出发，向襄南挺进。部队经过应城时，接到了天汉特委发来的一封急函。信中说，日军已从武汉调一个师的伪军进驻蔡甸，约2000人，伪师长熊光所部在汉阳蔡甸等地奸掳烧杀，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严重威胁着（汉）川汉（阳）沔（阳）一带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委要求第四团队速过襄河，歼灭这股伪军。李人林、雍文涛当即率部自应城南下，搭乘木船，驶进沔汉湖。

沔汉湖在大革命时期是红色根据地，是李人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曾在横堤红军医院养过伤。此时重返故地，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当年



打土豪、分田地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仿佛就在眼前。看着陷入沉思的团长，政委雍文涛推了他一下，问道：“想什么呢？”李人林答道：“当年的战友仿佛就在眼前，我想告诉老百姓，红军回来了，烈士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不甘受辱、贫穷的人民，是绝对不可征服的。”雍文涛深表赞同地说：“是的，深重的灾难只会使人民群众反抗的意志更加坚定。我相信有这里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我们一定能很快打开抗战新局面。”

部队来到沔汉湖南岸，当地党组织已在大沙咀备好船只，趁着夜色，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团队渡过了襄河，宿营于蔡甸以西5公里处的七肖大湾。为了让第四团队指战员能够迅速安营扎寨，汉阳县第五中队前来配合担任警戒，监视着蔡甸方向的敌情。

“团长，这些官太太怎么处理？”

熊光的指挥部设在蔡甸西面的泰山寺。他自恃人多枪多，又有日军撑腰，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踏平（汉）川汉（阳），使蔡甸、马口连成一片。他还放出话来：“五中队那百把条枪，不捆着送来，还要老子去拿了。”

第四团队进驻七肖大湾的第二天，李人林、雍文涛便找来彭怀堂、萧毓福等当地负责人一起商议，分析敌情，研究攻打熊光的作战部署。会上有人说：“敌我力量确实悬殊，打好这一仗的把握不是很大。”雍文涛听完汉阳工委的情报分析，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这一仗是有把握打好的。别看伪军人数多，武器好，背后还有蔡甸的鬼子支持，但熊光部毕竟是乌合之众，人再多、武器再好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李人林操着本地土话说：“政委说的是实话，敌人刚到，工事未修，消息封锁，情况不明，只要我们敢打，集中兵力，利用黑夜，出其不意，突袭其师指挥部，一定可以成功。”

夜袭熊光伪军指挥部的方案制定后，彭怀堂、萧毓福便分头去发动群众，做战斗后援准备。李人林、雍文涛主持召开第四团队中队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具体作战部署。汉阳县五中队的中队长肖文安也参加了会议。

行动当天晚上，天空繁星密布，原野一片寂静。第四团队和汉阳县五中队共500余人悄然从七肖大湾出动，向泰山寺的伪军指挥部进发。第一

中队配合第五中队从左翼迂回，李人林和教导员杨子仿带2个中队正面突击，凭借着路熟，竟一枪未响就摸到了泰山寺伪军司令部跟前。待指挥部门口的伪军哨兵发现情况，李人林已率1个中队打进司令部，伪军官兵方从睡梦中惊醒，还没弄清状况就成了俘虏。熊光当天刚好在司令部，从屋里逃出来时挨了一枪，被卫士拖着侥幸逃走了。

战斗结束后，新四军指战员像围鸭子似的抓了一大群俘虏，泰山寺外的稻场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俘虏中，除了熊光伪师部秘书长王毓华以下200余名官兵外，还有70多位军官太太，哭哭嚷嚷的。不一会儿，一中队奉命将男俘虏全带走了，中队长跑到李人林跟前报告：“团长，这些官太太怎么处理？”李人林略加思考，说：“集合，讲话。”顿时，稻场上鸦雀无声。李人林首先讲了一段抗日救国的道理，随后交代了共产党、新四军对待俘虏的政策，要她们回去后劝说自己的丈夫弃暗投明，莫当汉奸。最后，李人林宣布将这些官太太全部释放。

新四军攻打熊光伪军师部的消息，迅速传遍汉阳、汉川、天门、沔阳一带，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激发了第四团队战士们的士气和斗志，国民党汉阳县县长陈绳武、汉川县长向岩也派人前来慰问新四军。《沙市日报》载文：“我敌后游击队，消灭熊光千余人。”

痛打熊光“神兵”

捡了一条命的熊光躲进了蔡甸据点，好久不敢出来，逃命出去的散兵近百人也陆陆续续回到泰山寺，每天提心吊胆，特别到了夜里就乱放枪壮胆，使日军坐卧不宁，大骂熊光“大大的混蛋”。

当汉奸的熊光日子也不好过，一边怕日本人，一边怕新四军，哪一边逮着都是要杀头的。没办法，他竟想出了一个新主意，派人去刘家隔向反动会道门头子丁文斗求救，搬来800多所谓“刀枪不入”的“神兵”，让他们住在司令部附近助威。这些“神兵”倒真壮了熊光的胆，让他又飘了起来。

费了好一阵子功夫，熊光的探子终于打听到新四军的住处。一天凌晨，



他带着大队人马杀气腾腾窜到七肖大湾，企图偷袭第四团队和汉阳县五中队，结果李人林率部迅速转移了，扑了个空。最后他竟丧心病狂下令把七肖大湾抢个精光，把房子也烧毁。老百姓对熊光伪军的暴行愤恨不已。一位老婆婆领着5岁左右的孙子对李人林哭诉：“同志们啦，不消灭熊光，老百姓活不成啊。这个孩子的爹妈被熊光杀了，现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重返七肖大湾的新四军指战员看到这令人伤心的景象，再也忍不住了，纷纷请战，要为人民报仇，决心赴汤蹈火，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又是一个晴朗的夜晚，第四团队与汉阳第一中队、第五中队兵分三路，直指泰山寺，向熊光部发起第二次进攻。泰山寺内火光通红，喊声震天，一窝蜂似的冲出几百人来，个个光着胳膊，高举火把，手舞大刀长矛，走不像走，跑不像跑，乱蹦乱跳地向前拥，涂抹成红一块黑一块的大花脸，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口里不停地喊着：“打不进，杀不进，观音老母保护我神兵。”

初见这鬼怪样子，战士们不免愣了一下。为了避免大量杀伤这伙多数是受骗而来的“神兵”，李人林命令战士对空射击，想吓退他们。谁知这

些家伙反误以为他们果真是“刀枪不入”，更加气势汹汹地向第四团队阵地冲来，前面几个直接冲入了阵地。第四团队指导员钱日新当即带领战士反击，把“神兵”赶出了阵地。

就在这时，从大队“神兵”的后面突然射出一排子弹，钱日新中弹牺牲。这是熊光使用的诡计，他利用“神兵”打头阵，将伪军躲在后面，用火力的掩护“神兵”冲锋。李人林见钱日新倒下了，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怒火，他拔出手枪，大声怒吼：“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打！”顷刻间，子弹雨点



李人林

般射向敌群，手榴弹也一束一束爆炸。跑在前面的“神兵”倒下一排，后面的纷纷四散逃命。“神兵”一散，躲在后面的伪军就完全暴露在新四军的火力之下，短短几十分钟，就把熊光看家的老本打光了，他无奈之下只得星夜逃回汉阳城。

新四军李先念部在武汉近郊消灭伪军一师部，武汉三镇为之震动，特别是在敌占区的群众中传得更加神奇。有的说新四军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一晚能从孝感跑到汉阳；有的说新四军千军万马，走时无影无踪，打仗势不可当，刚到汉阳就打垮熊光一个师，还破了 800 “神兵”，活捉了 200 多人。

第四团队进军襄南，一举歼灭熊光的伪九十二师，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大长了人民的抗日志气，扩大了共产党坚持抗日的政治影响，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开了天汉地区的抗战局面，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中的美女记者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进步女作家、著名记者，1890年出生，早年当过工人，1919年起侨居柏林。1928年12月，她来到中国，在随后的12年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结识了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更是一位坚毅刚强的女战士，曾冒枪林弹雨采访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写下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全世界介绍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中华民族抗战的烽火岁月，她与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汉口为新四军募捐药品

1938年1月，史沫特莱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身份从抗日前线来到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世界反法西斯



青年时期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的中心，备受瞩目。到达汉口不久，史沫特莱就接受了《新华日报》的采访，讲述了在山西风陵渡的见闻。她说在风陵渡等待渡河时遇到了一队穿着单薄的伤兵，由于保暖物品缺乏、药品匮乏，这些受伤的士兵只能在寒冬里忍受着伤病带来的痛苦。她曾把自己的铺盖和大衣赠送给伤兵，可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自那时起她就想，一定要发动更多有爱心的人来帮助这些为国家而战斗的士兵。

1月23日，受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邀请，史沫特莱在汉口发表演讲，宣称“军队是鱼，民众是水，得民众者即如鱼得水矣”，以真实的前线见闻、切身的体会断言日军必定失败，因为其“无民众基础”，发动的是反人类的战争。演讲最后，史沫特莱真诚希望大家捐助，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并自愿介绍自己募捐的情况，激发大家为前方将士捐款捐物。28日，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在汉口金城银行举办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茶会，史沫特莱应邀参加并致辞，发言的主题依然是抗战募捐。会后，史沫特莱暂时停止新闻写作，全身心地投入宣传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以及整个中国抗日军队所处的困境，力所能及地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工作奔走呼号，期待着更多热爱民主与正义的人们关注。

在汉口，史沫特莱居住在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横平竖直的长方结构，大坡状瓦顶，方石墙基，深灰色清水砖外墙，正立面连续的拱券门窗，造型优美。教堂的主教为史沫特莱准备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在这里，史沫特莱通过旅华的南斯拉夫健康专家鲍谦熙博士结识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救助队的创始人林可胜医生，并加入中国红十字总会医疗队做义工。

为扩大红十字会医疗队，她四处活动、呼吁，争取捐助，建立了17个医疗小分队，分别派往在武汉外围前线的野战医院。不久，战事日紧，医疗器械和药品短缺严重，史沫特莱想办法弄来了1辆大卡车，逐一到汉口各教会医院征募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还向海外的好友去信，募集了大批款物，通过国际联络网，突破日军封锁，把医药物资源源不断运送到汉口，运送到各医疗队。在史沫特莱和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共同努力下，武汉战地救护工作得到改善，到武汉会战开始时，已有58个红十字会医疗小分队活跃在武汉周边各个抗日战场。

在汉口的一次聚会上，史沫特莱遇到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外国人的身份提起中国士兵急需医疗救助的客观事实。史沫特莱说，士兵微薄的医疗费经常被官员层层剥削，等医疗费送到前线后往往所剩无几，无法购买药品。而红十字会的捐助必须遵循捐助者的意愿，只提供给难民，无法帮助前线士兵。那次，宋子文也不得不捐出1万法币用作前线的医疗



费。还有一次，史沫特莱的好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请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吃饭，史沫特莱同受邀请。席间，史沫特莱不停向孔祥熙游说，三句不离募捐。在得知孔祥熙不愿给八路军资助时，史沫特莱既不争辩，也只字不提，而是巧妙地把为八路军募捐说成是为在山西游击的民兵募捐。最后，孔祥熙还是给了史沫特莱“美国人”的面子，开出一张用来购买药品的支票。

在汉口，史沫特莱还用了大量时间向美国、加拿大、英国各界发函，谋求得到这些国家的财政、人力支持和物资援助，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



1940年，史沫特莱拍摄的鄂豫边区妇女救国会部分成员合影

抗战争取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并取得显著成效。如白求恩大夫受美国、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到中国，柯棣华等人组成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支援抗战，都凝聚了史沫特莱的心血。

史沫特莱作为《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在武汉会战前每周给该报发2篇航空稿，内容大多为报道中国伤兵的悲惨命运。此外，史沫特莱以记者的身份参加集会、发表演说、写文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为正义而战。周恩来称赞史沫特莱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1938年10月，日军的铁蹄已经践踏武汉近郊，史沫特莱和她的中国秘书驾驶着一辆救护车，冒着敌机轰炸突破封锁，深入敌后去寻找新四军。至此，史沫特莱在汉口居住了将近1年的时间，这是她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她后来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有点迷恋汉口的魅力。在我这10年生涯中，它是美好的地方。”

“真正民主的政权”

1940年1月9日，史沫特莱从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那里得到了前往新四军驻地的通行证。史沫特莱与田汉夫人安娥跟随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小分队在山里整整兜转了3天，经过了好几个哨卡，于夜间终于抵达京山八字门——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的首脑机关驻地。在这里，史沫特莱受到了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陶铸等边区领导和军民的热烈欢迎。边区党政军领导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朱理治在会上致欢迎词，热情称赞史沫特莱为中国人民抗战所作出的贡献。史沫特莱激动地说：“不！不！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我只是忠实地报道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侵略战争。”她为自己再次和游击队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称：“好得很，我很快发现我又一次和一群把枪杆子和知识视为同等重要的人们在一起了。”

欢迎大会过后，陈少敏、杨学诚、夏忠武等同史沫特莱进行了座谈。陈少敏代表边区党委介绍了边区的抗战、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等情况。史沫特莱则介绍了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呼吁争民主、争自由，反对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史沫特莱和安娥还参加了边区妇女服务队和《七七报》报社等为她们召开的座谈会，她们在会上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国统区的情况。

史沫特莱在陶铸的陪同下，参观了设在八字门附近村子里的纵队医院。这个医院只有1名医生和12名护士，房舍简陋、整洁、安静，史沫特莱在医院里细心察看诊断室、手术室和病房，以及用门板搭的病床、用竹蒸笼代替的高压消毒锅和自采的草药，自制的脱脂棉、绷带等。她看到了医务人员兢兢业业的服务态度，工作人员和休养人员之间的深厚感情。她还了解到，医务人员在极端缺药缺器械的恶劣条件下，想尽各种土法治疗伤员，使他们一批又一批重返前线。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令史沫特莱格外敬佩。她说：“想不到在这个山沟里还有这样一座医院。你们的条件困难，设备简单，但是精神振奋，工作先进，中国人民了不起！”

在医院里，史沫特莱俯身察看每个伤员的伤势。这些伤员是在新街



战斗、马家冲战斗、天王寺战斗与日军作战中负伤的，其中有一个战士腿部受伤严重，因无医疗器械，医生用木工锯子为他做了截肢手术。史沫特莱问他：“伤得这样严重，你能忍受得了吗？”这名战士坚毅地回答她：“只要不当亡国奴，负伤、流血算什么？”史沫特莱特地为这名战士和战友摄影留念，连声称赞道：“英雄！英雄！”她还亲自喂东西给伤员吃，帮伤员擦洗伤口。她真诚的关怀，使医务人员和战士们很受感动。

史沫特莱在京山八字门边区首脑机关采访了将近一个月，同边区领导和军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在《解放区见闻》中写道：“这里到处洋溢着爱国歌声，迎接我们的是一张张快乐的笑脸，啊！我又生活在这人群中了。这是一群多么勇敢的人啊！在他们看来，祖国比生命更宝贵。我将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名普通战士，在他们战斗行列里向前挺进！”

2月中旬，史沫特莱应天汉地委、纵队第四团队、天汉抗日十人团总团和汉川县长向岩的邀请，与安娥一起离开八字门赴天汉湖区访问。在天汉湖区，她访问了天汉地委领导和机关人员，参加天汉抗日十人团总团召开的代表会，并作长篇讲话，受到与会领导和代表的热烈欢迎。她还参观、见证乡的民主选举过程。

抗日根据地的民众选举是采取投豆子的方式，候选人身后放一只碗，看谁得到群众投的豆子多，谁就当选。因为农村民众大多数不识字，采用这种变通的办法能体现人民的民主意愿。这种独特的民主选举方式得到了史沫特莱的高度赞扬，她说，抗日游击根据地里是发展民主的，“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通过民主选举敌后农村的乡区镇下级官员，“‘十人团’的会员、乡村教师、铁匠、农民甚至1位妇女等军事干部负责当选，代替了那些只做官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地头蛇”。“人们说上任的新官会烧三把火的。他们是‘真正的人’，不抽烟，不赌博，不动摇，老老实实为百姓办事。”

史沫特莱曾到达汉川县田二河镇，访问该县国民兵团第二中队，一个由共产党员罗连仿领导的优秀的抗日连队。她称赞说：“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天汉人民子弟兵虽然武器陈旧（汉阳造步枪），但士气旺盛，这是

日本侵略军难以逾越的钢铁长城！”史沫特莱在汉川拍摄留下了“列队通过田二河镇的第二中队整齐军容”，还留下了给天汉地委机关报《前卫》的题字，这都是不朽的历史见证。

史沫特莱还去过陡埠头等地。在罗叔平的帮助下，当时汉川党组织负责人童世光用不熟练的英语与史沫特莱进行了交谈，介绍了汉川人民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来所经过的斗争历史，以及村民直接选举基层乡保长、自发成立抗日自卫队，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等。史沫特莱听后称赞：“中国人民真了不起！”

“我所经历的一次战斗”

1940年初的沔汉湖区，虽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但形势依然相当复杂，有的地方与日伪顽势力犬牙交错，史沫特莱来湖区采访，危险系数还是很大的。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天汉地委抽调一个排的兵力负责警卫，其间他们经历了3次战斗，印象深刻的是与日军的遭遇战。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史沫特莱骑着马，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过敌人的封锁线。正当穿越公路时，忽然从不远处射来一道强烈的灯光。

“敌人！准备战斗！”指导员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奔向公路两旁，史沫特莱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愣住了，骑马伫立在路中央。“快，隐蔽！”没等她缓过神，马已被人猛抽一下，飞快越过公路。“战斗！已经发生了战斗！”处在危险之中的史沫特莱紧张不已，不敢继续前进，纵身下马，俯卧在一座坟包后面，睁圆眼睛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嘎——嘎——”曳光弹划破了夜空，子弹的呼啸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大约过了一刻钟，战斗结束了，大家没有伤亡，集中在一起，却发觉不见了史沫特莱，大家的心顿时像坠了一块铅。指导员急了：“找不着史先生，谁也别想回去。”战士们深知责任重大，赶紧分头寻找。“啪，啪！”战士们每前行一段，轻轻击掌两下，这是夜行军商定的联系暗号。“啪，啪”，忽然，前方传来两声轻微的回声。循掌声方向，一名战士依稀看见了史沫特莱骑坐的战马，接着见史沫特莱正站在马边焦急寻找队伍。战士冲上前去，



紧紧地抱住史沫特莱，兴奋地讲述刚才的战斗。原来，部队遇上日军巡逻队，在战士们的反击下，日军仓皇逃走了。当夜，史沫特莱写下了《我所经历的一次战斗》，记录下这次战斗经历。

和战士们在一起，史沫特莱亲历了边区游击队员紧凑的战斗生活。他们除了打仗，还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十人团”，站岗放哨，勇敢机智地搜捕敌人，每周都会抓来一些汉奸。在湖区，史沫特莱还参加了1次第四团队对汉奸的审讯、处决过程。

史沫特莱在边区采访了近3个月，足迹遍及京山、安陆、应城、汉川等县的山地、平原、湖区。在《中国的战歌》一书里，她记述了鄂豫边区抗战这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并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对真理与正义的执着追求，敏锐地‘看到我们国家有两个世界——新的和旧的’，从而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日进步力量的高亢战歌。”

当年给史沫特莱当翻译、陪同她采访的骆方同志，1982年在《她唱出〈中国的战歌〉》一文中写道：“我们上前线的采访活动异常紧张、频繁。每天，我们清晨出发，到各个团队的驻地去，行动是隐蔽的。走的尽是荒无人迹的地方、崎岖的山路，避免碰上敌人的部队。每到一个目的地，史沫特莱就立即开始紧张的采访活动：找战士、指挥员询问、座谈；找老乡们亲昵地聊天。

她同当地老乡攀谈时，老乡开始拘束不安，渐渐地被她和蔼的、善良的问话所吸引，简直忘记了对面交谈的是位外国人。她同年纪相仿的人交谈，宛如姐妹之间的叙谈，如问：‘孩子听话吗？’‘年底收获了该添置点什么？’……她同年轻战士交谈，却又像一位慈祥的长者，问：‘家在哪里？家里有田地吗？打垮了日军准备干什么？’……她像块吸铁石一般，把许许多多的人吸引到她身旁。而她又从这种攀谈中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社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就是这样琐碎的谈话，使她掌握了描写中国人民战争必胜的素材和细节。”

骆方介绍道，史沫特莱的体质一向不好，而且这样频繁的活动又过分消耗精力，司令部为了照顾她的身体，特地为她配备了一匹马，派了一个

班的战士保护她的安全。这匹马又矮又瘦，倒像一匹小毛驴，高个子的史沫特莱骑在马上，模样有点滑稽，她的两只脚几乎可以擦地。每次骑上马后，她总是幽默地说：“我又演剧了。”但是，她真正骑马的时候很少。行军时，只要遇见伤病员，或者警卫战士有病，她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有时，伤病员执意不骑，她就很不高兴，直到伤病员骑上马后，她才转怒为喜，高高兴兴地走在队伍的前面。她多次讲：“他们为正义流血，应该受到照顾。”



1940年2月下旬，史沫特莱（左）和安娥（右）在天汉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

每天晚上，在旷野的山村里，万籁俱寂，史沫特莱总是在一盏豆油灯下认真地整理笔记、撰写稿件，一直伏桌疾书到深夜。每每要警卫员催促几遍，她才肯安睡。她是用全部身心写出《中国的战歌》等作品，记录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战地报道。



敲开武汉西大门

新四军进军襄河

1940年元旦前后，新成立的豫鄂边区党委完成了对各地武装力量的整编。1月3日，中原局、刘少奇等电示李先念等：“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皆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纵队，由纵队首长组织纵队委员会，以理治、先念、质斌、少卿、少敏诸同志组织之，以理治同志为书记。中级干部任免、部队行动，及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均须经过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这是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根据中原局的电示精神，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于1月上旬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随后，为了加强统一领导，还成立了边区军政委员会，其成员与纵队委员会相同，亦由朱理治任书记。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建立是新四军第五师建军史和豫鄂边区抗日战



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领导人合影（左起）：
陈少敏、郑绍文、朱理治、李先念、刘少卿

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党中央和中原局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的成立，实现了党在豫南、鄂中、鄂东三个地区掌握的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统一编组、统一指挥；完成了豫鄂边区党的工作重点向武汉外围的沦陷区，主要力量向敌占

区进军的转移；有计划地展开了在豫鄂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从此，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危急时刻诞生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坚决遵循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高举抗日旗帜，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在战斗中壮大自己，胜利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战新局面。

自1939年11月起，国民党顽固派逐渐由政治反共进入军事“剿共”，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共高潮。对此，中共中央指出：“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应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愈益剧烈，李先念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率挺进纵队在边区各地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积极展开对日伪军的作战。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团队、第六团队在京山石板河以南伏击从皂市调往京山的500多名日军。2月，李先念令第四团队开辟天（门）西，移师天门赖兴场，与刚刚组建的天门县抗日游击大队会合。日伪闻讯后，即调集千余步骑兵，向新四军驻地进攻。指战员奋起还击，与敌人展开拉锯式的肉搏战，从拂晓激战到午后，胜利突围。中旬，李先念率第二、第四、第五团队，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目标直指盘踞在汉阳侏儒山的伪军汪步青部。

汪步青为虎作伥

汪步青，军人出身，曾参加过北伐，后长期在武汉赋闲。武汉沦陷后，他逃离武汉，在郊区黄陵矶打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招牌，自封团长，招兵买马，并弄到了一笔钱，买了一支短枪，再邀约一些人，打着抗日的旗帜，回家乡沔阳县西流河镇。

汪步青在家乡到处炫耀，称“蒋委员长是我的校长”，标榜是国民党正统，打出“一切为了抗日”，欺骗蒙蔽群众。对国民党军队西撤时留下的散兵游勇、帮会成员、三五成群前来投奔的人，则论人多少和枪多少、好坏封官。如汉阳县保安中队长陈正权率100人枪投奔汪步青，汪步青就封陈正权一



顶团长的帽子；保安分队长刘振邦带 30 余人枪来投靠，则被封为营长；沔阳马家滩惯匪马又清携 30 条长枪、40 余名兄弟，汪步青也给封一个营长的官阶。所有带人、带枪、带钱的，汪步青是来者不拒，短短 3 个月的时间下来，居然拥有了 3000 多人的规模。

到了 1939 年，汪步青摇身一变，任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第八十二师师长，有日本人支持，师部移驻汉阳黄陵矶。不久，伪中国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去日本，代理总司令杨经曲率所部一并投入汪步青，被编为第一六四旅、第一六五旅。接着，活动在洪湖一带的地方武装李太平部和沔阳县保安团中队长苏振东也纷纷投靠，被编为第一六六旅，苏振东为团长。经过不断收编扩充，汪步青的总兵力已达万人以上，驻扎在汉阳县属黄陵矶、侏儒山、山羊头、蒲团、大咀、东江垸、永安堡、蓼山、十成堡、桐山头以及汉川县的系马口、南河渡等地，成为新四军开辟川汉沔地区的重大障碍。

敲开武汉西大门

1940 年春节，边区军民不是在对付日伪军进攻，就是在提防国民党顽军的袭击，毫无年节的气氛。一天，李先念司令员召集大家开会，商讨摆脱困境的对策。会议开始，李先念手里卷着“红军烟”，头也不抬地问在座的人：“自去年 12 月以来，大家都有些什么感觉呀？”纵队参谋长刘少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紧张，就是紧张。”政治部主任任质斌接着补充说：“是太紧张了。两个月来，日伪顽齐上阵，搞得一曲比一曲难唱。”

政治委员朱理治若有所思地说：“日伪顽三方，目前还是顽军的威胁最大呀。这伙人不专心抗日，却在内部搞摩擦，从事反共活动……”李先念抬起头来，感慨地说：“是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要设法打破这种日伪顽夹击的形势。”

一直带兵打仗、对国民党顽固派有刻骨仇恨的参谋处长张体学一拍桌子，转而建议说：“我看要破也不难，集中兵力先打假洋鬼子。”

李先念站起身来，肯定地说：“我们目前的力量只能打伪军。但是，打了这个伪军，要对日军和顽军都有震动。”

任质斌说：“那就打汪步青，打汉阳的伪军，那里离汉口近，对日军震动肯定很大。”

李先念转过头问张体学：“汪步青四个旅，哪个旅距离武汉最近？”张体学回答：“要数驻防侏儒山、永安堡一带的第一六四旅最近。”“好！”李先念紧握双拳有力砸向桌面，“打侏儒山，我带三个团队去，争取打疼他。”

2月26日晨，李先念率第二、第四、第五团队出发，进军襄河。三个团队分成东西两路南渡襄河，对侏儒山形成钳形攻势。东路由第二、第四团队组成，由第二团队团长周志坚负责，从汉川县两河隐蔽渡过襄河，经系马口以东，直插侏儒山；西路由第五团队组成，蔡松荣带队，李先念亲自率领，从汉川县脉旺嘴渡过襄河，经杨林、西江之间，直趋侏儒山。

黄昏，第五团队到达脉旺嘴，地下党已准备好了船只和晚饭。吃罢晚饭后，部队悄然渡过襄河，趁夜向东南潜行。第五团队团长蔡松荣带一个尖兵连走在最前头。

凌晨1时许，作战参谋报告：“司令员，团长和尖兵连已抵侏儒山镇西门外，请指示行动。”按照作战计划，是要等待第二、第四团队到达侏儒山的东北和东南，对侏儒山形成包围后，再发起攻击。于是，李先念说：“告诉蔡团长，部队加强警戒，原地待命。”

这时，旷野里仍是一片黑暗，侏儒山镇西门内传来阵阵更鼓声。伪军班长领着几个士兵来到西门换哨，换下来的哨兵倒背着枪，嘴里哼着小调，朝坡下草丛方便。这一尿不打紧，把隐伏在草丛中的新四军战士吓了一跳，忙朝一旁滚动。伪军哨兵听到响动，惊叫：“谁？”无人回答。伪军哨兵忙将倒背的枪掉转枪口，慌乱中误扣扳机，“砰”地一枪打在自己脚上，他大喊大叫，称自己被人袭击。哨位上的哨兵闻声也乱放起枪来。

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蔡松荣问政委杨焕民：“怎么办？”杨焕民没有犹豫，果断下令：“趁乱攻击。”于是，蔡松荣一面派人速去向李先念报告，一面指挥部队发起攻击。

李先念火速赶到西门指挥。此时枪声已惊醒伪第一六四旅旅长袁杰，他披上大衣翻身下床，大喊：“冯副官，何处打枪？”



“好像是在西面。”冯副官在门外回答。

袁杰不敢怠慢，迅速命令冯副官：“立刻查明情况，并向汪师长报告。”

袁杰心里迅速对情况进行分析。他首先想到的是新四军，但很快又否定了这一想法——新四军在应城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怎么会打到这里来呢？他又怀疑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但也不太可能，游击队的实力还没有到直接攻打他旅部所在地的程度。

西门下，蔡松荣带领二营趁乱攻进镇里，沿着西大街向纵深推进，将赶来抵抗的伪军纷纷击垮。李先念把三营留在镇外准备援，同时准备接应第二、第四团队，自己带着一营随二营在后面跟进，扩大战果。

伪军旅部大院里吵吵嚷嚷，乱作一团。冯副官满头大汗，急急地向袁杰报告：“旅座，不好了，是新四军的主力打进来了！”

“是吗？”袁杰大惊，并再次向汪步青求援。

汪步青听说新四军主力打进来了，不由得胆战心惊，慌忙对参谋长喊叫：“快向内山英太郎求援，同时命令各旅进入战斗状态。”

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接到汪步青来电，认为情况不实，因为李先念还不曾到过武汉以西地区活动。接着，他向汉口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报告：有一支新四军部队已到汉阳，请命令系马口据点出动兵力增援。随后，由联队长北村胜三大佐率领 300 余人，在进至石山时与新四军第二、第四团队遭遇，展开了激战。

负责指挥东路的第二团队团长周志坚一心想火速南下侏儒山，可现在不行了。他与第四团队团长李人林商议，认为情急之下，只有硬打过去。二团队政委黄春庭提出异议：“这样恐怕就要耽误时间了。”四团队政委罗通则建议：“一面打，一面派人赶快向李先念司令员报告这里的情况。”

此时，李先念指挥部队将伪军旅部大院包围，正集中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攻。汉口滨江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里，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摆在园部和一郎面前。“汪步青所部将被歼灭，派出增援的部队暂无消息。”电报是内山英太郎发来的。园部和一郎看过电报，两眼发直，直呼：“侏儒山失守，汉阳难保。戒严！戒严！全城戒严！”

拂晓，袁杰眼看旅部大院将被攻破，遂率少数随从从后门出逃。这时，李先念得到报告，侏儒山街道已被攻占，部队正往外撤；第二、第四团队在石山与日军发生激战，已不能南下了，原定全歼伪军第一六四旅的可能性不大，天色已明，应早点撤出。于是，李先念命令第二、第四团队返防，第五团队迅速撤出战斗。此战，新四军共击毙伪第八十二师第一六四旅营以下官兵 100 余人，俘敌 20 余人，敲开了武汉西大门，迫使日军在武汉宣布戒严 3 天，不敢轻举妄动了。



兵定姚家山

在湖北大悟县与黄陂县之间有两块山地，中间由一条从花园到夏店的公路隔开，公路以北叫大悟山，以南叫小悟山，又叫姚家山。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豫鄂挺进纵队的司令部、政治部曾设立于此，后逐步发展成为边区的后方战略基地。

司令部设在姚家山

1939年9月，国民党桂军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率两个团，伙同国民党鄂东游击总队总指挥程汝怀部主力，突然向张体学率领的独立游击第五大队驻地夏家山、芦泗坳等发起全面进攻。第五大队各部被迫分路向河南信阳、罗山和鄂东北礼山相连的地方突围，沿途战斗激烈，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夏家山事件”。在此次事件中，许多共产党员和支持抗日的群众遭到屠杀，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遭到摧残和破坏，广大指战员对鄂东的国民党顽固派怀有深深的仇恨。

11月，四望山会议召开，豫鄂边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实现了统一。根据中原局的指示，为配合新四军第二师的反顽斗争，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筹建过程中，李先念等就制定了挺进纵队东进大小悟山的战略部署。当时在姚家山一带驻有国民党顽军刘梅溪支队、杨希超支队，总共加起来有几千人，这些顽军都参与了“夏家山事件”，是挺进纵队东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障碍。

1940年1月，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刚刚成立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李先念的亲自率领下，由第一团（团长罗厚福、政委方正平）、第二团（团长周志坚、政委黄春庭）、

第三团（团长肖远久、政委钟伟）组成主力，跨越平汉铁路，向小悟山专事反共摩擦的刘梅溪部展开反击。2月初，为了避免与桂军直接冲突，打破日顽夹击的阴谋，挺进纵队撤回路西。



2月中旬，纵队第一团、第二团再次进军小悟山，全

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大礼堂旧址，位于黄陂区姚家山

歼了投奔刘梅溪的贺承慈残部。3月，纵队抽第一团队一部和鄂东、信应地委的地方武装组成鄂东独立团（团长吴林焕、政委张体学），坚持在小悟山一带。4月，中央军委电令挺进纵队增兵路东，打击程汝怀，以拊桂军侧后，牵制桂军对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进攻行动。4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亲率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同时调来鄂东独立团作为配合，再次东进大小悟山。这次战斗击溃了刘梅溪、刘亚卿、杨希超等部，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与（黄）陂（黄）安南连成一片，开始了建立姚家山抗日后方基地的历程。

在姚家山，李先念、任质斌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决定以第一、第二、第三团组成平汉支队，周志坚任支队长，方正平任政治委员，纵队司令部、政治部驻姚家山，同时陈少敏率边区党委也从京山八字门搬来姚家山，并命令平汉支队和另外两个团驻在大悟山，保卫机关安全。这样，姚家山就成了当时部队和地方党的指挥中心。

在姚家山，李先念主持召开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5月11日向中央军委提出向西作战略展开设想与部署：“日军大举西犯，桐柏、新野、新城、枣阳均已失陷，襄樊大有不守之势，这是我们发展的良机，我部决即向西出动”；31日，出席豫鄂边区各界救国联合总会的成立大会；还曾赴天汉地区布置对国民党第一二八师王劲哉部的统战工作，派易家驹与王劲哉谈判等。



任质斌曾回忆说：“其实大小悟山（姚家山）当时还不能完全算作敌后，环境也不是很好。它的地形可以比作一个口袋。西面是平汉铁路，驻有敌人，东面也有敌人的驻点，南面是黄陂县城，只有北面没有敌人，是‘口袋’开口处。鉴于这种地形，国民党正规军包括广西军不敢在此常驻，便让地方游杂武装暂驻，而广西军则驻在麻城、礼山等地。我们进驻大小悟山，在姚家山没过几个月，广西军就开始进攻我们，由于力量悬殊，我们撤出了大小悟山，退到白兆山。区党委的几位同志也觉得大小悟山不稳定，不愿住在这里，便又搬回到了京山八字门、小焕岭一带。”

6月2日，桂军第七军两个团及鄂东游击第十六、第十九纵队共万余人分数路进攻大小悟山地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一部予以还击。激战四昼夜后，豫鄂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司、政机关于5日全部转移到平汉路西。20日，李先念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名义向全国发出抗议通电：“本月2日，鄂东专员程汝怀勾结两面派杨希超、刘梅溪等，骗请皖主席李品仙令其所属第七军军长张淦率全军共两万余众，向我大小悟山之留守部队进攻。程汝怀、杨希超、刘梅溪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现大小悟山一带多成瓦砾，民众惨遭蹂躏，尸横遍野，怨深似海。”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又发起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毛泽东指示：“李品仙的反动不加以打击是不会回头的。”“第四、第五支队主力宜向西调，完成此任务，同时也是压迫李品仙让步之必要步骤。李先念主力仍须继续打击鄂东反动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接援由皖南突围的新四军部队，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李先念派挺进纵队第一团、第二团东进，配合鄂东独立团，坚决打击鄂东的反动武装。1月27日，第一团在黄陂湛家河附近，将国民党鄂东第十六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击溃。2月17日，李先念率正在组建中的新四军第五师4个团的兵力，向侵占大小悟山的鄂东第十九游击纵队进击。经3日激战，攻克顽军困守的全部阵地，完全恢复了大小悟山根据地，司、政机关进驻姚家山。姚家山第二次成为边区首脑机关的指挥阵地。

3月4日，李先念等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路东局面已初步打开，

小悟山（在孝感、黄陂间）亦仍控制于我手中。目前我们的部署：继续开展路东的局面，第一团在（黄）陂（黄）安南活动，第二团控制小悟山。”

4月上旬，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完毕，李先念等率部回白兆山。不久，姚家山一带被国民党鄂东保安第一旅（简称保一旅）占领。8月下旬，保一旅杀害了陂安南县委书记田东，李先念闻讯后研究决定东进，消灭保一旅，开辟鄂东地区。9月初，李先念率第十三旅、第十四旅全歼保一旅第一团和黄安县自卫队，以及保一旅第二团、第三团各一部，俘其营长以下 1000 余人。随后，第五师师部第三次进驻姚家山，目的是为了配合新四军军部作战行动。

10月5日，华中局指出：“因为桂军有东进向皖东新四军进攻之企图，故令第五师师部及李先念、任质斌东进至鄂东、黄陂以东地区待机，准备配合皖东新四军作战。也为了战争的需要，第五师已将第十四旅张体学部调至师部附近整训。”11月，李先念、任质斌向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及十三旅全部在礼（山）孝（感）边之大小悟山整训。”12月12日，李先念、任质斌向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第十三旅主力及司、政两部现已移至大悟山以北汪洋店、二郎店以南之大岑、万福山、新屋一带整理。并以一部到小悟山地区活动。”以后，新四军第五师的首脑机关多在大悟山。

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发出指示：“挺进纵队是党的武装中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一时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取得地域上的联系。因此，必须努力扩大自己，务求在一年内扩大到四万人枪。”并强调“军队中的工作是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也就是在这时，根据部队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良倾向，李先念与任质斌等不时交换看法，求得共识，认为要使部队迅速发展壮大，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正规化党军，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军政干部中开展以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游击习气为主要内容的“反不良倾向的斗争”。



豫鄂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领导都十分清楚，形势的迅猛发展，战斗频繁和相对独立的作战环境，固然是部队和根据地扩大的很好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战斗的频繁使得部队的伤亡相对增大，部队以农民为基础和新成分的迅速补充，良莠不一；相对独立的作战环境，亦势必在少数指挥员中滋长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游击习气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部队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难以应付更困难的局面，难以争取更大的胜利。

5月9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黄陂姚家山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李先念司令员主持，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代理政治委员任质斌在会上作了题为《开展干部中的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的报告。在报告中，任质斌首先阐明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指出：“革命的阵营、革命的军队、革命的政党，都是从不断地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中巩固起来、壮大起来的。而开展干部中的反不良倾向的斗争，则是整个反不良倾向斗争中的基本一环。”“中国党和军队中的干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着比任何国家更多的数量。因此，这一问题在中国党和军队的发展和建设中，占着更重要的地位。”

他还紧密联系实际，着重论述了“在今天，在豫鄂挺进纵队里，更值得强调提出这个问题”的三个理由：一是“我们这个部队目前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不良倾向需要纠正”。他列举了部分干部中存在着的不良倾向的



新四军第五师历史陈列馆

种种表现，诸如：苟安偷懒、不负责任、疲沓懈怠的倾向；自由主义的倾向；本位主义的倾向；贪污腐化，颓废堕落的现象；骄傲自大的倾向；不顾一切，任性妄为的现象；气量狭小，不能涵养的倾向；英雄

主义、锦标主义的倾向等。二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更加困难了，要使我们能够胜利渡过这个难关，需要首先整顿与巩固内部。而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则是整顿与巩固内部的最重要的前提”。三是“最近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所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更重大，不克服目前干部中所存在着的这些弱点，是没有办法来完成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所赋予我们的这些光荣任务的”。

任质斌进而还剖析了各种不良倾向产生的原因，并围绕怎样在干部中进行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着重提出了要做到“六个必须”。即：必须明确规定开展这一斗争的目的，必须在全体干部中进行深入的解释和动员，必须用一种非常坚毅的精神来进行这一斗争，必须大公无私地来进行这一斗争，必须健全党的生活、健全干部小组的生活，必须系统地加强干部教育等。最后，任质斌在总结中满怀信心地说：“全国民众在期望着我们，党在号召我们，部队要愈益巩固与扩大，而干部也要愈益进步。我们的干部都是愿意执行党的路线，响应党的号召。因此，我们是会把这些不良倾向克服下去的。”

5月15日，《挺进报》全文登载了任质斌的报告，政治部副主任王翰撰写“编者按”，指出这个报告“内容丰富，发人深省。为了巩固我们艰难缔造的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我们的挺进纵队，配合全国抗战，使我们每个同志都能忠贞坚定地为民族为阶级发出我们最大的力量，在不断的斗争中不断地进步，每一个同志都应深刻地研究这一报告，虚心地检查自己”。“希望各级政治领导机关立即发动各部门进行研究和讨论，并正确开展这一斗争。”

6月，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布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以便克服不良倾向，把部队的政治工作“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姚家山会议后，挺进纵队开展了反不良倾向斗争的运动，使部队在正规化党建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7月，在抗战3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又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抗战第4周年将是异常困难与危险的一年，全党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使自己成为团结全



国抗战力量的核心，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新四军必须用最大毅力，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一切做法应以长期坚持斗争，积蓄人力、物力为出发点。此后，李先念、任质斌在率部向西作战略展开，发展襄（河）西，开辟天（门）西，巩固鄂中根据地，使豫鄂边区出现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的局面后，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主力部队集中进行政治和军事整训，继续在各级军政干部中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

李先念派粮救灾民

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反“摩擦”的艰难日子里，姚家山地区的军民学习陕北南泥湾的经验，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以冲破日伪顽封锁。他们通过创办边区建设银行造币厂，发行“边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和商业贸易，保证军需民用。

1941年春，边区首脑机关及部队主力万余人移驻大、小悟山区，物资供应骤然紧张，加之日伪顽严密封锁，造成了根据地生活资料严重不足。针对这一情况，边区行署在此地成立了（黄陂）蔡店贸易公司。公司管理四大商行，并经办商店营销业务，通过各种渠道组织货源，有效缓解了根据地生活物资的匮乏。

1943年6月，边区行署直接承办的民生烟草公司生产出“女将军”品牌香烟，畅销边区各地。同时，他们还集资筹办化工、修械、电镀、被服、皮革、造纸等工厂。此外，姚家山军民还广泛开展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生产运动，在湖区修堤，沿河筑堰，在山区建坝。通过开展田亩普查和“二五”减租活动，调动了农民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鄂东分部、鄂东公学等，培训抗日军政干部。

新四军新五师司、政两部多次驻扎在姚家山，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故事至今让姚家山人民难以忘怀。

1941年秋，姚家山地区60多天没下过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几乎绝收。无奈之下，百姓只好上山挖野菜、葛根等填肚皮。李先念率部抵达后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想方设法从边区拨出一些米麦分给乡亲们，使全村人渡

过了生死难关。李先念当年的房东姚成台回忆：“李师长没有一点官架子，非常好亲近。一有空他就跟我们拉家常，讲许多大道理给我们听。”李先念在他家用的灯台、书柜、桌凳等物品至今仍存，成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李先念不时也走家串户，问寒问暖。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李先念让战士们将缴获的猪肉给每户农家剁一大块。为了活跃驻地文化生活，他还提议部队组织宣传队，给当地军民们唱戏、演节目，讲打日伪的故事。

1944年11月20日，豫鄂边区党委在姚家山召开了边区农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0余人。会上，陈少敏作了《一年来农救工作的总结》报告，吴祖贻作了《秋收减租总结》报告，郑位三作了《迎接天光》的政治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边区农救会的斗争纲领、斗争目标，提出了斗争口号：要造成边区根据地农民的优势；要克服经济困难，展开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打下反攻的经济基础；要迎接反攻以前的农民运动的新高潮。为实现这些斗争口号，大会要求各地完成五项重要任务：一是农救会要领导农民大大进步，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二是加紧生产，切实准备来年的春耕；三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农民要帮助政府、军队克服财经困难；四是展开全民武装建设，整顿民兵基干队；五是巩固与扩大农救组织，培养大批农民运动的领袖。会议还选举成立了边区农救总会，边区党委民运部部长吴祖贻兼任会长。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进一步开展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支援战争，准备反攻，打下了基础。

姚家山人民衷心拥护抗日的人民军队，他们敢于斗争、敢于牺牲，发扬了大无畏革命精神，同时为部队筹粮、筹款、腾房、救治伤员等，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88年，姚家山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旧址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汉阳伪军反正

汉阳伪军的反正，是1940年鄂豫边区对日伪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年春，以顾大椿为书记的中共天汉地委就开始对汉阳伪军做策反工作。5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政治部联络部长张执一去汉阳，具体进行争取伪中国人民自卫军汪步青部黄人杰旅（第一六五旅）和袁罡旅（第一六四旅）等的反正工作。通过接触，张执一了解到，隐居在敌占区的爱国人士杨经曲对这两个旅有较大的政治影响，黄人杰又是杨经曲的外甥。于是，受李先念等之命，张执一、顾大椿及天汉地委组织部长易家驹等持董必武的信件前去做杨经曲的工作。杨经曲与董必武同为湖北同盟会会员，交情甚笃。经过争取，杨经曲决定亲自做两个旅的反正工作。

“借屋躲雨”

1939年，在武汉西大门的川（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形成了日顽勾结、蒋伪合流的黑暗局面，其中实力最大的伪军就是以汪步青为师长的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独立第八十二师，该师有4个旅共5000余人。袁罡掌握的为第一六四旅，黄人杰掌握的为第一六五旅，另外还有何筠旅、李太平旅。对第一六四、第一六五旅有重要影响力的则是武昌士绅杨经曲。

杨经曲是同盟会会员，曾与董必武同学，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担任过恩施、来凤县长，在湖北有一定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经曲一度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与共产党员张执一、国民党元老孔庚等主持湖北省抗日乡村促进会工作。1938年8月，杨经曲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拜访董必武，董必武鼓励他利用老关系搞武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服务。

武汉沦陷后，杨经曲的外甥黄人杰和共产党员许大鹏，在武昌县油坊

岭地区各组织了一支武装。同年底，武昌县党组织负责人许保民等将这两支武装合组整编为鄂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 1000 余人，由黄人杰任总队长。同时派共产党员潘斌、舒江皋、许大鹏分别任副总队长、政训员、中队长。1939 年初，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获取合法名义，黄人杰率部改编为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司令部直属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简称樊湖大队。

黄人杰多次率部与日伪军作战，如曾在武昌豹澥镇埋伏袭击日伪军，击毁敌军车数辆，毙伤敌军 20 余人。同年夏，天汉中心县委应鄂南特委的要求，派共产党员韦为、余成刚等 7 人到该部工作，并建立中共支部。8 月，韦为、余成刚等计划发动兵变，把队伍拖回，结果秘密泄露，所有共产党员被黄人杰赶走，黄还在顽固分子的怂恿下杀害了中共武昌县委组织部长王健民。

武汉沦陷前夕，金龙章在黄陂、孝感和汉阳、沔阳等地拉旗组织队伍，拼凑武装，自封番号。武汉失守后，金龙章部成为伪军，号称十万，打出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的旗号，辖第八军（军长李汉鹏）、独立十八师（师长马亮）、独立二十一师（师长杨希超）、独立二十三师（师长尹昌彦）、独立二十五师（师长赵光荣）、独立八十二师（师长汪步青）、独立九十二师（师长熊光）、警卫第一师（师长曾大钧）等，是武汉外围最大的一支伪军队伍。其实，日军对金龙章并不放心，所以很快便以到日本、上海参观访问的名义，调金龙章离开部队。

杨经曲与金龙章长期友好，关键时刻，他劝说金龙章善自为之，不要做民族敌人。经过多方权衡、思考，金龙章提议在参观访问期间，由杨经曲代自己统率所部，并得到日本人同意。与此同时，黄人杰部先后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梅华团”和国民党方步舟部的袭击，损失惨重，杨经曲趁势促使黄人杰部编为金龙章的伪中国人民自卫军鄂南独立旅。最后，在杨经曲斡旋下，以“受编不受调”“借屋躲雨”方式，将黄人杰部和金龙章麾下的袁罡部编入伪八十二师汪步青部序列中，黄人杰部被编为第一六五旅，袁罡部为第一六四旅。

实际上，杨经曲与汪步青之间矛盾重重，双方在驻地和供应问题上就



没有停止过交锋，不过是双方互有得失，彼此心照不宣罢了。所谓的“受编不受调”，本身就是双方权力斗争妥协的产物，只能维持一种微妙的稳定，这种稳定十分脆弱，一旦汪步青意图加强对黄、袁两部的控制，双方的矛盾就会迅速激化，甚至发生火并。杨经曲自己也深知，“借屋躲雨”绝非长久之计。

董老来信

1940年2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率第二、第四、第五团队，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攻汪步青伪第八十二师独立第一六四旅袁罡部，攻占了侏儒山街道，击毙伪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俘敌20余人。此战沉重打击了伪军官兵的士气，震动武汉，使盘踞武汉的日伪军戒严三天，极大提升了新四军的声威和影响。同时，这一仗也加深了汪步青与袁罡和黄人杰两旅之间的矛盾，第一六四旅和第一六五旅官兵对汪步青把他们放到最前沿去参战、送死深为不满，愈发不听调动，双方摩擦加剧升级。

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为了巩固和扩大鄂中抗日根据地，一面对敌进行坚决的军事打击，一面运用统一战线，广泛进行争取伪军的工作。4月，已经是黄人杰部营长的共产党员许大鹏与中共汉阳组织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党做争取黄部的工作。随即，天汉地委在黄人杰旅建立了党组织，并派许大鹏的父亲许保民利用与杨经曲、黄人杰的同乡关系和多年私交，做争取杨经曲和黄人杰反正的工作。这时，汪步青听到了一些风声，对杨经曲保持距离，甚至处处刁难，散布黄人杰部有私通共产党的嫌疑，引起天汉地委的高度警觉与关注。

7月下旬，正值盛夏，天气炎热，汪步青突然通知要进行部队大检阅，命令黄人杰把队伍带到黄陵矶，企图将其一举缴械。黄人杰称病不出，由许大鹏率部前往，部队在返回途中，突遭汪步青直属部队袭击，汪、黄决裂分手。许大鹏乘天黑率部冲出包围圈，回到永安堡。第二天，汪步青率部兵分三路，赶到永安堡、桐山头、侏儒山一带进行追击，黄人杰只好退至索河、李家集一线，靠近新四军的活动区。袁罡、杨经曲、黄人杰是一

起的，汪步青在迫黄人杰时，袁罡见势不妙，率部撤至蔡甸一带。

就在黄人杰和袁罡撤退时，国民党第一二八师和汪步青部纷纷派人拦截和收编他们的流散人员，而中共（汉）川（汉）阳工委则组织群众前去慰问，并派医护人员为伤病员治疗。看到共产党的诚意，看到了新四军与国民党军的区别，杨经曲深感触动。中共天汉地委立即将杨经曲的举动、天汉各部动态电告边区党委，并建议报告中央请董老致函杨经曲，促其率部起义。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请示决定，由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张执一以“纵队参谋长”名义，带一个警卫排，携董必武名义发给杨经曲的电报，前往接洽。

在天汉地委的负责人顾大椿、易家驹等人的协助下，张执一在蔡甸附近的官塘角会见了杨经曲。见到董老的电报，杨经曲二话不说，当即表态：“照董老的意见办，我来做黄、袁两旅的工作。”经过认真研究后，杨、张决定了起义的日期与会合的地点。

离开官塘角后，杨经曲直奔黄人杰处，在说明了与新四军代表见面的情况后，他说：“人杰，团结抗日乃吾多年夙愿，我和你先在武昌受编金龙章部，后在汉阳受编汪步青部，均为借屋躲雨，先养待机，迎义师以成大业。多年来受尽屈辱，身心痛切。幸得新四军不弃愚陋，赐我以应天命、顺人心、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良机，吾等绝不能辜负也！”但黄人杰顾虑曾与共产党作对，害怕得不到原谅，迟迟下不了反正的决心。杨经曲进一步开导说：“人杰，不要那么想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今世上，只有共产党光明正大。目前你部的处境危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与其身死敌手，不若弃暗投明，把人枪带往新四军，亦可将功补过嘛！”

在做好了黄人杰的工作之后，



杨经曲（右一）与妻杨助吾（左二）等家人合影



杨经曲又去做袁罡和他的“义子”、第一六四旅团长杨瀛等的工作。第二天上午，袁罡召开第一六四旅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弃暗投明，起义反正，得到了大多数军官的拥护。会后，杨经曲还把自己和黄人杰旅连以上军官的家属，全部交托给汉阳五中队掩护先去襄北新四军活动区域，以示义无反顾的决心。为了保证起义的圆满成功，张执一和天汉地委、（汉）川（汉）阳、（汉）川沔（阳）工委的领导又同杨经曲一起研究和确定了行军路线和序列，并确定了口令。

震动豫鄂边区的壮举

1940年8月13日晚10时，杨经曲向黄人杰第一六五旅和袁罡第一六四旅下达“移师襄北，领取军饷”的命令。随后，在汉阳五中队的掩护配合下，两支队伍秘密离开索河，向天汉湖区挺进。途中，第一六四旅旅长袁罡因不满意杨经曲只许诺给他任团长，中途变卦率一团四五百人投靠汉口汪伪杨揆一部而去。第一六五旅和第一六四旅杨瀛团在丁家集与前来迎接的新四军部队会合，经老新集、芦排到达襄河南岸，黎明前全部抢渡襄河，顺利到达汴汉湖边的杨家集。

正当起义部队欲登船离开时，400余日军和伪军汪步青部等蜂拥而至，向杨家集合围。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张执一和杨经曲率部队迅速转移，命令共产党员许大鹏率一个营的队伍进行殿后堵截。许大鹏、张子敬等抢占湖堤进行阻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白刃格斗，为起义部队顺利上船、安全脱身转入湖中芦苇深处赢得时间，战斗中张子敬连长等30余战士英勇牺牲。

起义部队劈波斩浪，开赴汴汉湖西畔的韩家集，尔后转赴天西，受到李先念等纵队首长的热烈欢迎。8月21日，起义部队被编为纵队第十团和第十一团，基本保留原有建制。第十团由黄人杰任团长，黄德魁任政治委员；第十一团由杨瀛任团长，娄光琦任政治委员。并由第十团、第十一团与纵队第四团队合编组成纵队第四支队，杨经曲任支队长，郑绍文任政治委员。

同日，杨经曲发布“率部反正通电”。1941年4月，第四支队又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一纵队，杨经曲任纵队司令员，张执一为政委兼政

治部主任。

杨经曲率伪军 1500 余人反正，事关重大，李先念和任质斌都亲赴天汉地区具体部署。他们不仅会见杨经曲，高度赞扬他的义举，还一同商量的部队的整编工作，并特别强调告诉郑绍文：“中央有指示，建立外围武装，改造不宜过急。”

关于这次湖区之行，任质斌回忆道：“我与先念同志曾到天汉湖区去了一次，接见了杨经曲等。”“在接见杨经曲时，我们和湖区的同志布置，要求在当地组织一支坚强的水军，可以两栖作战，这件事后来也没有抓紧，没有完成好。如果当时能有一支真正的水军，那以后就好办了。”“这是我在中原八年中唯一一次到天汉湖区。那时湖区荒凉的景象至今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杨经曲率汉阳伪军一个旅加一个团共 1500 余人反正，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诱降阴谋，动摇了边区周围的伪军，造成重大的政治影响。当时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和国民党中央社都曾作了专题报道。李先念在总结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时，也称此是“震动豫鄂边的壮举”。



红色涨渡湖

涨渡湖位于长江中游北岸，西距汉口约 40 公里，东距黄州约 30 公里。据史料证实，在远古时涨渡湖曾是古云梦泽的边缘部分，一派水乡泽国，每逢涨水季节，江、河、湖浑然一片，横无际涯。涨渡湖境内有举水、倒水、沙河三条河流，均发源于鄂东北山区，从北向南流入长江，襟带丘陵、平原和湖区，河湖港汊相连，芦苇丛生，菱藕藏盛，水鸟群居，经济、地理条件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时期，由黄冈中心县委在武汉近郊领导创立的涨渡湖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第五师东进的战略基地和转战南北的桥头堡，为实现从东边对武汉进行战略包围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集结地和渡江地段，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李先念来到余家楼

1941 年 9 月，新四军第五师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策应华东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反击国民党顽军桂系的进攻，同时保卫和加强战略包围武汉的东线阵地，组织主力部队分三批东进鄂皖边。第一批由第十四旅政治委员张体学和第四十二团团团长熊桐柏率领，于 9 月先行；第二批由第十四旅旅长吴林焕、副旅长熊作芳率领，在 10 月跟进；第三批则是李先念师长亲率第十三旅、特务旅，于 1942 年 1 月挺进鄂东、鄂皖边。3 月初，在完成预期战斗目标后，李先念师长率部返回大悟山途经黄冈，来到涨渡湖抗日民主根据地，视察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并在余家楼看望当地干部和群众。

接到李先念师长将率部途经涨渡湖并视察黄冈县的消息后，县财政科

长李仲华便发动各区乡财粮干部迅速投入到筹集工作中去，着手准备大部队到来之后的后勤供应问题。一天，县长孙侠夫找到李仲华，问道：“现在，你手上有多少钱？”

“我手上有没有钱，你还不清楚？”

李仲华知道孙侠夫是明知故问，想知道想出了办法没有。

“莫急，急不来。说起来我是县政府管钱的，其实我手上总是没钱。但是到时候总还是过去了。做的就是为难的事，我已习惯了。”

由于主力部队大规模东进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从涨渡湖来往的部队特别多，有十三旅和特务旅，好几千人呢。下面的钱款还没有收上来时，部队负责后勤的同志找李仲华提款，情急之下，只有先批条子，让他们拿着条子自己去找区乡或税所、税卡取款。部队走后，下面单位凭收据到县财政结算。平时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可这一次是提前得到师长要来的消息，李仲华等分头同各区乡、各税所、税卡打招呼，要求暂停一切开支，将现金封存，随时听候调拨。

就在孙侠夫和李仲华谈论钱粮筹措的时候，忽然大门被推开，七八个身穿国民党军服的人闯了进来，为首的30来岁，一身军装整齐得体，目光炯炯有神，举止稳健潇洒，一派大将风度。孙侠夫和李仲华见状，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道来人是谁，半天没作声，也不知如何是好。孙侠夫对李仲华使了个眼色，自己起身上前去迎接客人。李仲华心领神会，趁机想溜。来人问道：“你是孙侠夫吗？”这让他很吃惊，不由得停下脚步。对方接着又说：“不



涨渡湖抗日根据地纪念碑



认识我吗？对不起，我们是不请自到啰。”旁边有人介绍道：“这就是我们的李师长呀！”这一下，孙侠夫又惊又喜，李仲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转身进屋。

气氛马上活跃起来，随行人员帮助招呼，李仲华喊来了县委在家人员，李先念叫大家一一坐下。他首先代表边区其他领导同志向黄冈中心县委的同志们表示问候，然后仔细询问了春节前后当地的工作情况，表扬大家过节不放松警惕，仍在日伪顽夹击下坚持斗争的精神。李先念对武汉近郊有涨渡湖这块抗日根据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还告诉大家部队已进驻在王伏六、大屋围、破月一带。他还风趣地说：“我们刚到，第一个任务就是拜访你们‘地头蛇’啊！”引得哄堂大笑。

谈了一阵，李先念等起身要走，孙侠夫恳切挽留吃完饭再走。李先念见他们情深意切，便说：“吃饭可以。不过，光我们这几个人可不够啊。”孙侠夫疑惑不解，连忙问还有谁。李先念笑着说：“这样吧，今天你们先忙着，我也有事。这顿饭，我们明天来吃。你们可得准备二三十人啰。”孙侠夫这才高兴地连声说：“欢迎，欢迎！”第2天，李先念带周志坚、何耀榜、夏世厚等近30人到余家楼，这个6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就像过年一样热闹起来，到处都是拥军爱民的热烈气氛。这一次，李先念在与大家交谈中对国民党顽固派保安八团的活动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消灭保八团的作战计划也在他的脑海酝酿着。

过了不久，果然传来了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夜袭保安八团、歼敌70余人的胜利消息。随后，又捷报频传：李先念师长指挥抗日军民在麻城乘马岗反击在程汝怀指使下搞反共摩擦的保安一旅，歼其大部；第五师部队在蕲（春）黄（梅）广（济）歼灭国民党顽固派第五战区第二纵队的一个团。余家楼的抗日军民欢欣鼓舞，从此，原经常骚扰涨渡湖根据地的保安八团、黄雨亭部、广西军第一七二师都龟缩山里，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活动了，涨渡湖抗日根据地日益得到巩固和发展。

陈少敏施政斗湖霸

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在1942年、1943年间，先后几次来到涨渡湖区，领导当地干部贯彻执行《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开展“反湖霸”的斗争。

1942年3月22日，豫鄂边区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豫鄂边区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是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边区具体情况制定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共分二十五条，对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行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方面政策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第十七条规定：“举办土地登记，实行减租减息，取缔私人征收的湖课河课，免除湖赋河赋。”

1942年11月，陈少敏带工作组和一个警卫排来到涨渡湖区，检查是否做到“取缔私人征收的湖课河课，免除湖赋河赋”，指导黄冈县委开展“反湖霸”斗争。当时，她就住在安仁湖边的谷家咀村汪新亚家。

在涨渡湖区根据地，已建立县、乡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第五师、第五师第四军分区和边区的后勤部门，如医院、文化、教育等单位机关，也设在湖区。广大渔民支援抗日的政治热情和发展生产的激情都空前高涨，滨湖咀、莲湖畈、王家坊都是稳固的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开展并不充分。湖主恶霸欺压剥削渔民的旧制度仍然未改，湖区的管理仍掌握在少数的“湖霸”手中。有的湖霸占有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天然产鱼湖泊，还打着幌子说是“取赋办渔”“严禁官湖”，加重对渔民的盘剥。而广大渔民未经湖霸许可，不得下湖捕鱼，否则会受到酷刑和重罚，甚至毁船、焚网。湖霸的这些行径无异于公开抵制《豫鄂边区施政纲领》的贯彻执行。

陈少敏了解情况后，通过黄冈中心县委组织渔民群众，宣讲“施政纲领”，宣传行署的“法规”“条例”，湖产归公等，制定保护措施。在安仁湖，依靠穷苦渔民，组织渔民协会，发动大家揭发湖主恶霸欺压剥削渔民的罪行。群众发动起来后，严厉要求惩办作恶多端的恶霸湖主汪小丹，吓得他连夜



逃跑。于是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安仁湖湖权归渔民协会所有，渔民自行决定开湖日期，组织开湖捕鱼，废除“湖课”。

在陶家大湖，渔民们要求12月初开湖捕鱼，但湖主恶霸在幕后进行干涉，在渔民中间制造纠纷，甚至准备挑起械斗。陈少敏在听汇报时拍着桌子说：“湖霸好大的胆子，完全不把抗日民主政府放在眼里。”于是组织渔民去宣传，新四军抗日政府宣布所有湖区一律属于公产，属于民主政府所有，新四军支持渔民有组织进行打鱼。陈少敏命令警卫排保护渔民安全捕捞，他们把机枪架在船头上，在湖中巡逻，严厉打击了湖霸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渔民的安全捕捞秩序。

回到白果树湾后，陈少敏与边区党委同志研究，认为边区湖泊多、渔民多，对湖区管理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必须制定规定、办法。同年底，豫鄂边区行政公署根据广大渔民的愿望，成立了黄冈湖业管理局，直属边区行署领导，局长、副局长由边区党委任命，日常事务由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和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代管。湖管局成立后，张翼任局长，漆先庭任副局长。1个月后，张翼调走，漆先庭接任局长，直至抗战胜利。

黄冈湖业管理局管理范围东到黄草湖、青草湖、白滩湖，南包括江南梁子湖工委活动范围内的湖泊，西含陶家大湖、庞湖、西滩湖，北至曹家湖、西连湖、格子湖等广大湖面。湖业管理局成立后，根据《豫鄂边区施政纲领》中关于“取缔私人征收湖课”的规定，召集渔民开会，张贴告示，宣布废除各种旧的湖规，合理规定湖主与渔民的分成比例。此举得到了渔民的支持与拥护，多数湖主也遵章执行，但也有些渔霸拒不执行民主政府的规定。对此，湖业管理局进行了坚决打击。

涨渡湖湖区湖泊众多，鲜鱼产量很高，有“开湖腥三县”之称。但是大小湖霸霸占着所有的水面，春夏征收水课，秋冬禁止渔民打鱼，独享渔利，渔民们极为不满。陈元卿是涨渡湖的一大湖霸，湖管局第1次派工作人员找他交涉，他根本不理睬。第2次派一名科长去又碰了钉子，在回来的路上还险遭毒手。在陈元卿的淫威之下，涨渡湖的渔民不敢与湖管局的工作人员接近，湖管局的工作无法开展。

边区党委指令：由漆先庭亲自带人去涨渡湖搞试点，必须打赢“反湖霸”这一仗。当时湖区的渔业也分很多种，有脚坑业、钩业、网业等，每一行业都有分会，都有一帮人马。其中，脚坑业是渔业中最穷最苦的一行，干这一行的渔民没有捕鱼工具，他们在数九寒天赤身下水，靠身体的暖气诱鱼捕捉。漆先庭到涨渡湖后，并没有直接去找陈元卿，而是先到一户做“脚坑业”的渔民家里住下来。几天后，他把做“脚坑业”的渔民召集起来，再通过他们串连从事“钩业”的渔民，通过与各分会业主交朋友、讲政策，涨渡湖 300 多户渔民终于发动起来了。广大渔民兄弟听说有政府和新四军撑腰，个个摩拳擦掌，要漆先庭带领他们去找陈元卿谈判。

趁着这股热劲，漆先庭带领几百号渔民来到陈元卿家中。陈元卿见这么多的渔民把自己家围得水泄不通，已先自胆怯。发现新成立的湖管局长就是汉留会的“漆大爷”时，更是惊吓不小。

漆先庭在堂屋坐下，茶不喝，烟不抽，严肃地说：“我今天是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到你这里搞工作，前几次的事暂不谈，现在渔民向政府控告你，说你不遵守法令，要找你打官司，今天双方都在，我看就在这里把事情搞清楚。”陈元卿正要开口，渔民们就抢着控诉他的种种剥削行为，一个个性愤填膺，像溃口的洪水，把多年来积压在心里的怨气一股脑儿倾泻出来。众怒之下，陈元卿硬不起来了，只得乖乖答应渔民的要求。

涨渡湖开湖了，局面也随之打开了。在漆先庭的领导下，湖管局免除了从事“脚坑业”和“钩业”渔民的渔业税，并通知所有湖主，一律不得向“脚坑业”渔民提成。渔民对此感激不已，与湖管局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渔民们只要看见抗日民主政府的税船下湖，总要挑最好的鱼丢到税船上，工作人员不能随便收穷苦渔民的物品，渔民们就说：“这不是交税，是慰劳新四军的，祝新四军年年有鱼（余）！”

协调好湖主与渔民的关系后，漆先庭把工作重心转到发展生产上。1943 年春，湖管局按照生产种类和自然条件，组织渔民成立 33 个渔业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渔民超过 10000 人。在湖管局的领导下，渔业合作社组织渔民新挖鱼池 37 个，孵化鱼苗 76 万尾，分发各湖投放。此外，还指



导渔民将 10 万尾鱼苗投放到农村集镇附近的水塘和新开鱼池中，用（芝）麻饼、谷糠和牛羊粪作饲料喂养，使当年 5 月投放的鱼苗到 10 月就长到 1 斤多重；同时还发动渔民种莲藕 1800 余亩。入秋以后，湖管局又组织资金，贷放给渔民购置船、网，为他们合理划定捕鱼场所，解决生产困难。

同年冬，陈少敏又深入湖区，受到漆先庭等热情欢迎。在陈少敏的指导下，漆先庭领导黄冈、广济、黄梅、鄂城等沿江湖区渔民掀起反湖霸斗争的高潮，最终实现了湖产归公，取消一切湖霸的规定，大大促进了湖区的生产发展。

涨渡湖区无政府状态就此结束，各方面的关系完全理顺。之后，湖北管理局逐步在渔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同时，指导各党支部组建渔业协会、船业工会，把渔船按战时体制进行编组，对渔民进行战备演练，平时渔民下湖作业，战时自动为抗日队伍和党组织服务，帮助抗日队伍袭击敌人和迅速撤退，在湖区开展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在黄冈湖区，一有枪响，便有渔民驾船赶来接应新四军，这项工作被新四军第五师首长称为“一大创举”。

张体学湖区打“红学”

1941 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和第一、第二游击纵队等，共 15000 余人。罗厚福、张体学分任第十四旅旅长、政治委员。

1942 年 9 月，张体学带第四十二团二营在涨渡湖地区活动，常驻站桥、破月、大屋围等村庄。这些村庄紧挨湖边，居民的房屋都构筑在高墩子上。每逢雨季，江河湖水都涨了起来，这些村庄就成了水中星罗棋布的小岛。河湖港汊、沙洲江堤纵横交错，加之芦苇丛生，地形十分复杂，是部队打游击的理想之地。所以，边区的一些机关、学校、银行和部队后勤部门等都曾迁到这里。

这年秋天，正是收割芝麻的时候，张体学率部准备打垮刘集（今刘镇）的反动“红学”。战斗前，张体学给二营指战员作动员报告。当时反动“红学”

确实可恨，他们的头目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卖命，专门与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为敌，干了很多日本人和伪军都干不了的坏事，可以说是十恶不赦了。他们拦截群众支援抗日的粮款，杀害地方党员干部和税收人员，为日伪刺探情报，通风报信，为日军带路，为虎作伥。因此张体学在动员会上明确指出：“打‘红学’就是打日寇，打日本鬼子，就是抗日。”

张体学讲完，旅敌工科长袁益洲介绍了“红学”的组织情况。他说：“‘红学’是日伪政权利用封建迷信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组成的极其反动的会道门组织，是日伪卵翼下专门针对我抗日军民的‘御用工具’。兄弟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配合黄冈指挥部打垮了金台和安义的‘红学’，现在涨渡湖区的地方政府和人民要求我们去打垮刘集的‘红学’。这刘集的‘红学’在其他地方的‘红学’被摧毁后仍不悔悟，反而变本加厉，太猖狂太恶劣了，居然将我们的区委书记、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顾润谦，区委委员童怡生残忍杀害，这个仇是非报不可，不灭‘红学’减不了我心头之恨。”大家听了张体学和袁益洲的讲话后，群情激愤，恨不得马上飞过湖去直奔刘集。

下午5点钟，张体学率全营指战员分乘几十条小木船从莲湖出发，向南横穿涨渡湖，直朝双流地划去。船在汪林靠岸，当地有一堂“红学”，见新四军来了，他们的头目直说好话，解释他们没有反对新四军，也没对抗抗日民主政府，请求莫打他们。新四军在严厉警告他们之后，转身急行军向刘集奔去。

天放亮时，部队到达刘集外围。尖兵班解决掉了一个站哨，却不料被流动哨发现敲起锣来，不一会儿四面八方都响起锣声。张体学命令部队迅速散开，占据有利地形对刘集形成包围之势。

张体学命令1个排埋伏在芝麻地沟边，只见一帮“红学”会众擎着大刀、



新四军第十五旅政委张体学



长矛直扑过来，他们头缠红布，身扎红带，口念符咒，蜂拥而至。新四军一边鸣枪警告，一边喊话。但是，他们根本不听劝告和警告，杀气腾腾，似乎真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把新四军指战员放在眼里。眼看大刀长矛就要向新四军战士砍刺过来，一连长忍无可忍，一声令下：“打！”顿时枪声大作，一下子撂倒了几十个。“红学”会众的队伍瞬间崩溃，一个个抱头鼠窜，四处争相逃命。在殷店附近的一个湾里，新四军击毙了“红学”头目，焚毁叶氏祠堂，让群众看清他们所谓“刀枪不入”的“法术”纯属蒙蔽百姓的骗人把戏。刘集“红学”的老巢就此被捣毁。

战斗结束后，新四军指战员乘船回到滨湖咀休整，从此在涨渡湖根据地不断闹事的“红学”被彻底消灭了，附近据点的日军再也不敢轻易地出来打劫、袭击抗日根据地边沿地带了，涨渡湖根据地更加安全巩固。

鏖兵侏儒山

1941年12月7日至1942年2月4日，在李先念率领下，新四军第五师不失时机发动了侏儒山战役，歼灭伪定国军第一师汪步青部5000余人和日军200余人，开辟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实现了扩大抗日根据地，从西面威逼武汉日伪，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意图。此役为新四军第五师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的一仗，标志着第五师战斗力的空前提高，已从游击战转向多个团队配合的运动战。同时，侏儒山战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有着重要地位。2005年3月，中国军事网站“铁血军事论坛”登载了“我军著名战役作战图”，其中抗日战争时期收录了28个著名战役作战图，将侏儒山战役与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黄桥战役并列，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著名战役之一。

挥师川汉沔

1941年12月初，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发动对英美在太平洋属地的进攻。英美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同时要求“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牵制敌人”。

早在1941年10月，新四军第五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边区实际情况，决定抓住日军兵力空虚、日伪矛盾加深的时机，以相当兵力深入武汉近郊敌后，加紧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地区，进一步作战略展开，扩大我军回旋余地。（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北枕汉水，南临长江，位于长江、汉水交汇的三角地带，为武汉西部屏障。开辟这块地区，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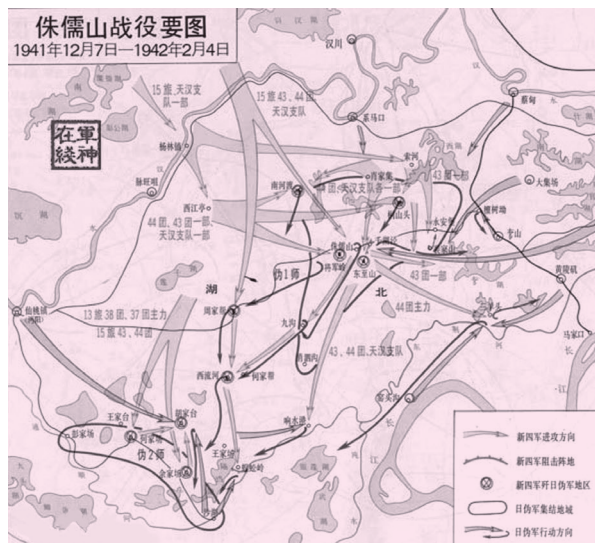


北控汉水，南扼长江，威逼武汉近郊，既能自西直接形成对盘踞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又为下一步向以洪湖老苏区为中心的襄南大发展建立桥头堡。也正因为它战略地位重要，日伪将其作为军事要地，设立了稠密的大小据点，派有伪定国军近万人分驻各地。

负责承担开辟（汉）川汉（阳）沔（阳）任务的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党委决定，派旅政治部主任张执一率第四十四团3个连和1个手枪队赴襄河，深入敌区，全面摸清日伪情况，以便正确选择打击对象、制定作战方案。张执一在1940年策动杨经曲率部起义反正时曾在汉阳活动过一段时间，与当地的党组织、群众有过密切联系，可谓轻车熟路。

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张执一带着便衣队员几乎跑遍了汉阳各据点周围所有的村落，搜集了大量有关日伪军详细部署、工事、武器配备以及内部种种矛盾的材料，还从伪军和统战对象那里获取了襄南的军事地图和伪第一师发给各团在10天内使用的军事口令，顺利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调查结果表明，日军在（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驻兵不多，主要依靠伪定国军守备。伪定国军军长刘国钧，其军部盘踞在沔阳的沙湖，下辖2个师和1个直属教导团。伪第一师汪步青部拥有3个团、1个机炮营和1

个教导大队，共5000人，盘踞在汉阳侏儒山、桐山头、永安堡、消泗沟、九沟和汉川南河渡一带，并设有兵工厂，为伪军中实力最大者。伪第二师李太平部盘踞在沔阳沙湖、彭家场一带。此外，还有小股伪军熊剑东、王维哲等部，皆二三百人，盘踞在汉川系马口和汉阳黄陵矶、蔡甸、



侏儒山战役要图

大集场等地。

在日伪内部，伪军间互相排斥，常常以种种借口在日军面前互相攻击对方。日军对伪军既利用又限制，且相互猜忌——日军担心伪军反正“祸起萧墙”，伪军害怕日军“过河拆桥”，于是双方各怀鬼胎，都有防备，日伪间矛盾颇深。当时，汉阳一带传言，汪步青为了扩大部队，准备把当地18岁到40岁的青壮年全部捉去与日军换枪械，使已被日伪压榨得喘不过气来的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惶惶不安，反日伪、反汪呼声日益高涨。

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先集中兵力进攻长沙，后又转攻郑州，并不断抽兵南调，致使武汉外围各据点守备减弱。李先念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川汉沔地区的日伪军情况和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果断作出决策，决定抓住战机，进一步作战略展开，立即部署主力部队南下（汉）川汉（阳）沔（阳），发动侏儒山战役，扩大新的敌后根据地，彻底粉碎日伪的大“扫荡”，实现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态势。

四战侏儒山

张执一奉命到汉阳后，领导当地党组织对汪步青部开展群众性政治攻势。首先通过地方士绅带信给汪步青，敦促其反正抗日，并向他提出，只要他能脱离日军，不再认贼作父，残害同胞，新四军可以既往不咎。然而，汪步青坚持其反动立场，一面敷衍说什么他们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曲线救国”，一面采取措施赶修工事，准备对抗新四军。在劝诫汪步青的同时，张执一还发动伪军家属和与伪军有亲戚关系的群众，向伪军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他们到处散发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新四军打击日伪的战绩，警告伪军识时务，不要给敌人当炮灰，赶紧行动起来，拖枪反正。

强大的攻心战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驻裴家山的伪军新兵队听到宣传后，托人向中共组织打听：“新四军来了我们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最好是拖枪跑，万一跑不了，伪军官威逼你们抵抗新四军时，就朝天打枪，并在枪上拴块白布条，听候缴枪，这样可以避免被新四军打死。”后



来在战斗中，新兵队的大多数人果然这样照办了。就这样，伪军从上到下，个个惶恐不安，那些被迫当兵的开始三五成群地携械投向新四军。

曾挨过新四军铁拳的汪步青听到新四军第五师要打侏儒山的风声，一面向在武汉的日军呼救，一面强迫群众日夜放哨，规定一旦发现情况，白天鸣锣，晚上点火，立即向据点告急。如有发现情况不报者，杀！第五师获悉这一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组织群众天天晚上点火告急，搞得伪军一夜数惊，疲惫不堪。这样接连闹了几天，据点里的伪军开始有些麻痹了。

12月7日深夜，新四军部队冒着刺骨的北风，兵分两路，由熟悉伪军情况的便衣队员带领，一支前往南河渡打援，一支直插侏儒山东南的伪第三团团部，成功获取伪军口令，顺利通过3道岗哨，一举将第三团部及特务连、卫士连歼灭，伪军团长汪波扬连姨太太也顾不得带走，赤身逃脱。完成奇袭任务后，新四军参战部队迅速撤出战斗，侏儒山战役正式打响。

8日，系马口、蔡甸、大集场日军200余人分3路向新四军进攻，敌人刚出动，群众就送来了信。接到报告后，新四军立即安全转移了。首战侏儒山告捷，俘伪三团军需主任以下官兵1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驳壳枪7支、步枪100余支。新四军无一伤亡。

12月23日，新四军第五师第2次向侏儒山发起进攻。第十五旅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全部及天汉支队1个大队，由天汉湖区出发，经过杨林沟过襄河，分别到汉阳的索河及汉川的西江亭附近集结。次日拂晓，分2路同时向侏儒山、南河渡、桐山头进击。第四十四团一举攻占侏儒山南面的将军岭，乘胜向坝上发展，全歼伪机炮营。第四十三团以一部兵力进攻桐山头，俘获伪军1个连；以另一部兵力进攻裴家山，击溃伪新兵连。南河渡守军1个排在天汉支队的攻击下，携械反正。后因蔡甸、黄陵矶和大集场日军在麦山会合向新四军出扰，攻击侧翼，企图截断第四十三团第一营归路，于是第五师主力撤出战斗。

遭到新四军五师2次打击后，汪步青部随即收缩战线，撤出南河渡、桐山头据点，仅在永安堡驻有新兵队及后方机关一部，将主力集结于九沟至周家帮一线。

1942年1月7日，新四军第五师向侏儒山发起第3次进攻。第十五旅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及天汉支队全部投入战斗，分2路进逼侏儒山、周家帮。第四十四团顺利占领侏儒山，突破九沟一带工事，迫使守敌纷纷向何家帮、西流河逃窜。第四十三团和天汉支队则猛攻驻守周家帮的伪军第一师一部，经西流河向王家场、余家场一线追击。两股伪军乱成一团，争相夺路逃命，被新四军追击部队拦腰截击，歼灭1个主力营。

1月10日，驻沙湖的伪定国军军长刘国钧率教导团及第二师李太平部1000余人，配合日军一部，分3路向西流河以南之蜈蚣岭第四十三团阵地进犯。新四军指战员隐蔽于河堤下，当日伪军进至阵地前200米时，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杀伤部分敌人，两翼敌军溃退，中路日军10余人仍在顽抗，第四十三团第一营乘机反冲锋，以刺刀与日军展开肉搏，将其全部消灭。此战，第四十三团俘获伪军官兵400余人，毙伤日军20余人，夺取汪步青部九沟兵工厂，获步枪、轻重机枪40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侏儒山战役被俘的伪军

汪步青在遭连续打击后，再不敢轻易回侏儒山老巢，只得在汉沔交界地区收容残部，企图东山再起。日军则从沔阳各个据点拼凑兵力，加强沙湖据点。驻天（门）潜（江）沔（阳）的国民党军第一二八师在新四军第五师同日伪作战时袖手旁观，并乘机扩大地盘，进至彭家场附近。为避免



遭日伪顽夹击，第五师遂将主力撤回天汉湖区，留第四十四团一部坚持川汉沔，待机歼敌。

1月中旬，第五师第十五旅集中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及天汉支队全部，对汪步青残部进行全线出击。在追击的过程中，打退了企图抢占三羊头阵地和进攻侏儒山的日军，并在东江垸、三羊头、窑头沟等地搜取藏于水下的伪军兵工厂设备，获机床10余台、马达2部、步枪枪身2000余条、机枪枪身50余条。为迅速彻底解决战斗，第十三旅一部由旅长周志坚、政治委员方正平率领赶来参战。28日，第三十七团2个营、第三十八团全部与第十五旅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团配合，分2路向沔阳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猛烈进攻，汪步青伪军残部一触即溃，又被歼1500余人。汪步青仅率亲信数10人夺命逃窜，其伪军势力土崩瓦解。

歼灭伪军第一师后，新四军第五师部队直逼武汉近郊，日军极为震惊，迅速集结邻近据点兵力，企图将新四军挤出川汉沔。2月2日，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团各一部宿营于沔阳彭家场东北之安家台一带。当天下午，仙桃镇100余名日军、50余名伪军来犯，占领了安家台东北的胡家台。晚上，第十三旅部署以第三十七团第五连和第三十八团第九连沿河正面攻击，以第三十八团一连、重机枪连过河迂回至胡家台侧后进行阻击。

最后日军主力占据胡家台1个大祠堂及附近民房，负隅顽抗。第十三旅指战员在漆黑中摸到祠堂附近，战斗随即打响。日军以猛烈火力阻击，第五师部队则迂回过河，隔河向祠堂射击。第三十八团第九连一部在猛烈攻势掩护下突然冲进祠堂，和敌人缠斗在一起，双方均伤亡很大。第五师部队退出祠堂后，集中力量对民房中的日军予以逐一歼灭，使祠堂内的日军陷入孤立，新四军战士奋不顾身爬上祠堂屋顶，向祠堂内射击、投弹，进行火攻，予敌以重大杀伤。

3日上午，驻沙湖日军数十人前来增援，被第四十四团击退。4日拂晓，驻汉川日军100余人在3架飞机掩护下前来解救被围残敌，第五师部队随即撤出战斗。

胡家台战斗，新四军指战员与日军经数次肉搏，迫使日军龟缩祠堂内

困守待援，被打死、烧死近 200 人，邻近各据点的日军再也不敢贸然越雷池一步。至此，新四军第五师发起的侏儒山战役胜利结束。

壮哉，朱立文！

今天，在汉阳索子河畔、柏子山麓，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烈士碑，碑文正中刻有“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安息在这绿水青山中的烈士就是在侏儒山战役中牺牲的朱立文。朱立文是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军事指挥员。

1938 年，朱立文于延安抗大毕业后，到河南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任副参谋长。1939 年 1 月，朱立文随李先念南下鄂中，先后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三团参谋长，第五团参谋长、副团长，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副旅长兼第四十三团团长和政委，在开辟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过程中，屡建奇功，战绩卓著。

1940 年 10 月，驻湖北京山三阳店的日军步骑兵约 1000 人，于深夜沿宋河公路南下，中途突然转向坪坝，向坪坝发动进攻。清晨，在坪坝整训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六团得到情报，正在吃饭的团长朱立文立即放下筷子，和参谋长杨子仿研究部署，向各营下达伏击作战命令。

伏击圈设在坪坝东南的崔家冲，从宋河到安陆的公路穿过这里，是敌人必经之地。这里丘峦纵横，树林茂密，朱立文带着全团战士就隐蔽在密林之中。上午 8 时左右，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圈，朱立文指挥部队，集中火力，打得敌人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这次战斗，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和 10 余匹战马，彻底挫败了敌人重占坪坝的企图，保障了白兆山南方门户的安全，使挺进纵队与大山头及其他根据地的交通联系畅通。

12 月，为牵制日军西进，豫鄂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在京山小花岭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襄（河）西指挥部，开辟襄西荆（门）当（阳）远（安）抗日根据地，令朱立文率部西渡汉水。襄西地处宜昌战役的前线，日伪据点林立，形势十分复杂。1941 年 1 月，襄西指挥部成立，朱立文兼任指挥长，统一指挥第六团队和毛凯、曹玉清率领的襄西独立团以及刘宝田领导的荆



当大队，负责开辟襄西新区的任务。

在日军不断“扫荡”的情况下，朱立文率部经常往返荆（门）沙（市）公路两侧连续作战，在日伪据点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根据地的发展，而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一次驻汉宜公路、襄沙公路、荆沙公路沿线各据点的日伪军分头出动，对新四军进行大“扫荡”，情况异常严峻。当部队从路东转移到路西四平山、香炉山、周家集的行军途中，朱立文患了重病，管理员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而他坚决拒绝，坚持同战士们一道走路行军，直到体力不支，倒卧路旁。

1941年4月，国民党顽军以2个师的兵力向香炉山、高庙一带根据地进犯，时任第五师第十五旅副旅长兼第四十三团团长和政委的朱立文率部与顽军作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子弹从右前胸直穿后背，血流如注，浑身红透，伤势严重，仍坚持在弹火纷飞中指挥战斗，不下火线，也不肯包扎。卫生队长钟华眼看他流血过多，有生命危险，急得不知所措，派人将其强行抬走。朱立文这种坚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给部队以深刻的教育和影响。部队在他的带领下，先后消灭了周赞庭、左墨香2大股伪顽武装，追击周老八，奔袭半月山，东讨西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大小几十次战斗，终于打开了襄西的局面，为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撤出香炉山战斗的那个雨雪交加的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在崎岖的山地、泥泞不堪的道路上摸索着，滑倒了，爬起来，又跌倒，整整一夜只走了5里路。这种情况下没有马该有多么困难。团政治处主任蒋立由于眼睛近视，加之在一次战斗中马被打死了，因此在路上不断地摔跤，朱立文坚决把自己心爱的小川马让给他，而自己坚持和战士一道徒步行军。

在开辟襄西抗日根据地初期，部队在日伪据点的夹缝中生存，区域狭小，战斗频繁，经济财源极端困难，部队常常没有饭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在这严峻的情况下，朱立文毅然决然地卖掉了自己的战马，把所换来的款全部用来为战士们买粮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侏儒山战役的第2次战斗中，朱立文率第四十三团2个营、天汉支队1个独立连及团部通讯班，攻打侏儒山东南的桐山头 and 永安堡，配合主攻部队围歼敌人。朱立文令一营（缺一连）、二营攻打桐山头，得手后从西南方夹击永安堡附近的伪军据点裴家山。朱立文与一连连长刘嗣坤带领部队很快打下了永安堡，接着攻打裴家山，并令天汉支队独立连守住九真山隘口要道。战斗从10时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因一、二营打下桐山头后向裴家山进军的途中遭日军阻击，不能前来夹击，朱立文率部独攻，久攻不克。

此时，黄陵矶、大集场等据点的日军增援裴家山，其中寥山的一部从侧面向我进攻，企图切断第四十三团的退路，天汉独立连也因日军猛烈进攻而撤退。九真山隘口要道丢失，敌人从山上向一连压下来，裴家山据点的敌人也冲了出来，一连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急。朱立文见状大喝一声：“共产党员跟我上！”抱起机枪带头向九真山隘口冲去，很快打退了从山上下来的日军，并乘胜追击，杀开一条血路，占领了山口要道。朱立文令通讯班随自己留下掩护一连撤了下去，然后才带通讯班在合贤集追上一连。两军会合后西撤到铁李甲湾，此时已是下午5时。

朱立文令部队在此造饭，当战士们正吃饭时，日军又从合贤集方向追了过来。朱立文命令部队以铁李甲湾为依托，准备在此阻止日军至天黑再突围。铁李甲湾地处合贤集西2公里，从合贤集到铁李甲湾是一片开阔的稻田，中间还有一条从南流向北的五六米宽的小港，南边是九真山，北边和西边是索子长河。当部队布置停当，日军正在过小溪，朱立文准备下令射击的关键时刻，忽然，从村中来了十几个70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向朱立文下跪说：“求求您，千万不要在我们村里打仗，只要枪声一响，我们全村几百人就全完了。”朱立文赶忙扶起老人。他想，在铁李甲湾进行阻击，坚持到天黑再渡索子长河突围是没



朱立文



有问题的，但在村子里打阻击战，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确实会受到损害。

在这生死关头，朱立文毅然以人民利益为重，下令向索子长河撤退。此时，身后2公里处，除了茫茫长河外，已无任何屏障和有利地形，朱立文命令指导员李毅和马焰带2个排过河，自己和刘嗣坤带1个排及通讯班在岸边掩护。当李毅带的2个排靠仅有的1条船渡过索子长河时，日军已经逼近，朱立文带领的阻击部队已无法过河了，只好沿索子长河向下游退去，退到麻雀岭处，已无退路了。

麻雀岭三面环水，形如岛屿，仅南面有1条路通河上游，而敌军正从南面扑来。这里只有1条放鸭子的小船，朱立文令刘嗣坤带全排战士藏于麻雀岭的芦苇丛中，自己带通讯班仅存的几个战士在1条小船上向敌人射击，吸引敌人，并向河对岸划去，刘嗣坤带的1个排得救了，但朱立文和通讯班的战士则全部壮烈牺牲。

朱立文牺牲时年仅32岁，其生命虽短暂，但璀璨绚丽，闪烁着时代的光辉。他的一生，功勋卓著，彪炳史册，为共产党人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金水河畔抗日英雄逞英豪

金水河，蜿蜒百里，汇集宋家河、汀泗桥、金水等河港，连接西凉湖、斧头湖的出口，流经蒲圻、嘉鱼、咸宁等县，从武昌县的金口注入长江。在抗日战争时期，金水河以其便利的交通，成为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条重要地下交通线，在护送干部、传递文件和情报、运送武器和物资，以及沟通豫鄂边区和湘鄂赣边区的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金水河畔交通线成为战略包围武汉布局中的一枚活跃棋子，被誉为“掐不断的地下交通线”。

建立金水地下交通线

武汉沦陷后，鄂南各地相继沦入敌手，形势急剧恶化。1939年夏季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在武汉外围地区制造反共摩擦，特别是在鄂南。5月，活动在武昌县五里界、流芳岭和汤逊湖一带，由共产党领导的樊湖大队，在覃公庙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梅花团袭击，损失3个中队。6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中共湘鄂赣特委被破坏，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与之失去联系。7月，国民党方步舟部在武昌县法泗洲又袭击了700余人的梁湖大队，使整个鄂南的抗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随后，日军在鄂南占领区以交通要津为据点的网络已经形成，国民党的一些杂牌武装纷纷投敌，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处境十分危险。根据豫鄂边区党委指示，鄂南党组织的当务之急，就是求得在敌人的夹缝之中生存下去，建立交通网络，坚持开展抗日活动，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

1939年11月，豫鄂边区党委指示鄂南党组织设法建立一条贯通大江南北、连接鄂豫边区和湘鄂赣边区的交通线，以便于应付突然事变，保存



抗日力量，准备新的斗争。根据这一指示精神，通山中心县委书记李平等研究决定，派共产党员张曙光、王源到武昌法泗洲筹建金水流域交通线，并将法泗洲作为金水交通线的活动中心。

接受任务后，张曙光当即将全家人从土地堂青山嘴搬到了金水河畔的法泗洲，与王源等人一起，以搞湖莲为名，串联船民，发展党员，建立中共水上支部。不久，又与活动在这里的中共党员祁曙东接上关系，让祁曙东在法泗街上以开商店为掩护，对外称“杨泗老板”，建立交通站。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巩固交通站，他们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物色人才，发展组织，壮大力量，先后发展了 50 余名共产党员，建立了港尖、桂山、菱米、船工、赤矾山、大新埠等 11 个党支部，同时设立了 12 个联络站。1940 年 2 月，中共金水工作委员会（简称金水工委）成立，张曙光任书记，祁曙东任组织委员，王源任宣传委员。金水工委的建立，加强了对交通线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使金水流域一度成为党在鄂南的活动中心。

运枪姑娘

梁湖大队遭遇严重挫折解散后，李平将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 1 挺机枪和 2 支手枪交给张曙光和王源，嘱咐他们把枪带回家藏好，以备过段时间后再拉起队伍来打游击。不久，鄂南党组织决定张曙光由青山嘴搬到法泗洲，组建交通站，要求他将 2 支手枪一同带过去。张曙光和夫人商量，把破烂的家什装了满满 2 箩筐，又把衣物捆了几大包。要搬走的东西都装好了，只有那 2 支手枪不好办。张曙光本来打算放进罐子，觉得不安全，带在身上又怕敌人检查时搜身。为了把枪藏好成功带出去，夫妻二人绞尽脑汁。

正在这时，门口闪过 10 岁的小女儿润英的身影，张曙光一拍脑袋，高兴地招手叫道：“润英，你快进来。”小润英走进房间，张曙光举起手里的手枪在姑娘面前晃一晃，问她：“润英，你看这是什么？”润英回答：“是打敌人的手枪。”张曙光拉过女儿的手说：“对！这枪是游击队的叔叔拿性命换来的，那边的叔叔打鬼子等着要。把它放在你的棉袄里，可不能让鬼子发现，路上听你妈妈的话。”小润英懂事地点点头。

辞别了左邻右舍，张曙光一家出发了。他挑着锅碗瓢盆走在前头，大儿子担着一担箩筐跟着，润英牵着妈妈的手走在最后面。经过第一道岗哨，张曙光回过头提醒大家：“前面就是敌人的驻点，都要沉住气，莫慌张。”刚刚走到哨口，伪军就把枪一横，蛮横喝道：“站住！干什么？”张曙光迎上去，笑着回答：“回老家去。”“有良民证吗？”伪军问道。张曙光连忙从口袋掏出“良民证”，趁机会递上一根烟，连声说：“有的有的，请你过目。”伪军接过烟，语气缓和不少，装模作样地检查证件。在一旁的润英镇定自若，四处摘野花玩。伪军见她是一个10岁的小姑娘，压根都没有放在心上。润英手捧一把野花，边玩边向前走，就这样顺利闯过了哨卡。

机智的润英跟随着爸爸妈妈，大胆沉着地一路闯关，经过了仙人桥、土地堂、马鞍山等日伪哨卡，安全抵达法泗洲。到了家里，关上房门，张曙光夫妇连忙从润英的小棉袄中把2支手枪取了出来。枪是贴肉放的，小润英稚嫩的皮肤被擦破了，妈妈看着女儿身上的伤痕，心疼得流下了眼泪，一把将小润英抱进怀中。

手枪运到了，机枪还在青山嘴。为了把机枪安全运到法泗洲，金水地下党的同志专门作了研究，考虑到机枪目标大，决定采取夜运的办法。一天晚上，张曙光和黄全德、王源等5位同志一起回到青山嘴埋机枪的地方，他们挖了一大片，也没有找到枪的影子，急出一身汗。几个人紧张得不得了，担心枪被敌人弄走了。夜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隐蔽，又不敢点火，只能边挖边摸，最后终于找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把枪拆散，一人带一部分，连夜赶回法泗洲，把枪妥善包好后埋进粪堆里。

几个月后，鄂南党组织决定将张曙光的家从法泗洲搬到咸宁宝塔洲，要求他把这挺机枪也运过去。为了运枪，张曙光干脆买了一条破木船，把机枪装在舱里，上面再钉上一层木板，然后再铺上一层灰粪，由他的儿子撑船，从法泗洲经斧头湖到宝塔洲。每过一个岗哨，张曙光总是让儿子主动将船撑到哨兵面前，摆出一副积极配合检查的样子。日伪哨兵一看，一船灰粪，觉得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一摆手直接放行。

就这样，张曙光想方设法运送的枪支，最终成为了鄂南抗日挺进队“起



家的宝贝”。

歼敌汤逊湖

1941年9月，鄂南中心县委书记李平和委员雷同、刘光前等率新四军第五师鄂南独立五团一部，顺利插进武汉近郊，来到位于武昌县汤逊湖的庙山。庙山是湖上的一座小岛，地势较高，四面环水，站在岛上可以看到日军重兵防守的武汉。李平等率部到达后，派出手枪队员装作砍柴人到山上布岗放哨，其他的人都在渔船里休息。

时近中午，哨兵报告：“有5名伪军划着船向庙山驶来。”雷同果断驾船迎了上去。对方高声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雷同大声回答：“做生意的。”这几名伪军一听，以为有油水可捞，立即把船划过来，当双方距离只剩下2米左右时，埋伏在船上的新四军战士突然跳出来，十几支枪举起，瞄准他们的脑袋。“不许动，我们是新四军，缴枪不杀！”5名伪军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乖乖缴械投降。

傍晚时分，部队从北咀出发，经梁子湖，向保福祠开进。船到麦斗山附近，被伪军发现，要强行搜查，雷同便命令快速划行。伪军官周筱山急忙带着1个班的伪军尾追而来。雷同见来犯之敌人数不多，便起了“顺手牵羊”之意，命令将船靠向位置偏僻的青山嘴，只等着伪军靠近。

不一会儿，周筱山提着手枪站在船首，只见雷同一人在船上抽烟，不由得暴跳如雷，一边叫骂，一边带着手下就往雷同船上攀。趁周筱山立足未稳，雷同将手上的烟头往船舱里一丢，20多个新四军战士手握钢枪冲出船舱，干净利落地缴了他们的枪。

周筱山趁乱跳回小艇，发动船机想溜，被雷同发现飞身追了上去。雷同掐住周筱山的脖子，和他扭打在一起，从船上打到水中。战士们见状纷纷跳入湖水，协助雷同将周筱山擒上船。

太阳落山了，晚霞映红了大半个天空，李平和全体参加战斗的新四军勇士们驾着船，押着俘虏，向保福祠飞驰。湖面上微波荡漾，只剩下那艘无人驾驶的敌船留在原地漂荡。

夺盐船

盐，在今天是随处可见的日用品，想买就能买到，谁也不会拿盐当作稀罕物。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金水河两岸的老百姓想弄到盐却是难上加难，因为当时的食盐全都控制在日军和汉奸手中。

1944年，日军疯狂“围剿”金水河畔的新四军游击队，拼命封锁粮食和食盐，妄图困死根据地的游击队和老百姓。这样一来，盐就成了比金子还金贵的东西，1担谷子仅仅能换到2斤盐，里面还掺杂了水和石膏。许多老百姓因没有盐吃，面部浮肿，脚瘫手软，甚至丧失劳动能力，落得个田地荒芜、无以为生的悲惨境地。

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军分区沿江游击支队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为老百姓搞盐。一天，交通员送来情报，说有30多名日军押运1批盐船，从武汉出发，由于风大，现已停靠在江边。与此同时，皇协军第一师也知道了这一消息，出动了2个连，想蒙面突袭独吞这批盐，发笔横财。沿江支队经研究，当机立断：“虎口夺盐。”政委张曙光决定：法泗洲游击队配合作战，相机消灭敌人；组织号兵班四面埋伏，待机迷惑敌人；便衣队奇袭敌船。战斗打响后，冲锋号四面吹响，便衣队枪声大作，烟雾弥漫。皇协军一时摸不清楚新四军实力，不敢贸然行动，只得落荒而逃；30余日军见势不妙，跳水的跳水，逃跑的逃跑。张曙光率沿江支队抓住时机，迅猛出击，全歼日军，缴获10余条枪和所有食盐。

金水河畔地下交通线在战略包围武汉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英勇的新四军指战员保家卫国，英勇抗击日伪的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流传至今。



深水潜流——沦陷时期的中共汉口市委

1940年春，豫鄂边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对武汉相关情况作系统调查研究，并决定“首先以汉口为主进行城市工作”。同年冬，共产党员刘毓兰（女）等进入武汉，建立汉口支部。1941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陈少敏、李先念：“抓住中心，要把工作放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大城市与生产部门，首先清理汉口之组织，建立短小精干之支部，并选择可靠的同志到汉口另建立新的平行组织。”10月，边区党委任命王锡珍为中共汉口市委书记。随后，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锡珍借名“陈约珥”

王锡珍，1913年出生于湖北均县城关一个破落的士绅家庭。1935年1月，在武汉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在学习期间，王锡珍追求进步，满怀激情和理想抱负，大量阅读马列书籍，关心国家民族存亡大事。

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21日，武汉学生联合行动，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爱国学生。从早到晚，学生们露宿街头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武汉这场示威游行的斗争中，王锡珍始终站在队伍前列，引领学生高呼口号，成为众人瞩目的学生代表。

一二·九运动过后，以武汉中等以上学校为主体的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武汉学联）秘密宣告成立。王锡珍为省一中代表，被选为武汉学联的组训股长。国民政府当局强迫学校惩戒参与游行学生，省一中千方百计要开

除王锡珍等进步学生，引发同学们的强烈不满，集体罢课，终迫使校方暂收回成命，王锡珍等继续返校就读。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王锡珍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他逐步认识到需要有一个组织，应该加入一个组织，有组织才有依靠，从而开始积极向共产党组织靠拢。1936年春，王锡珍参加武汉学联在武昌都府堤18号组织的读书会，并成为该会核心小组成员。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讨论理论、时事问题；秘密油印散发宣传抗日的刊物和传单，书写抗日标语，利用春假下乡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不久，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武汉学联，禁止学生抗日活动。读书会决定由郭仁寿和王曦为代表，赴上海寻找党组织。

1936年5月，郭仁寿和王曦从上海回来，宣布党组织已批准王锡珍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武汉支部。这是自1932年9月中共武汉工委被破坏后武汉恢复重建的第一个党组织，结束了武汉地区中共党组织3年多的空白状态。不幸的是这个刚刚建立的党支部于6月18日又遭到国民党当局破坏，王锡珍因在学校集中接受军训幸免被捕。

1936年夏，何伟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到武汉，着手重建党组织。他在武汉找到党员王锡珍和习东光，成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由何伟任书记，隶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由何伟单线联系。他们找到了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成立了中共武汉临时支部和硚口工人临时支部。1936年底，因何伟在南京被捕，王锡珍与北方局的联系随之中断。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相继失守，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中心。在周恩来及其领导的第三厅影响下，武汉救亡团体空前活跃，救亡报刊异彩纷呈。特别是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在武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湖北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等，抗战救亡大潮在武汉汹涌澎湃。

在抗日救亡浪潮中，王锡珍再次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积极参加歌咏队和宣传队，并担任歌咏队长。中共湖北省工委成立后，安排杨学诚和



王锡珍等领导武昌各中等学校的建党工作，开展青年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至年底就先后在省一中、省师一中、省师、女师、省高中、乡村师范学校等建立了党支部，直接发展了江文、胡克实、尹卜甄、许云、胡韦德、段飏等十多位同志加入党组织。

1937年12月，青年救国团在武汉成立，王锡珍被选为委员兼武昌区团部组训股长，主要负责组织工作。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月底，中共中央长江局发出“猛烈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员”的指示。据此，在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领导下，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党组织得到恢复与重建，武昌区委、硚阳区委、汉口区委先后成立，王锡珍任武昌区委书记。

武昌区委成立时，仅有党员20人，6月即发展至170人，辖裕华纱厂、大成纱厂、民生纱厂、第一纱厂、制呢厂、复兴纱厂、省武昌高级中学、省女师、第二女中、农业专科学校、武昌职业界（含教育界）、武昌医院、第一中学、武昌救护小组、武昌失学学生小组、武昌工人特别支部共16个支部。王锡珍在裕华纱厂以工人识字班教员的名义，培养积极分子，一批批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报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8月，武汉沦陷前夕，武昌区委撤销。

1938年9月，王锡珍拟分配至鄂中特委，在即将前往时，省委又指示其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赴鄂南指导工作。武汉沦陷后，鄂南10县也相继被日寇占领，党的迫切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崇阳，王锡珍等一方面组织群众撤至山里，一方面组织青年积极分子收捡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武器弹药，成立游击中队，由崇阳县委书记王佛炳任中队长，王锡珍任政委。

1939年“平江事件”发生后，鄂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与湘鄂赣特委失去联系，何功伟等决定派王锡珍去江北寻找党组织。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偷渡长江到鄂中，在根据地见到了李先念、陈少敏、陶铸、杨学诚等负责同志，向他们汇报了鄂南工作情况。8月，王锡珍辗转到达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重逢钱瑛、何功伟等。9月，随何功伟等回宜昌，

参加湘鄂西区党委工作。9月11日，钱瑛主持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南方局指示，决定成立中共湘鄂西区党委，钱瑛任书记，蔡书彬任组织部长，何功伟任宣传部长，王锡珍任委员。

1940年2月，钱瑛回南方局，何功伟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王锡珍任湘鄂边特委书记，负责湖南的常德、澧县、南县和湖北的公安县、石首县的工作。为开辟江陵、监利、沔阳地区游击战争，打通与豫鄂边区党委的联系，湘鄂西区党委又任命王锡珍为江陵中心县委书记，负责组建江陵独立营。为此，王锡珍返回江陵，集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三湖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1941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陈少敏、李先念：“抓住中心，要把工作放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大城市与生产部门，首先清理汉口之组织，建立短小精干之支部，并选择可靠的同志到汉口另建立新的平行组织。”10月，豫鄂边区党委任命王锡珍为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回到武汉前，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在根据地同王锡珍谈话，明确了工作任务、组织领导和注意事项等，还特别提醒以新面貌回到武汉，尽量少与过去的关系发生联系。王锡珍在来武汉读书前，曾借用他人之名“陈约珥”，很多人不知道此情，所以此次回武汉他仍决定借用“陈约珥”名，在汉口敌占区坚持战斗。

假夫妻 真感情

刘毓兰，1923年11月出生于湖北咸宁咸安区汀泗桥镇。1938年10月参加革命，1939年2月在鄂南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湘鄂赣边区加紧进行反共摩擦，平江惨案发生，鄂南中心县委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中共中央南方局遂决定将在鄂南已经暴露身份的地方干部撤至江北。

1940年2月，鄂南第一批撤至江北的干部为：何功济（何愚）、何功国（何勋）、何桂仙（何济华）、雷荫民（雷同）和刘毓兰。他们离开咸宁，几经辗转，后到达京山八字门边区党委所在地，被分配在刚组建的新四军豫



鄂挺进纵队第四团工作，不久又一起到边区党校学习。他们5人在一个党支部，何功济任支部书记。4月，党校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政机关从京山县八字门迁到黄陂姚家山。6月，返回八字门，刘毓兰被分配到边区党委组织部巡视团。

同年秋，刘毓兰接受一项特殊使命——潜入敌占城市汉口，开展秘密工作。临行前，陈少敏专门安排组织部门同志找刘毓兰谈话，交代工作步骤、注意事项，并提供先期联络的几名党员的名单。

11月，刘毓兰通过关系弄到了武汉的“良民证”，化装成普通市民，来到汉口，住在何功济的二舅张槐渠家。张槐渠是位商人，为人比较开明，在汉口小夹街经营“瑞隆海味号”。刘毓兰有事找他，总是得到热情支持，可从不过问其身份，心照不宣，偶尔还在经济上接济她。在张家安顿下来后，刘毓兰找到中共党员何功扬（何平）、钱道权，再由他们将王国棋、吕江红等联系上，不久建立了中共支部，刘毓兰任书记。后改为特别支部，刘毓兰继任书记。

党支部建立后，刘毓兰一面在汉口准备找关系建立联络站，一面准备报考中学，取得合法身份以利工作。当时武汉被日本人占领，环境极其险恶，刘毓兰的一举一动都如履薄冰。她先到汉口市第一女子中学，找到招生简章一看，第一要铺保，其他附加条件也繁多，很难被录取。于是，她到汉口圣约瑟女子中学，恰好她的一位远房堂兄在该校任数学教员，她得到帮助与支持，被圣约瑟女中录取。圣约瑟女中是一个教会学校，校规条条框框很多，管理很严格，没有亲属去接，一概不许外出。无奈，刘毓兰只好给何功扬写信，让他冒充哥哥到学校接人。

为建立秘密联络站，刘毓兰通过亲戚和社会关系多方打听，已关注到一个名叫周德盛的中学生。周德盛是咸宁老乡，他的父亲原来是汉口码头趸船上的工人，武汉沦陷后失业了，全家6口人，全没有一个正式工作。刘毓兰通过老乡引见，登门看望周德盛。经过进一步了解，刘毓兰认为他豪爽，热心助人，还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周德盛还有个哥哥叫周德茂，妹妹叫周德贞，也与刘毓兰相处如故，非常融洽。周家家境贫寒，刘毓兰每

次串门，都要想办法予以接济。后来周德茂就把刘毓兰当成自己的妹妹，她所有的来往信件他都直接收发，所有客人他都直接接待。这样，周家成了秘密联络站，周德茂就成了联络站的办事员和联络员。边区来人要搞“良民证”，要安排住处、送出武汉等，都由周德茂去安排、承担。1941年，在刘毓兰的介绍下，周德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锡珍抵达武汉时已是初冬季节，他没有什么行李，仍只穿一件单衣，在汉口田家巷的周家第一次见到刘毓兰时，冻得瑟瑟发抖。刘毓兰见状，马上让周德茂带着去当铺购置冬装和鞋袜。后来王锡珍说，他从根据地动身时，虽已是深秋但气候还暖和，组织安排是到汉口与史纪德夫妇接头后再根据需要添置，经费已发给史纪德，可是到了以后，在约定的地点找不到史纪德，听说他俩已去了上海，于是王锡珍一文不名。王锡珍还说，这次来汉口，边区党委原本是安排他到徐家棚小学为一个休产假的老师代课，等取得合法身份后进行隐蔽，开展工作。现在史纪德夫妇不在，徐家棚小学的关系不敢贸然联系、使用，只好继续以周家为秘密联络站。

不久，王锡珍在汉口偶遇中学同学赵济华，通过赵济华相继联系上其他几位同学，他们大都在汉口任教，当年同学时都属于进步学生，他们也知道也了解陈约珥，却不知道“陈约珥”是王锡珍借用的名字。此次在武汉重逢，大家纷纷想方设法为“陈约珥”在市内找教师的工作。时任汉口市伪教育局科长史坤侯，曾是省立一中历史教员，也教过“陈约珥”，对其政治面貌也略知一二。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史坤侯还是帮助陈约珥安排了工作，先后在硚口区舵落口小学、罗家墩小学当老师。王锡珍虽然有了教师的合法身份，但工作开展仍很不方便，他独自一人住在郊外，每周六回市区1次，周日匆匆返校，路上经常遭日伪军警特务盘查、稽问，安全毫无保障。大家原本也想在市内帮他租个房子，可一打听，在汉口没有家眷的单身汉是不允许租房子的。

1942年初，王锡珍回大悟山边区党委机关汇报工作，党委书记陈少敏突然问道：“你结婚了吗？”“跟谁结婚？”王奇怪地反问。陈大姐哈哈大笑：“你这傻瓜！身边有那么一位好姑娘，你不晓得找她结婚？现在回去就告



诉她‘大姐让你和我结婚’！”王锡珍有点羞涩，为难地说：“那不好，她还是个小姑娘，我怎么开口？”陈大姐指着即将去汉口做机要交通员的钱道权说：“你回去对小刘说，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她和王锡珍结婚。”就这样，在这年春天，根据组织的决定，刘毓兰和王锡珍结为夫妇。

从此，这对为革命事业弄假成真结成的夫妻，经受了战争和政治运动考验，手挽手，风风雨雨相伴20多年。在刘毓兰的眼里，王锡珍是世界上最好的伴侣、最值得尊敬的同志，她曾写道：“从他不平凡的经历中，我看到了他献给党的一颗炽热赤诚的心，他为人真诚豁达的秉性，襟怀坦白的作风，严谨的政治态度，坚韧求索的精神……令人佩服，与他相伴是我三生有幸。”

建立中共汉口市委

刘毓兰和王锡珍结婚时，遵照豫鄂边区党委、陈少敏书记的指示，尽可能利用刘家在汉的一些社会关系，广交朋友，以利更好开展工作。他们在汉口六渡桥会宾楼举办了隆重气派的婚礼，大宴宾客。通过婚礼，他们不仅沟通了已有的社会关系，还广泛结交了教育界、工商界、医务界人士，



1946年秋王锡珍、刘毓兰在南京

及其可利用的一切社会关系，为在汉口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婚后，刘毓兰继续在圣约瑟女中读书，一面读书，一面做青运工作，培养青年积极分子。比如曾春英，就是她在校内通过广交朋友结识的同学，后介绍她入党，宣誓仪式还是由市委书记王锡珍主持的。王锡珍、刘毓兰在汉口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遵照上级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建立了中共汉口市委组织机构，王锡

珍任书记，鲁直（姚慕兰）任副书记，积极开展党在中心城市的工作，先后建立中共硚口屠宰场支部、汉口店员支部、汉口工人支部、圣约瑟女中等学校支部，扩大了党在汉口市区的组织。第二，广泛争取合法身份，在纱厂工人、人力车工人以及职员、教师与学生中开展活动，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的党员，扩充中共汉口党组织的力量。第三，建立中共汉口市委与豫鄂边区党委的联络站、交通线，掩护和护送大批干部进出武汉和青年知识分子去边区。周德茂后来也到了豫鄂边区，被分配到电台从事机要工作，在抗战胜利前夕英勇牺牲了。

1943年夏，王锡珍奉命回边区党委工作，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毓兰当时有些舍不得，想不通，因为她和王锡珍历尽艰险，已经在日伪上层打开了工作局面，建立了工作关系和联系点。但她毕竟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于是，她与钱道权等奉命一并撤回大悟山根据地。

回到边区后，刘毓兰才知道让他们撤回的真正原因是有人怀疑王锡珍是特务，起因就是王锡珍借用“陈约珥”之名。豫鄂边区党委对王锡珍进行了认真调查，才彻底弄清了此事的原委。王锡珍在武昌读书时，因家境贫寒，无钱缴纳学费，经同乡朱积玺介绍，借用“陈约珥”之名上的学。因“陈约珥”是公费生，每月可享受8元钱公费，其时此人已考上国民党中央军校，不可能来武汉念书，所以王锡珍顶用他的姓名读书。没想到参加革命多年后，有人以此怀疑他是“特务”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经过审查才真相大白。

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曾战斗在汉口敌占区的先辈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活跃在武汉周边的反战勇士们

抗日战争时期，在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部队中，活跃着一支特殊队伍，即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第五支部。这些反战勇士与共产党人携起手来，密切合作，活动在武汉周边，以各种斗争方式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曲悲壮的国际主义反战凯歌。

涨渡湖畔的读书声
我们是年轻的对敌工作者，
我们是反攻的先锋队
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
向日本军阀作决死的斗争……

这是抗战时期曾响彻大悟山四周峡谷河川的歌声，歌声里带着童声，清脆雄壮，歌词有时用中文，有时却是用大家听不懂的日文。唱歌的是一支 100 余人的队伍，他们大多数是刚脱稚气的 10 多岁的新四军“小鬼”，其中年龄最大的也只有 20 岁左右。这支队伍就是新四军第五师对敌工作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他们唱的这支歌是敌工训练班的班歌。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处境极其困难，环境十分艰险。为了适应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在李先念的直接关心下，由第五师代政委任质斌提议，办起了一所专门培养直接对日军展开斗争的干部学校。训练班一共办了 2 期，每期 8 到 10 个月，主要教授学生熟练掌握日本文字和语言，了解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风俗人情，并熟悉对日斗争中的方针、政策以及策略和方法。

敌工训练班的学员，是由第五师政治部对敌伪工作部、组织部、锄奸

保卫部联合，从边区各部队和地方组织中严格挑选、审查并呈报师部批准后调集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少年。他们聪明好学，政治觉悟高，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的仇恨。第五师首长对这个训练班学员的学习、生活非常关心，平时就随师部机关一起行动，在驻地附近学习培训，一旦遇到敌人“扫荡”，对敌工作部部长林滔就带领训练班和反战同盟第五支部转移到涨渡湖。涨渡湖是一片茫茫湖区，群众基础好，易于隐蔽，第五师和边区政府的许多机关、学校、军工厂、造币厂都设在这里，有几期敌工干部训练班就是在这里坚持训练和学习，完成学业的。

1943年元旦前后，日军集结万余人，兵分14路，实行长途奔袭，发动对大小悟山根据地的大“扫荡”，情况十分紧急。12月16日，五师部队开始分路突围，为了保证敌工训练班和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安全，任质斌派主力部队第十三旅一个营掩护突围，成功跳出敌人包围圈，经黄陂柿子树店，过宋埠敌据点，到达新洲贾庙，最后绕到涨渡湖王家坊、滨湖嘴一带。

王家坊、滨湖嘴三面环水，环境非常隐蔽、幽静，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过了个把月，驻阳逻、仓子埠等地的日伪军连续对湖区进行“扫荡”，什么“铁壁合围”“长途奔袭”“梳篦战术”都用上了。为了确保敌工训练班学员安全，黄冈中心县政府在文祥等同志组织领导下，准备了很多条木船，每条船都配几名船工，敌人快靠近时，学员们按照安排分别上船，将船划到湖中心或芦苇中隐蔽。如敌人从东边来，船工就将船划向西边，从西边来就将船划向东边，总在湖里划来划去，与敌人捉迷藏。

在湖边的田野上，地方武装和敌人进行着东游西击的麻雀战。枪声、炮声传到涨渡湖里，传到木船上，传



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旧址



到为抗日而学习的训练班学员们的耳朵里，与日语教员的教书声、学员的读书声混在一起，与反战的日本歌声混在一起，令人分不清此时的涨渡湖究竟是战场还是学校的课堂。

敌工训练班的学员们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在枪声炮声不断，子弹、炮弹空中横飞的情况下，在涨渡湖完成了近1年的学习生活。学员们不仅学会了用日文拼音、会话，还学会了口语和文字翻译，能制作一般日文宣传品，并掌握日本民俗风情和政治、社会、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在对敌斗争上学会了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涨渡湖使这批抗日青少年锻炼得更坚强更成熟，回到大小悟山、回到根据地后，他们战斗在边区各个部队和地方，发挥着特殊人才的特殊作用。

撒向武昌城的反战宣传品

为了加强对武汉外围日军的宣传攻势，激发敌军的反战、厌战心理，新四军第五师急需将原来的油印宣传品改成铅字印刷品，以增大发行量 and 提高宣传效果。为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弄到大量日文铅字。根据地不能造，只有在大城市武汉想办法，第五师对敌工作的同志深知这一点。

1943年秋，第五师第三军分区部队在襄河截获了一支敌运输物资船队，俘获了一名帮助日商办事的中国商人。第三军分区敌工科长陆诚对其做了细致的工作，详细介绍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希望他尽可能为抗日事业作贡献，



新四军十三旅旅部旧址

并承诺根据地允许他正当经商。这名商人非常感谢陆诚的理解和接待，感谢新四军对他人格的尊重，表示将努力为新四军、为根据地做力所能及的事。几次来往后，我方就和他谈起请他帮忙购买1套日文铅字的事情，他欣然允诺。不久，这名商人

在伪汉口市教育局购得1套4箱日文铅字，趁商行运货之机，将铅字运出汉口，送到我方指定的地点。这4箱日文铅字发挥了巨大作用，我方通过它印制出版了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赤旗报》和大捆大捆各式各样的反战宣传品，分送到边区各地和第五师各部队，还运用各种方式在敌占区日军部队散发，引起了日军惊慌，有效地削弱其战斗意志，激发其反战厌战情绪。

1944年底，第五师敌工干部整风班学习结束。敌工部长林滔找到家在武汉的对敌工作队队员朱植松谈话，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大反攻可能即将到来，形势需要我们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同时更需要获取1批日伪报刊资料进行研究工作，所以师部决定派你回武汉，利用家庭、同学和其他社会关系作掩护，做好这项工作。”临行前，边区党委委托党校教务长易家驹与朱植松具体布置到武汉后的活动安排。到达(黄)陂孝(感)县行委会敌工站时，杨翼为朱植松准备了便衣和向导，在向导的带领下，2天过了敌人的几道哨卡，顺利回到武汉。

朱植松家住武昌，按照易家驹的交代，说自己是从国民党办的鄂东联合中学放假回来的，别人也没多问，就顺利地安身落脚。随后，朱植松找到原就读师范学校时比较亲近的同学胡荣生和孔泽吾，向他们讲清楚了这次到武汉的任务。这些人都是热血青年、积极分子，愿意支持抗战，特别是胡荣生的日语很好，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孔泽吾则表示愿意为散发宣传品和购买敌情资料出力。

当时武汉的日伪特务多如牛毛，散发反战宣传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反复观察，朱植松等选中武昌司门口附近1个日军过境部队的圈马场。马场周围防卫设施很简陋，只一道铁丝网，铁丝网紧挨着人行道，往里投东西很方便，过境部队警戒也不太严。

第1次散发反战宣传品的行动，是在临近春节的一个夜晚。朱植松、胡荣生、孔泽吾，2人放哨，1人散发，将宣传品一张一张地撒进铁丝网内的马场走廊人行道上。这次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事后发现敌人没有什么动静。隔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利用夜晚时间散发了1次。后来又在别处日军驻地散发，同时又利用邮筒、邮局递送。一时间，武汉三镇都发现有“反对日



本军国主义”和“侵华战争必然失败”的日文反战宣传品，武汉人民群众中也纷传“四老板”（新四军）进城了。虽然日军加强了戒备，但还是有反战宣传品暗中流传，搞得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

1945年3月，朱植松带着购买和搜集到的日伪报刊及各方面情报资料回到大悟山根据地，从而开辟了1条向武汉寄发日文反战宣传品的新线路，从大悟山源源不断地寄出大捆大捆的日文反战宣传品，通过武汉周围附近的各敌工站，再秘密转入市区内线关系手中，投寄散发至武汉市区内。这些反战宣传品犹如一颗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在日伪军营中爆炸，显示出新四军五师对敌工作的巨大威力。

奇袭青山日军机场

1944年6月21日，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军分区鄂南部队成功奇袭日军在建的青山机场。战斗结束后，日军驻汉口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闻讯大惊，命令武汉三镇戒严，并派出部队四处搜捕，结果一无所获，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被迫停建青山机场。

“汤司令”

万里长江起怒涛，男儿报国在今朝。
奇兵誓越千重险，直捣龙庭奋举刀。

这首诗是率队袭击日军青山机场的武（昌）鄂（城）总队总队长汤楚英在战斗结束时所作。

汤楚英，湖北省孝感县（今孝昌县）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排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九团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第四十二团第二营教导员、第四十一团团团长，鄂南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第十四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等职。

1938年10月，日寇铁蹄践踏华中大地，武汉失守，鄂南相继沦陷，国民党军一路溃败，鄂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42年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决定发展鄂南，新四军第五师挥师南进，开展游击战，创建鄂南抗日根据地。同年冬，在鄂南工委和鄂南军事指挥部统一领导下，武昌县工委和县游击支队在武昌城郊开展游击战，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开辟汉（阳）孝（感）（黄）陂根据地，形成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态势。



日军占领武汉后，华中军事总指挥部一直设在武汉大学内。1943年冬，为了加强空中打击力量，打通粤汉和平汉铁路，日军在青山一带修建军用机场，具体在武昌城东北郊青山的白浒湾。其西北是青山据点，东南是葛店据点，与江对面的阳逻据点相对峙，西南为北湖，与武昌陆地隔断。从青山到葛店，除沿江堤别无他路可进。

为保证指挥部的安全和修建机场的顺利实施，日军在武昌东北郊设置了蛛网式的据点，在宪兵队、情报班和宣抚班下还组织了多头的、稠密的情报网。这些甘心为日军驱使的特务汉奸为虎作伥，对附近百姓强征暴敛，敲诈勒索，民怨沸腾。其中最顽固最反动的是武汉伪保安大队肖春庭部。

肖春庭在武汉沦陷后，依靠搜检到的几条枪起家，拉了1支小队伍投靠国民党“别动队”站稳脚跟，后公开投降日军，任伪保安大队长，驻青山以东白浒湾一带。日军修建青山机场后，肖春庭及其保安大队就担负起工地周围的警戒任务。

日军在武汉曾依靠敲诈盘剥修建了武昌南湖机场、徐家棚机场。根据史料记载，日军占领武昌后不久，即以抓壮丁为“征工”，拆民房为“征料”，强拉苦力700余人，聚集南湖一带，初建零星工事，继建飞机跑道，每人每天仅付军用票4角、馒头2个，许多苦力穷病交加，苦不堪言。1943年10月，开始修建徐家棚机场，规模更大，“日征集苦工2万余人，从事刨掘拆毁等工作。不数日间，良田5000余亩化为荒土，居民3000余人流失所”。此次修建青山机场，日军故技重演，又强征数千民工日夜施工。

鄂南工委和军事指挥部奉豫鄂边区党委和第五师师部命令，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破坏在建机场，争取迫使其停工，以扰乱其军事部署。接受任务后，鄂南军事指挥部决定奇袭白浒湾，并将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武（昌）鄂（城）支队汤楚英部和武（昌）北支队姜南平部完成。

黑夜特别行动

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鄂南指挥部驻地晒谷场上，第五师第四军分区副政委兼鄂南指挥部指挥长罗通与鄂南中心县委书记兼鄂南指挥部

政委鲁明健在交谈着。

“我想派支部队到在建的青山机场搞他一家伙，一是扬扬咱新四军的声威，再是灭灭日军的嚣张气焰。”罗通首先开口。

“我也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还没有成熟。”鲁明健说。

“我就说嘛，我们总是不谋而合。”

“部队沿江到青山，摸到机场都不难，关键是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咱们要进得去还要安全出得来，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才能达到目的。”

“说得对，说得对，应先派人去侦察一下，把情况搞准，然后再谋划谋划。”

“叫姜南平他们先去摸摸情况，他们常在那附近活动。”罗通一拍手，“就这么定了。”

几天后，鄂南指挥部和中心县委联合召开作战会议，部署袭击青山在建机场战斗。鲁明健说：“根据武昌支队侦察员获得的情报，机场北面是长江大堤，堤外就是长江，西北方向的青山和东南方向的鄂城、葛店驻有日军。如果规模搞大了，或者从东、南、西方向发动进攻，都难于接近敌人，因大面积湖泊阻隔，部队运动困难。我们想只从北面渡江，直抵机场北侧的江堤，出其不意发起突然袭击，打了就走，以破坏为目的，因此队伍不能过大，要短小精悍。”

“在机场及其周围的敌武装力量，除肖春庭的保安大队外，还有少数日军在机场内负责警戒。白天不行，必须在天亮前完成任务，不主动找敌人打，破坏性越大越好，争取迫使机场建设瘫痪。”罗通话音未落，在会场的指挥员们都坐不住了，抢着喊：“把任务交给我们吧！”

“不要争了！我们研究决定，此次任务由‘汤司令’（汤楚英）和姜队长率突击队去完成。”鲁明健宣布后还不忘叮嘱，“记住，从北面进攻，动作要快，天明前撤回来。”

受领任务后，汤楚英和姜南平把部队开到黄冈刘家集附近的一个村庄待命。从此地到目的地白浒湾，可以走水路，也可以走陆路，反复斟酌权衡后，大家还是决定走水路。尽管走水路也要经过华容和阳逻的日伪据点，



但缩短了路程，还可以直达机场附近登陆，计划将于 20 日执行。

神兵天降

6 月 20 日下午 3 时，汤楚英等率队向赵嘴长江渡口挺进。到达赵嘴时，太阳快西沉，他们迅速渡过长江，与武北支队在龙口附近的小村会合。这支奇袭突击队包括司号员、警卫员、卫生员在内共 58 人，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善于奇袭作战的好手。整个行动，大家轻装上阵，配有四挺轻机枪。

这天夜里，阴云密布，眼看大雨即将来临，汤楚英、姜南平与船民兄弟交谈后，要求每只船由 2 名船工驾驶，船上准备好了旧棉絮，以抵御敌人的子弹，每名战士还准备了三四根削尖的杆子，以备船中弹后塞孔堵漏。一切准备就绪后，天黑即升帆溯江而上。为了避开敌人在沿江设置的据点，5 只船在江中张帆以“之”字形逆流行进。忽然，汤楚英隐约看见岸边有个大黑点，遂紧张起来，急询船老大：“你看是敌艇还是民船？”船老大说：“不像巡逻艇，没听见马达声。”黑影越来越大，等快靠近时，借着微弱的星光，能清楚地看见是敌人的 2 艘大兵舰，舰上炮口直指江心。

午夜的江面，漆黑沉寂。小木船遭遇大兵舰，这是一场出乎意外而又力量悬殊的遭遇战，一旦打响，奇袭机场的任务就完不成了。汤楚英迅速镇定下来，低声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尽量想办法混过去。”战士们轻轻地把子弹推上膛，拧开手榴弹的后盖，机枪手也做好各种准备，只要敌人一动，就立马打他个措手不及。5 只船缓慢地向前行驶着，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密切注视着对面敌船上的情况。敌舰上有少许灯光，并未注意到这几只逆行而上的小船。就这样，他们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过了阳逻，继续向青山在建机场前进。

青山机场的灯光越来越清晰。在侦察员的指引下，参战船只在离机场约 2 公里处的江边落帆，每船留 1 名战士协助船工将船稳住隐藏好，随时准备接应部队返回。

陈友山连长带 1 个班冲在前面，汤楚英和姜南平带 3 个班紧跟在后。当部队到达堤外与机场平行处，汤楚英下令部队在堤下暂时休息，加强岗哨，

他同姜南平、陈连长和侦察员等卧在堤上，对敌情作进一步侦察。最前面1排房子中间的1幢楼房就是伪保安大队部，肖春庭就住在楼上，江堤与机场工地间是一片开阔地，探照灯在上下扫射。他们决定由陈连长先率2个班隐蔽接近这处楼房，姜南平率队尾随其后，战斗一打响，一齐扑上去。汤楚英则率1个班在堤上掩护行动。

夜更深了，在姜南平和陈连长的率领下，战士们的枪都上了刺刀，一个一个紧盯目标，悄悄向楼房逼近。“射击！”一声令下，几挺机枪同时开火，探照灯与几处亮灯首先被打灭，战士们向敌人猛扑过去，哨兵迅速被解决，尚在睡梦中的敌人被惊醒，慌乱奔向门外。

战士们冲进楼房，有敌人在负隅顽抗，陈连长一扬手甩进2个手榴弹。陈连长大声斥问：“肖春庭在哪里？”忽然，从一个倒下的沙发后面蹿出一个身穿日本军服的人，朝后门飞跑。“不许动！”敌人竟回头开枪，陈连长机警闪过，顺手给了那家伙1枪，被击毙的是伪保安大队副大队长。

整个战斗前后不到25分钟，敌伪的有生力量已被消灭，在建场地全毁。汤楚英率队赶到，命令姜南平和陈连长迅速集合队伍，准备撤，所有俘虏就地释放。令人遗憾的是，伪保安大队大队长肖春庭当天正好不在机场，侥幸逃命。

武昌城内的日军听到飞机场边的手榴弹声、枪声，紧急调兵，汽车、摩托车呼啸着，直奔青山机场。待赶到机场，只有遍地尸体和被毁工地。参加奇袭作战的新四军指战员安全回到停在江边的渔船上，顺风顺流而下，胜利归来。次日，武汉三镇戒严，持续1周之久。为了勉励投入战斗的有功人员，豫鄂边区特编发战报予以嘉奖，消息传到延安，《解放日报》还为此印发“号外”。日军遭此打击，不得不停止青山机场的修建。



武汉城区武工队

1939 年春节刚过，共产党员邱国卿来到武昌城。当时，在武昌城青山一带，有许多来自仓埠的农民在干苦力。仓埠属于冈西，也就是黄冈县的西部，今属武汉市新洲区。邱国卿是红色汉留的“龙头大爷”，汉留会是民间帮会，有一定群众基础，邱国卿受中共黄冈中心县委的指令，到仓埠一号召，汉留骨干分子一发动，4 月份就分别在武昌和仓埠成立了专在武汉城区活动的武工队，队长由冈西五区武装队长邱绪武兼任，政委先后由区委书记苏九如、县委书记黄友权兼任。从此，经常保持在 30 人左右的新四军武工队，活动在武汉三镇城区，抓住一切机会，神出鬼没打击敌伪。

“你要枪，没有。你自己去搞。”

1939 年，18 岁的魏正坤参加武工队，对战斗生活满怀期待的他，本以为很快就能领到一支属于自己的枪，可是等了许久，别说领枪了，武工队的领导连发枪的意思都没有。憋不住的小魏从城里跑回仓埠，直接找到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苏九如，二话不说，伸手要枪。苏九如不动声色，微笑看着面前这个鼓起勇气开口的小伙子说：“你要枪，没有。你自己去搞。”魏正坤一听都傻了，苏九如却不慌不忙地说，上级不给武工队员发枪，还要武工队员帮助抗日武装搞枪，因为这就是武工队的任务，这就是抗日。魏正坤明白了，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自己从敌人手中搞到属于自己的枪。

魏正坤回到武昌，在陈家湾继续做苦工。他私下和甘少山、刘华清、施耀章、周洪奎、邱金伢等武工队员商议说：“日本监工一天到晚打人，我们要搞枪，要报仇。”经过长时间的侦察、研究和论证，他们认为可以到珞珈山日军军械库搞枪，并制定了一个认为可行的方案，最后派魏正坤

回区里请示汇报。苏九如和武工队的领导们都说，军械库肯定是重兵把守、戒备森严，那太危险了。魏正坤却很有把握地说：“我们在那里做了好长时间的苦力，还扛过枪支、弹药，军械库的房子、院子、路径熟得很，站岗的、值班的也认识不少。”苏九如想了想，同意他们的行动建议，一再嘱咐：“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能蛮干。”

1940年10月上旬的一天夜晚，雨后，微冷。魏正坤一行6人来到武昌三层楼附近，绕道荒湖场子、低洼地带，接近军械库的围墙。在确认周围没有异常情况后，他们熟练地翻过围墙，拿出锤子、起子、钳子、铁棍等工具，准备扭锁撬门。这时，一个巡逻的日本士兵笼着雨衣慢悠悠地过来，他们连忙钻进泥水沟里，等日本士兵转过屋角，他们爬起来接着干。过了一会儿，门终于被撬开，他们悄悄摸进去，扛出4挺轻机枪和3支步枪，子弹抓了多少也没个数，用事先准备好的棉絮和麻袋装好、捆好，又悄悄沿原路撤出军械库，一口气赶到青山下的团房，找到武工队的秘密渡口。驾船的叫李宏运，也是武工队队员，他将魏正坤等人送到江北的桂家洲。他们从桂家洲步行到窑头，再横穿武湖。第二天，苏九如见到他们搞到的枪支，高兴得像小孩一样，连声说：“好，好，机枪好，机枪真好，太好了，就是缺机枪，我们天天做梦都想机枪。”遵照苏九如的指示，这4挺机枪、3支步枪被送到涨渡湖，通过黄冈中心县委转交给张体学的鄂东独立团。

1943年7月，魏正坤又率武工队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搞枪。那是夏天涨水季节，青山一带的江水和湖水几乎都连成一片，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魏正坤、叶显中、杨再能、甘少山、胡金群等人驾船沿着上新河一直划到震寰纱厂的院墙外。纱厂里面有接头的人，参加行动的队员们在与线人见面后，迅速扛出9挺机枪，消失在茫茫夜色与水雾中。

魏正坤带枪顺江东流，直抵桂家洲，从武湖到余集登岸，直插倒水岸边的老山头，在叶店附近黄冈军事指挥部将9挺机枪交给指挥长漆少川，成为第十四旅四十一团的压舱货。

武工队第三次在武汉市内搞到的枪和子弹更多，还活捉了3个日本人。那是1945年2月，漆先庭、邱国卿找魏正坤去布置任务。漆先庭说，通过



内线关系,已掌握武昌珞珈山某处有枪的信息,希望你们尽快想办法搞回来。魏正坤进一步搞清楚放枪的位置和进出路径等情况后,急忙赶回武昌,找金维贤、金士勤、罗自元、胡金群等人筹划。他们反复商量,还事先钻到珞珈山树林里,趴在茅草丛中观察了那一带的地形,除了东一栋、西一栋的楼房外,几乎没有人家,也没有街道,山下是湖水。行动之夜,他们搞到了一条船,趁夜划到山下隐蔽地方停靠,留一人在船上,其余的人顺着山沟爬上珞珈山。罗自元神不知鬼不觉就将哨兵从背后放倒,口里塞上毛巾,接着撬开库房,却不料里面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日本人。他们迅速扑上去将两个日本人控制住,捆了个严严实实。寒冬腊月,天寒地冻,队员们抓紧时间往山下运枪,共运出2支手枪、2挺机枪、80支步枪、14箱子弹,外加3个俘虏,出湖入江,顺流而下直抵大埠街,在蓼叶咀与县委书记黄友权交接,将枪和子弹交给新四军五师第四军分区。

“捉一个就少一个呗!”

1942年初的一天,魏正坤和周宏奎、陈少山、刘华清等在武昌三层楼日军军马场附近干苦力。他们已摸清楚了附近的房子、道路、岗哨、铁丝网等情况,觉得军马场场子宽、房子简陋,每天只有两个日本士兵在那里照料马群,好对付,可以大干一场。

商议一定,他们在一天晚上爬进军马场,却没想到在马场里转了一圈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士兵,当时就懵了,面面相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就这样撤回去又不甘心。大家一合计,既然来都来了,不能空手回去,能顺手牵走几匹马也不错。结果一人挑选一匹好马,悄悄牵出军马场,直奔青山下的团房。

夜深人静,江水流淌。前来接应的李宏运事先将渡船固定,由踏板赶马上船,顺利冲过江心,直奔江北桂家洲,在毕铺附近交付战利品。冈西县委认为野战部队没有马不行,于是要求他们将马送到大埠街蓼叶咀,请中心县委转交给野战部队。

1943年6月,日军在武昌修建青山机场,周围建有军械库、军马场、粮仓、

被服仓库等，同时还开垦了大片菜地，强征当地农民做苦工，帮助种菜。魏正坤、甘少山、叶显中等就是被日本人找去种菜的。他们一边在菜地干活，一边寻找行动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看管一大片番茄地的只有3名日本士兵，他们白天轮班，一个站岗放哨，另两个睡觉，到了晚上只一个人站岗。于是，他们决定借机消灭日本兵。

天黑前，武工队员分头出发，没带枪。因为要在武汉城区穿行，带枪风险很大。魏正坤等6人陆续聚集到番茄地边，只见一个日本士兵端着枪在棚子边站岗，另两个没有见到，按照平时的活动习惯推断，应该在棚子里睡觉。6名武工队员进行分工：3人对付站岗的士兵，3人到棚子里对付那两个睡觉的。在番茄苗的掩护下，队员们顺着垄沟爬过去，待站岗的士兵一转身，三名队员一跃而起如猛虎扑羊，一人捂住他的嘴，一人勒住他的颈，一人夺下他的枪。与此同时，另外3人摸进棚子里，手脚利落地将睡在床上的两个士兵塞住嘴巴捆绑结实。

这次赤手空拳逮着三个日本兵，还缴获三支步枪和几十发子弹，晚上行动，天亮归队。区委、区政府和附近村里的人听说武工队捉回了3个日本兵，都来看稀奇。妇女干事对魏正坤说：“小魏呀，叫你们多搞点枪回来，你们怎么搞了几个活宝回来？有个么用，还要照料他吃的，还要派人看着……”魏正坤笑着说：“我不管那些，碰到什么逮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人听了大声问：“鬼子多得很，你捉得完吗？”魏正坤回答倒也很爽快：“捉一个就少一个呗！”大家都沉浸在快乐的气氛中。

“你还是去吃日本人的饭，但要干我们的事。”

一直坚持在武汉从事“特别”工作的魏正坤，由于机警缜密，多次行动从未失手，名气越来越大，日伪的军警宪兵特务也很清楚，新四军有武工队在城区活动，队长叫“魏咚咚”，于是到处搜捕“魏咚咚”。

参加武工队后，魏正坤就很少再干苦力，也很少固定在某一地，行踪诡秘，来往飘忽不定。所有工地的工友、所有汉留会的“兄弟”都是朋友，随时都想办法对武工队员进行保护和隐蔽。所以，尽管日伪到处抓捕“魏



咚咚”，但根本都不认得谁是“魏咚咚”。

1943年6月的一天，魏正坤和刘华清在武昌蛇山铁路附近一个杂货店停留。伪警小队长周群大摇大摆地走进店来，咋咋呼呼地喊道：“华新。”华新是这家杂货店的老板，也是武工队的老朋友，他见周群来了，连忙上前拱手相迎：“您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又拿烟又泡茶。周群大大咧咧地说：“你晓得么，我们这一带有个叫‘魏咚咚’的家伙，是新四军，带着武工队，经常晚上行动，摸枪杀人，搞得我们忙得不成名堂。”接着边吹嘘边扬言要如何缉拿“魏咚咚”，要如何惩办等等。当时魏正坤和刘华清就坐在他身边，陪着一边喝茶一边听他吹牛。

周群走后，魏正坤冲着华新神秘一笑，表示感谢后也离开了杂货店。接下来，他们摸清了周群的活动规律，尤其是查准了他喜欢在粮道街老峡洲28号过夜，那是周群的相好家。于是，一天深夜，魏正坤带着武工队员来到粮道街，没费多少功夫就把周群给控制住了。他们将周群押到蛇山上一个乱坟岗，周围尽是大大小小的坟墓，乱七八糟，白骨森森，令人生畏。

周群吓得直哆嗦，魏正坤笑着说：“我们见过面吧，你不是喊着要抓‘魏咚咚’吗？我就是。”不等魏正坤说完，周群连忙“扑通”跪倒在地，“莫来这一套。”魏正坤转身喝道，“把他绑上石头扔到江里去。”站在一旁的武工队员二话不说，拿来一块足有两百斤重的碑石。这时，周群已像疯了一样，又哭又叫，拼命求饶：“我上有老娘，下有妻子儿女……”

“像你这样的汉奸卖国贼，还有脸提到你娘、你儿女？”周群连打自己的嘴巴，骂自己不是人，保证以后不再做坏事。魏正坤警告说：“好，我们可以放过你这一回。我们也不在乎你再干坏事。这块碑石就放着，我随时可以将你绑上去。”周群的脸都吓白了，嘴里不停嘟囔着：“再也不敢干坏事了，再也不敢干坏事了……”

接着，魏正坤要求他从今往后必须和武工队合作，他连连点头应允。魏正坤说：“你还是去吃日本人的饭，但要干我们的事。”还反复宣传新四军的政策：只要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为人民做事，为抗战出力，我们

既往不咎。

周群后来确实改过自新了，不时给武工队通风报信，掩护武工队在城区开展活动。有一次，他带队执行日伪命令，查抄武工队在武昌的一个落脚点，当时有另一帮警察也在，周群带人装腔作势抄了一气，就将一群警察撤走了，保护了武工队员的安全。后来他还根据武工队的需求，送过“良民证”“持枪证”等，为抗战做了一些有益工作。

神出鬼没的武汉城区武工队，书写了武汉抗战史上的传奇篇章。



革命“尼姑”曾赛珠

曾赛珠，1907年生于湖北麻城。1927年，她和姐姐曾赛华冲破农村重男轻女的陋习和包办婚姻的束缚，一起参加农民协会，投身王树声领导的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在黄安战斗中，曾赛华牺牲，曾赛珠被打散。在找不到部队的情况下，曾赛珠辗转到汉口，出家为尼。在以后20多年里，她仍然不忘初心，拥护共产党，支持革命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不惧风险，敢于牺牲。她利用其特殊身份，广交各方朋友，在汉口建立党的联络站，为新四军第五师的武汉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汉解放前夕，她曾帮助组织船只和物资，支援大军渡江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武汉市妇联工作，1988年在汉口病逝，享年81岁。

“尼姑”原是革命人

抗日战争时期，在汉口栖隐寺有一位沙弥尼，剃了头发，可身上仍穿在家日常的衣服，平时不跟任何人讲话。许多人都以为她傻，说话不利索，不识字，更不会诵经拜佛。慈学师傅善待她，不许他人轻视、欺负，还教她功课，念经拜佛，并取法号为“法正”。

慈学师傅后来介绍说，“法正”的真名叫曾赛珠，是参加革命后被反动派追杀，逃命来到汉口，被迫剃头出家的。她老家在麻城，父亲是共产党，她与姐姐跟着父亲一起参加革命，加入农会。黄麻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大肆屠杀起义者及其家属，许多人被迫“跑反”到山里躲起来。曾赛珠没有跑，家里的人也没有跑掉，全部被捕。本来都已死到临头了，地下党暗中保护了她。大屠杀开始的那一天，有人叮嘱曾赛珠的父亲，把她推在队伍前排的最左边，机关枪扫射的时候，有意不扫到最左边，于是曾赛珠逃过这一劫。

事后，地下党又秘密派人把她送到庙里剃度出家，再安排送到武汉，住进栖隐寺。

汉正街九莲庵的当家师傅病重，临终前要把寺院交给慈学师傅打理，慈学师傅因佛教正信会会众太多不便离开，同时又担心曾赛珠长期在栖隐寺，恐有人会把她认出，于是介绍她去了九莲庵。

从“漆大爷”那里来的

1942年9月，新四军第五师张体学部东进、南下，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不时有重伤员被送到涨渡湖后方医院，可医院缺少治病救人的高效西药，有时眼巴巴望着伤员因为缺药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面对困境，医院领导找到漆先庭和邱国卿两位红军老党员，他俩也是抗日汉留会的“龙头大爷”。

按照医院的要求，漆先庭和邱国卿把筹药的任务交给了冈西武工队队长魏正坤。漆先庭说：“汉口汉中街有个九莲庵，庵里有位尼姑叫曾赛珠，她有好多徒弟，其中曾应志、曾应汉与她更贴近，办事得力又放心，你们去接上这个关系，估计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接着，邱国卿给了魏正坤一封信，还交代了找曾赛珠接头的用语和联系方法。

魏正坤从阳逻搭船到汉口四官殿，步行到汉正街、汉中街，然后装扮成烧香拜佛之人走进九莲庵。九莲庵烧香磕头的人真不少，你来我往，既有穿着阔气的老爷、太太、小姐，也有一般市民。对香客迎进送出的是一位极有佛性修养的僧尼，魏正坤估计此人可能就是曾赛珠。

找了个较僻静的地方，魏正坤试探地问道：“请问，您是曾师傅吗？”对方点了点头，就转身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刚才那位僧尼悄悄问魏正坤：“客人从哪里来？”

“黄冈漆大爷处来。”魏正坤把香烛点燃，虔诚给菩萨磕了头后，曾赛珠将他带入内堂。魏正坤递上了漆先庭、邱国卿的信。曾赛珠阅后说：“今后办事千万要小心呀，犯出事来，是要杀头的！”并叮嘱魏正坤，等过2天再来九莲庵。



第2天，曾赛珠弄到西药，不料却被日伪稽查跟踪到九莲庵。稽查问她为什么买西药，谁让她买的。曾赛珠镇定回答：“出家人也吃五谷杂粮，也难免有病有恙，平时开荒、种蔬菜，亦难免被刺破、划伤，不搞点药怎么办？”稽查虽无言以对，可仍纠缠不放，硬说药品来路不清，去向不明，要没收。曾赛珠故意引起香客过来围观，一些平时常来的太太、小姐即刻帮她解围。她们对稽查说：“曾师傅说的都是真的，要体谅出家人呀！”

“那点药算个么事，她们也很可怜，平时有的药还是我家送给她的。”有人说道。这样一来，稽查非常清楚众怒难犯，只好悻悻地走了。

随后，魏正坤按约定的时间再去九莲庵。曾赛珠在极秘密的地方交给他1袋药品，其中有4瓶“尼克露”，粉末状，很香，20银圆1瓶。曾赛珠告诉魏正坤，此药很稀有，市面上用金子也买不到。还有一种药，日本医生称作“海金方”，产自日本，治疗外伤效果极佳。另外一种叫“沙林”的白药水，专门用来清洗伤口，杀菌消毒。大大小小30几盒，魏正坤安全带到根据地。

此后，魏正坤又多次找曾赛珠买药，一会儿扮成大老板，一会儿又扮成伪军长官，甚至装扮成日军翻译。有时不仅自己去，偶尔也带上几名武工队员，最多时1个月去两三次。除买药外，他们还通过九莲庵运回大量办公用品、印刷器材、染布颜料等紧缺和严禁的物资。就这样，九莲庵不仅成了边区根据地的采购站，还是地下党的联络站、交通站。

组织出家人支援抗美援朝

新中国成立前，曾赛珠仍住九莲庵。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政府派人到栖隐寺调查曾赛珠，也就是当年的“法正”师傅，认定她为烈士遗孤，还动员她还俗，并安排在武汉市妇联工作。

抗美援朝运动掀起高潮后，曾赛珠曾到栖隐寺找慈学师傅，看到她们创办的武汉市第十童装厂组织100多位出家人自食其力，连声称赞。让曾赛珠惊讶的是，慈学师傅依然还是出家人身份。她十分真诚地劝慈学师傅还俗，并承诺介绍其去武汉市妇联参加社会工作。但慈学师傅已习惯出家

人生活，不肯还俗，更不愿离开寺院。曾赛珠此后再也不与她谈还俗的事，依然对她特别敬重。当市妇联联系到军用衣被的活计时，曾赛珠第一时间安排由童装厂负责加工，还亲自来寺院开动员会，鼓励大家用心好好地做。

后来，曾赛珠又跟市妇联的领导商量，安排童装厂改做被子、床单和军粮袋。师傅们通过做军粮袋、床单、被套后，手艺都熟练了，直线也都走得很好了，所有产品都是合格的。看到大家车工都做得很不错，曾赛珠就开始安排大家制作军服、军裤，还专门为她们培训技术熟练的师傅。

前后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做军用品，到底做了多少军粮袋、床单、被套和军装，曾赛珠和慈学师傅也记不清，但当时的心情大家都记忆犹新。尤其记得市妇联委托曾赛珠来做思想工作时的情景。她饱含深情地说：“出家人要支持抗美援朝，要为国家做贡献，要以敬重佛、敬重菩萨的心敬重军人，要以爱护佛、爱护菩萨的心爱护国家……”



新洲有位“刘大爷”

刘天元，1897年出生于黄冈贾庙黄坳刘家湾，今属武汉市新洲区。自幼孤苦伶仃，2岁丧父，7岁失母，跟叔父放牧为生，苦水中泡大。长大成人后，交游日众，阅历渐广，怀救国救民之志，爱打抱不平。1928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受党组织委托，出面组织红色“汉留”组织“复兴景宝山”，为“龙头大爷”，登高一呼，八方响应，为壮大抗日力量，开辟鄂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那时起，新洲“刘大爷”便闻名遐迩。

唱戏为生

刘天元随叔父一起，10岁学艺剃头，14岁到榨坊打榨做工，15岁改学唱“皮影戏”。他聪明好学，做什么事都肯用心，下苦功，动脑筋，好琢磨，后来唱戏也有自己的特色。刘天元唱皮影戏，男声、女声都能唱，声音洪亮圆润，词调清晰。提影子是唱皮影中的硬功夫，影子提得好，观众从幕布上看到的人物才能活灵活现，才达到最佳效果。刘天元不仅提一手好影子，更难得的是能将影子控制得恰到好处，紧扣戏中情节，突出人物性格，把戏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老百姓看得懂，看出道理，能目不转睛，甚至热血沸腾。成年后刘天元在当地的皮影表演中特别受欢迎。

行江湖，周游四乡，成年累月走街串巷，萍踪无定，是戏班子的基本生活方式。刘天元从唱戏中不仅学习知识、人生道理，也深为地主豪绅的为富不仁而愤恨，为贫困大众水深火热的生活而不平，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工农运动，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教育广大受压迫的民众认识革命的真理，让刘天元看到希望。

刘天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带着朴素的改变社会不公的意识，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1928年冬，经漆先庭介绍，刘天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全身心投入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时，刘天元被调至黄冈工委工作。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斗争中，他有家不能回，经常躲藏在无人的榨坊或荒野的山洞中，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毅力，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日子。他白天云游四乡，到处串连，夜间以唱皮影戏为掩护，宣传革命道理，发现和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先后秘密发展党员100多人，为保持大别山红旗不倒作出重要贡献。

1936年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派张建月、汪少川率便衣队在黄冈、新洲和麻城一带经常活动，掩护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刘天元和红二十八军取得了联系后，推动了当地党组织的恢复重建，革命之火再度燎原。到四五月份，黄冈建立了3个区委会，刘天元任第二区区委书记，在金鸡坳、沙河、夫子河、黄陂坳等地开展活动，负责扩展游击区，扩大红军队伍和掩护伤员。

1937年夏，蒋介石令卫立煌3个月内消灭大别山的红军。红二十八军遵从党的指示，为保存力量，争取团结抗战，决定将红军干部和便衣武装有计划进行转移隐蔽。刘天元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有深厚坚实的群众基础，组织决定让他留守根据地，带一支便衣武装保护群众，安定人心。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重托，一直坚持到全民族抗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结队抗日

刘天元因为唱皮影戏在黄冈、新洲等地小有名气，为人又耿直、态度谦和、生活朴实、作风正派，四里八乡无论是穷人富人、商界学界、男女老幼，没有不认识他的。在土地革命时期，他还是该地区党的负责人之一，领导过广大群众同土豪劣绅进行坚决斗争，始终和大家同呼吸共命运，水乳交融，赢得老百姓的支持拥护，享有很高的威望。



1938年秋，日军大举进犯武汉，黄冈、新洲、麻城相继沦陷，国民党地方政权纷纷溃散，鄂东局面极端混乱，群众惶惑无助。国民党投机分子夏南山趁机以“紫金山”名义拉山头，蛊惑不知底细的群众加入“汉留”，扩展势力。1939年夏，中共地方组织为了争取群众共同抗日，及时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策，决定运用刘天元 and 漆先庭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望，采取“旧瓶装新酒”的革命斗争策略，通过开山堂、“砍香”，聚集会众，掌握和发展“汉留”组织，壮大抗日力量。

刘天元的“汉留”会，团结抗日各个阶层，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积极为抗日部队筹粮、募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它的发展壮大一直在鄂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发动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奠定群众基础。刘天元为“汉留”组织“复兴景宝山”的“龙头大爷”，漆先庭是“全华山”的“龙头大爷”，他们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再加上共产党、红军在这一地区的崇高威望，两大“山头”很快就发展起来，将国民党掌控的“紫金山”挤到一边，没过多久就土崩瓦解了。在前后2年时间里，“复兴景宝山”团结聚集了数万“红门兄弟”，积极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筹粮筹款，补充兵员，为鄂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和鄂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时间，“刘大爷”闻名遐迩。

随着根据地的开辟与日益扩大，为了增加抗日武装力量，刘天元积极宣传鼓动“一带三”，即动员一名党员带动三名群众参军。在他的家乡徐古一带，村村都有党组织，湾湾都有青年参加新四军。刘天元还善于做统战工作，积极向士绅、地主和商人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道理，用古书老戏的故事打比方，深入浅出，深入人心，当地许多有影响的开明士绅、富商都踊跃捐钱、捐物，支援抗日。

1940年新春，新洲伪督察团长占河望在老家过春节，为了确保安全，还家门口用楠竹做了围墙，四门派兵把守。身为抗日县政府公安局长的刘天元只身闯进占府，破门而入，占河望惊恐万分，正准备喊人动手，刘天元却自报家门：“我乃复兴景宝山寨主刘天元。”

当时豫鄂边区政府已逐渐取消“汉留”，但“汉留”会的影响在鄂东

还是非常深远的。占河望一听“汉留”会龙头大爷驾到，不敢怠慢，赶紧让座端茶，将来客奉为上宾。刘天元此次本是借春节之机，在家乡做占河望的统战工作，劝占河望以民族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勒马回头，弃恶从善。他很诚恳地说：“我知道，你也是走江湖闯码头的好汉，到过许多大城市，见过许多大世面，我们汉留会的规矩你也懂，现在应是我们团结一起，共同保家护院、安抚家乡百姓的时候，不应你争我斗，互相残害，特别是家乡父老兄弟。这次来就是想同你说，希望对老百姓好点，做事留点后路，好自为之。”占河望当面表示愿意改邪归正，愿意力所能及为新四军办事，为老百姓办事。但本性难移的占河望最终并没有兑现承诺，而是彻底投靠日伪，与抗日军民为敌，恶贯满盈。后来，刘天元亲自率队将其捉拿，押赴柳林河处决，并张贴告示，宣布其罪行。

1941年，刘天元任黄冈中心县委对敌伪工作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黄冈、新洲、麻城等地的工作推进很快，敌、特、汉奸都不敢轻易出来骚扰，为根据地的发展争取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车裂酷刑

刘天元为革命敢于担当，勇于牺牲，从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安危。在土地革命时期，他的原配夫人杨氏被敌人迫害致死，留下一个女儿，曾托付战友程鹤鸣抚养，不幸六七岁时夭折。抗战初期，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没过多久，爱人又被国民党顽军捕去，后英勇牺牲。自此刘天元下定决心，革命不胜利，再不考虑个人问题。

1945年秋，日本战败投降，鄂东国民党官僚政客借接收之机，大肆搜括民脂民膏，走私贩卖禁品。比如，他们将粗楠竹打通竹节，将搜刮来的鸦片烟或银圆灌进去，充作抬杠，掩人耳目，蒙混过关。刘天元等侦察到此情况后，派出公安侦察队把守水陆交通要道，查获和没收了大批鸦片和银圆。

1946年春，中原地区形势险恶，中原局决定派一批党员干部化装突围北上，刘天元也在其中。他和王正春、林少怀等每人挑1担净花，以小商



贩身份作掩护，经安徽、江苏到达华东局所在地山东临沂，后又辗转至山西晋城，与胜利突围的中原军区北路主力会合。

1947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战局的发展，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作出战略进攻的伟大决策，以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协同逐鹿中原为开端，举行战略大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将经过补充、整训后的豫鄂陕军区主力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由李先念等率领从山西晋城出发，挥师东进，继而南下中原，与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比肩，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刘天元随刘邓大军抵达大别山后，任新洲县长兼县公安局局长，迅速开展各项工作，积极想方设法为部队筹粮、筹款，竭尽全力支援解放战争。

1948年4月11日，刘天元去何家洼出席县委会议。就在同一天，张体学率部准备攻打胡家坳，解救那里被国民党军抓走的1000余老百姓。国民党军3个团被张体学击溃后，扑向新洲县委驻地何家洼。当时只有1个班的警卫部队，刘天元决定突围撤退，但他因为身体染病，不愿拖累大家，就在大部突围后只带着通讯员上山隐蔽。不料走到吴家垸塘后，被追赶上来的敌人包围，通讯员负伤牺牲，刘天元落入虎口。

抓到刘天元，国民党地方当局喜出望外，当即将其押解到柳林河营部邀功，军官连夜提审。未承想刘天元神态自若，冷笑着说：“我乃堂堂县长，你不够审我的资格，往上解好了。”随后就保持沉默，任对方软硬兼施，就是不开口。无奈，敌人只有将其押解至宋埠敌兵团司令部。走到夫子河，敌人故意让他骑在马上，企图趁机诱捕革命同志，刘天元心知肚明，在马上破口大骂，故意大声喝道：“老子被捕了，你们还看什么？！”

在宋埠，国民党军花招频出，一会儿请刘天元吃饭，一会儿有人来看他、保释他，一会儿承诺只要给老百姓讲讲话，就可以释放。他们为了宣传，甚至还帮刘天元写好了讲稿，只要念念就行。刘天元知道身在虎穴，不奢望生还，便抱“杀身成仁”之决心，决定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一击。于是将计就计，同意登台演讲。

敌人误以为他有所屈服，立即布置会场，会议开始时还曾隆重介绍

说：“现在有请共产党的刘县长讲话。”刘天元从容不迫走上讲台，忽然脸色一沉，将准备好的讲稿撕个粉碎，抬起头对台下高声说：“士兵们，共产党的部队已经过了黄河，到了大别山，你们的家乡有的已经解放了，在分田地，你们都是被迫抽壮丁出来的，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赶快放下武器，回家参加土改种田去吧。现在我们大军南下，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完蛋了。”

敌军官听刘天元越讲越不对头，恼羞成怒，歇斯底里地大声咆哮：“把他拖下去！”刘天元用尽全身力气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刘天元拉下讲台后，竟惨无人道地用2部汽车将其活活肢解，然后毁尸灭迹。

英雄逝去，英魂永存。今天每当人们提起新洲曾经的“刘大爷”时，总会对这位秉持初心、无私无畏，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战士、党员肃然起敬。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红烛之光——黄陂籍省委书记杨学诚传奇

他曾是一位温良谦逊的青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前面，如猛然警醒的睡狮般怒吼起来”。

他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赤手空拳地走到浩瀚的群众大海中去，进行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工作，直至把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建立起来”。

他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29岁的年轻生命践行“我这支蜡烛，不要求点的时间长，只要求点得亮”的诺言。

他，就是杰出的革命战士、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楷模，为革命而牺牲的黄陂籍省委书记——杨学诚。

学运领袖 青运导师

杨学诚，1915年8月8日生于黄陂县研子岗罗村，自幼好学，1930年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学习，是典型的农家子弟靠勤奋而完成学业的。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三省后，进一步将侵华魔掌伸向中华大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职责”。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党组织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杨学诚同数千名学生一起，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包围，面对带血大刀、军棍、刺骨水龙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振臂高呼，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恶行径。16日，杨学诚走出清华园，参加有3万多人参加的天桥集会、示威游行。

为了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引向农村，中国共产党通过北平

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杨学诚在第三团任先遣队员，负责侦察情况、选定路线、交涉食宿等。数九寒天的北方原野，寒风刺骨，风沙漫天，杨学诚随南下宣传团长途跋涉，播撒抗日救国的火种。

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杨学诚又成为这一组织的活跃分子，承担许多重要工作。一次，在清华大学的反法西斯声讨大会上，一个混入学生中的汉奸在会场捣乱，打翻写着抗日标语的灯笼，撕毁会场标语，杨学诚挺身而出，率同学揪出汉奸，驱出会场。2月25日，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包围清华大学，逮捕蒋南翔等学生运动领导人。关键时刻，杨学诚冒着生命危险，率进步同学冲到校门口警卫室，将蒋南翔和纠察大队长方左英抢救出来。

大搜捕过后，特务活动更加猖獗，不抵抗主张甚嚣尘上，一股股政治寒流纷至沓来。面对危机，清华大学“民先队”重选出杨学诚等5人组成新的队部，从斗争的实践中摸索新的方式，团结更多青年，更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民先队”工作重新活跃起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顺利发展。

5月，杨学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在校期间，他不遗余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通过各种集会、演讲，以生动的事实有力批驳各种卖国投降的无耻论调，在实践中成长为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之一。

1937年5月，杨学诚在刘少奇、彭真率领下，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着重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杨学诚（此照片摄于他从北京南下途中）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其间杨学诚还聆听了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的系列报告，深受鼓舞。在讨论会上他作了发言，从进步学生的思想情绪出发，提出工作意见和个人的一些顾虑。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报告中对这些问题均作出详细解答。回到北平后，杨学诚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书记、北平城西区委书记。

北平沦陷后，杨学诚等首先设法回到清华园，分头烧毁、处理各种秘密文件，接着发出集合指令，要求民先队员迅速撤到天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北上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一路继续南下，发展组织力量，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沿途播撒抗日救亡火种。杨学诚等率队南下，于9月初抵达武汉。回到武汉，等于回到家乡，杨学诚的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他带大家在武昌三道街租了几间房子，首先将南下途中建立的济南、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的负责同志召集起来，把平津、上海转移到武汉的青年共产党员、民先队队员联络在一起，办补习学校，号召大家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

南京沦陷后，流亡到武汉的学生越来越多，为了把他们更好地组织起来，杨学诚等发起组织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建立30多个宣传队，派往各地宣传抗日。在武昌设立“民先队”办事处，随即将总队部由北平移驻武汉。10月，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12月，省工委举行扩大会议，改组为湖北省临时委员会，杨学诚参加临委领导工作，任青委书记（不久改任青年部长），负责领导武汉和全省青年运动。根据省临委的决定，以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和民先队为基础，建立青年救国团总团，杨学诚任总团部党团书记。青年救国团在武昌、汉口、宜昌建立了区团部，在全省36个县建有分团部，广泛发展团员，仅武汉地区就达万人之多。

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

1938年6月，遵照中共湖北省委指示，杨学诚赴鄂中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当时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

战线，重视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村工作，轻视独立自主开展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杨学诚到鄂中后，即与陶铸一道深入农村，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首先，培养训练干部，发展党的组织，依靠党组织的力量去开展敌后工作。早在1937年12月，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通过与国民党元老、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石瑛洽商，派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在应城汤池主持湖北省建设厅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由于陶铸和共产党的影响，训练班效果和成绩显著，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恐惧，迫使陶铸离开训练班，离开汤池。随后，杨学诚实际担负起训练班的主要领导工作，主要以夏家庙为驻地，用汤池临时学校的名义在鄂中各地广泛招收爱国青年，办了2期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共300余人。训练班以抗日宣传、军事训练、游击战争准备为主要教学内容。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先后培训600多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参加了抗日斗争，促进了鄂中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为鄂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了组织和干部上的准备。

杨学诚还千方百计抓武装，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前夕，杨学诚在潘家集主持了为期3天的鄂中特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深刻分析了整个抗战的形势，特别是鄂中的形势，提出“全党军事化，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斗争”的口号，铿锵有力地说道：“我就是讨饭，也要讨到一支枪，拿起枪去跟日本鬼子干。”

会后，他深入各地检查督促落实会议精神情况，在给钟祥县委书记刘慈恺的信中说：“武汉情况紧急，要马上把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武装斗争上来，想方设法搞枪支，准备上山打游击……”县委按照杨学诚的指示，紧急行动起来，人人动手搞枪，从国民党溃败的散兵手里买，从联防队里往外拉，很快就搞到了几百条枪，组建了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第四支队。

杨学诚尤其重视在工人中发展武装。应城是膏盐矿区密集地，工人多，他就经常深入矿区，发现、培养革命骨干，通过他们去发展党员，组织武



装力量。中共党员蔡斯烈，家有3个石膏矿和1个盐矿，作为家族矿业的继承人，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为组建鄂中抗日武装毁家纾难。蔡斯烈按照杨学诚的指示，拿出1000多银圆，通过各种途径，买到了德国造快慢机1支、驳壳枪1支、勃朗宁小手枪1支和仿制汉阳造步枪4支，子弹半箱，手榴弹18枚，加上他家原有的1支金陵造小手枪，组成了1支8条枪、10多人的抗日武装，这就是有名的“应城8条枪”。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支从8条枪起家的抗日队伍，不到1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应抗”的中队、大队、支队，直至成长壮大为后来新四军第五师的1个团。

11月21日，日军轰炸应城，国民党县长弃城逃跑。24日，杨学诚在应城矿区听到轰炸声、枪声，随即与蔡斯烈带着13名矿工，背起“8条枪”，奔赴京山丁家冲，上山打游击，途中会集了邓先柱率领的20余人的工人武装，在丁家冲与陶铸会合。

在陶铸、杨学诚等领导、组织下，鄂中敌后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三五条枪、七八条枪队伍如星星之火，高擎抗日大旗，坚持统一战线，逐渐穿珠成串，汇集成强大的革命队伍，把抗日烽火燃遍鄂中各地。李先念在《一年来鄂豫边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中写道：“我们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征途上，汇合了信阳地区共产党员自动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厚福以28条枪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和张体学同志率领的武装，以及鄂中陶铸、杨学诚、蔡松荣等同志以8条枪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所有这些就成为以后发展坚持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解放后，李先念回忆起杨学诚时说：“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也是个干将！”

维护大局的楷模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倾向，批判了王明右倾错误，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

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会议还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在敌后不设党的省委，而设省级区党委，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所有长江以北地区党的工作归中原局领导。

中原局在延安召开第1次会议，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等区党委。1939年1月底，鄂西北区党委在襄阳成立，王翰任书记。2月，鄂中区党委成立于随县长岗店，钱瑛任书记。4月，杨学诚代理鄂中区党委书记。

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等率新四军挺进团第一大队到达京山大山头，与杨学诚及“应抗”第三、第四支队会合。16日，鄂中区党委在养马畈召开了为期3天的扩大会议。会上，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创建根据地的6条原则，以及中原局关于整编和扩大鄂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指示。会上，就“应抗”是否打出新四军旗帜问题，与会者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意见。李先念力主统一豫南和鄂中部队的领导，这项主张得到了杨学诚的积极支持和赞同。6月19日，会议接到中原局刘少奇、朱理治的电报。电报指出，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1支5000人以上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应抗”应立即编为新四军。

这份来电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会议决议将“应抗”等鄂中、豫南党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根据中原局的指示，扩大会议对区党委成员作了调整，由陈少敏任书记，杨学诚任组织部长和社会部长，李先念任军事部长，陶铸任统战部长等。杨学诚在会议上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需要我们，我们就站出来，响应党的号召，统一整编，打出党的旗帜。”在场的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部队整编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李先念谈到这段历史曾感慨地说：“杨学诚同志在会上所起的作用要加以肯定。”

杨学诚的党性原则极强，坚决服从党的指挥，从来都是党指向哪里就



打向哪里。1940年4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主力东进，同时在（平汉）路西成立指挥部，由陶铸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8月，进军天西，开辟天（门）潜（江）沔（阳）根据地时，边区党委成立天（门）西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

当时在天西有潘殿华、潘尚斌父子率领的地主武装2000余人，盘踞在石家河、带家河、西龙尾山一带，坚持“反共”，态度极其顽固。在杨学诚、刘少卿等带领下，部队从南山出发，在天西向潘氏父子发起进攻，仅3个小时便击溃匪兵，控制石家河一带。随后，在这里建立中共天门县委、京山县委。

1942年5月，日军开始进攻浙赣线。为牵制日军的新进攻和扩大第五师的回旋余地，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第五师决定发展鄂南地区，创立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实现从南线对武汉进行战略包围态势。8月10日，经请示华中局批准，新四军第五师江南兵团指挥部成立，刘少卿兼任指挥长，杨学诚兼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发展鄂皖边及鄂南地区。鄂南抗日基地的建成，达到了扼控湘鄂赣咽喉，从南线对盘踞武汉之敌实行战略包围，并由此南下湘粤，东进吴越，与皖南、苏南相连接的战略目的。同时，还有力地牵制日军对浙赣线的进攻，对鄂豫边区粉碎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杨学诚是豫鄂边区党委的中坚力量，一直任组织部长和社会部长，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和支部工作，注意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经常在《党的生活》《挺进月刊》《七七月刊》上发表文章，如《目前支部的严重现象》《反对党内的中农思想》等文章，对边区和第五师党建工作既有针对性，又有指导性。他经常深入基层具体抓支部建设，要求每个支部都要摸清楚每一名党员的思想状况，把思想工作做通，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抗日事业上，使每个支部都坚强有力，每个党员都成为群众的一面旗帜。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延安听取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工作情况汇报时曾赞扬说：“杨学诚同志在戎马倥偬中还能够找支部书记谈话，具体地一个一个了解支部党员情况，很了不起。”

杨学诚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把一切都献给人民。他曾说：“我也是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穷人翻身求解放！”这就是他的初心，为此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他因为操劳过度，缺乏营养，在鄂南病倒了。他瘦得不成样子，领导要他休息，他强忍病痛写完了鄂南工作总结，并向干部们作了报告。因为疼痛，他在报告时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大家都劝他下来，他却一直坚持讲完。从此，他就卧床不起了，即便是在病床上，他还是不忘革命，不忘群众，他对护理他的人说：“人民对我太优厚了，我很不安。不要给我用好药，我给党没有做多少工作，现在又要花人民这么多钱，给我治病，真对不起党。”

1944年3月21日，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陈少敏沉痛电告中共中央、华中局：杨学诚同志于本日七时四十分病故于大悟山以北高家洼，年仅29岁。

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人是不朽的，杨学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从书斋走出的钢铁战士

他生于湖北咸宁，成长求学于武汉，曾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鄂南特委书记、鄂中特委书记、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等职，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31 位湖北省委书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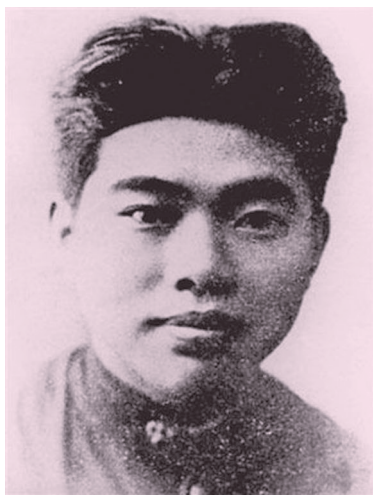
他是武汉地区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从武汉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他牺牲后，延安曾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解放日报》刊发《悼殉难者》社论。他就是感动中国的 100 位历史人物之一——何功伟。

成长求学于武汉

1915 年 11 月，何功伟诞生于咸宁桂花镇一书香人家。他的父亲何楚瑛是当地有名的士绅。何功伟自幼聪颖，读私塾时师从王寿桥，学古文、习诗词。1927 年，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咸宁蓬勃兴起，何楚瑛携何功伟等离开咸宁赴上海、杭州等地，后回武汉定居。

何功伟在武汉就读于武昌阅马场省立第四小学，1930 年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1933 年入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中学时代，何功伟学习勤奋，数、理、化、文、史各科全面发展，主要学科经常拿满分。他的作文文笔犀利，思想鲜明，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爱国之情和救国之志跃然纸上，令国文老师和同学们赞赏不已。他能言善辩，论证严谨，逻辑性强，多次参加校内演讲获第 1 名。他的英语功底扎实，坚持写英文日记，曾在《英语周刊》的全国性测验中成绩名列第 1。他注重体育，爱好音乐，是典型的全面发展优材生。初中毕业会考，何功伟获全省第 1 名；高中毕业，因参加学运被追捕逃亡，未能参加考试。为此，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的教务主任曾惋惜、感慨道：“我教了一生书，还没有遇到像何功伟这样全优的学生。”

何功伟在学生时代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从初中起，他就养成阅读书刊、关注时事的习惯，每日必读几种报纸。那时的中国正内忧外患，寇深祸亟，灾难深重。帝国主义列强早已在中国划出各自势力范围，日本妄图独霸中国，步步紧逼。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妥协退让，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力量“围剿”红军、剿灭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身在武汉的何功伟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热血沸腾，誓雪国耻。



何功伟

东北沦陷后，何功伟在同学中发起组织读书会，以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为榜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勉，组织救国宣传活动。1931年冬，何功伟得到了一本《朝鲜亡国惨痛》，便组织读书会的同学在师生中募捐，广为印发。一次，他从期刊中找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日本天皇的“奏折”。“奏折”中明目张胆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阅后，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为了让更多的国人认清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他拿出自己的生活费翻印“奏折”，站在武昌司门口散发，边发边演说，声泪俱下，过往之人无不为之感动。

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激励着何功伟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他的视野更为广阔，政治思想也逐步成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常到汉口生活书店阅读进步书刊，在那里结识了顾一凡，参加了他组织的读书会。在读书会里，何功伟又和追求进步的何伟、黄心学、万国瑞等成为好友。通过认真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特别是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他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决心做“爱迪生第二”到立志投身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他曾这样对同学说：“当前读书不能救国，科学也不能救国，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家。”他还说“学生的当务之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



家亡了，伟大的抱负有什么用？”当他从汉口出售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读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喜形于色，立即告知同窗好友，并推心置腹地说：“将来我们一起参加共产党吧！”

领导武汉一二九运动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地区之时，日本侵略者趁国民政府持不抵抗政策，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控制整个华北。1935年6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北平、天津和河北。紧接着，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居然要求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11月，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国民政府一再退让，计划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实施“华北特殊化”。一时间，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何功伟首先在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响应，他到汉口找到读书会的市一女中学生万国瑞，到圣罗以女中找到范元甄，商议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他们奔走于武汉各学校，于12月12日在华中大学召开第1次武汉中等以上学校联席会，决定：“通电全国，制裁汉奸，保卫国土，并电勉北平各级学校，应与北平城共存亡，同时吁请武汉各学校当局扶助学生，成立学生会，共图救亡。”何功伟在学校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埋头读书，不能救国，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有出路。国土沦亡，学生要打先锋，为了民族解放，牺牲也是光荣的。刚劲有力的演说唤起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何功伟等人的组织动员下，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学生宣布罢课，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学生。12月17日，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何功伟当选为常务干事。学生救国联合

会决定在全市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12月18日，在学生救国联合会第2次会议上，何功伟说：“武汉不能沉默了，全国是一体，北平和武汉的学生是一体。虽然学生的责任是读书，我们也要读书，当然要读书，但光读书能救国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我们要收复国土，民族独立，我情愿流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是光荣的。”会议决定举行全市大游行示威，还决定成立纠察队，由何功伟任游行纠察队总队长。12月20日，武汉三镇学生纷纷涌上街头。武昌40余所大中学校的上万名学生在平阅路湖北省体育场集合，计划前往汉口会合汉口学生，到日本租界示威。当他们手执各式小旗，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抵达汉阳门码头，却发现渡轮没有了，连一只小划子也看不见了。原来国民党省政府为阻止学生示威游行，指使建设厅“封江停渡”。愤怒的学生们知道原委后，砸烂了轮渡售票亭，结果还是解决不了过江的问题。

关键时刻，何功伟挺身而出，号召同学们到省政府去请愿。省府官员采取敷衍搪塞的手段，企图拖垮学生，让学生从清晨等到下午也见不到省主席，很多学生又累又饿，只好陆续散去，只有何功伟率省立武昌高中学生还在坚持。何功伟没有放弃或者动摇，而是毅然带着队伍开始二次游行，高呼“不要五分钟热度”“坚决要求渡江游行示威”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他们的感召下，游行队伍再次聚集在黄鹤楼下，万头攒动，群情激昂。

晚上，奔忙一天的学生忍饥挨冻，待在马路的石板上过夜，不少代表提出“收兵回校，明天再来”。何功伟耐心向大家反复动员说，我们是要向当局和全国人民表明武汉学生的救国意愿，我们不怕天寒地冻，不畏饥饿疲劳，不达到过江游行的目的，就会前功尽弃。

整整一夜，何功伟一面组织纠察队巡逻，保证学生安全，一面与各校领队研究对策。周围的城市居民被学生的爱国之情所感动，纷纷为学生拉亮门灯，送茶，送水，送吃的。何功伟还在工人们的协助下，派少数学生乘划子偷偷渡江，与汉阳、汉口的学生取得联系，商议共同坚持斗争。第2天拂晓，何功伟带领武昌万余学生包围了省政府，要求省政府官员接见



学生。经过再三交涉，何功伟等学生代表进入省政府。他们要求省政府转告国民政府，公布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内幕，维护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维护武汉学生运动，同时恢复轮渡交通。国民党省政府官员眼看众怒难犯，只好答应恢复轮渡。

22日上午，何功伟等率8000多名学生从武昌分批渡江，汉口、汉阳学生整队在江边欢迎，三镇学生会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何功伟等在返回途中，从轮渡上看到停在江边的铁驳船上满载着铁矿石，愤怒地说：“日本人把这些铁矿石运回去干什么呢？是制造枪炮来打我们中国人的！”在经过省建设厅时，大家由卖铁矿石给日本人联想到建设厅下令停渡封江，阻挠学生渡江游行的行径，就一哄而入，找建设厅长刘寿朋说理。刘寿朋见势不妙，躲藏起来。愤怒的学生一气之下摔了他办公室的花钵，砸了玻璃，掀了桌椅。奉命监视学生的省立武昌高中训育主任见事态扩大，急忙找何功伟，要他负责。

何功伟理直气壮，满口答应，立即找到纸笔，一挥而就，写下《锄奸声明》，指出建设厅将铁矿石贱卖给日本，用以炼成钢铁，制成枪炮，然后杀我同胞，占我土地，这一汉奸卖国罪行，理应受到严厉惩罚。文章最后特别强调：“此次捣毁建设厅，全出于学生义愤，一切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与学校任何主管人无涉。”《锄奸声明》张贴在建设厅大门。23日，何功伟等又率学生再次到汉口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甚至冲进日租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武汉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取得胜利，何功伟在领导学生运动过程中经受了锻炼，逐渐成熟起来。

在武汉推动工农运动

何功伟积极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仇恨，当局发布通缉令，要逮捕何功伟。得知消息后，何功伟设法分别告诉其他学生领袖，在妥善安排好学联工作后，暂时到汉口亲友家躲避，经过亲友同乡的帮助，乘坐轮船离开武汉去上海。1936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成立。何功伟到上海后，改名何明理，到全国学联担任常

委职务。8月，经胡乔木和唐守愚介绍，何功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党决定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去，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队，由何功伟负责领导向内地转移，他们经南通、镇江、南京，奔向武汉。到武汉后，武汉群众抗日团体——青年救国团也建立起来了，何功伟根据上级指示，将内地工作队并入青年救国团，胜利地完成了从上海转移骨干到武汉的任务。

12月，何功伟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由董必武介绍到湖北战时乡村促进会任秘书，主持会务。他亲自起草《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言》，明确指出：湖北战时乡村促进会的宗旨是“集中湖北一切爱国分子，在党政军各机关领导之下，以促进湖北乡村一切救亡工作及一切战时建设”。中心任务“一方面是要以最大的努力，协助政府，动员湖北乡村之物力和人力，以保卫湖北，支持抗战；另一方面，是要以最大努力，协助政府，从推进各种适应战时需要的建设中，来培养湖北乡村的物力和人力”。《宣言》还大声疾呼：“我们抗战之资源，既多仰给于农村，抗战之兵员，亦十之九来自田间。换言之，即在抗战中所需要的物力与人力，差不多都要依赖于农村之供给，而整个农村也就成了培养整个抗战力量的根源。假若我们要实行持久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则必须动员农村之物力与人力，方能有济，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因此呼吁同仁：“深入乡村，埋头苦干，以动员更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才是保卫湖北，争取抗战胜利的出路！”

在乡促会，何功伟专门负责组织政治活动和对外联络，并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工委之间联络。他主持该会人员训练班，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工作方法的训练，参加训练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农村工作的骨干。他还派遣数支乡村促进会的农村工作队奔赴全省各地指导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省各县均建立了乡村促进会的组织，在湖北广大农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作为湖北省工委负责农救工作的委员，何功伟积极支持、倡导汤池训练班的学员深入农村，通过合作运动去推进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合作运



动与救亡运动——给从事合作事业的救亡青年》一文中称：“湖北合作事业，输进了这一新的血液，无疑地将要展开一个光辉的前途。”并告诫从事合作事业的救亡青年：“想一想从前与农民自由接近的机会是如何难以获得，就会知道现在通过合作运动与农民自由接近是多么宝贵；如果想想从前组织一个小团体是如何艰难，就会知道现在向合作社社员宣传救亡运动是多么自由。我们不希望同时组织几百个健全合作社，我们只要集中精力先培养一两个模范来，我们不希望立刻把合作社完全合乎理想的农民组织，我们只要在一点一滴的收获中建立工作基础。这里需要的就是艰苦卓绝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没有这样的精神和决心，我们固然干不了合作运动，就是换上另一种救亡工作也是负担不起的。”

1938年5月，何功伟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后，首先在工人、学生、教师中发展党员，抓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为了保证党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区委建立了武昌工人特别支部，从青年救国团抽调优秀青年到纱厂办夜校、图书馆，组织歌咏队、读书会，教唱抗战歌曲，开展工运活动。何功伟时常到工人中去，目睹工人困苦的生活后，深感自己肩上担子沉重，下决心要为改变他们的贫穷状况而斗争。他多次引导工人进行合法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同时还带领青年学生深入群众中去，深入工人中去，从实际的宣传斗争中学会与工人同甘共苦，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道理讲演，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深受欢迎。

在何功伟的领导和影响下，武汉一大批从学生运动转到工人运动的革命青年都脱下学生装，改变学生腔，努力与工人建立感情。那时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下班后来不及洗去脸上汗水粘连的飞絮，就得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愁米愁柴，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国家大事，更想不到有什么“前途”。为了接近工人，在何功伟的指导下，这些青年首先从帮助工人料理家务开始，逐渐引导他们到识字班上学，接受抗日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他们的工作往往是从一两个工人开始，接着人数就成倍增长。就在这时，遵从党中央要求，湖北省工委经过挑选输送了700多名产业工人到延安；派了一批工人回家乡去发动群众，准备组织武装打游击；培训了一批

能利用合法形式在国统区和敌占区坚持和开展秘密工作的青年。

武昌区委在当时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何功伟大多时间与青年救国团的同志们住在一起。他虽然不负责救国团的工作，却常常与青年们一道谈前途、人生，鼓舞大家坚定信心，团结民众，在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6月，何功伟任湖北省委委员。7月，受省委派遣回到鄂南，领导恢复重建党组织，组建抗日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8月，鄂南特委成立，何功伟任书记，在两个月时间内先后建立4个区委，发展党员100多人。10月9日，咸宁沦陷，他迅即举起鄂南抗日大旗，于11月初在挂榜山打退日军一小分队的进犯，击毙日军2名；12月下旬奔袭盆塘畈，击溃前来“打掳”的日军，缴获大量物资；在高赛岭公路伏击日军，毙伤数人，点燃了鄂南武装抗日的烽火。

12月底，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何功伟迅即派人与中共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并按特委指示，将鄂南特委改为通山中心县委，何功伟任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1月，何功伟主持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从鄂南抗日的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共产党独立抓武装的重要性，要时刻把刀、枪握在党的手里。

6月12日，平江惨案发生后，中心县委与湘鄂赣特委的联系中断，何功伟离开鄂南，赴江北寻找党组织。8月，何功伟抵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鄂南党组织和抗日的有关情况，撰写了《鄂南工作情况报告》，深刻地检讨“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9月，南方局派何功伟回宜昌参加湘鄂西区党委工作，任党委宣传部长。

1940年2月，钱瑛回南方局，何功伟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6月，奉南方局指示，何功伟将在宜昌的党员干部有组织地分批撤往巴东、恩施，而自己直至宜昌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撤出。8月，何功伟到达恩施，再次与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会合。在钱瑛主持下，决定改湘鄂西区党委为鄂西特委，何功伟任书记。



感动中国的革命先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第五战区在恩施进行大搜查、大逮捕。鄂西特委书记郑新民被捕叛变，供出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以及与刘经常联系的何功伟。1月20日，何功伟前往医院换药时不幸被捕。

由于叛徒的指认，何功伟自被捕之日起，特委书记的身份就已暴露，所以也就将生命置之度外。在严刑拷打、“劝降”、“感化”、封官许愿等均不奏效的情况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打起了“亲情牌”，派人将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从石首藕池口附近的调关镇接来恩施。4月9日，在狱中，何功伟父子相见，父亲如实说：“他们（国民党）答应，只要你回心转意登报脱离共产党，马上就可以出狱，还可以出国留学或就任全省青年领袖职位。”听后，何功伟冷静地说：“爷（湖北方言，意指父亲），你不要信他们的话，我抗日救国无罪，为共产主义献身，我死而无憾。万一如此，请爷就当少生了我这个儿子吧！”

何楚瑛最后一次探监，父子俩在谷仓睡了一夜，彻夜长谈。为了挽救爱子性命，父亲在何功伟面前苦苦劝说，老泪纵横地说：“省主席陈诚说了，不要你写自首书，只要你肯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功伟，你就点一下头吧！”何功伟扶起老父，再次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说：“我为天地存



何功伟烈士陵园雕像

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头不可点！”在给妻子许云的信中，他写道：“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努力吧，把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好好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周恩来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宣读何功伟给党组织的信后，沉痛地说：“同

志们，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让我们向功伟同志学习吧！”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从容不迫，踏着坚定的步伐跨出了监狱大门。在押往刑场的途中，要登一条数百级的石板路。敌人先威胁何功伟说：“上一步，我问你一次‘回不回头’，若你一回头，就免于一死，若走完石板路还不回头，就枪毙！”然而，令敌人震惊的是，何功伟毫不理睬，戴着沉重的脚镣，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高唱《国际歌》，一步一步地登上台阶。每上一步，敌人就诱降一次，但何功伟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直登山顶。在刑场上，敌人喝令何功伟跪下，何功伟怒斥：“共产党员是不会下跪的！”他高呼口号倒在血泊中，用26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理想的壮丽颂歌。

1942年6月7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大礼堂为何功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解放日报》特刊发《悼殉难者》社论，称：“（何功伟）在染满血腥的刽子手面前坚持党的立场，引颈就义，是何等的慷慨，何等的从容！这样可歌可泣的青年，真不愧为伟大革命政党的党员，真不愧为伟大民族的新鲜血液！我们全党的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他的不朽模范！我们相信，以这样党员组成的党，以这样的党为中坚的民族，必然能渡过一切的难关，达到民族解放的完全胜利。”

“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这副悬挂在追悼会会场的中共中央青委的挽联，是全党和全国青年对烈士一生的高度赞扬和深切怀念。

何功伟的英勇事迹感动了新时代。2018年4月，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人文艺术类节目《信中国》在黄金时间播出，节目中何功伟拒绝父亲营救的“绝命书”被朗读，当嘉宾念到“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时，无数观众为其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信仰、初心和共产党人尊严而震撼、动容。《人民日报》推出的“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于2019年1月24日载出《何功伟：坚贞不屈的青年楷模》，烈士的光辉事迹和为理想、为党的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引发了强烈反响，激励着广大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激发了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武汉受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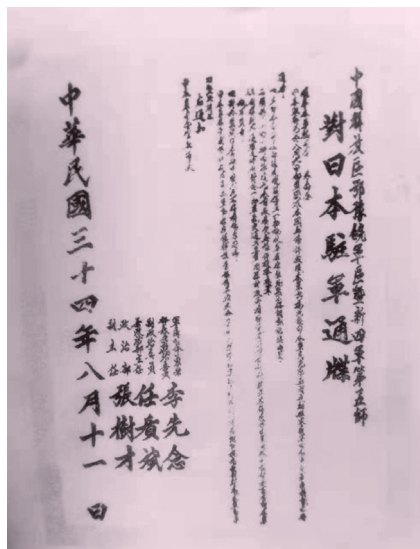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迎来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最后通牒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随后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朱德总司令接连发布7道全面反攻的命令,要求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

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推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11日,在武汉外围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五师向华中日军第六方面军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其在24小时之内派遣代表前来湖北大悟向新四军第五师无条件投降。

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五师集结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一线,并要求师部即日发布武汉市长及湖北省主席人选,立即委派官员,接收公共机关,出安民告示,维护秩序,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坚决镇压一切反抗。



新四军第五师命令日伪投降的通牒

同时通告全国: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派出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之命令。新四军第五师接到延安总部命令后,立即命令各军分区动员全部力量迅速占领所辖地区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令日伪军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并在指定地点驻扎,否则予以消灭。

全面反攻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斗争形势需要,中共中央致电鄂豫边区党委并华中局及河南区党委,批准在鄂豫皖地区成立中央局,决定徐向前任书记,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任前由郑位三代理书记,并指定李先念、陈少敏、傅钟、任质斌、程世才、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为中央局委员。

8月中下旬,新四军第五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再次对日伪军发出通牒,将主力向信阳、武汉一线推进,展开受降工作,并着手准备接管武汉。鄂豫边区各军分区(旅)部队在群众协助下,纷纷向敌占区发起进攻。

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沿平汉铁路东侧南下,进抵魏家店、花园后,迫使伪第十二师一部官兵45人携械投降。晏家河之敌伪拒不放下武器,被第三十八团全部歼灭。随后,第三十八团继续南进,在三汉埠附近遭遇正向汉口撤退的日军,因其拒绝投降,遂予以打击,俘敌2人,缴获大批物资。军区警卫团第二营收复夏店,缴获军用品一批。

第一军分区第四十二团、教导团在攻克黄陂甘棠铺和六指店后,发起对河口镇的围攻,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组织群众以火攻相威胁,迫使河口镇伪黄安县大队全部投降,共俘虏伪官兵300余人,缴获轻机枪9挺、重机枪3挺、迫击炮8门、长短枪200余支;20余日军携械逃窜。



汉口市民在中山大道欢庆抗战胜利



第二军分区独立五团向应山县之日伪发出通牒，限令投降。第五军分区第四十四团第一营、教导团一个大队和分区警卫连全歼驻京山永隆河拒绝投降的伪军张明道部。第四十四团配合天（门）京（山）潜（江）和天（门）汉（汉川、汉阳）两个县总队，在天门吴家新场歼灭拒绝投降的日军1个中队及伪军2个大队，击毙日军50余人，生俘日军中队长以下官兵5名，毙伤伪军100余名，生俘伪军官兵200余名，缴获平射炮1门、重机枪1挺、长短枪270余支。

京钟大队攻克下洋港，歼灭伪军1个中队，缴枪70余支。第三军分区江南挺进支队围攻石首调关、焦山河、章华港等伪据点，歼灭守敌，缴获长短枪40余支。第四十五团围攻潜江城，歼灭守敌一部，并在监沔总队的配合下，全歼驻监利毛家口的伪军沈家常部2个大队，瓦解其1个大队，缴获长短枪700余支、机枪9挺。接着，监沔总队将朱河伪军古鼎新1个团全部缴械。在沔阳胡场，歼灭伪军独立第十三旅苏振东部1个营。襄西第三十三团歼灭石牌镇敌伪军一部后，又在荆南的姚家集、雷都庙等地进攻日伪军，毙伤其40余人。

汉沔指挥部向盘踞峰口的伪军400多人发出通牒后，这部分伪军在中共党员黄彪掌握下携械投降。第四军分区警卫部队配合确山支队围攻竹楼和杨楼2个敌伪据点，俘获伪军100余人。第六军分区信应地方武装配合区乡基干武装攻占信应公路沿线的杨柳河、青石桥小庙、西双河等日伪据点。鄂南部队配合县、区、乡武装围攻马桥、陆溪口等日伪据点，伪军官兵200余名投降。贺胜桥之伪军700余人及嘉鱼伪军80余人也全部投降。豫中军分区挺进二团协同地方武装，在舞阳公路上截击敌军辎重部队，俘虏日军7名，缴获胶轮大车50余辆及大批物资，全歼驻叶县西南常庄之伪军300余名。

在十多天的受降斗争中，新四军第五师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毙伤、俘虏拒绝投降之敌伪军达3500余人，攻克中小城镇12处，敌占区人民重见天日，欢欣鼓舞。

武汉受降

在抗战胜利之时，以李先念为师长兼政委的新四军第五师就开始部署武汉受降工作，成立了由黄宇齐（邝林）任书记的武汉工作委员会，由杨经曲任主任、顾大椿任秘书长的武汉解放委员会，由杨经曲兼任司令员、文建武任参谋长的武汉解放军司令部。新四军第五师还派杨经曲以武汉先遣军司令的名义，进驻汉口洞庭街原俄国领事馆，负责接洽驻汉日伪军的投降工作。同时，鄂豫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也抽调民主建国公学部分熟悉武汉情况的师生，组成先遣队进入武汉市区，开展宣传、组织和调查工作，为接管武汉作准备。

不久，许道琦接受顾大椿的安排，到黄陂横店附近开展对伪军的接收工作。到了横店后，通过伪军送信，许道琦令伪军司令前来谈判。伪军司令接到通知后，换便衣如约而至，还带来了一大包伪钞。许道琦代表新四军第五师向伪军司令宣布朱德总司令命令，将由新四军李先念部负责接管武汉。伪军司令听后，表示愿意向新四军投降。

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即将胜利时，也紧锣密鼓地部署抢占武汉。8月10日，蒋介石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发出指令，要求留1个军监视宜昌、沙市方面之敌，同时派4个军向武汉挺进，解除日军武装，“应警告管辖区内敌军不得向我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11日，蒋介石发出电令，委任伪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北保安司令叶蓬为暂编第七路军司令，任命伪第十四军军长邹平凡为武汉守备指挥所兼新编第二十一军军长，负责武汉地区治安。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颁布中国各战区受降主官分配表，指定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武汉、沙市、宜昌地区日军第六方面军的投降。

26日，第六战区部队进驻宜昌。30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所在汉口设立。同日，孙蔚如任命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为武汉地区日军总受降官。第六战区各部纷纷向武汉进发，第六十六军宋瑞珂部经公安、潜江、天门、汉川向汉口前进；第五十九军刘振三部从宜城经随县、应山、



孝感向武汉东前进；第七十七军何基沣部从钟祥经京山、安陆、随县向武汉北前进；第七十五军柳际明部从宜昌出发，经沙洋、应城、天门、汉川向武汉西前进。一直在武汉外围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成果就这样被国民党军霸占了。

9月13日，王敬久抵达武汉办理受降事宜。17日，孙蔚如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有关人员到达武汉。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受降仪式，由孙蔚如主持受降。下午3时，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其参谋长中山真武少将立正排列受降席前，向孙蔚如行礼致敬。随后，冈部解除佩刀递上，以示日军第六方面军21.3万部属全部缴械投降。接着，



武汉中山公园受降堂

孙蔚如将《第六战区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交给冈部直三郎，冈部恭敬地在降书上用毛笔签名并加盖私章，表示“遵照实施”。

武汉受降后，内战阴霾悄然隐现，长期孤悬武汉敌后，艰苦坚持抗战的鄂豫边

区军民，面临着从大后方倾巢而出的国民党军队空前压迫。解放区人民和英雄的新四军第五师紧紧团结在一起，为保卫抗日胜利果实，制止国民党内战阴谋，又展开了新的斗争。